

广西文革血与火

铭记历史，传播真相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请勿用作商业用途，著
作权归张雄飞等原作者

学习编辑社 选编

1968，血与火的南宁城

(博讯 2005 年 4 月 25 日)

二舅一生命运坎坷。他最为悲惨的莫过于文革时的经历了。

在这之前，我的亲人都是远离政治的普通市民，可是这场运动，裹挟着可怕的洪流，滚滚而来，没有人能够逃脱得掉这场劫难。

我那时尚未出世，很多是听母亲叙述的。

“联指”和“四二二”是当时两个不同政治观点的派别，而南宁，也象全国各地一样，先是进行了大规模的辩论，继而发展成可怕的武斗，动用了机枪、坦克，在南宁这个巴掌大的小城里上演了一场真实的战争。

1968 年 8 月，“四二二”被“联指”包围在解放路一带，被迫缴械投降。大批的居民举着双手被押解出来，甚至伏在母亲背上的一两岁的孩子也知道把双手举过头作投降状。当天，“四二二”的广播员、成员共二十六人，被押到现在的广州照相馆门口，全部用机枪扫射死。父亲因为到处寻找二舅，亲眼目睹了这一幕。“还有几个是很年轻的姑娘啊”，父亲现在还念叨着。

这批老老小小，包括婴儿和老人在内的“反革命”，当晚被送到二中的教室里关押起来。二舅便是其中一员，他利用口袋里的一张外地来南宁的介绍信，逃出了二中大门。夜幕中，二舅低着头，一路小跑到了附近的市第一医院，闪身进了厕所，脱掉了外套，挂在门背后，找来一只口罩戴上，然后跑到了二中后门现在叫“阳光公寓”的地方寻找我母亲。那时我家刚搬到这里，二舅还不曾来过，他向一个坐在门口纳凉的老人问路。也许是苍天有眼，他问的那个老人正是我的奶奶！奶奶定睛一看，这不是二舅吗？

就这样，二舅暂时脱离了危险。但是明天，又是一个更危险的白天，所以二舅必须离开南宁。经过商讨，大家一致决定把二舅送去北京，北京因为不赞成武斗，被全国“四二二”看成是最安全的地方。

二舅的出逃，仿佛一幕惊险剧。母亲讲述这段往事时，语气中还透着紧张。

为了阻止“四二二”前往北京告状，“联指”在往北京去的列车上布下重兵进行盘查。从南宁去北京是不可能的了，父亲想起了有一个叔伯兄弟在湛江火车站卖票，于是，即将临盆的母亲陪二舅连夜上了开往湛江的火车。父亲的堂兄，找了一张介绍信，替二舅买到了一张开往北京的火车票。因是外地人，二舅得以顺利到达北京。

就在二舅逃出南宁的这一天，被关押在二中的反革命，绝大多数被一个接一个用麻绳拴着，一车车拉到邕江边用机枪射死！足足三天，邕江河畔枪声不断。那几天，河上漂满了尸体，江水全都染成了红色，西津水电站连夜开闸，好多天过去，仍有源源不断的尸体向下游冲去。一具具尸体从上游一直漂到港澳地区，港澳的报纸惊呼：“广西武斗造成人员大量伤亡，尸体漂至大海……”，一时震动世界。

大舅的一个儿子，我的从未谋面的十五岁的表哥，也在那晚魂断邕江。现在青龙岗上埋藏的只是他的衣冠冢。在这场惨烈的运动中，多少父母失去了儿女，又有多少孩子一夜之间变成了孤儿。

没有被俘的“四二二”成员和家属共三千多人（有说七千人），躲进了地下人防工事。那年头美帝国主义正在轰炸越南，南宁是革命大后方的最前线，因此

市里修建了不少人防工事，人防工事易守难攻，可谓一夫当关，万人莫敌，军队和联指一时无法攻入。

8月，正是南方的暴雨季节，南宁下起大雨来。据说上游雨下得更大，邕江水位看涨。但住在江边，邕江水哪年不涨几回？谁也没把它当回事。可1968年的大水却邪门，一夜之间竟把南宁城除了公园里的古炮台外都给淹了。坚守在地下的反对派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北京“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派人来救他们一命。他们拍过明码电报，派人突围上京紧急告状。但亲爱的“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对此置之不理……。几天后大水退了，解放军从地下人防工事里清理出许许多多发臭的尸体。南宁市武斗到此宣告结束。

后记：1979年，广西第四届人大好不容易召开了，大会其间从某地农村赶来了的一位不速之客，给大会提供的一份爆炸性的材料，揭示了六八年南宁百年不遇的大洪水的源头。来人是复员的前解放军某部工兵排排长，七三布告后的一个大雨倾盆的夜晚，他奉命率领工兵排在邕江上游炸毁了一座大水库的拦水大坝。当时他并不知道为什么要炸坝。（值得一提是邕江下游还有一座低水头的西津水电站。）大会文件发到代表手中，一个个看的目瞪口呆，大会要求严格保密。与此事有牵连的自治区党委书记，广西军区司令员刘重桂因此下了台。

桂林文革中的“五四雄鹰”是个什么组织

张雄飞

笔者为此采访了几位“老多”老朋友，我们对此组织有以下共同看法：

这是个政治观点与“打倒韦国清”的“桂林老多”、广西“4·22”相同的造反派组织，其成员主要由三种人组成：学生，工人，社会无业青年。

在桂林文革整个过程中，这个组织既不属于早期的学生组织如“师院老多”、工人组织如“桂林市工人红卫兵总指挥部”（简称“工总”）等规模庞大的群众组织，也不属于后来全市各造反派组织联合组成的“桂林市革命造反大军”（外部习称“桂林老多”），是个完全独立的群众组织，人数很少，从成立至1968年桂林“8·20行动”被镇压，都不超过百人。

其主要头头有：“司令”邓铁桥，“政委”王维堂，“作战部长”张邦林，“宣传部长”王仕强等。

“五四雄鹰”成立的原因，是因为“桂林联指”下属组织“五四铁笔”成立后，专搞打砸抢抄抓杀，扰乱了本来还算安定的桂林社会秩序，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恐慌与愤怒，于是，就有一些思想比较偏激的青年人，组织了“五四雄鹰”，意思是要用“雄鹰”克“铁笔”，与“五四铁笔”对着干。

由于组织成立的目的，是要用对“联指”的打砸抢，对付“五四铁笔”对“老多”的打砸抢，就决定了这个组织是个搞无政府主义崇尚暴力的极“左”组织。

例如，“老多”在桂林得势时，“五四雄鹰”就抓了“联指”的一些群众，并对其一些人乱打，乱斗。笔者就亲眼看见在市中心，“五四雄鹰”的成员，把一个“联指”女青年，剃了个阴阳头，用皮带有后面抽，那女青年跌跌撞撞地被赶着走。此外，在早期“造反大军”下属的群众组织批斗“当权派”时，他们时常不请自来，对“当权派”们拳脚相加，如街道的“老多”组织批斗红星公社的机修厂厂长×××时，“五四雄鹰”的“作战部长”张邦林，就带着几个人，不分青红皂白地上台就打，批斗红星公社党委书记×××时，张邦林也带人去打这个党委书记。

1967年8月10日，“桂林老多”根据“中央文革”“革命造反派要文攻武卫”的指示，有组织地抢了桂林军分区的枪，叫做“8·10行动”，“五四雄鹰”不听“造反大军”的统一指挥，由“政委”王维堂带队，去抢龙胜县武装部的枪，被该县武装民兵包围打死一人并全部抓起来，若不是该县武装部长田××曾当过桂林歌舞团团长，认识王维堂（歌舞团演员）而放了他们，“五四雄鹰”这些人还要吃苦头。

“五四雄鹰”的人，平时爱搞些出风头的事，比如开着抢来的汽车，在街上飞一般地招摇，驾驶楼的两边还各站着一个人，高高举着卜壳枪大喊“让开让开”显示威风，但真正打起仗来，他们又不行，比如武斗其间，他们几十个人在伏波山“占山为王”不去守据点，后来因为红卫师要武装缴他们的械，才迫不得已派一个班去守东江砖瓦厂据点，他们也不好好守，在据点里睡大觉，晚上还不用“造反大军”的口令，自己乱编口令，结果被“联指”民兵偷袭打得逃了回来。

“五四雄鹰”的所作所为，客观上也像“五四铁笔”那样，加深了两派的对立，不仅“联指”群众恨他们，“桂林老多”从上层头头到基层群众，也对他们十分反感。“师院老多”曾在十字街贴大字报，要求辩论“五四雄鹰”是不是反

革命组织？当他们的胡闹到实在难以容忍时，“老多”武装曾在“张永发商行”楼上架起重机关枪，武装包围了他们的据点文化宫。后来“老多”一些上层头头，认为他们虽错误严重，但大方向是正确的，与“五四铁笔”还是有本质区别，起码他们没有杀人的恶行，所以才不对他们实行武装缴械。

在“8·20行动”中，邓铁桥被关进牯牛山看守所，打得他像猴子那样佝偻着走路，多年后死在这个看守所里。

2010年1月1日

略论“桂林几个反革命分子”与“桂林老多”之不同

张雄飞

这是个可说可不说的话题。不过它既然是发生在桂林的一个历史事实，道道也无妨。那就是：1974年因写大字报揭露广西文革罪恶，“四人帮”被打倒后，在全自治区进行“革命大批判”的“桂林几个反革命分子”（官方也称作“张雄飞反革命集团案”和“七四专案”，在官方内部简称“张案”，故下文也简称“张案”）和“桂林老多”，有什么不同？或者是：“张案”这个组织，就是“桂林老多”的一部分；或者：1974年发生于桂林，影响波及全广西的批判桂林“八二〇行动”和与韦国清的斗争，就是“桂林老多”与韦国清斗争的再起和继续？”

对这件事到底应该怎样认知？很多人是弄不清的。而我本人，因与原“桂林老多”的成员们，“同是天涯沦落人”，开博客后，也不想对此细作什么区别，所以在博文中，有把二者等同起来之误。现在觉得，说清楚是有必要的。

例如在晓明所著《广西文革痛史钩沉》一书的第二十四回“批林批孔又批韦祖珍，桂林老多揭批八二〇”中，就有这样的叙述：

……当年的“老多”人被镇压下去了，但一些活下来的“老多”人的心里是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八·二〇”的。乘此“批林批孔”之机，活了下来了的“老多”骨干成员张雄飞、许瑞林、黄锦祥、龚志明、李新、陈体郁等一批人站出来，发扬“老多”人当年大无畏的造反精神，勇敢地站出来写大字报揭发批判《八·二〇公告》及其行动……

首先十分感谢晓明先生对我们当年揭发批判“八·二〇行动”的肯定，也欣赏他著书立说揭露韦国清及广西文革罪恶的勇气，但他的上述记述，是不够准确的。

1974年桂林写大字报的成员，不完全是原“桂林老多”的成员；他们与“桂林老多”，在组织上没有任何关系；在斗争的目的和性质上，也与“桂林老多”完全不同。

一、成员的不同：

“张案”的成员，是由7种人组成：

1、原“桂林老多”的成员。如张雄飞、罗绍安、许瑞林、刘玉生、李新、陈体郁等便是。这部分人占多数。他们先是虽受“八二〇行动”镇压，但误认为这个行动是执行《七三布告》，心想既然是中央支持的，就是想不通，也不敢反抗而任其批斗、关押，个个都作了检查“认错”。他们后来被陆续释放，回到社会后，才知道这个“八二〇行动”，是个乱抓人、乱打人、乱杀人的法西斯暴行，同时也知晓了发生在全广西境内的无数惨案，这就让他们对“八二〇行动”和广西的文革罪行，从忍气吞声到奋起揭露批判了。

2、原“桂林联指”的成员。如李和平、×××、×××(不便写出他们的姓名)等便是。他们原是“桂林联指”观点的，并是这个组织的骨干。如李和平，是“桂林联指”最初的30几个组织成员当中的一个，所以后来是“桂林联指”总部的参谋。但他从来不参与“桂林联指”的各种违法行动，对于桂林的“八二〇行动”及发生在全广西境内的滥杀无辜，他更是深痛恶绝，所以，1975年春节，

他和他的朋友们，去桂钢找到了我，毅然参加了写大字报的活动，并成为最坚定的“张案”的主要成员。

3、没参加广西文革，从外省调回桂林工作的人。如哈康文便是。他原在湖南工作，七十年代才调回桂林钢厂当技术员。在了解了桂林及广西的文革惨案后，便于1974年春，与罗绍安、张雄飞三人商量，决定在桂林发起写大字报揭露桂林和广西的文革问题，在桂林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的就是他。

4、文革被杀害者的子女。如刘月婵、邓平波便是。刘月婵是临桂县法院院长刘锡成之女。在临桂县的杀人狂潮中，刘锡成夫妇双双被害。这还不够，该县的“联指”，又去东北把“武斗”之前，就回老家避难的他们年仅17岁的儿子抓回来杀掉。邓平波的母亲罗玉珀是临桂县医院的副院长，父亲也是临桂县的中层干部，都被杀害了。所以，当1974年大字报上街后，他们就怀着父母被害，自己和年幼的弟弟妹妹成为孤儿的仇恨，参加了“张案”的活动。

5、既不是“广西422”，也不是“广西联指”，属于“中间派”组织的成员。如赖东荣便是。他原在平桂矿务局冶金机修厂当技术员，七十年代初期随全厂迁调来桂林市。在平桂矿务局时，喊“打倒韦国清”他不举手，喊“打倒伍晋南”他也不举手，他组织了一个中间派组织“鲁迅兵团”，主张对立的“422”和“联指”搞大联合，不要搞武斗。当武斗暴发，机枪哒哒叫，手榴弹轰轰响的时候，他竟执着地冒着生命危险，跑去两派的据点中，做两派的思想工作，劝他们不要打，要联合。就是这样一个人，当1974年桂林大字报上街时，他逐渐看清了广西文革的问题，便坚决参加写大字报的活动，他既反对“八二〇”，也反对韦国清，也是“张案”把观点坚持到底的主要成员。

6、“桂林老多”“桂林联指”都不参加的人。如黄锦祥便是。老黄原是桂林雁山植物研究所的技术员，他最关注的是搞水稻秧苗栽培的研究，用那时候的话来讲，他是个只关心业务，不关心政治的“白专”技术人员。对文化大革命，他原来是不敢参与的，主要原因是他的父亲、母亲、大哥、姐夫都被划成“右派分子”并被劳改，妹夫也是“右派分子”，岳父是“历史反革命分子”。他为什么参加了我们写大字报的活动呢，一是因为被我们所揭露的“八二〇”和广西的文革罪行所震撼，二是因为他当时为了解决广西在“倒春寒”中的“烂秧”问题，创造了一种叫做“墙壁育秧”的方法，即利用农民向阳面的墙壁，采用他的特殊技术手段来育秧，就可以解决“烂秧”问题，但单位的领导因为他的“成份不好”，不支持他，他火了，就加入我们的行列，用写大字报，宣传他搞科学研究受压制的情况，还两口子拿着他研究的成果，去到北京，要在天安门展览宣传贴大字报，还打算在中南海前拦中央首长的汽车，为“张案”（此时多人已被捕）和他的科学试验受压制鸣冤，这样他就成了桂林的“天安门分子”，被桂林公安从北京押解回来，最后被判了15年有期徒刑。

6、部队转业下来的、1974年前没参加广西文革的成员。如彭富森便是。老彭复员前曾任解放军127师师部组织干事，回桂林后，就碰上了桂林的大字报风潮，他也因为赞成大字报上的观点，积极参加了活动，是“张案”的活跃分子和主要成员，最先被抓的就是他和李和平。

所以从成员的组合来看，“张案”成员与“桂林老多”原成员，显然完全不同。“张案”成员，其实是社会上一群有正义感，有良知的人，因反对广西文革暴行才生死与共进行斗争的！他们的联合，不是文革派性的联合。

二、组织的不同

1968年8月20日的桂林“八二〇行动”，标志着“桂林老多”这个群众组织，因武装镇压而被彻底瓦解不复存在了。

1974年到1975年，桂林的大字报上街活动，原来是没有组织的各自为战。到了1975年春，能顶住政治高压坚持下来的大部分人，利用四届人大颁布新《宪法》的时机，起初计划发起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群众组织“革命群众监督委员会”，并写好了《章程》，因部分成员认为这样搞不适宜，便改为成立“桂林市工农革命群众执行捍卫新宪法协会”（简称“捍宪会”），后又因一部分成员不赞成，最后改成由“编委会”组稿和统一编辑书写的大字报专栏：“桂林市工农革命群众执行捍卫新宪法论坛”（简称“捍宪论坛”）。这个组织，是在“桂林老多”已消亡将近七年后组成的，因此它在组织上与“桂林老多”，没有任何关系。

（附件一：《革命群众监督委员会章程（草案）》，法院影印件）（因电脑技术不行，插入图片失败，抱歉！）

（附件二：《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80）刑复字第52号》有关段落：

“张雄飞……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五年春，打着批林批孔旗号，进行串联，妄图建立秘密联络点，成立所谓《桂林市工农革命群众执行、捍卫新宪法协会》（后改为《论坛》），自任该会中心组长，制定《协会》总纲和《革命群众监督委员会》章程，煽动群众，制造舆论，妄图实行乱中夺权。上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本院认为，申诉人张雄飞，于文化大革命初期，搞打砸抢破坏活动，受处分后仍不悔改，打着批林批孔的幌子，建立秘密联络点，成立非法组织，妄图实行乱中夺权，其行为已构成反革命罪。申诉人张雄飞否认犯反革命罪是无理的。但据其所犯的罪行，原判量刑过重。据此本院判决如下：

一、撤销原桂林市人民法院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六日（76）刑判字第67号刑事判决；

二、改判反革命犯张雄飞有期徒刑十二年。刑期从本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前关押的日数以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六日起至一九八七年七月十四日止。”）

三、斗争特点不同

一、如果把“桂林老多”的斗争，分成几个阶段，那恐怕就是：

（一）最初的反对当权派压制群众“革命造反”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阶段；

（二）联合全市“革命造反派”组成“革命造反大军”，进行全市大夺权行动阶段；

（三）“造反大军”——即“桂林老多”与“桂林联指”的争夺掌握桂林权力斗争的阶段；

（四）后期的反对韦国清压制和镇压“桂林老多”和“广西422”阶段。

而从1966年6月至1968年9月，桂林市文革的特点是：

（一）集中表现为两大派——“桂林老多”与“桂林联指”政治的和军事的斗争。

（二）而这两大派，都是拥护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都是按照或利用当时中央

的战略部署进行活动的；都是部分或全部得到当时中央的支持的。

(三)这两大派，最终都被中央定为“革命群众组织”。

(四)这两大派斗争的目的，都是为了完全控制或主导桂林市的各级政权。

二、“张案”与之比较便可见：

(一)“张案”的斗争开始是写大字报上街，后来写大字报的人，联合组成“捍宪会”和“捍宪论坛”，阶段性很简单；

(二)“张案”没有对立的群众组织，矛头始终对着以韦国清为代表的区市两级党政机关，所以是民与官之争，不是派与派之争；

(三)“张案”的斗争，只是利用了当时“批林批孔”的口号，实质否定的是中央支持的广西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因此他们的行为，从来得不到中央的支持，反而也受到来自中央的压制和打击；

(四)“张案”成员所成立的组织，并不被中央和广西视为“革命群众组织”，相反地，从大字报一上街，就被定为“反革命活动”，其后的组织，也被定为“反革命集团”组织。

(五)“张案”从来没有以夺取桂林市各级政权为斗争目标。

(六)“张案”的斗争，始终坚持非暴力的、和平的说理斗争。（但被镇压时，则像“桂林老多”那样挨打被斗，如李和平，因他有“双重罪恶”：“张案罪”和“背叛‘联指’罪”，多次被拉开牢房用木棒毒打，打得他遍体鳞伤，膝盖肿得像海碗那么粗，爬着回牢房。审讯时，办案人员还拿成把的大头针扎他的头皮，他回到牢房，竟从头皮里，扯出9根大头针来！）

四、斗争目的与性质的不同

斗争目的，决定斗争的性质。

如上所述，“张案”成员1974年至1975年的斗争，可分两个阶段：

一、1974年底以前的大字报阶段。这个阶段的斗争目的，是联系“批林”，揭露“八二〇”和韦国清的文革罪恶。揭露的重点，是乱杀人的大量冤案。这样做，是为了达到四个目的：

1、希望通过大字报和向中央递交书面材料，让中央了解广西和韦国清的问题，把韦国清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

2、要求惩办逍遥法外的杀人凶手，把因打人杀人有功而入党作官的违法分子，从党内和政权机关内清除出去；

3、要求党委为死难者平反昭雪；

4、给死难者的家属经济补偿和切实的生活照顾。

虽然“张案”的成员，在写大字报过程中，也有控诉“革命造反派”被镇压的内容，也提出过“革命造反派”要翻身的口号。但通观其整个斗争过程及斗争诉求的实质，“张案”主要是利用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口号，揭露广西文革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以争取中央解决广西大肆乱杀人的严重问题。

所以“张案”的斗争实质，是坚持人道主义，反对反人性的法西斯主义，这就直接捍卫了人的最大权利——生命权。

二、自1975年春天起，桂林的大字报活动，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即成立了“捍宪会”和“捍宪论坛”。这时的斗争内容，除了继续揭露桂林和广西的文革惨案外，向社会和党政机关呼吁不是在口头上，不是在文字上，而是在现实的生活中，兑现“新宪法”赋予公民的民主权利：即“四大”（大鸣、大放、大

辩论、大字报）自由及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并提出群众有监督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执行“新宪法”和党的方针政策的权利。

由此可以说，到了这个阶段，桂林的大字报活动，已经起了质的变化，即人民群众自觉起来捍卫和争取社会主义法制与民主权利的质变。

如今人民群众要求国家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其中一个重要内容，不就是建立法制社会，给予人民群众真正的民主权利，以对国家政权，实行有效的监督吗？这是政治改革应有的题中之义。而在 1975 年，“张案”虽然还有着某些局限性，但是已经把上述问题的实质提出来了，并且不怕镇压，以成立“捍宪会”和“捍宪论坛”的实际行动，行使了（即便只有短短的两三个月）“新宪法”中赋予公民的民主权利。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实质，“张案”1974 年 1975 年的那场斗争，不是广西文革中的两大派的斗争，是社会上各行各业、无职无权的一群普通干部群众，与实施和掩盖广西文革暴行的各级当权者的斗争；是普通老百姓与当权者人权与反人权，法制与反法制，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这些都是与“桂林老多”不同的。

如果把“张案”的斗争，依然归结为广西文革两派的争斗，那便是没有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没有作深入的研究和科学的分析，仅凭一得之功一孔之见而作出的轻率结论。

五、受镇压迫害的特点不同

一、“桂林老多”在 1968 年既受到武装围剿，“八二〇行动时又遭大抓捕、大屠杀、大批斗，其规模之大，受害者之多，“张案”是不能与之比拟的。

二、但“桂林老多”受迫害、关押、屠杀的，绝大多数是中下层头头和普通成员。而上层负责人则不同。例如在《七三布告》颁布后，广西两派赴京学习班在北京执行“各自清理”（《七三布告》语）本组织的“坏头头”时，“桂林老多”赴京代表团的头头们，除了被迫把“二刘”（即刘天偿、刘振林，后者不是“市革委会委员”）当作“坏头头”“揪出来”批斗外，其他的头头，在京时都被韦国清当作“统战对象”不批不斗不关。只是在回到桂林后，才有了三种“待遇”。以“桂林老多”的 21 名“市革委会委员”为例：

1、二人被关进看守所；

2、部分被关在单位；

3、部分不关，仍保留“市革委会委员”头衔，只在单位和各种学习班上被批斗。其中学生身份的，更受“优待”：有的从来不关只小批不斗。即便是“造反大军军长”×××，也是先短期关在学校，后下放农村监督劳动，最后分配工作。

所以在 21 名“市革委会委员”中，除了刘天偿被长期关押在看守所，最后以所谓的“刑事犯罪”被冤杀外，没有一个被判刑的。

“张案”则是 20 几个主要成员，全部被关进看守所。被关押和服刑时间少则 3、4 年，多则 7、8 年。其中被判死缓等重刑的 4 人。

三、在七十年代的中、末期，官方把要“从严处理”的“桂林老多”头头，从人民内部矛盾转换成敌我矛盾时，都扣上“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如被执行死刑的刘天偿；被判刑 10 年的“红卫师师长”唐××；还有“桂林工总”的几个头头如鲁××、伍××等。不过坏事也变成了好事，当“张案”彻底

平反时，刘天偿之外的这些头头们，也都彻底平反了，并“用麻袋去装补发的工资”（社会传言），而南宁、柳州的“422”头头们，却没有这种“运气”。

六、受批判的规模不同

一、“桂林老多”被武装消灭后，并没有对这个组织进行“革命大批判”，仅对个人问题——被掌权者定为“犯罪”和“犯错误”的问题，进行单个的批判。而批判的范围，也仅限于单位和桂林，只是在批判“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时，才在《桂林战报》上，点了刘天偿和刘振林的名。

二、对“张案”的“革命大批判”，则不同了。其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可以说在广西是“史无前例”的。

1、《桂林战报》、《广西日报》连篇累牍发表大批判文章和“评论员文章”、“编辑部评论”文章，批判“张雄飞那几个反革命分子”、“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

2、《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也刊载若干广西党政负责人的文章、发言，对“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进行“革命大批判”，于是把批判的影响，扩大至全国。

3、在四年多的时间中，桂林市委、自治区党委，对“张案”多次召开万人大会进行大批判。在所有的其他重要大型会议上，也不忘记上挂“四人帮”，下联“张雄飞那几个反革命分子”，或“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y7 g# r. U8 _9 A

4、桂林市、自治区两级党委的主要负责人，多次带头批判“张雄飞那几个反革命分子”、或“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他们的讲话，都刊载在《桂林战报》、《广西日报》的第一版头条。

5、桂林广播站、广西人民电台，大肆播报批判“张案”的消息和文章，造成超出国界的影响。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详情见本人博客文章《这样大的冤案为什么不写——三揭〈桂林晚报〉……》）

2010年10月8日星期五

桂林“文革”工人领袖刘天偿的惨死

张雄飞

几十年了，在“文革”中受尽苦难的“桂林老多”的老朋友们，每每回忆起往事，就想起刘天偿，他是个没有过错却受尽折磨，没有打人却被冤作杀人犯枪决的一条硬骨头汉子。

一、一个可亲可敬的工人领袖

刘天偿出身贫寒，小时候在街上叫卖油堆，长大了打铁，后来进了桂林汽车修配厂做四级锻工，1968年时约35岁，身高1.7米左右，体魄强壮，站在那里，有一股威武的英雄气。他文化不高，待人诚恳，守信用，讲义气，性格豪爽。认识他的人，都自然而然地产生敬爱之情。所以，当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怀着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本能的感情毅然参加运动，成了“桂林老多”派的工人领袖“桂林市工人红卫兵”总部（简称“工总”）的第一号头头。

据工总的第二号头头唐玉星回忆：刘天偿当了工总的头头后，对总部人员的管理和要求很严，不仅在政治上要大家紧跟党中央毛主席，在生活上也不允许乱来，特别对男女之间的关系，他更是不允许有不正常的现象发生，发现有不好的苗头就开民主生活会直接批评。他经常对工总成员说：我们是工人阶级的革命群众组织，尤其是在总部工作的同志，要注意影响，我们的言行举止，都要对这个组织负责，如果我们在生活问题上不检点，在群众中能有威信吗？那是成不了“正果”的。

老朋友曾广福回忆说：“我是在武斗期间才熟悉刘天偿的，我们后勤部在广州饭店开了个食堂，由我来管，武装人员都到那里吃饭，刘天偿基本天天去，他没有架子，待人和气，和这个和那个打招呼，有什么吃什么，没有什么特殊要求，来了就打了个饭菜出来，一个人坐在那里，吃完就走。他也有一个警卫员，是个15、6岁的小孩子，外号叫做‘太阳宝’，个子矮矮小小的，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他不要派头。”

二、在“桂林老多”反围剿中的贡献

在1968年夏天那场12个县的武装民兵团配合“桂林联指”民兵师包围攻打“老多”的时候，刘天偿是坚定的反围剿主将。

唐玉星等回忆：“5月4号，‘联指’为了挑起武斗抢占据点时，刘天偿正在北京，这时我们工总大有群龙无首之感，怎样对付‘联指’的挑衅行动？打还是不打？怎么组织怎么打？不知道怎么办。记得5月8号，在师院里的《红卫兵战报》楼上，开了一次造反大军各单位领队会议讨论形势，大家的意见很难统一，因为周兆祥（市造反大军主要头头）和刘振林（学生领袖）在学生中的影响大，而在工人中，刘天偿的影响最大，所以必须等他回来表态。刘天偿从北京回来后，市造反大军又开了一次全市下属各组织负责人会议。会上，刘天偿表态说：‘联指’抢占了那么多据点，特别是在南边占了榕城饭店制高点，在北面占了鸚鵡山制高点，把我们夹在中间，这就等于把枪对准我们的胸口，把刀架在我们的脖子上，我们已经没有路可退了！为了生存，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我主张打！而且要狠狠地打！因为我们是为正义而战！我们打的是红色山城保卫战！’

刘天偿的话，使大家的意志更统一了，反围剿的信心更足了。现在回顾这段历史，如果当时没有刘天偿等‘老多’头头们的主张坚决抵抗，或者指挥不力，让‘联指’打了进来，那么‘桂林老多’和人民群众，就不会是‘八·二〇’被杀害几百上千人这个数目，可能会像南宁那样成千上万！”

围剿和反围剿的仗越打越激烈，民兵所占领的观音阁口的鸚鵡山（又名观音山），像把铁锁，把“桂林老多”和数万群众封锁在阳桥以北、观音阁以南狭小的区域里。最致命的是：桂林市粮食和油料等等副食品仓库，都在鸚鵡山以北的北门一带。而那些仓库，也都被“联指”武装民兵占领了，所以“武斗”发生后不久，“老多”区域内的粮店就没有米卖了，广大群众和“老多”武装人员，眼看着就要挨饿了。在这种形势下，必须首先拿下鸚鵡山，然后攻打北门一带的粮油仓库和养猪场等据点，以解决缺粮的燃眉之急。

于是，主要由学生组成的“红卫师”，与主要由工人组成的“工总小分队”决定联合作战，把北门观音阁一带拿下来。

鸚鵡山地势极为险要，桂林古城的北城门，就依山筑在那里，至今还可以看见那些险峻的古城墙的遗迹。

战斗开始，刘天偿亲自指挥“工总小分队”强攻鸚鵡山，只用了半天时间，就把鸚鵡山攻占了。

那次“工总小分队”和“红卫师”所向无敌的气势，让年过花甲的曾广福记忆犹新：“那次战斗，我们负责送饭，真让我亲眼看见什么叫做‘兵败如山倒’了！打鸚鵡山只要了半天，‘联指’民兵败得像水推一样，一下子就挨推到储木场、推到八里街那边去了，我们向观音阁打了几炮，民兵给吓得跑都跑不及。”

“打下北门以后，我急忙组织十几辆大汽车，粮呀，油呀，糖呀，猪呀，拉了几几天几夜。粮食拉回来后，粮店马上开门卖粮，老百姓好高兴啊，粮店门口像过年一样热闹，有的群众甚至跪下来感谢我们。如果打不下北门，我们和老百姓就会饿得拿不动枪听任‘联指’打进来杀人！刘天偿指挥打胜了鸚鵡山这一仗，我看很有功。”

有两件事是唐品端难以忘记的，他说：“反围剿期间，和‘工总’观点相同的组织‘五四雄鹰’，成员多是街道上的年青仔，无政府主义很严重，他们住在伏波山下，又不出来守据点，一天在那里瞎掰，红卫师坚决要求取缔他们，要武装缴他们的械，不缴械就消灭。红卫师把这个决定通知了工总，刘天偿马上召集工总的头头开会，讨论怎样对待‘五四雄鹰’问题？最后会议一致认为，不管‘五四雄鹰’怎样操蛋，大方向是正确的，是打韦的，是紧跟毛主席的，虽然有些作风、生活上的问题，属于教育问题，还是要教育团结他们，不能把他们置于死地，但是，他们必须守规矩，必须出来守据点。那次会议我参加了。做红卫师的工作由汤其新去，做‘五四雄鹰’头头邓铁桥的工作，要他出来守据点维持治安，刘天偿点了我的将：‘叫唐胡子去。’

邓铁桥是个像‘草头王’那样的人物，有时是不讲道理的，造反大军总后勤部部长阳文生在伏波山下河洗澡，上来枪就挨他缴去了。很少有人敢去伏波山的，我去了，我用的是一支20响的卜壳枪，

见面后，邓铁桥讲‘唐胡子，把你的卜壳枪给我看看嘛。’我晓得他要名堂了，我就拿出来给他看，他第二句话就讲：‘唐胡子，我们换一换枪呀。’我讲‘枪是拿来打仗的，换枪可以，你要跟我上战场。’他讲‘你瞎掰了，我不要你的。’我讲‘枪你不换可以，不去打仗守据点不可以。’他讲‘我守伏波山不是守据点吗？’我讲‘你守伏波山防的是哪个呀？现在要你去守北门蒋家岭砖瓦厂，你去

不去？你今天就要答复我，你要是不去，明天红卫师就来武装缴你们的械，把你们的枪全部缴去发给别人去守据点。’他知道红卫师那帮学生仔打仗厉害，惹不得，就乖乖地派一个班去了。在避免和‘五四雄鹰’打内战免使联指有可乘之机的问题上，刘天偿是有贡献的。”

刘天偿的第二个贡献更大，那就是因为他政治上的敏锐和远见以及宽大的胸怀，使“桂林老多”避免了一次后果不堪设想的内斗。

那是在反围剿开战之初，造反大军商量成立联合指挥部，将地、市、铁路三合而一，统一编制，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红卫师一个主要头头对这个建议不赞成，认为庞大的造反大军成分复杂，还有些乱七八糟的人，合二而一，反而会影响战斗力，所以红卫师不能与其他武装合并，要独立作战。本来那天晚上已经要召开合并誓师大会的了，只因为红卫师没来参加，开不成。于是，造反大军中的一个重要部门的人，认为这个红卫师的负责人有个人野心，像军阀一样，自己抓着个人势力范围的武装，不愿与其他武装合并，不除掉他，反围剿不会胜利。因为唐品端熟悉那个负责人的情况与活动规律，就找他，要他去搞掉那个学生领袖。唐品端一听，就连声说：“要不得，莫乱来，这不是小事情，牵动到整个大局，那个人是学生的头头，特别在中学生中有威信，中学生又是实力最强，最打得干得的，如果这样就搞掉他们信任的头头，肯定要和工总干起来，那时不等‘联指’消灭我们，我们自己就互相搞清楚了。这事我得先问问天偿，看他的意见怎么恰当处理。”

唐品端于是就去工总总部的所在地“张永发商行”，当他把上述情况对刘天偿一讲，刘天偿马上说：“不行，不行，胡子莫乱来，兵临城下，大敌当前，自己莫内讧！”唐品端一听，更加觉得刘天偿还是有眼光、心怀全局、没有个人偏见的好同志！那个建议也就胎死腹中了。

三、在北京的坚决斗争

1968年7月，虽然中央的《七·三布告》下达了，但“桂林联指”和12县民兵对“桂林老多”的进攻却越来越猛烈，如7月13日攻打桂师和榕湖饭店“老多”据点，失败后，7月24日，又对桂师“老多”据点发起猛攻，又被击退。此时，“老多”虽然只固守，不进攻，但桂林的“大武斗”，仍处于越打越激烈之中。

为了有效制止“武斗”，中央令两派群众组织的代表赴北京谈判。

“桂林老多”的主要头头刘振林等于某天夜晚，全部化装成解放军，由解放军用汽车护送，通过“联指”控制的区域南门，直赴李家村飞机场，登机前往北京。

他们一到北京，就发现中央对“桂林老多”的态度彻底变了，因为此时的广西大局已定：中央偏信韦国清谎报的军情，在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黄永胜的直接策划下，把广西“4·22”和“桂林老多”，定为反革命了。在处理桂林问题时，黄永胜和韦国清，已认定桂林反围剿最坚决得力的刘振林和刘天偿，是桂林“一系列反革命事件”的罪魁祸首。

当刘振林等人去北京的时候，虽然中央也点名要刘天偿去，但他没去，因为“桂林老多”担心，如果头头们都去了北京，“老多”的领导力量就大为削弱，如果“联指”和民兵趁机打进桂林来，“老多”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损失就大了！所以第一批没让他去。

然而韦国清等人哪能放得过他？责令桂林当地驻军，务必把刘天偿“请”到

北京去。

刘天偿去到北京时，伙伴们看见他几乎认不出来了，只见他到处都是伤，原来当他去到李家村机场上飞机前，被“联指”一群人包围起来，往死里拳打脚踢，只打得他满身是血。

见刘天偿被打，“桂林老多”的代表们就想：为什么中央请去北京的代表，随便可以乱打，连生命都没有保障呢？

7月25日，中央首长接见两派代表，刘天偿当场拿着血衣控诉联指，叙述他挨打的过程。在血衣和铁的事实面前，黄永胜和韦国清等不得不轻描淡写地批评“联指”打人不对，要他们写个检讨，就不了了之了。

那天的接见，刘振林和刘天偿极力为“桂林老多”辩护，虽然他们讲的理由充分，事实不可反驳，但是，谁有回天之力，去改变那个已定的大局。

在北京开了批斗会。批判刘天偿之前，桂林市的驻军首长王汝保等找唐玉星谈话，问：“你觉得刘天偿这个人怎么样？先和你讲清楚，这回如果你组织批判刘天偿组织得好，保证你可以当自治区革委会委员或者常委。”唐玉星说：“刘天偿这个人蛮好的呀，从小卖过油堆，家里是贫民，本人是工人，根正苗红，他各个方面表现都不错，在群众中威信很高，你讲组织批判他，我没有把握。”唐玉星回忆道：“他们听我这样讲，心里就不舒服了，但会还是要开呀，对刘天偿大家不知讲些什么东西？你讲一句，我讲一句，批判不起来，揭发不下去，更斗不下去，刘天偿在会上呢，毫不畏惧，总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不像一般人那样面对高压，就‘我错了，我低头认罪’，他没有的，态度坚决得很。结果第二天的会开得很不成功，不欢而散。”因为批斗刘天偿没有成功，自然唐玉星的“自治区革委会委员或者常委”也就没当得成。不过与其说没当成，不如说是唐玉星抵制了那不光彩的巨大利诱。由此可见，即便在那种非常的情况下，刘天偿的优秀品格，在朋友们心中依旧像旗帜那样飘扬。

开批斗会以后，刘振林和刘天偿都被隔离起来了。而刘天偿，从此便永远失去了自由！

四、冤死狱中

刘天偿自1968年被关后，一关就是八年，最后广西的司法部门竟在1977年，判他为现行杀人犯枪决了。然而，他的死，却是一起人为制造的冤案。

先听听唐品端是怎样讲的：“我因为参加桂林‘武斗’，被判了20年，在露塘农场劳改时，有几个从桂林新去的犯人，是和刘天偿关在一个‘笼子’里的，他们告诉我刘天偿硬是被冤杀的。起因是：一个农民小偷，关进刘天偿同一间牢房。因刚关进来吃不下饭，同‘笼子’的其他犯人就分来吃，关了个把礼拜后，那个小偷肚子里没得油水饿了，可是那些犯人都分他的饭吃，他气不过，就向看守所所长报告，那所长就把‘笼子’里的人，一个个拉出去打得鼻青脸肿，于是在‘笼子’里引起了众怒，就商量教训他一顿。有一天，几个人把他扑倒，用被子捂着住他的头，就你一拳我一脚地痛打，没想到竟把那人连打带憋地弄死了。

打死人以后，看守所就来调查，把犯人一个个提出去审问。但办案的人员在审讯时，却逼迫犯人说：‘是不是刘天偿打死的？是不是刘天偿指使打死的？不是？不是就是你打死的，是你指使打死的！’然后令犯人们写供词、签字。犯人们为了活命，就只得按照办案人员的意思，把罪责统统推到刘天偿身上去。

其实刘天偿并没有出手打人，也没有指使其他犯人打死那个人，此时他已被关了八年，病弱得连站都站不起来了，怎么还可能动手打人？

犯人们回到‘笼子’，都把办案人员审讯他们的情况告知刘天偿，刘天偿听了便讲：‘这个责任呢，由我来承担就是了，我已经关了八年了，也不晓得哪天能够出去，我也不想活了。只要求你们出去后，对我的兄弟们讲，我刘天偿绝对不会因为一罐饭打死人！’”

再听听唐玉星的回忆：“80年代末我在叠彩路和一个叫陆坚强的人开饭店，有一天在闲聊到工总时，他问我‘刘天偿你认得吗？’我讲哪不认得，他是第一把手我是第二把手。他讲‘他死你晓不晓得？’我讲‘他死我晓得。不是听讲在牢里打死了人？’他讲：‘不是的’，接着就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我：

当时陆坚强和刘天偿同关在一个‘笼子’里，打死人那一天，陆坚强恰巧被提审出去，回来以后，‘笼子’就打死人了，那个人是什么原因挨打死了呢？因为牢里的犯人们饿，抢他的饭吃，他不服，就报告，让看守所长把牢房里的人打得半死，那些挨打的人回来以后，就拿被窝罩着他头你一拳我一脚打，这样就把那个人搞死了。他听牢里的人讲，打人的时候，刘天偿只是躺着拿口盅敲了一下。后来为什么讲是刘天偿打死了呢？凡是被审问的犯人，审问的人都这样问：‘这个人是怎样死的？是不是刘天偿打死的？是不是刘天偿指挥打死的？’被提审的人讲不是，办案的人就讲：‘你讲不是，那就是你打死的，是你指挥打死的！’在这种情况下，犯人们只好个个都讲是刘天偿打死的、是刘天偿喊打死的人了。”

许瑞林（原桂林市法院副院长，上世纪五十年代毕业于北大政法系）也回忆刘天偿被杀这件事，他于2009年9月24日说：“1980年冬我从英山监狱平反回到桂林，大概是81年初吧，有一天来了三个人，说是曾经和刘天偿一起坐牢的。说‘听说你许老师出来了，你很有能力，懂法律，因为我们的良心过不去，所以来找你，讲刘天偿冤枉的事情。我们是和刘天偿关在一个“笼子”里的，有天因为抢饭打架，打死了一个人，那时刘天偿有病，躺着动不了。那个人死后，公安就来调查，说是刘天偿主使打死了那个人，我们说不是的，他们说这件事责任重大，你们如果不说出主使的人，责任就是你们的。因为被公安审问逼来逼去，我们都不敢不作证说是刘天偿主使的。如今你许老师出来了，希望你帮把刘天偿这个冤案翻过来。’我那时胆子很大，说‘你们敢作证吗？’他们说‘敢！’我说那好，你们等着我的消息。我就去找刘天偿老婆，想让她出面申诉，这样我就可以帮她把冤案翻过来。可是我找到刘天偿老婆后，她说‘我已经嫁人了，儿子现在又在劳教所，现在我再出面说刘天偿的事，对我现在的家庭不好。’她这样说，我就只好作罢了。”

刘天偿会变成杀人犯吗？唐玉星说：“刘天偿是不打人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从来不主张打人，不主张抓人，也不主张杀人。比如武斗时关在工总‘张永发’里面的俘虏，他不准打，讲乱打人不行。”

据说判刘天偿死刑以后，有十天上诉时间，他在牢房里大声喊：“给我纸！给我笔！我要写上诉！”但看守所就是不给他纸和笔。

曾广福说：“枪毙刘天偿那天，公安用汽车押他游街，从十字街往南门游了一趟，我亲眼看到他挨用绳子勒着嘴，想喊都喊不出！”

还有一种传闻：刘天偿被枪决后，马上被剥皮，送去医院给一个烧伤的人植皮……。

结语：刘天偿杀人案，肯定是个冤案，而且是文革的派性杀人，理应复查纠正，这是一切正直的人们的期盼。

雾锁群山——文革狱中诗词

张雄飞

我因 1974 年春写大字报上街，揭露文革中以韦国清为代表的帮派势力，在桂林在广西全境，对无辜人民群众进行镇压、屠杀的暴行，被韦国清的区党委定为“现行反革命罪”，于 1976 年 7 月被判无期徒刑，押解到广西第一监狱(即英山监狱)劳改。

可是，我们被判刑后，不让“劳改”，而被关进狱中之狱——单身牢房约四年之久。什么原因呢？一是我们是当时广西“反革命罪行”最严重，因而是最危险的“阶级敌人”，不宜放出来劳动；二是凡是被判刑的犯人，首先要认罪服法方可劳改，反之，就被关进单监(小牢房)，直到老实了，认罪态度好了，才获得那个起码吃得饱，穿得暖，能活动身体的小自由。而我呢？是个自被捕之日起，直到彻底平反出狱，在将近八年的时间里，从不检查，从不认“罪”，从不揭发别人，是个得到乔××和刘××(广西后任第一、二把手)“这个人相当顽固”、“顽固到底”好评的“犯人”，这样，被长期关进单监，就是很符合“监规”的事了。

双手沾满无辜者鲜血的人，照样入党，当官，甚至当大官，反对法西斯暴行的人，则被批，被斗，被判，被囚，面对这样的现实，怎不让人至死都怒发冲冠。

在身陷囹圄的绝境之中，怎样发泄心中的愤懑，写诗是最好的选择了。所以从 1977 年起，至 1980 年 4 月放出单监，我都进行着诗歌“创作”。

然而我所作的诗，都是“反”诗，而且不是一首，是数十首，一旦被发现，“罪行”可就大了，肯定要被加刑。我已是“无期”了，再“升级”，起码是“死缓”！

所以，我就把诗做在肚子里，做一首，死记一首，诗做多了，就三天两头地从头到尾在心里背诵一遍，那几年，这是我要做的一件要紧的事。为了便于背诵，做的都是格律诗。1983 年平反出狱时，我马上把这些在肚子里埋了几年的“反”诗，用笔写出来，才得此诗集。

我 12 岁参军前，只读过四年书，1952 年部队扫盲时，好不容易得了个最低文凭——小学毕业。后来演奏乐器，写诗，作曲，指挥乐队，都是自学的，所以文化底子薄，特别对于古典文学，简直是个老文盲。而此诗集中，不时的出现什么“水调歌头”呀，“忆秦娥”呀，“七绝”“七律”呀等等，这些所谓的“词”与“诗”在格律上，充其量是贻笑大方的赝品，懂得古典诗词的人，看了会笑掉门牙。不过，我是在那种特殊的境遇中，才滥竽充数的，望网友见谅。

(关于狱中作诗情形，以后有纪实叙述)!

目录

静候杀头（词二阙）

照相

风雨狂（词二阙）

疯狗

寄母亲（词二阙）

真理在哪里
思念桂林父老乡亲
单身牢房之歌（四首）
治饿
谈话
三千万人“批”我
风湿
妥协回旋之战（五首）
单身牢房诗六首
赠“韦西斯”（四首）
寄妹妹（十五首）
出狱诗

静候杀头（词二阙）
水调歌头

大喊要杀我，从容等决战。欢乐而不悲愁，做个夏明翰。如此壮烈场面，(注)一战浩气长存，错过太遗憾。人生最高处，一定要登攀。

革命者，轻生死，重理想。老死病榻，怎比忠骨抛青山？（注2）当年慷慨陈词，而今变节偷生，何颜见群众？不做垂杨柳，迎风把腰弯。

（注）历史上新的政权上台，都要杀一大批人，因此在全国大批“四人帮”之时，我想既然是“张雄飞反革命集团”的“首恶”，韦国清之流岂能不杀我？于是决心学吉鸿昌那种壮烈的死，枪毙我时，也一定要他们面对面开枪，并且要厉声对他们说：“我要看看修正主义的子弹，是怎样把我打死的！”所以此词中方有“如此壮烈场面”一句。

（注2）有时革命者是死无葬身之地的！

西江月

百分之百准备，静候冲天一战。杀头之日见本色，看看谁是纯钢！
继续用功读书，珍惜富贵时光。最后通读《资本论》，拜见马恩不惭。

照相

十月十三日，铁门一声响。“快出来照相”，狱警高声嚷。
满脸是杀气，叉腿当院站。背后手中纸，好像是名单。
这同看守所，剃头就照相。照相要判刑，被唤心胆寒。
此时全单间，大气不敢放。屏息宁神听，恐慌又紧张。
我心平如镜，飓风难掀浪。从容让他剃，听鸟山中唱。
同被剃头者，老龚死缓汉。（即龚志明同志）两年未到期，为何又宣判？
我被判无期，升级可设想。一把杀人刀，悬在头顶上。
下午果又来，高声把我喊。整齐衣和帽，迈步出门槛。
监外金风爽，令我心舒畅。仰首望高天，一片蓝湛湛。
似见高天上，从师把我望。看我真虔诚，还是尚空谈？
心中暗告师，教导记心房。吞天大气魄，学生永效仿。

正襟而端坐，沉静不慌忙。藐视摄命机，冷漠又安详。
走卒察颜色，哀哀空长叹。何时怕杀头？先生太健忘。
照相小交锋，略为显胆量。待到杀头日，要你天地翻！

风雨狂（“忆秦娥”二阙）

一

风雨狂，雾锁群山高围墙。高围墙，怒视昏天，思潮如澜。
可恨韦贼中山狼，镇压人民太疯狂。太疯狂，批斗开除，监狱刑场。

二

风雨狂，浊流滚滚百花残。百花残，仰望高树，笑裹云裳。
共产党人最钢强，面对屠刀不胆寒。不胆寒，视死如归，慷慨激昂。

疯狗（念奴娇）

韦贼一伙，今得势，活像一群疯狗。嚎叫咆哮气焰嚣，似要撕碎地球。逮捕判刑，斩尽杀绝，大泄文革恨。好个“土豪”，把我战友恨透。

重刑吓倒揭露？痴心妄想，砥柱立中流。捍卫真理战不义，岂怕坐牢杀头！
“战士死了，战士万岁”，（马克思语）怒火变地火。一朝喷出，烧尽一切腐朽。

寄母亲（诗词二首）（注）

诗

妈，铁门响哗哗，打手施恐吓。暗示要杀头，看我怕不怕。久在险风恶浪中，
五雷轰顶眼不眨。生死难推断，精神摧不垮。管他是死还是生，七尺铮铮铁骨岂怕杀！

妈，人生谁无死，高低差无涯。英雄倒如山，懦夫死像虾。真要杀头到不坏，
留得美名传天下。不愿做奴隶，被驱似牛马。与其被贼折磨死，不如轰轰烈烈拼了它！

妈，想起此冤狱，气得肺要炸。悲哀理难伸，叹息多假话。眼看壮志付东流，
苟且偷生有何价？坚决和他斗，不怕泰山压。一场捍卫真理战，谁当逃兵万人唾骂。

妈，祖辈四代人，代代飞血花。各种惨死者，亲人有七八！狱中回首血泪史，
恨反动派咬碎牙。泪往肚里流，拳向墙上砸。而今若是当叛徒，那真罪该万死当活剐。

妈，您年青守寡，为子誓不嫁。受尽万般苦，把儿拉扯大。带儿走上革命路，
险峰天桥是您架。百般疼爱我，天涯常牵挂。回忆往事倍感恩，立志精忠报国来谢答！

妈，此次若永别，莫把热泪洒。捐躯为人民，血红似朝霞。雄鹰纵折搏云翼，
也胜龟鳖泥里爬。教好三外甥，马列根深扎。长大继承父辈志，让那五洲四海红旗插！

水调歌头

家门今咫尺，慢道银河远。隔山如隔星系，墙是九重天。几回依稀白发？梦醒倍添思念，子母心相连。铁牢关不住，寄语绿水边。

春无数，儿不归，要开颜。生离死别，心忧天下自泰然。不负哺育之恩，誓

做千秋雄鬼，谈笑斗党奸。狱中思慈母，慷慨更无前。

（注）我母亲王毓华，早年参加革命，是地下党老党员，文革中被柳城县的帮派分子打成该县头号“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受尽非人的折磨和残酷迫害。

真理在哪里

真理在哪里？真理在手里。手里是什么？手里是权利。老韦最有权，有权就有理。百姓敢反对？反对就抓你。你若敢不服，不服就杀你。有理没有权，有权没有理。

动辄讲镇压，法西斯主义。同志勿奇怪，这就是国弊。见弊怎么办？坚决斗到底。真理是斗争，不斗没真理。真理在我方，一定会胜利！

思念桂林父老乡亲（一九七八年元旦作）

逢佳节，倍思亲；水漾胸，浪拍心。不是父母非兄弟，却比骨肉亲十分。

文化革命同受苦，“八二〇”中共死生。怎能忘？记终身。见山如见独秀影，见水如闻漓水声。常与英山月，乘风回桂林。

“八二〇”，母心碎；寡妇恨，孤儿泪。

乱抓乱杀是正道，清白无辜犯死罪。武装帮派如狼虎，山城处处血花飞。忆惨状，愤又悲。可恨大官蠢如猪，黑白不分乱是非，发誓正历史，九死而不悔！

批林贼，连珠炮；演说台，大字报。三多路口呼声急，十字街上人如潮。慷慨揭批“八二〇”，一火引来万火烧。忆盛况，情更豪。为了正义胜不义，折戟沉沙心也笑。人民做后盾，心中旗不倒。

无真理，有镣铐；罪被揭，举屠刀。本是林彪一洞蛇，岂容批林传捷报？牯牛山上铁门响，强奸民意最英豪。藐淫威，蔑横暴。人民心中有本账，谁是谁非记分晓。冤狱定昭雪，上帝最公道。（注1）

判刑日，长街行；十字街，尽是人。人山人海看我们，亲人心思我知明：满怀不平来相送，默默相望表同情。永相忆，铭在心。群众待我如父母，我披肝胆谢人民。石烂心不变，海枯仍忠贞。

铁窗冷，北风烈；想桂林，化冰雪。坚信党能辨真假，马列思想是日月。“八二〇”账总要算，人民不容豺狼獾。看中国，望世界：历史一切反动派，得意后面是悲咽。明朝回桂林，捉尽漓江鳖。（注2）

（注1）上帝：意为党和人民。（注2）漓江鳖：意指文革中广西那些前台幕后的杀人犯

单身牢房之歌（五首）

一

单身小牢房，长宽四平方；墙厚似古堡，铁门不透光。
顶上开个洞，罩着玻璃箱；活像一方井，望天便有感。
屎坑在床边，水池漏潺潺；空气不流通，气闷臭难当。
阴雨连绵日，水珠挂石墙；席子粘人手，衣被霉毛长。
更恼大花蚊，轮番逞疯狂；逼我拍大腿，彻夜震天响。（单间不准挂蚊帐）
酷暑更要命，老君炼仙丹；又似烤红薯，炙灼无处藏。
井盖夜放热，休想入梦乡；纸扇摇断把，依旧汗湿床。
晚风多清凉，飒飒过天窗；可惜好凉风，不入鬼门关。
白天八两米，难以充饥肠；“收支”不平衡，人瘦像螳螂。

然而此绝境，炼人最优良；是泥烧成灰，是铁炼成钢。
真假革命者，一关现本相；真的更坚定，假的必投降。
单间暗自勉，勿做软鸡蛋；平时喊革命，这是好战场。
条件全具备，对手难寻访；无畏留美誉，屈膝坏名扬。
历史巨浪急，死鱼抛沙滩；今日主沉浮，浪峰任飞翔。
不跟韦贼走，心定如泰山；何谓真正人？自由加钢强。
甘当贼工具，灵魂丑又脏；无义又无德，生命暗无光。
铁牢关不死，闷炉憋不憋；锐目穿石壁，五洲在胸膛。
凌云志不衰，马列是指南；正义和人民，总在我身旁。
革命需牺牲，献身最荣光；而今尽义务，欢乐喜洋洋。

二

床上跑步君莫笑，单间有路万里遥；四平方米立锥地，险道崎岖万丈高。
蜀道难兮难不倒，踏艰履险入云霄；爱把奇峰踩脚下，爱听深山虎狼哮。
历尽磨难情更豪，藐视韦贼杀人刀；待到重振千钧棒，狼虫虎豹一齐扫！

三

重刑判无期，人生没有完。自由依然在，道路曲且长。
坚信党伟大，定能指航向。系统读马列，斗志更昂扬。
想逼我投降，肯定是妄想。不是氧化铁，我是高碳钢。
你急我不急，从容来对抗。单身牢房中，任务有三项：
刻苦读马列，学习毛思想；我是小学生，天天要向上。
第二多做诗，磨利手中枪；揭开豺狼皮，刺穿黑心肠。
第三练身体，战胜病魔缠；熬过苦中苦，强健迎朝阳。

四

都说人间苦，莫过于坐牢；尤其小牢房，愁苦更难熬。
莫道打手愚，整人毒又刁；小牢关老子，又是三年了。
我是石下草，有缝就伸腰；又是山泉水，越阻浪越高。
你想我悲忧？开怀乐陶陶；你想我颓唐？心花永不凋。
这个好地方，锻炼实难找；作诗揭贼丑，诗句似钢刀。
日夜想国事，虽苦不烦恼；地球转得快，数年像一觉。
身穿劳改服，心中红旗飘；坐牢为人民，人瘦情更豪。
荣辱阶级异，革反两条道；你骂我“土匪”，其实你是妖。
你当你的官，我坐我的牢；老张躺在地，比你万丈高。
水晶埋深地，出土闪光耀；希玛拉雅山，海底入云霄。
人生命途短，转眼就走到；不做春归雁，做个啄木鸟。

治 饿

老张手大脚长，吃饭素有海量；当年垦荒东北，记录一斤六两。
而今关在牢房，八两分做两餐；一天两勺青菜，实在遗憾遗憾。
年年月月如此，没有任何改善；想用饥饿整我，磨掉棱角锋芒。
我有办法对付，奇功异效非常——青菜参碗开水，再把裤带紧缠。
饥肠安静不闹，心中甜过蜜糖；纵情引吭高歌，歌声震动山岗——

“红米饭那个南瓜汤，挖野菜那个当军粮。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餐餐味道香味道香。哎哟嘿——”

谈 话

狱官来谈话，（注）要我写检查。高论像条白蠕虫，直往耳朵爬——

“判刑已两年，你还不知过，你是中央点的名，难道还会错？”

‘八二〇’正确，区革委决议。高级首长和机关，水平不如你？

党报点名批，历史有几多？广西日报是大报，难道不正确？

材料发全区，老少都知道？三千万人批你们，你还不检讨？

如今全广西，都说你们错。人人都是这样讲，你还想什么？

大局现已定，何必再顽固？低头认罪揭发人，还会有出路！”

立场有问题，思想更错误。榆木主义脑袋瓜，活像个蠢猪。

自以为高明，其实好僵化；马克思把这种人，叫作“席尔达”。

华国锋主席，当代大伟人。他办的事可放心，自然最公正。

老韦说了算，官大就有理！若问真理是什么？强权加嘴皮。

只听上级的，不论是与非。蒋介石来当主席，照样喊万岁！

报大就正确？见解真独到！《纽约时报》是大报，你敢说他好？

三千万人批，更要卫真理。人民受压又受骗，背叛最无义。

全区都反对？完全是胡说！捨命揭露“八二〇”，同情支持多！

趋炎附势者，投靠不吃亏。老张情愿当傻瓜，关死心不灰。

大局确已定，马列真理胜。败坏党者必受惩，历史会作证！

（注）狱官：即英山监狱管教科长韦×。

三千万人“批”我

三千万人“批”我，心中十分快乐！我们宣传鼓动，难得如此规模！

它把真理声音，传遍城镇村落。引起广泛思考，埋下仇恨烈火。

即便百里有一，能够认真思索，也是巨大胜利，意义深远广阔。

我看觉醒人数，必定大大超过。人民不是阿斗，岂听韦奸胡说？

真理这把利剑，专破蒙蔽硬壳；又像金色闪电，照亮人民心窝。

蒙骗不能持久，谎言不攻自破；广西这伙凶手，历史惩罚难脱！

城镇山乡海岛，遍布干柴烈火；只要时势到来，肯定一点就着！

我的亲爱故乡，受尽林类折磨！欲知恶棍罪行，请问咆哮江河！

鲜血不会白流，浇开胜利花朵。待到春花烂漫，请摘一束祭我！

风 湿

数年难见太阳面，春雨连绵背发寒。牢房阴暗又潮湿，风湿透骨入膏肓。

可恼药少骨头多，不擦也难擦也难。日后瘫痪倒可喜，免得折腰事土王！

妥协回旋之战

那年被捕发誓决不背叛，看清嘴脸更加斗志昂扬；反对清查不怕虎豹凶恶，桂林外调统统打发回还。

十次硬顶气得打手发狂，喊打喊杀真是剑拔弩张；敢进树林岂怕野狼嚎叫？早已看透丑类恫吓伎俩。

然而形势已经发生变化，敢于斗争也防头脑简单。正确策略应随形势变换灵活应战才不被敌所伤。

清查已经搞了十一个月，打手外调跑遍两湖两广。“双批”之中全部活动情况，基本已为韦贼一伙所掌。

主要成员早已逮捕宣判，各人表现我也大体知详。外围同志有些瓜葛联系，帮助解脱以免仍受磨难。

而今大事不会再来找我，蒜皮小事可能还来纠缠。两人的事说圆说方在我，避实就虚可以巧做文章。

我的故乡久受林类摧残，屠杀人民白骨堆集如山。揭“八二〇”气得韦贼发疯，全区“批判”不惜动众千万。

桂林风潮主要人物是我，不想害我倒是奇怪稀罕。既要斗争又要保存自己，面对险恶暗自细细思量。

伟大列宁当年与德谈判，英明教导如日照亮心房。革命策略必须灵活运用，攀登高峰必须绕道拐弯。

当机立断写出短信几行，表示愿与帮派先生交谈。先生得意那是愚蠢鼠目，同志误会以后解释不难。

广西帮派坏得又臭又烂，十年劣政凶残丑恶不堪。不正本源此生死不瞑目，争取生存为了再战一场。

大风浪中努力辩明方向，搏击沧海争取自由往返。壮志凌云藐视一切丑类，豪歌冲天震倒十万大山。

二、原则

这是战略转移，不是退畏逃奔；这是新的战斗，不是放弃斗争。

放弃原则妥协，就是背叛革命；“不拿原则交易”，教导必须遵循。

决不承认有罪，也不揭发别人；只要胡说一句，就是千古罪人。

决不助纣为虐，出卖同志、灵魂；所有要害问题，坚决守口如瓶。

定要保护同志，尽量开脱减轻；大事化作小事，天塌一肩担承。

以上三个原则，就是行动指针；他若逼我就范，那就干脆硬顶。

三、策略

被你全部占领之地，承认已经让你占据；既然事情你已知道，当然不妨再告诉你。

被你占领一半之地，从容抗争侦察火力；守不住的且战且走，守得住的决不放弃。

要害之地坚决死守，打到最后在所不惜；无论你知还是不知，保护同志牺牲自己。

策略既定仔细回忆，找出各人要害问题；以我不变应敌万变，胸有成竹夺取胜利。

四、目的

妥协回旋之战，欲达什么目的？既要坚持斗争，又要保存自己。前是不变原则，后是尽量争取。原则不能改变，争取可以放弃。颠倒两者关系，就是背叛投敌。以错反错之徒，同样可耻卑鄙。

“波兰的解放不在波兰”，我的生死决定，不在英山监狱。如果一定要杀，一切争取无益；介乎两可之间，争取就有意义。单身牢房之中，不知他们底细。只能根据现象，大致判断推理。判断可能出错，受他可乘之机。万事都有利弊，不必苛求自己。历史终将分出：战士、叛徒、烂泥。

对于桂林来客，下面款待一律：讲些明摆大事，让他觉得可以；如要帮他深

挖，请他留在原地；勿让客人吃饱，也别饿着回去；一点不给失策，多给就是叛逆；给他似是而非，让他扑朔迷离；锋芒不要太露，温度适当降低；姿态不低不高，行为不亢不鄙；刺穿他的“气球”，使他举棋犹豫；夺他杀人舆论，争取一线生机；坚持持久斗争，必须巧妙应敌；与他讲谈诚实，比宋襄公还愚。下面这个评论，使我颇为满意：“你已有所转变，开始愿谈问题，已经站在十字路口，只是不知向东向西？”目的全在于此，没有更多求期。妥协回旋之战，看来可获胜利。

批林之战失败，韦贼甚为得意。斗争转入低潮，消沉时期开始。正义必胜邪恶，对此决不怀疑。然而何时胜利，确实难以预计。如今身陷囹圄，巧妙周旋为宜。尽量争取时间，时间就是胜利。先争十年八年，后争二十世纪。总之决不投降，斗到停止呼吸。发誓不出单间，不怕饿得剩皮。创个坐牢记录，磨炼改造自己。刻苦学习马列，热情年年如一。红心永远不变，以谢党和阶级。

五、九日战记

桂林财贸四人来，调查宾、关、张与黄。（注1）多年同志如手足，情深似海洋。保护同志是义务，牺牲自己理应当。打了一场“马打松”，足有九天长。来者颇狡猾，说话绕大弯。话从榕湖饭店起，问我如何认识詹？（注2）

十次硬顶中，（注3）情况基本掌：湖心亭中谈话事，（注4）知其已知详；来往书信和材料，早也知道被抄光；托关捎信广州事，（注5）半年前就紧问盘。

既然你已知，谈谈又何防。零上加零等于零，顺水推舟作文章。于是“倒豆子”，来者喜洋洋。以为老张已老实，向他缴了枪。其实老张是老九，安排巧机关。

斗争二回合，情况不一般。问我如何写书信，托关带给詹？还问小关自穗归，回来见我怎么讲？这是预定死守处，哪能对你讲！你不知道告诉你，岂不太荒唐！于是推说记性差，脑袋瓜子挨过枪：大事记不全，小事全忘光；不提示我讲不出，你提示还再想想；老张就是没记性，你说怎么办？

四人费尽九牛力，难拖轮船过沙滩。气得先生发牢骚：“没意思，没意思，全是我们来提示，你还不认账！”

斗争三回合，形势更紧张。来者嘴脸全暴露，真是狗豺狼！“团结同志”是谎言，“帮助解脱”是扯淡。要打他们反革命，歹毒黑心肠！一问怎骂“八二〇”？二问怎说区市党？三问怎么议人大？四问怎么论中央？个个问题都险恶，扩大一点可重判。屠杀无辜反有功，反对烂杀要法办。人妖颠倒是非淆，怎不叫人气断肠！于是斩钉又截铁：“他们什么都没讲！”

方针早在胸，阵脚稳如山。四人磨破嘴，谈话无进展。眼看要破产，破产哪心甘？于是四个臭皮匠，想变一个诸葛亮。再次向我来进攻，发起一次攻心仗。

主将改行做记录，板着面目耍笔杆。其余三人来攻坚，句句话语包着钢。“你的年纪不算大，以后日子还很长。你的命运在桂林，表现后果要想想。我们是来看态度，对抗没有好下场！”

舍得一身剐，这些威胁都平常。你的箭头利，我有铁胸膛；你的话语甜，老张不吃糖；你急我不急，你忙我不忙；平心静气和你磨，慢条斯理扯皮糖。

这一回合先生胜，捞得水中月，其大如磨盘。

诡计无作用狗急便跳墙。拉开皮包亮证据，又打一发重炮弹：那是××的揭发，密密写了纸两张。说我曾经叫小关，出去外地搜情况。“这件事有没有呀？你表表态讲一讲！”“这件事情很简单，两秒钟就可说完。一定是他弄错了，这个

揭发太荒唐！”“你的表态要签字，严重后果你思想！”签字就签字，后果又怎样？只要不怕掉脑袋，天塌下来也无妨！

先生阴谋全失败，泄气皮球出洋相。我拿起笔签字时，主将度步出门槛。屋外失声唱起歌，歌声忧愁又悲伤。听他唱歌我暗笑，心中默把他表扬：“你的歌声像爆竹，报到老张打胜仗！”

尾声更有趣，想起笑断肠。主将回桂林，留下二女郎。第九天上又找我，开了一串长名单：“张王李赵等等等，带着老婆会宾关。聚在一起开黑会，议论人大和中央。这件事情已查清，希望你也讲一讲。不讲对你没好处，利害关系要想想。第二件事是传单，是关从穗带回还。作者是个老教授，标题只有三字长。那天你要借来读，恰巧借出尚未还。你和宾关到某家，读罢传单频赞扬。这事也查清，你再谈一谈。”

听她说鬼话，暗笑蠢婆娘。于是我也编鬼话，逗逗她们玩：“哎呀，这事真有趣，我不知道太遗憾。是不是有人编故事，叫你们来哄老张？”

说得女郎格格笑，阶级斗争全忘光！

九日鏖战罢，倍思宾、关、张与黄。铁窗北望暗忧虑：不知吾意被敌诳。同在险风恶浪中，但愿眼明志如钢。今生若能重相会，携手除奸保江山。

（注1）即宾光国、关茂林、张裕林、黄鼎同志。（注2）即广州的“旗派”成员詹德和。（注3）即广西“三清查”（即清查‘四人帮’、张雄飞、冯邦瑞）开始的前十一个月，我把桂林来的十批外调人员全部顶了回去，拒绝回答任何问题。

（注4）我和詹德和在桂林榕湖湖心亭中谈过话，向他介绍写揭露“八二〇”大字报等情况。（注5）我曾托出差去广州的关茂林同志，捎信给詹德和。

单身牢房诗六首

声声“你要想自己”，（注）鸠山嘴脸真卑鄙；要我投降也容易，请把广西搬北极。（注）韦×之流常来给我做“思想工作”。

七律

巍巍兴安横长空，一派雄姿万年同。怒对西北阻寒流，笑向东南迎花红。雨打风吹更苍翠，冰封雪压愈峥嵘。愿作兴安一棵树，屹立高峰乐无穷。（1977年作）

七绝(四首)

死也不作变色龙，负我珍姐与方兄；（注）自古英雄谁惧死？今欲断头学英雄。（注）“珍姐方兄”，唐小珍，周俊方同志。1977年5月，他们单位来英监外调，我拒绝回答问题，吵了两天，回单监写了此诗。

火烧长天云影空，大地沉沉无清风；我劝旱魃休肆虐，雷雨就在奇热中！（1978年夏作）

独卧小牢日夜烧，残躯如树半枯槁；遥闻天外寒儿号，愿作木炭献渔樵。（1979年作）

英山雨点大如斗，击破牢房四壁走；夜半被湿无法睡，坐听山外巨雷吼。（注）此诗作于1979年夏某日。是时我才知道党的三中全会作出平反冤假错案的决定，于是，在黑夜中我看到了解决广西文革问题的曙光！

赠“韦西斯”四首（注1）

此公瘦又长，像根钓鱼竿。从来言无信，开口就扯谎。马列半点无，铁杆保韦党。（注2）单间关数载，尽受毒手腕。

冬天不给衣单裤御风寒。酷暑不给水，喝尿实难堪。不准家送食，长年响饥肠。不准读马列，说我太舒坦。去年高低烧，至今十月半。不许进医院，依旧关单房。还在大病中，要我去铁厂。想用烟与尘，送我见阎王。看清蛇蝎心，坚决和他抗。一定要我去，就是不买账。大叫要捆我，硬捆料不敢。官威被冒犯，气得脸发黄。

几年压不垮，微微见曝光。明朝出狱去，记住这条狼。（注1）“韦西斯”者，乃英山监狱教养科长韦×也。（注2）此公原参加单位“4·22”群众组织。后“反戈一击”，整起“4·22”观点的政治犯来，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

二

天上没神仙，地上棺材伏。是人都要死，百岁也短促。都是共产党，何必这么毒？我死不要紧，没有老婆哭。派性不可有，党性不可无。敢去打台湾，老张才佩服。

三

单身牢房发高烧，（注1）头疼胸热苦难熬。要求住院竟不许，大病还要坐小牢。如实叙述望医治，嘴说可以人去渺。毒哉走卒“韦西斯”，效忠“老爷”有功劳。（注2）你把病痛告诉他，他以此做割肉刀。一点一点割你肉，要你屈服去求饶。看穿毒计志更坚，情愿病死不弯腰！

（注1）自1979年3月29日，至1980年4月20日，我在单身牢房中高烧、低烧发了一年，即便这样韦×都不准去犯人医院住院医疗！（注2）1967年南宁“4·22”成员创作过一幅讽刺韦国清的漫画《韦老爷上轿》，从此广西打韦派即“尊称”其为“韦老爷”。

四

不许住院不给药，叫你又病又挨饿。我是棕榈千层皮，一层一层任你剥！

寄妹妹（十五首）

一

年年为我泪满襟，今又含悲万里行；（注）骨肉阶级千般爱，全在妹妹一颗心。（注：去北京上访）

二

归雁啼寒过天空，妹迎风雪走匆匆；万里为兄觅温暖，可恨南疆正冰封。

三

当年广西遍地尸，韦贼残忍人人知；营救兄长不避险，（注）我妹心灵美如诗。（注：自1977年始，我妹张雯即为营救我冒死上访北京三次，上访桂林、南宁三十三次）

四

妹行千里哥心忧，广西无处没血流。提防狰狞“海以那”，吃人从不吐骨头。

五

申诉回桂必渺茫，妹遇无理莫悲伤；香山遥向英山望，便见家乡多豺狼。

六

“落实政策”喊不休，冤者无数谁自由？不信请看档案袋，如牛负重度春秋。

七

平反“彩调”唱花哨，冤狱铁门关更牢；蛇咬青蛙哪肯放？韦贼杀人不用刀。

八

哥的前途最光明，出狱必成明朝行。不是官心要改恶，而是民心不可凌。

九

久不还家勿伤悲，几多孤寡依门扉？更有无数红卫兵，慈母千声唤不归。

十

铁门开处妹心碎，一声“阿哥”千滴泪！扑进我怀放声哭，人间难得此妹妹！

十一

无限悲哀无限愁，牵肠挂肚几春秋？万语千言要倾诉，奈何语塞泪频流。

十二

我劝妹妹勿伤悲，哥哥明日定能归；教育外甥信马列，长大成才放光辉。

十三

北去归来又探监，欲诉话语有万千；可恨身旁跟看守，几多话语到嘴边。

十四

妹称哥妻甥称儿，去年求见竟不得！（注）闻妹受辱怒万丈，有刀必斩两脚蛇！（注：1977年春节，妹妹带她7岁的小儿子张延去英山探监，韦×不准见，一路哭着回来。她走后，韦×竟来对我造谣说我妹冒充我的妻子求见他没批准，我信以为真，气愤中才作了此诗。韦×小儿真是无耻之徒）

十五

受尽凌辱与折磨，恨煞韦贼老妖魔！有朝一日冲天起，十万大山推下河！

出狱诗(注)

捨生曾一拼，牢底终坐穿；民心如日月，有罪是山官。（1983年1月下旬平反出狱回桂林受群众欢迎于游行前将此诗写于标语牌上）

“张雄飞反革命集团”案的翻案历程及其历史作用

张雄飞

1975年7月15日，当我们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最后一个成员——张雄飞被逮捕后，第二天，桂林市委就在市中心体育场，召开全市各单位负责人的万人大会，宣布破获了“一个桂林市解放以来最大的反革命组织”，不久，便将这个“反革命组织”的成员们，具体扣上了“张雄飞反革命集团”的罪名，拉到各系统，各大单位去轮流批斗，从此，这个“反革命组织”，便明确地叫做“张雄飞反革命集团”了。

那么，这个“集团”的人们，都干了些什么？他们的所作所为，在广西文革的历史上，起到了什么作用？

他们写大V报上街，揭露桂林“八·二〇革命行动”，是个对数以万计的无辜进行大抓捕、大批斗、大屠杀的反革命法西斯行动。

他们写大字报上街，揭发韦国清是文革在广西全境进行大镇压、大屠杀、大迫害的罪魁祸首。

为了捍卫公民的民主权利及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他们成立了“桂林市工农革命群众执行捍卫新宪法协会”，并创办了继续揭露桂林和全广西的大镇压、大屠杀、大迫害，以及反对官员中的资产阶级特权的大字报专栏《执行和捍卫新宪法论坛》。

由于以韦国清为代表的许多党政军干部，在广西文革中的无法无天无人道行为，不允许人民群众对其进行监督，因此为了争取人民群众对各级干部的监督权利，《执行和捍卫新宪法论坛》的成员们，还打算行使《宪法》所赋予的“结社”权，成立《桂林市工农革命群众监督委员会》

所以韦国清们对这些人恨之入骨，于是把他们打成桂林最大的、也是广西“最大的反革命集团”——“张雄飞反革命集团”（后来官方对这个“集团案”简称“张案”），把“张案”的20几个主要成员全部逮捕，并于1976年，将其中四人分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而成员陈壬午，还被害死在柳州铁路局公安处的牢房中。

然而，“张案”的历史作用是：自1968年韦国清在全广西进行了大迫害、大镇压、大屠杀后，广西人民便处于帮派势力的统治下，处于有悲无处诉，有冤不敢申的高压之中。1974年春，“张案”的成员们，打响了彻底否定广西文革的第一枪，撕开了韦国清们上欺中央、下压人民掩盖罪恶的铁幕，揭开了广西文革大屠杀的冰山一角，直接为1983年中央派工作组来广西“处理广西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简称“处遗”），比较彻底地清查和处理了大批“三种人”的罪恶（撤职、开除党籍、判刑、枪决），作了舆论准备打下思想基础。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张案”成员自1974年至1982年持续八年的斗争，就不会有1983年的“广西‘处遗’”。下面，我们将用事实来证明这个结论。

一个震动西南中国的大字报风潮

1974年春，桂林钢厂的哈康文、罗绍安、张雄飞三人，策划了张贴桂林第一张大字报活动，随之市里的职工李新、陈体郁、刘玉生、许瑞林、牛建农、彭富森等一批人跟进，把大字报的星星之火，引到市中心“十字街”去，变成了熊

熊的大火。他们开始的大字报主要内容是揭露桂林“八·二〇革命行动”的罪行。后来张雄飞的大字报又把矛头直接指向韦国清，从而把大字报的斗争引向深入。

因为桂林是个旅游城市，流动着全国各地的人，所以桂林风潮的讯息，很快便传到西南半个中国，于是当时便有了“广东的李一哲，广西的张雄飞，四川的牟其中”之说。

桂林的大字报风潮，尤其震动了全广西的文革受害者，引起他们的共鸣和同情，激发了他们奋起斗争的决心，这样，它就为1983年中央下决心解决广西文革的问题，做好了舆论准备，打下了思想基础。

桂林的大字报整整写了一年多，直到1975年春夏之交中央整顿全国生产秩序时，才被迫停止。

当1974年韦国清和广西区党委，把桂林的大字报风潮，定性为反革命的时候，相应地成立了几个专案组，总负责人是桂林市委书记钟枫，内部密称为“七四专案”。那么，我们如果根据桂林的大字报风潮及其对整个广西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把它当作一个实际规模并不小的群众运动，并称之为“七四运动”，恐怕也不为过。

这样，广西的文革铁幕，韦国清在文革中的罪恶，从1974年桂林市出现的第一张大字报起，就被揭开了。这是“张案”对否定广西文革起到的历史作用之一。

“张案”成员李和平进京申诉

一、李和平一进北京：

在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平反冤假错案决议的巨大压力下，广西的韦国清们，不敢再对“张案”的其他成员判以重刑了，“张案”的主要成员李和平，于1978年被释放出狱了。

李和平是桂林大字报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和骨干，《桂林市革命群众执行和捍卫新宪法论坛》成立时，他被推举为编委会中心组副组长。李和平一出狱，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解决“张案”的彻底平反问题。

他和“张案”成员鲁鹤松商量，认为广西不会为“张案”平反，只有去北京向中央反映，通过中央干预，才能解决。于是，鲁鹤松和李新各人给了他几十块钱，王磊品给了他100元做路费进京。

李和平虽被释放，仍在公安局的监视之下不许“乱说乱动”，但他毅然冒着再次被抓的危险，明说去南宁，到了火车站，就跳上了北去的列车。他从北京回来后，公安局的人还警告他：“你再去北京，我们就把你抓起来”

李和平到了北京，先去找最高人民法院的信访局长田明中。因为这是他的熟人。原来，田明中是在1957年“反右”期间，从最高法刑事审判庭的庭长“反”到桂林来的，没挨戴“右派”帽子，也没分配他工作，只发给工资，和李和平舅舅是邻居，认识李和平，又最了解桂林文革的情况，1978年右派平反，他调回最高法先作民庭庭长，后改任信访局长。李和平去找他，是最合适不过的。这个历史的偶然性，帮了“张案”及桂林人民甚至广西人民的大忙。

李和平找到田明中后，自然得到田最热情的接待，因为李和平因“张案”被抓后，他就说过：“讲李和平是反革命，我是绝对不相信的，因为我看他长大的。”

李和平带去了反映“张案”问题的简单材料。田明中就把刑庭中南组组长武俊英和另一位负责人范萍，一起找来听李和平汇报。此后李和平又反复和他们谈了三、四次。他们对李和平个人遭遇和“张案”成员受迫害的情况很同情，向上

面作了汇报，并介绍李和平去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女副检察长徐意汇报。徐意也详细听了他的汇报，并在接受“张案”的简要书面材料时，建议李和平：“你是不是继续把材料整理得再详细点？”

李和平的第一次北京之行，虽然没有具体解决他个人和“张案”的问题，但引起了最高两院对“张案”、桂林文革、广西文革的高度关注。

二、李和平二进北京：

李和平回到桂林介绍了北京之行的情况后，让“张案”其他成员及受牵连者大受鼓舞。又有几个人：潘文源、管学庭、潘国球参加他们为“张案”平反而斗争的活动了。鲁鹤松的家，成了他们活动的中心。李和平又建议：尽快将“张案”活动的前后过程，写出一份详尽的材料来。先是由管学庭执笔写了份 100 多页的材料，李和平看了觉得太长，便删改成 20 多页，标题是《关于张雄飞反革命集团事件的汇报》。

1980 年 3、4 月间，李和平二次进北京。到了北京后，便带着这份材料去见第一次进京谈过的最高院和最高检的那几位负责同志，他们看过材料和再次听李和平的汇报后，都表态说“这是个冤案，够不上任何罪名”。因为两院的权限只解决个案问题，对于集团案，则难以解决，于是建议李和平把材料送去或寄去中央，向中央汇报。

李和平找到了中央信访局长陈永新，并到他家里去拜访。陈局长听了李和平的汇报后，立即给了他一个信箱号，叫李和平按照这个信箱号把材料寄出去。材料寄出后，不几天陈局长告诉李和平，那个材料中央办公厅的秘书已经作了记录，并报到中央书记处去了。

中央调查组来桂林调查“张案”

1980 年 5、6 月份，由原交通部副部长、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刘汉章，率领中央调查组来到桂林（这是中央为了广西文革问题派出的第一个工作组）。据说李和平的材料，转到中央书记处分管农业和政法的万里书记那里去后，万里对“张案”的问题，作了批示，刘汉章他们就是为调查“张案”问题，专程来桂林的。参加中央调查组的就有最高院中南组的两个负责人武俊英和范萍。同来的还有公安部劳改局局长蒋端芳。刘汉章等来到桂林后，通过公安局第一个找去谈话的就是李和平。

广西的韦国清们对这个调查组的到来并不欢迎，李和平清楚记得刘汉章一见面就这样不满地说：“我们来桂林他们想把我们封锁起来，对我们采取特务行动，不让我们接触群众，这还像什么话？这样哪行！”还说：“我们是受中央领导的指派来的，我们是来调查的，我们不便下什么结论，但是桂林给我的感觉很不好。”范萍也对李和平说：“外面就有人，是跟着你的，李和平你怕不怕？”李和平说：“我不怕！”范萍告诉李和平，他们主要是来调查“张案”的。

刘汉章要李和平介绍知情人去谈话，李和平就把“张案”的人，如黄鼎、宾光国、邓平波、关茂林等等都介绍去了。桂林和临桂县在大屠杀期间死难者的家属们，也闻风而动了，纷纷去向调查组叙述冤情。调查组对去反映情况的人，都热情接待，都作详细记录。这样调查组就详尽地了解了“张案”和桂林文革的情况，自然也就部分了解了广西其他地区的文革惨况，例如当听到宾光国汇报说：黄鼎在平桂矿务局工作的两个弟弟，被杀死后还把头砍下来，叫他母亲一手抱着一个儿子的头颅游街时，吃惊激动得跳起来，叫宾光国“马上叫黄鼎来！马上叫黄鼎来！”

韦国清们的第一次反扑

刘汉章调查组回京一个多月后，7月下旬，市委一个离休的负责同志叫人告诉李和平：7月28号，自治区副主席兼公安厅厅长史清盛来桂林，召开了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传达了“彭真三点指示”——即他在北京见了彭真，彭真指示：1、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不能够一风吹；2、对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的处理不能一边倒；3、“张雄飞反革命集团”案性质不能变。

李和平听此大吃一惊，第二天(29号)，“张案”的成员马上凑路费给他第三次进京，以弄清是否真有“彭真三点指示”。因刘汉章、武俊英、范萍回京前，都把办公室和家里的电话号码留给李和平了，所以到京后，他很快就见到了刘汉章他们，向他们作了史清盛传达“彭真三点指示”的情况，并递了个简单材料。

他们听了也很吃惊，都说没听说有这回事。比如刘汉章就这样对李和平说：“我们回来已经如实地向中央作了汇报，现在就等中央作决定了，你们要相信中央。可是没听说有什么‘三点指示’呀，我可以帮你们了解一下。”

不几天，刘汉章明确对李和平讲：“史清盛来北京要向彭真汇报，彭真根本没见他，是秘书接见了，与他简单谈过一次话。我们调查了，那些话，可能是秘书讲的，也许把彭真的观点谈出来了，也许不是。一个秘书的话，不能作为领导讲话的依据。”韦国清们制造所谓的“彭真三点指示”，无非是想稳定军心，继续捂紧广西的文革盖子。但是，自刘汉章调查组来桂林调查，使中央书记处了解和关注广西问题以后，可以说，否定广西文革，是大局已定了。

第二个中央工作组来广西

1981年，中纪委第五室主任张珉，率领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等部委组成的联合工作组，来调查广西落实平反冤假错案政策的情况。参加工作组的又有曾是刘汉章调查组的成员蒋端芳、范萍等。由此可见，张珉工作组是刘汉章调查组的继续，也是受命于中央书记处，为了进一步调查广西文革问题而来的。工作组一行19人先到南宁。他们通知李和平去汇报，李和平匆匆前往。

到了南宁，在哪里听李的汇报呢？为避开广西搞的“特务行动”，工作组主动提出：“不能在工作组住的西苑饭店谈，那里不安全，你人还没到，人家就知道你到了。”于是，就由也深受韦国清迫害的原南宁市委副书记袁家柯和夫人罗丽华(局级干部)，把谈话的地点，安排在广西文联大院里的一位老同志家里。

工作组的三四个人在那里和李和平罗丽华座谈，李又全面汇报了“张案”、桂林“八·二〇行动”以及广西整个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如屠杀问题，镇压问题等等。而且在去南宁之前，李和平就和鲁鹤松、管学庭等整理好了一份全面揭发桂林“八·二〇行动”罪行的材料，此时他把材料当面交给了蒋端芳。听了李和平的汇报后，工作组的人特别明确强调说：“‘张案’已经有几个人出狱了，像李新、刘玉生呀就要平反了，这是已经定了的，正在办着。我们来，就是要解决‘张雄飞反革命集团案’的问题的。”

李和平到了南宁，还见了区党委纪委副书记、曾给陈云当过秘书的徐江萍及袁家柯、钟国松等老干部，并向他们建议：以争取中央平反“张案”为突破口，进而解决全广西的文革问题。他们同意李和平的意见，表示要从这个方面通过各人通中央的渠道做工作。徐江萍告诉李和平：陈云要他注意广西的文革问题，所以他已经搜集了成麻袋的材料。

工作组在南宁和李和平谈过话后，蒋端芳、范萍等几个人，还专程去鹿寨县

英山监狱，找仍关在英监单身牢房中的张雄飞，以及服刑的广西“4·22”其他头头，如南宁的熊一军、柳州的白鉴平、梧州的王冬明等谈话。

张雄飞在谈话中，依然坚持 1975 年被捕前的观点陈述：写大字报揭露桂林“八·二〇行动”暴行是正确的；揭发广西其他地方在文革中滥杀无辜的罪行是无罪的；组织《桂林市革命群众执行和捍卫新宪法论坛》的行为是合法的，等等。记得当时范萍听了很感动，站起来当着表面陪同，实则监视谈话的区劳改局及监狱负责人的面，要张雄飞写申诉。在她们离开英监时，蒋端芳还特别指示英监：“在中央作出决定之前，对张雄飞这个人你们要保护好。”

张珉工作组回北京的时候，蒋端芳又带了几个人来桂林，找李和平去榕湖饭店谈话，告诉他，她是专门负责调查桂林“八·二〇行动”和对“张案”成员落实政策情况的。

这件事可以说明：中央书记处和中纪委，通过“张案”，不仅了解了桂林的文革情况，也部分了解了广西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所以才派张珉工作组，直抵南宁，除了来解决“张案”的问题，还要全面调查广西文革大屠杀的情况，为全面解决广西文革问题，作了前期准备。

韦国清的第二次反扑

下面所叙述的事，是张雄飞 1990 年在北京拜访已离休的张珉同志时，张珉亲口告诉的：“我在去广西之前，在广东调查了两件腐败案子，结果杀了两个县委书记。”张珉接着说：他们工作组在南宁期间，通过进一步的调查，发现广西文革问题极其严重，回到北京，即给中央写了详细报告。在写此报告之前，中纪委的领导同志很高兴，对他们在广西的工作相当满意，表扬了他们。但报告报上去后，过了一段时间，中纪委领导同志的态度变了，一个姓王的副书记找张珉谈话，不提报告的事，只简单告诉他，不要再管广西文革的事了，如果再管，可能要受纪律处分。

张珉听了后知道广西的事太难办，很难过，但纪检干部和共产党员的责任感，不让他撒手不管。于是找工作组另外两个负责人余金鑫(最高检的一位司级干部)、蒋端芳谈，提出直接给最高层领导人，写个署名报告反映广西文革问题。因为这样做，风险很大，张珉便说：“我抗日战争参加革命，什么危险的事都经历过，我是不怕的，你们怕不怕？”余金鑫说：“我不怕，我被划了 20 几年右派，还怕什么，干！”蒋端芳说：“写就写吧，我也不怕，反正我也快离休了。”参加工作组的其他十几个人也坚决支持。于是，张珉他们就联名写了个报告，历数了广西文革的 19 条罪状，直接寄给了最高层。

××看了那报告后，就把它转给了当时地位在处于日中天的韦国清。张珉说：“韦国清蠢了，他办了件傻事，如果他得到那报告后不吭声，也许就没事了，他却组织了 8 个广西‘秀才’，对我们的报告进行逐条反驳，也寄给了最高层，这样一来，就变成广西区党委和中央纪委打官司了，中纪委的领导同志就不能不以中纪委的名义干预了。这件事反映到习仲勋那里去，习仲勋就给邓小平写了几个字：‘广西的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再派工作组去调查？’邓小平见字也批示道：‘广西这个无头公案，是到了解决的时候了。’这样，中央最后才在 1983 年又派出一个更大的工作组，去广西搞‘处遗’了！”

我的博文打算怎样写下去——致网友

张雄飞

去年九月以前，我从来没想过要搞自己的博客，因为读了《桂林晚报》八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那三篇关于桂林文革的“纪实”，憋了一肚子气，加上又看到那三篇文章，不仅在报上发表，还搞到网上去了，所以才决心要写文章在网上反驳，让区内区外正直、客观的人们，知道他们是怎样利用舆论大权，任意愚弄读者的！

这叫逼上梁山。

建了博客，就觉得一发而不可收了。特别是一些年轻的网友，因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不知道桂林文革的很多真情，很希望亲历者把当时的事实真相写出来，供他们在前进道路上研究参考。这个要求，除了令我感动感慨，一种莫名的责任感也油然而生，觉得自己虽然是一介平民，毕竟多多少少知道桂林文革和广西文革的事，有义务写出来留给青年们作资料。我今年就七十三岁了，俗话说“七三八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再不写，还等什么时候？

我是个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立，毛泽东时代，改革开放时代的人，当过顽童，当过游击队的武工队员，当过解放军的兵，当过农场的农工，当过工厂的加热工，当过革命干部，也当过劳改犯，当过共产党员，也当过“反革命”。我所经历过的事情，是如今的年轻人，在书本上是看不到的，因为没人帮我写，所以统统藏在肚子里。

我有个研究桂林近代史颇有建树的朋友说，只要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无论他是干什么的，哪怕是个妓女，能把经历写出来，也是有价值的。此话有理。

“把自己经历过的事统统写出来”，这恐怕是我回归大自然之前要做的头等大事了，因而我给自己鼓劲——继续努力吧，老头！

下一篇博文要写什么呢？写《三揭（桂林晚报）回避、歪曲、捏造桂林文革历史》，《四揭（桂林晚报）回避、歪曲、捏造桂林文革历史》。

“三揭”的内容是：《桂林晚报》既然写的是桂林市 1949 年到 2009 年六十年“桂林城事”中的大事，为什么偏偏回避发生在桂林的另一件大事：全市各种大会小会批判、关押、判刑、“罪恶材料”发全广西，轰轰烈烈搞了几年的“张雄飞反革命集团案”不写？为什么对在《桂林战报》、《广西日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连续两年连篇累牍的发表文章批判“张雄飞和那几个反革命分子”，“‘四人帮’的别动队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的事避而不谈？

“四揭”的内容是：《桂林晚报》也“忘记了”发生在桂林市的另一件大事，即 1977 年桂林市委在韦国清的指示下，发动全市点名批判斗争，也在《桂林战报》上发表大块文章“狠批”的“冯邦瑞反党集团”。冯邦瑞是 1938 年参加革命的文革前的桂林市长，文革时期的桂林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只因为他的观点是支持“桂林老多”，反对“八·二〇革命行动”，支持 1974 年桂林部分群众写大字报揭露“八·二〇”的罪恶，就被韦国清打成“反党集团”、“张雄飞反革命集团的黑后台”，也搞了人家几年。这样的事，难道不是桂林城事的大事，现在居然被堂而皇之的遗忘了。

接着我还准备“乘机”对《桂林市志》说三道四。这个由几届桂林市党政第一把手参与的“桂林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四百万言的鸿篇巨著，在其“大

事记”中的文革部分，却根据广西和桂林文革帮派残余势力的政治需要，把许多本该记的大事，或不记，或用略记的手段使其抹糊，或用篡改的方法使之消失。不顾历史事实，只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把历史打扮成自己喜欢的芭比娃娃，这哪是大人做的事？

再下来我就写 1974 年至 1983 年我们这个“反革命集团”的事了。标题叫做《为推翻桂林文革大冤案而拼死的人们》(暂名)，第一章的标题是：“活火山终于爆发，大字报轰动桂林”。

写完这部分，打算写其他的桂林文革亲历，特别要写“桂林老多”1968 年反围剿、求生存的艰苦血战。

然后，只要我还能打电脑，还活着，要写的东西还有，还有……

为了让自己的博客不要寂静太久，我可能在发计划中的博文之前，插空发些其他纪实以馨网友。

不被承认的忠诚与正义——致网友

张雄飞

如果按文革至今 42 年计算，那么我参加广西文革只有两年，却吃了将近 41 年的苦头(我的许多难友亦如是)。先是“桂林老多”被军事镇压后被打、被斗、被长期关押、被罚做苦工、被判刑劳改之苦。这种苦从 1968 年 8 月始至 1983 年 1 月止，长达 14 年多。其后是精神上的苦，即从 1983 年广西“处遗”至今，因仍受隐藏在广西领导阶层中的帮派残余势力政治上的压制思想上的歧视，级别不能一视同仁地提，工资不能一视同仁地加，人格不能一视同仁地受尊重，因而带来无穷的精神上的不平、压抑和痛苦，这种白了少年头之苦，又有 26 年之多了。例如就在今年 8 月，《桂林晚报》那三篇加罪于“桂林老多”的长文，就是一把刺在我们受伤的心灵上的刀！

然而，我们错在哪里？无论从哪个方面，都说不上有错！

先从肯定文化大革命的角度来说：我们不正是被广西的保守派代表人物韦国清镇压的造反派吗？可是，我们却被支持造反派的领导人，当作“土匪”、“暴徒”、“反革命”镇压了。

再从否定文化大革命角度来讲：我们揭露广西对无辜人民群众大镇压、大屠杀的暴行，不正是对文革的彻底否定吗？可是，当我们否定了广西的文革之后，我们又被被否定的那股帮派势力所否定了。因为那个韦国清的忠实战友×××，本来“处遗”也应当清算他，却被他骗来了“尚方宝剑”，成了广西“处遗”的“掌门人”，能不把我们继续压在“五行山”下吗？这个“否定之否定”，真是冷酷的“哲学笑话”。

还有，我们站在人道主义和维护人权的立场上，反对广西文革的惨无人道蔑视人权，然而却有主张人道，提倡人权的朋友，说我们“上当了，作了别人的工具”。于是，我们又统统被当作傻瓜。

还有，我们呼唤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可是那些崇拜无条件民主、膜拜法制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法宝的智者，却说我们的青春白费了，我们的血白流了，我们应该像孙悟空那样去取经，因为“民主、平等、博爱、自由”，只有西天极乐世界如来佛那里才有。

最后，我们反对政治和经济上的腐败，可是，那些靠了政治领域的黑暗才能在电视上风风光光的官，那些靠了经济领域的污浊才能家财亿贯住高级别墅的人，却说我们是制造社会动荡的危险分子，是道德比谁都败坏的伪君子……

我于是无言，因为社会醉了，像个酒后开车的司机。呜呼，悲矣哀哉，我们的忠诚与正义，谁个来承认耶？

然而，吾本老牛皮，泡亦三斤，不泡也三斤，感谢重视，不在乎非议和诽谤。原因：我没醉。我知道自己是谁。我的许许多多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朋友，也知道我是谁。因为这几十年来，我始终忠诚于自己的信仰没有随波逐流，并按照这种信仰去生活，去学习，去追求，去创造。我于是大言不惭：我是直立的人，不是倒行的他。

最激动我的是此时此刻，因为我正在博客上写文章。真是三生有幸啊，在我来日无多的岁月里，遇到这个通向人生，通向社会，通向世界的平台——互联网。只有在这里，我才能无拘无束地敞开心扉，向许许多多清醒的、善良的网友，叙述我的过去和现在。亲爱的网友：我太想向你们倾诉哀伤了，因为那是憋在心里几十年无法诉说的委屈啊！

我还对《桂林晚报》感激不尽，正因为它向我们刺来那太温柔的一剑，才使我热血迸发。如果没有他们，我还没有勇气站起来说话，还可能不是几十年，而是永远匍匐在那柄达摩克利斯剑的威严之下。

我建立博客，还有个“不纯动机”，那就是要为自己说话。因为自 1968 年我们变成了“刘少奇的孝子贤孙”、1971 年“林彪是我们的后台”、1976 年我们是“邓小平右倾翻案的社会基础”、1977 年我们是“‘四人帮’的别动队”以来，在广西，极少有官方的人说我们好话，一直把我们当作另类，使我们成为不可“超度”的政治亡灵。就拿我来说吧，在全广西及桂林几年的批判“邓小平”和“四人帮”的运动中，仅就《桂林战报》（《桂林日报》的前身）而言，在它的头版头条上，有多少领导人讲话，多少重要活动的消息报道，多少重要的政治评论，不言必上挂“四人帮”，下联“张雄飞”？其他版面上所载单位和个人的“革命大批判”文章，指名道姓批“张雄飞”的又有多少？基层单位会议上人人被迫“口诛笔伐”张雄飞的，更是数不胜数。

可是，《桂林日报》1983 年在报道我平反的消息时，只在一寸宽两寸长的篇幅上，登几句话了事。

骂我的话有一万句，不骂我的话只有一个字，这个比例，太有失公平吧？这能“恢复名誉”？能“推翻一切不实之词”？

这就让我从中悟出一个道理：“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从污水中逃生，“全靠自己救自己”。你若要让善良的人们知道你是谁？你就要用真话，把自己“博客”出来。至于对你之所记，人家信或不信，不必奢求。因为真的就是真的，掺不了假；假的就是假的，当不成真。你不要怀疑旁观者的判断力就是了。

所以，倘若有人说我的博文是“出风头”、“自我表现”，或者“贪天之功为己之功”等等，我将报以温良恭俭让的微笑。

但我不再缄默，也不再“谦虚”，因为缄默和“谦虚”，只能被人当作傻帽。

我只走自己想走的路，说自己想说的话，道自己做过的事，随别人怎么说。

因此，我的纪实博文，将一篇一篇写下去，题材可能愈广，品种可能愈多，时间的跨度可能愈大，而水平和质量，可能越来越欠，不过，只要不像《桂林晚报》那样胡言乱语，网友就会原谅。

那许许多多认识和不认识的网友们，我敬爱你们！

桂林文化大革命中的趣事

张雄飞

曾发生在桂林的文化大革命，虽然凄惨悲壮，但是只要有许多人参加的事情，就会有让人觉得有趣的地方，这就是人间百味。

“四清”把我饿得像豺狼

桂林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四清”运动还在进行中，我还在乡下搞“四清”。那时全国搞的“四清”，是个极“左”运动，它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生产队的干部，进村先把人家当作坏人来审查，冤枉了很多好人。不过“四清”运动也有个好处，工作队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对干部们是个很好的磨炼。我“三同”的贫下中农，是个四十多岁带着个十六七岁女儿的男人，他很穷，身体又极坏，瘦得二级南风都吹得走。他家一日三餐，前两餐喝稀饭，晚上才吃芋头丝米饭。每天吃饭时，我看着共餐的那个像患了痼病的男主人，实在怕被他传染，可又怕被人说“对贫下中农没有阶级感情”，只得硬着头皮吃，而且不敢吃饱，因为工作队规定每月只交给住户9块钱27斤粮票，我这个“大块头”，看着那个煮饭的小鼎锅，哪好意思放开肚皮吃？只好餐餐挨饿，还要参加田间劳动。好在那时我当工作队的资料员，经常要送汇报材料去雁山给工作分团。回来的时候，我的党性就差了，开始搞“小自由”了，我拿着包花生糖，一路走一路吃，美得连神仙和桂林人都不想当了。更加过瘾的，是工作队每半个月要回桂林来休息一天，回到桂林，我先跑去十字街的“老乡亲”饭店，要一盤红烧肉，一盤炒肉片，一盆猪肝瘦肉粉肠三鲜汤，再要两大碗米饭来解馋。服务员把这些美味佳肴端上来时，都好奇地问：“同志，你是两个人吃呀？”“一个！”她们的眼睛马上大了：“你吃得这样多？”“吃得，吃得！”结果不要二十分钟，我就把它们统统搞清楚了。

十字街的大辩论

到了六月份，“四清”工作队突然接到通知，要回桂林参加文化大革命。回城前，工作队开会传达上级党委精神，说解放前，桂林是李白黄（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的老巢，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很多，地富反坏右经常勾结在一起，反对社会主义，企图复辟资本主义，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现在广西师院，有一批右派跳出来想翻天，写大字报要赶走市委派去的工作队，说工作队是去搞镇压革命的反革命行为，还要抓市委书记和一个副书记去游街，所以工作队要回城，保卫市委，保卫社会主义革命成果。

我们这些忠诚的共产党人“老革命”，怎么经得起这样的宣传鼓动，就斗志昂扬地回来了。当时全市的绝大多数工人、学生、机关干部、各行各业的职工，都不接受师院学生的观点。据说在“四清”工作队回城之前，工人和学生，天天把师院围得水泄不通，找师院的学生辩论。我回到桂林时，辩论的范围已经扩大到市中心十字街了。那种辩论，可以讲是史无前例的，因为那段时间，十字街从早到晚都站满了一小圈一小圈的人，被围在中间的，都是师院和支持师院学生观点的中学生。我也参加了，观点很简单：市委书记是三八年的老延安，他还会有什么错？工作队进驻学校不是镇压学生。

在辩论中，因为观点的激烈对立，谁都不让谁，那时的人，最怕被人扣“修正主义”帽子，大家都知道修正主义的特征，就是不坚持革命原则。因此在“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大是大非”辩论中，谁敢不坚持原则？哪个愿当修正主义？所以那辩论呀，就像美国人打橄榄球，追着你打，揪着你打，缠着你打，让你挣也挣不开，跑也跑不脱，不辩得你缴械投降，就不准走人，而且让你饭也难得吃，尿也难得屙。吃饭撒尿，这对于围攻别人的人来说，不是个问题，他可以溜出去吃饱了肚子，放完了膀胱里的水，再来辩论，被围在中间的学生们就惨了，想走挪不动脚，因为你走就等于认输，谁愿意背叛自己崇高的信念，做因为被尿憋得突围而去的“革命逃兵”？于是乎，肚皮饿了，硬顶！尿胀了，硬憋！但“水满则溢”既然是自然规律和生理规律，当然也就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了，肚子饿好忍，尿胀了可不好憋，有些“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孩子们，就这样以顽强的意志，坚持到把尿屙在裤子里。听说后来还发生这样的事：当桂林持原来观点的人从多数变成少数的时候，十字街的辩论，又形成了激烈的新高潮，在辩论中，有个站在圈圈内的女红卫兵，辩不过对方，气得她解开腰带就脱裤子，这一着果然厉害，那些围攻她的人，见她居然如此敢为天下先，都被吓得一哄而散，什么“胜利果实”都顾不得要了。

我当“逍遥派”

城市中的文化大革命，十有九人的政治热情，都被鼓动起来了，但也有不参加“逍遥派”，不过那时当“逍遥派”并不光彩，被人歧视。因为当“逍遥派”的，一般有三种情况：一是被认为有严重政治问题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二是因“出身不好”不敢参加运动；三是“政治觉悟低”不关心国家大事者（其实这种人多数是智者）。

运动开始不久，我也变成“逍遥派”了，因由是单位的群众组织无中生有，说我有两个父亲，一个是革命烈士，一个是革命叛徒，这样我的家庭就从纯红变得蓝不蓝绿不绿的了。“老子不干了！”气得我去钓蚂拐（即青蛙）。

说起钓蚂拐，我可是个老手，十岁左右，就长于此道。因为那时家穷，十天半月，难得有两块用豆豉蒸的肥猪肉送饭，家里几个孩子和大人的肉食，主要靠我钓蚂拐，而我又最会钓蚂拐，别看十岁出头，我就掌握了专业“蚂拐佬”们先把蚂拐全部从竹林苑、草窝里赶下水塘去，然后再一个个地钓上来的技术。所以，每每我拿着长钓竿出去，个把时辰回来，就会有斤把蚂拐交给奶奶，村里的人给我起了个绰号叫“小蚂拐佬”。

我经常从隐山钓起，一直钓到南站。六十年代的隐山到南站的铁路两边，都是池塘、水沟、菜地。我去钓蚂拐的时候，从来没碰着“同行”，你说那蚂拐好钓不好钓？有一次我在南站对面的小河沟边，钓得个足有半斤重的“蚂拐精”，乐得我像个“巴爷”（桂林方言“小孩子”）那样手舞足蹈，只是还不会伸出两个指头喊“吔--！”。

我天天爆炒蚂拐，相好的同仁也沾光，还是吃不完，我的筛桶、脸盆，都成了装蚂拐的容器了。蚂拐再多，也经不起我的反复“扫荡”，钓来后来，我不得不钓到瓦窑、二塘附近去了。回想起来，文化大革命中最快活的是做“逍遥派”，自由，好玩，不用上班，工资白拿，不得罪人，没有危险，多好！

“革命大串联”

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大串联”，太受全国“红卫兵小将”的欢迎了，后来发

展到各行各业的人，只要不出国，想去哪里就去哪里，除了吃饭自己掏腰包外，坐车不要钱，住宿也不成问题，你只要高举“革命串联”的旗帜，哪个地方的人，为了表现“革命造反精神”，都会欢迎你，热情为你找睡觉的地方。这种免费大旅游，谁不想到海边去“经风浪”，到大城市去“见世面”？

到了1968年的秋天冬天，大串联更起劲了，原因是毛主席多次在北京天安门上接见红卫兵。那时的造神运动，成效真是了不得，多数中国人，都把“看见毛主席”当作崇高的梦想。于是，当“毛主席要第八次接见红卫兵”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桂林歌舞团的青年文艺工作者们，“组团”向北京进发了。

要去北京，必须坐火车，这是常识，可是现在的年轻人大概不会想到，那时要从广西坐火车去北京，“难如上青天”，因为铁路只有一条，要去北京看毛主席的人，则数以百万计。

我们接连几天，都上不了火车，特别有天下午，黄昏时分火车一到站，人就像潮水般地往上冲。所有的车窗都成了车门，每个车窗前都有成群的人我举着你的屁股，你抱着我的大腿往车箱里塞。车门上的挤和争夺，其激烈程度，就更不用说了，车厢要爆炸了还往里挤。这样搞怎样受得了？人毕竟不是箱子和麻包，可以一个一个往上摞！车上的人开始“自卫反击”了，用拳头打，用脚踢，要扫掉车门前的人。车窗上面的人，也不惜采取“暴力革命”，拼死把车窗关上。这样在顷刻之间，“两大派革命群众”，就在车上和车下形成了。车下的人“革命造反”的办法多得很，他们知道嘴巴的力量已经不起作用，便扛来长长的木头塞住车门，看你车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搞不搞关门主义？最精彩的是有人把铁道旁的枕木扛来，几个人举起，“一、二、三”地喊着号子塞进还没来得及关的车窗去，硬要车上的人“打开窗户说亮话”。但“车下派”最终仍不是“车上派”的对手，因为打仗要靠占领制高点，既然这个优势被车上的人占领去了，那长长的木头，那又大又重黑黢黢的枕木，最后还是被推了出来。那趟列车，在精力旺盛，斗志昂扬的“革命造反派”的反复争夺中，直到第二天凌晨才缓缓向北开去。

我们好不容易上了去北京的列车。人挤得像沙丁鱼罐头，平时只坐十人的两排座位之中，竟挤着三十六个人。我没捞着座位，就登上座位的“龙脊”，晚上还在上面睡觉练“扁担功”，不过我最深刻的感受是：臀部的肉确实太少太少了！

黄婉秋也跟我去搞武斗

黄婉秋现在是世界名人，但是这件事，肯定地球村许多村民不晓得。1967年入冬，桂林两大派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已经从打嘴巴仗到打长矛铁棍仗，并且冷兵器和热兵器混合使用。

有天晚上八九点钟，歌舞团夺了权的群众组织的头头，突然接到“上级”组织的紧急通知：对方向我方榕树楼据点进攻，要他们派人去增援。他们就叫我带队去。那时这个群众组织为了“文攻武卫”，暗中用粗钢条打造了十二支长矛，也发给我一支。我接到“命令”后，马上把“为革命不怕抛头颅洒热血”的少男少女们集合起来。

婉秋那时是个二十多点岁的姑娘，天真活泼，人缘极好，同志们都叫她“婉秋”，因为她的额头既高又饱满，还给她起了个亲昵的绰号叫“大头”。敢去打仗，需要很大勇气，婉秋那晚和七八个女孩子，勇敢地参加了由我领队的武斗队伍。不过在这要说明，她们与其说是去打仗，不如说是去看打仗，因为她们两手空空，那小小的拳头，连鸡都打不痛。

我出发前绞尽脑汁：怎样保护好这些女孩们呢？想起有个苏联电影，这样描

绘库图佐夫和拿破仑打仗的场面：拿破仑把进攻的队伍排成方队，军官们走在最前面，有的嘴巴还斜叼着烟斗，步伐整齐地向俄国人进攻，他们那种在枪林弹雨面前悠闲的、无所畏惧的欧洲中世纪骑士风度，表现得太激动人心了。我于是灵机一动，在艺术馆院子里编排出征的勇士：拿钢矛和棍棒的小伙子，排成锥形队伍，我在最前面，女同志在中间。我特别强调说：“这个队形，既可以保护女同志，又可以互相掩护，不怕‘敌人’攻击。”

队伍出发了，可是我的“锥形队伍”，没出艺术馆的大门就变成鸭帮了，乃至进了房地局的院子，更是什么队形都没了，因为我们的战场，不是辽阔的平原，是只能单人通过的小门。看来硬搬拿破仑教条，也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

果然有“敌情”！刚过房地局的后门，在榕树楼旁边的一个院子里，就发现有一伙手执铁棍长矛的人，有的站在昏暗的廊檐底，有的蹲在冬青树丛下，我们和他们已经面对面地相撞了。这是真正的遭遇战。我马上想起那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兵家名言，便用最大的音量，大喊“杀！”就带头冲上去了。

对方也很不怕死，一个穿着件长到脚膝盖黑外套的人，拖着条长长的钢棍，口中骂道“我操你妈的×！”劈头盖脸就给我一下，我用钢矛一挡，只听得“噹”的一声，把他的钢棍挡飞了，他又迅速地轮起钢棍，朝我脑门又是一棍，我又“噹”地挡了一下，这次他用的力量特大，那钢棍没被我挡飞，顺着钢矛滑下来，击得我左手的大拇指痛得钻心。我火了，上前半步，朝着他的下腹部就是个突刺，只听他“啊”的一声惨叫，转身拖着钢棍就跑，他的同伴被他的惨叫吓着了，也纷纷跟着逃。就在这时，猛听得“咣”地一声，满院子火星乱飞，原来我们有个没拿钢矛的人，看见对面远处有人要端冲锋枪扫射我们，就一个手榴弹甩过去。

那突如其来的响声和火花很吓人，进攻榕树楼的人，全都朝市委那边跑了。我们这边呢？婉秋那帮女孩子们听见爆炸声，也吓得不管是打了胜仗还是打了败仗，已扭头跑得无影无踪了。

那人被我刺穿肚皮一寸多深，算是轻伤。到了1968年9月2日，桂林胜利的一派（“桂林联指”），组织全市大游斗，我和婉秋同被押在一辆大卡车上，她站在车厢前面的右边，我站在车厢前面的左边，游斗她的人，给她戴顶戏曲里武旦插着长长翎子的凤冠，又给她披上鲜艳夺目的霞帔，本来想用这种装扮丑化她，哪知道这样一搞，更让她美若天仙了。

在游街途中，有两个人跟着汽车跑，其中一个指着我“点水”说：“刺伤你的那个人就是他！”原来是那个工人兄弟来找我“讨还血债”了，他拿着木棍，攀上车厢，朝着我的脑袋就是一棍。这回“武斗”可被他打着了，我顿时觉得天旋地转，眼前的人影从一个变成十个，好在他用的不是钢棍，不然的话，我早就到阎王那里去买个九品芝麻官来当当了。现在那位兄弟不知在哪里？我想请他喝早茶，不知他能否赏光？

我被子弹打得像树叶飘了起来

1968年8月，桂林地区12县武装民兵及“桂林联指”民兵师，重兵包围桂林欲消灭“桂林老多”的“武斗”已经结束了。那时我是“老多”红卫师的一个连长，为了执行市革委会关于两派交枪的通告按时交枪，12号那天，去军管会联系完交枪事宜后，在回连部所在地艺术馆的路上，突然听见从马路对面的三中（即如今的“桂林中学”），传来爆豆般密集的枪声。

几个月的“武斗”，已经让人民群众受尽了惊吓和苦难，他们早就盼望结束“武斗”了，如今“武斗”已经结束，又枪声大作，住在解放西路的群众，纷纷

跑出来看，以为又打起来了，当他们发现不是发生战斗时，有的就骂起来：“现在还打枪，是哪个单位的？这不是扰乱群众吗？瞎掰！”。

我这个连主要任务是守卫榕树楼、榕湖饭店、桂师、隐山一线，共有四个步兵排和 40 多个临桂县同观点的武装人员(他们是为逃避全县大屠杀，躲进桂林来的，不过后来听说，在“八·二〇行动”中他们还是被抓回去统统杀掉了)，还有一个爆破排。

小伙子们为什么放枪呢，是庆祝《七·三布告》的颁发和“武斗”结束吗？不是。他们已经从这个布告中，看到了是非不分和他们未来的命运，于是，拼命向天空开枪，用子弹发泄心中的悲愤。但也不能因此而惊扰群众！

我骑着自行车飞快冲进三中爆破排驻地。这个排三十多个成员，大都是从印尼等归国的爱国青年，正在院子里把那些带响的长短家伙，一齐朝天猛放，那枪声，耳朵都要被震聋了，我生气地大声喊：“不要打了不要打了！你们这是干什么？无组织无纪律！什么时候了，还乱打枪，外面的群众都骂我们了，你们知道不知道？”他们很听指挥，不打了，却向我发起牢骚来：“我们交了枪，对方再打进来就得死。”有的说：“对方是不讲信用的，不是早就签了停火协议吗？他们不是照样打死我们的人？”是的，就在 7 月 24 号下午，我们这个连的副连长陈思明(抗美援朝的老兵)，走到隐山前的铁路上时，西山主峰的对方武装，竟向他射击，子弹穿透他的大腿根，打断了主动脉，他被打中时，滚到路基下马上看手表，记下对方违反停火协议的时间，可是他还是在医院抢救无效死了。所以战士们对交枪的不满和怀疑，我无法解释。三中这边的枪声没有了，医专那边的枪声又响了起来，我更生气了，急忙去制止。

医专和桂林三中只隔着一道围墙，“武斗”时，为了行动方便，在围墙下开了个能过人的洞。在三中这边的墙洞边上，有口水井。我推着自行车朝那墙洞走，远远就看见洞口给子弹打得烟尘滚滚，而在墙洞边的井台上，有两个小孩子，大的最多四五岁，小的两三岁，正在那里你追我，我追你地玩耍呢。我一看更着急了，心想要是打着孩子怎么得了！于是想都没想有没有危险，便径直朝着那洞口快步走去，因为驻在医专的，是我这个连的第四排。

明明看见那洞口被打得冒烟，还要往那里钻，不是去找死吗？如果在战场上，我绝不会这么傻，可是这时连急带气，竟没想到此时的那个洞口，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

当我走到离那洞口大约两三公尺时，突然听到“炸——”的一声响，就觉得自已像片树叶似的轻轻飘了起来，又轻轻落在地上。霎时间，整个世界全黑暗了，我什么都看不见了；整个世界都无声响了，我什么都听不见了。

不知隔了多久，耳旁传来一个女人的喊声——“哎呀，你们快回来呀！……”

这时我才觉得自己是中弹了，强撑起半个身子，用力睁开很难睁开的眼睛，朝喊声望去，只见有个中年妇女，正站在她家门边，声嘶力竭地招手呼唤那两个孩子回家去。

我也向她招招手，意思是请她来救我，谁知她一看见我向她招手，竟吓得连忙躲进屋里去了。

后来我才知道我把她吓坏了的原因：一颗穿过砖砌围墙的子弹，斜着从我的下嘴唇打进去，击碎了上下牙床（手术后我只剩下九颗牙齿），震碎了下巴骨，又打烂了舌头，才从舌头下面钻到脖子右侧皮下，所以那时我的模样很难看，胸前全是血，脸的下部肿得很大很大，破裂的下嘴唇翻着耷拉下来，上面还挂着白花花牙齿……那个女人看见我这恶鬼般的模样，才吓得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要了。

又不知过了多久，听见有人大喊“快来人呀！张连长受伤了！”有的大骂“他妈的，是谁打的？”拔出手枪四处找凶手。这是住在校园里的三中武装红卫兵发现了被打倒在地上的我。

红卫兵们急忙前来抢救。那时作战人员都有止血胶带和急救包，见我的血不住从嘴里涌出来，情急之下，一个女生，竟拿她的止血胶带来勒我的脖子止血，被我拉开了；另一个把急救包，整团塞进我的嘴巴去，也被我扯出来了……

沉着冷静就是生命

临危不惧，处变不惊，对于人生来说非常重要，有时候，它甚至决定着你的生死存亡。

这时的我，完全不能说话了，眼睛也难睁开，但神志很清醒，心里也不紧张害怕。看见学生们这样“抢救”我，心想这些小弟弟妹妹，打仗厉害，抢救伤员可不行，再让他们这样搞，不死也给弄死了。于是伸出双手，伸直手掌，一伸一缩地做向前搬运的动作，意思是叫他们赶快把我送去医院。那些机灵鬼马上明白了，立刻后面两个人一人抓起我的一支臂膀，前面一个人提起我的两条脚，抬着我向校门急跑。

刚跑出校门，就碰上一辆去军管会交武器的汽车开过来，他们拦下汽车，把我抬上去直奔去“老多”的“野战医院”（即原工人医院）。这辆汽车，真是上帝安排来救我的命的，如果步行抬我前去，从三中到叠彩山下，最快也要半个小时，而那半个钟头，后来证明，是决定我的生死的半个钟头。还有，如果当学生们抢救我的时候，我自己不知所措或者被吓得晕过去了，肯定会延误了到达医院的时间，因为武斗期间在那一带，根本没有汽车过往。

我平躺在急驰的汽车上，血不一会儿就塞满了喉咙，我要转过头来把血吐出去才能呼吸，一路上，都不住地这样吐着。到了医院，医生们连忙为我做手术准备。此时我的眼皮重若千斤，用最大力气才能睁开一条缝，但我清楚医生们忙些什么。要做手术，首先要验血型，以便输血。当我听到“快查他的血型”时，我就用手连续在空中划圆圈，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血是“O”型的。

第一个来抢救我的医师，是桂林著名外科主任刘祖林，他曾当过抗美援朝的中国医疗队长。见了我的动作，连忙说“好，好，他的血是‘O’型的，赶快准备给他输血。”我又为自己争得了一点延续生命的宝贵时间。

我被推进手术室。一躺上手术台，医师们立即忙着寻找舌根下大出血的动脉止血。与此同时，麻醉医师在我头顶做着全麻的准备。我的双手也被绑在手术台上了。可是这个时候，医师们由于忙着为我止血，忽视了我平躺时口腔中大量的血塞住了呼吸道，有被淤血窒息的危险。我觉得气憋得十分难受。

我想用力挣开双手给他们做手势，要他们设法解决我的呼吸问题，可是手动弹不得了。嘴讲不出话，手又动不得，这时我才着急了。

就在全麻的那个“乙醚”面罩要扣到我脸上的千钧一发之际，我右边的手术医师靠近了我，我便使劲扯他的白大褂。那医师见我扯他的白大褂，便停下手术问我：“你想做什么？”

那麻醉师也把麻醉面罩拿在手中暂时不扣下来。我把拇指食指和中指捏在一起，做写字的动作。医师们明白了，连忙说“他要写字，把笔和纸拿来给他写。”

他们把我的右手解开，把一支圆珠笔塞在我手里，又把我的手拿到放在我胸脯上的一沓公文信签上，我马上写下了“呼吸”二字。

“啊，他呼吸困难，快把气管切开！”我的气管被切开了，医师把一个园型

的中间有个小管子的呼吸器插入我的气管中。我顿时觉得舒服极了，马上就什么都知道了。多年后，刘祖林老医师和我闲聊起那次手术时说：“那次给你输了一千五百西西血，多亏你沉着，也多亏你和我们配合得好，如果你再晚二十分钟做手术，结果就很难说了！”

我是怎样被那颗子弹打着的

那一枪，是谁打的呢？是财贸系统一个年方二十一的帅小伙打的。“武斗”时，我们的关系就不错，“武斗”后，更加成了“狗肉”（桂林方言“好朋友”）。

原来那天，他和伙伴们，用56式冲锋枪，朝那条围墙发泄情绪和过枪瘾。当他打得只剩几发子弹时，一个比他大点不多的“狗肉”手痒了，抢他的枪说“给我打给我打”，他不给，手一甩，“嘟嘟嘟”，那几发子弹就脱“靶”飞到围墙上面去了。他们这一“脱靶”不要紧，我在围墙那边就仰八叉了。

他们自然都是无意的。而且，知道我受伤住院后，忘记了“男儿有泪不轻弹”的古训，对着昏迷不醒的我大哭。不仅如此，还去看护我，洗脚擦背什么都做，就像照料自己的亲哥，后来还多次向我道歉。

我当然不生他们的气，一句责怪他们的话都没说，因为在那火炮连天的时期，没被对方的枪炮打死算是走运的，吃自己人的一颗子弹算得了什么？我的宽容，他们的善良，使我们的友谊之树长青。

“咬牙切齿”到如今

在手术台上，大夫们把我脖子下的气管切开后，就做了个十分复杂的手术。我的运气好，给我做手术的，还有著名的五官科专家虞静和李宁。

我下巴底下的皮肉，被从左边到右边割开了，因为要把下半张脸皮翻到鼻子上边去，才能缝合被打烂了的舌头，修补固定被打碎了的下颌骨。这时我脑袋的下半部分，就像被敲碎的罐子，要把这种“破罐子”修补好，还要坚固耐用，谈何容易？但外科高手们做到了。他们花了四个多钟头，把我的烂舌缝合，把碎成四块的下颌骨用不锈钢重新组合固定在一起，把破碎的牙床清理好，再用钢丝让上下牙齿紧密相连，免得对齐的上下颌骨走样。这种手术需要有相当的精密度，否则我的下巴骨长好后如果比腮帮子还宽，或者下巴的中心线不在左眼和右眼中间，那我的尊容岂不成了日本鬼子的机关枪——歪把子了？

但是，如果要求把我的“破罐子”，修补得和原先上帝做的那样精密就是强人所难的了。所以我的下巴骨长好以后，大牙臼比原来的高了些，于是生理的本能，就不按我的意志而自动调整起来：不管我愿不愿意，只要我没睡着，上下牙都像老牛反刍那样不停地咬呀咬呀，它们以为这样就能把凸出来的部分咬平！因此呀，我虽然没有不共戴天的私敌，却天天“咬牙切齿”，这篇纪实，就是在“咬牙切齿”中写成的。

“你就是张雄飞呀，老子枪毙你”

我手术后昏迷了三天三夜，醒过来没几天，就发生了全副武装进城抓杀手无寸铁的“老多”的“八·二〇革命行动”了。先是歌舞团不同观点的人去医院抓我，见我重伤躺在病床上，没动手走了。后来又有几个“桂林联指”下属的组织“五四铁笔”的人提着枪来抓我。这个组织在“武斗”期间，对不同观点的人和“牛鬼蛇神”从不手软，想抓就抓，想杀就杀，大有“党卫军”的风度和气概。他们冲进病房就大喊：“哪个是红卫师六连连长张雄飞？哪个是红卫师六连连长

张雄飞？”我还不知道“八·二〇”的厉害，很自然地抬起缠满绷带的头，表示我就是。

“把他拉出去！”几个人冲过来抓我。驻院的军代表大概是 6955 部队的，知道“八·二〇”乱杀人的情况，所以当他们在医院找我的时候，便一直陪伴在身边，此时见他们要抓人，急忙上前阻拦道：“这是医院，你们不能乱搞！”不准他们动手。

其中一个见不能抓人，喊道：“你就是张雄飞呀，老子枪毙你！”举起手中的卜壳枪就要打。我见状便往后一躺，心想“要毙就毙吧，反正我动不了，随你们的便吧。”

旁边的军代表又急忙挡开那个人的枪。

“五四铁笔”为什么找我？为什么恨我？是有原因的，因为在整个“武斗”期间，对方的军事指挥部，一直把我这个连守卫的西线，作为进攻“老多”的重点，他们的作战意图是：突破西线，直插十字街，然后分割包围“老多”各据点，逐个歼灭之。但他们的目的没有得逞，在桂师和榕湖饭店，他们打进来三次，又三次被打回去了。西线是对方进攻最激烈的地方，榕湖饭店的四号楼，被他们打进来放火烧掉了，那残墙断壁，就像二战时的斯大林格勒。

不过，他们找错了人，因为我不是红卫师的“功臣”，我们这个连，因为战线过长，兵力不足，如桂师那么一大片地方，有时夜里只有一个班防守，根本无法阻挡对方优势兵力的突然袭击。只是，我们从来没丢失榕湖饭店这个重要的战略据点倒是真的，而把他们打出去的，每次都是赶来支援的红卫师一连和四连。

当然，这些情况，对方当时是不完全知道的，因此他们每想到在西线进攻的失败，就想到我，把我当作打败他们的“罪魁祸首”，怎不想枪毙我？

谁知我命不该绝，在“八·二〇”之前，老天就安排我进医院去避难了，如若不然，我在“八·二〇”时被绑到街上游斗，十有八九现在不能在博客上做文章了。

子弹头和“骨髓炎”

我能起床活动了。这时，刘祖林等专家，已经被抓被关了，加之住院的伤员，都是“老多”的伤员，如果不是驻院军代表的帮助，我们早就被赶出医院了。负责我们这个病房的张医师，也这样对我们说：“我不能为你们医疗了，不知哪天，我也要被关了。”

此时人心惶惶，人人都有大难临头之感。而病房的窗外，是地区机关的所在地，天天看见有被五花大绑的男男女女，跪在地上等候押回县里。现在思想起来，我们当时所看见的那些年轻的“反革命”和“牛鬼蛇神”，大概早就成了冤魂了……

有天我于无意中，摸到脖子右边皮下有颗硬邦邦的东西，问张医师是什么？ he 说是子弹头，马上拿来针麻药，把我的脑袋摁在病床上，打进麻药，三刀两刀，就把那弹头挖出来了。他说如果不赶快取出来，它又会走掉的。原来，那颗子弹明明打进我的口腔，手术时费了很长时间就是找不到。幸亏它不甘寂寞，游走到皮下，假若它在脖子深处长期隐居起来，我就惨了！

9月初，我下巴底下本已愈合的刀口，突然裂开，有脓水从破处一滴滴掉下来。我又忙问张医师怎么会这样？他检查我的口腔，发现舌头下的伤口处，有一个白花花的脓头。他叹息着对我说：“我看你是得了骨髓炎了！”我问他为什么会是骨髓炎？他说因为我被打碎的下巴骨没长好，感染了，溃烂了。我问他骨髓炎容易治好吗？他说很难，在桂林没法治，要到上海去才有可能治得好。他还告诉

我，如果我真的得了骨髓炎，下巴骨就会慢慢地烂下去！

他这么一说，把我愁坏了，暗想自己是个对方喊抓喊杀的人，怎有可能去上海治疗呢？要是这下巴骨逐渐溃烂下去，那么我的脑袋，就不是“歪把子”，而是“烂冬瓜”了！

无奈呀无奈，听天由命吧！

有天上午，七八个穿白大褂的人，由军代表陪着来“查房”。其实，这是医院胜利的那一派，来清查“老多”的“战争罪犯”以便处理。当查到我的床位时，张医师介绍说：“他可能是骨髓炎。”

那些“查房”的人，听了介绍理都不理，只有位从印尼回来的归侨医师，要我张嘴给他看，看完没说什么就走了。查完房，那归侨医师又回来了，他用镊子挑我舌头底下的脓头，挑着挑着，便轻轻地夹住外扯。天哪，那东西越扯越长，扯完竟有半尺多长！

那半尺多长的东西，其臭难当，因为上面裹着一层发臭的脓浆！原来这不是脓头，是一条做手术时引流的纱布！本来，这条纱布，术后不久就应该取出来的，因“八·二〇”之后，医院里“老多”观点的人，不少被关押了，或被停职“交待问题”了，暂时没挨的人，也无心工作了，因此秩序大乱，伤员没人认真管，这样我口中的那条纱布，没人记得及时取出来，就慢慢滑进下巴的伤口里面去，只剩下些许白花花像脓疡似的纤维。又因为久不取出，那用于引流以利伤口愈合的纱布，就起了相反的作用，变成口腔细菌繁殖的“大本营”！在这种情况下，好肉细菌都能啃穿，何况你是刀口？阿弥陀佛，还是老天保佑，假如连那一点点纤维也全滑进下巴骨里面去的话，那我的脑袋肯定就要变成“烂冬瓜”了！

臭纱布取出来以后，我的“骨髓炎”不几天就不流脓了，但是在舌头底下，却有个像崇左县的天坑那样深的洞。这洞究竟里面有多深多大？我无法探测，只晓得每当大米饭路过那个洞口时，都一粒跟着一粒地跌落进去。因为那洞子不能当作“备战备荒为人民”的粮仓使用，张医师就给了我一个带着歪脖子针头的大注射器。每天吃完饭，我都得“清仓”。当我把那弯曲的针头塞进洞里，把一大管子的水灌进去，那些米粒，就像白老鼠似的一个跟着一个被灌了出来。一个多月后，那“天坑”才被新长的肉填满。

面目可憎者勿向姑娘乱表情

枪伤前，我的相貌还算不讨人嫌，枪伤后，我的模样就让人看了“情何以堪”了——右眼神经被震坏了，常年充血，而且眼皮很懒惰，结果一只眼睛很精神，一只眼睛总打瞌睡；右边的脸皮下垂，结果左边的脸皮比右边的短斤少两；右嘴角向右边倾斜，结果左边的嘴角比右边的水平高。大概是那子弹头打断了脸皮右边的血管吧，后来我被关进收容所强迫劳动时，有年夏天爬高山砍竹子，别人累得脸全红了，我只红了左边的脸，右边的脸依旧是白的。当同行者嘲笑我时，我顿悟：难怪人们这么讨厌两面派。

人确实难有自知之明，我虽然模样改变了，心态却依旧自我感觉良好。而人的思想状态如果不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走路肯定会撞在南墙上。

我在桂林钢厂当烧火工时，厂里的美姑娘比比皆是，我们这些“单干户”凡人，在她们面前，很难不动凡心。

我除了会烧火外，还喜欢拉小提琴，而且水准，和几百年前欧洲那些在别人的窗下拉小夜曲的小提琴手不相上下。在不上夜班的时候，我爱在宿舍的走廊上用自制的小提琴，再现独奏曲《渔舟唱晚》中的渔歌和波光。我还喜欢拉二胡，

有时弄得满楼都是刘天华《空山鸟语》的鸟声啁啾。

也许是为我的琴声所动吧，住在后排集体宿舍的一个俊俏姑娘，经常来我们的宿舍玩，有时竟要我拉琴给她听。面对这样的听众，我当然乐于“为工农兵服务”了。有回我的松香用完了，她痛快地说“我们车间有”，马上跑去拿，不一会儿就气喘吁吁地把一大块足有五百多克的松香，塞在我的手中说“给你！”我大笑了，更觉得她可爱了，心想：“小×呀，这块松香像你的脸那么圆，够我拉一辈子琴给你听了！”

然而我们的关系没有发展，我只不过当了一回“南柯太守”而已。当我从美梦中醒来的时候，才悟出个中原因：我的“门面”没装修。因为我居然不懂欲实践“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美好，必须先修好“门面”这个简单道理。设想，哪个体面的姑娘，会跟个一张嘴就看见那深不可测的黑洞、讲起话来嘴巴又歪又漏风的人出双入对？

还有个商店里的姑娘，其貌美经常让我想起《诗经》里那几句不知打动多少年轻人的千古绝唱：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有一天我去看她，她说：“你应该把牙齿镶上，那会比现在好看得多。”并马上介绍我去他们商店隔壁的牙科门诊部镶，说那里镶得好，她有熟人，我跟她去了，她要那熟人对我多多关照。我镶好牙后，专门去看她。她一见我，就笑得甜甜的说：“看，你现在比没镶牙前好看多了，和以前的样子差不多了！”从她的眼睛里，从与她的接触中，我看得出，她对我是有好感的，于是大胆给她写信，含蓄地表达对她的爱慕，她都给我回信，真叫我大喜过望。后来，我越来越胆大，竟写信约她去雁山公园游玩，她来信答应了，说她也很想去，并要我借个照相机，说“我想在那里留下难忘的面影！”后来，后来……自然是我又忘了自己当时的政治条件、物质条件、相貌条件而令她为难，她还是婉拒了原先的约会，远嫁他乡去了。

悲惨的母猫

我和“花花”的故事，要从它的猫妈妈说起。1980年夏天我是个被判了无期徒刑的“文革”政治犯，在鹿寨县英山监狱犯人医院种罗汉果。

从高墙外的石山上，来了一只野生的小雌猫。它傍晚从围墙下面的出水洞钻进犯人生活区觅食，天快亮时，就哀哀地叫着，像个想妈妈的孩子要回山上去。我经常在这个时候，怀着怜悯和伤感跟在它后面，一直把它送到围墙旁边，嘴里还轻轻地对它说：“去吧，去吧，平平安安去找你妈妈吧！”因为在那荒山怪石之中，谁知道它会在什么时候被猛兽残害呢？

猫本来就是和人住在一起的，小雌猫怎会不想找个能避风躲雨的处所？我睡的那间小工具房，便是它最理想的家了，加上我虽然盘中餐最缺肉，但它来时我宁愿少吃或不吃，也要热情款待，不久它就和我混熟了，不走了。

小雌猫嚎春了，一只硕大健壮的黄色公猫，被它从山上呼唤下来，那个罗汉果园，是它们的伊甸园。

母猫产崽的时候，我像个接生婆守在旁边，时刻准备帮它做点什么。其实这是多余的，猫“生孩子”可不像人那么可怕，它无师自通地把一切料理得妥妥帖帖。

它产完崽，我找来一只大纸箱，里面垫上件旧上衣，帮它把小猫们放到箱子里去。它对我的安排很满意，没把小猫叨到别处去。

因为哺乳小猫，母猫的食欲大增，我每天都少吃些饭，再用些许专为它买来的小鱼干拌饭喂它，然而，我每月两块五的“工资”收入，与它的需要相去甚远，四个小猫一天到晚要从它的身上吮去许多奶水，很快就把它吮得瘦瘦的了。

那天中午，它的肚子像填不满的洞，吃完了又咪咪地朝我叫着讨吃。我看鱼干所剩无几了，就没再给它。小母猫明白向我哀叫已没用，只好自己出去觅食。

下午两点多钟，猛听得屋外传来母猫凄厉的叫声，一病区的护士王某抱着母猫急匆匆地走进房来说：“它去癫老(疯子)房抓老鼠，挨癫老抓住折断了三条腿。”我连忙把它接过来，见它的三条脚上，果然都缠着绷带，散发着刺鼻的正骨水药味。

母猫不停地惨叫，看见我，眼中充满求助的神情，仿佛在说：“救救我啊，救救我啊！”见到母猫伤得这样凄惨，我心痛极了，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只能把它抱进那个大纸箱中去。

箱中四只未开眼的小猫，正抱作一团酣睡，听见母猫的叫声，立即抬起头伸长脖子、哀叫着爬去找母猫吃奶。可是当它们嗅着那浓烈的药水气味，就立刻不喊不叫挤到箱角不敢动弹了。

母猫刚被放进纸箱，看见小猫叫着爬向它的时候，强烈的母爱，让它忘记了那致命的伤痛，挣扎着要去舔舐它心爱的崽崽。可是，每当它挣扎时，那折断的骨头插进肌肉中的剧痛，让它更凄厉地嚎叫起来。我只好把它抱出纸箱。

它要站起来，但是每一个想站起来的动作，都伴随一声撕裂人心的哀号！越是这样，它就越是要站起来，而越是要站起来就越痛，越痛它就越挣扎，最后是满地乱窜了。

我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看见它哀叫着用焦急恐惧的眼光望着我的时候，一种负罪感，象山一般地压在我心头！我难过极了——若是中午我让它吃饱，它就不会有这悲惨的遭遇了！更何况，还有四只没睁开眼睛的小猫，等待着它哺乳啊！

……母猫死了。

我做了小猫们的“妈妈”

四只可怜的小猫，在纸箱里爬着，用弱得像没长毛的小麻雀的声音叫着，四散寻找母猫的哺乳。

此时，我觉得自己看见的已不是四只小猫，而是四个可怜的孩子了！面对命运竟如此凄惨的“孩子”，我能不想尽一切办法拯救吗？

终于有了办法：恰巧几天前我妹妹去探监时，给了我一包奶粉。于是我从犯人医疗室要来一条又细又软的小胶管，又寻来一只空眼药瓶，把胶管剪成寸把长，再把头修得圆圆的光溜溜的，做成一个小小的“奶瓶”，然后用热开水冲点奶粉，亮凉了吸满小瓶，试着喂它们。岂知头一天，小家伙们的嘴碰着“奶瓶”，马上把头扭开，无论如何也不吃。这可把我急坏了，只好把它们一个一个抓在手中，硬把“奶嘴”塞进口中去一个灌几滴，而且个多钟头就灌一次。第二天如法炮制，发现它们对牛奶不那么厌恶了，把“奶嘴”塞进它们的嘴里，也不挣扎了，而且逐渐会吮了。三四天以后，它们的嘴一碰着“奶瓶”，就拼命地吮啊，两支前脚还像拳击运动员的拳头那样不停地一伸一缩做着摁猫妈妈乳房挤奶的动作。小“奶瓶”转眼就空了。而且没几天，小猫们就把我当成它们的猫妈妈了，一听见我来到纸箱边，就拼命地爬哟，仰起小脑瓜向纸箱上叫哟。我的手一抚着它们，那叫声就更急更响了，叫得一种莫名的母爱，竟在我这个男子汉心中油然而生了，

觉得它们的叫声，是饥饿婴儿的哭啼，于是手忙脚乱地给它们冲奶粉，生怕它们“哭”得太久了会生出病来。

我这个“妈妈”毕竟没经验，第三天，它们个个闹肚子。怎么办呢？这时我想：人和猫都属于高级的哺乳动物，既然人拉肚子可以用土霉素治之，那么猫拉肚子，服土霉素不会没效吧？我找来土霉素碾成粉，掺在牛奶中喂它们，不吃就灌，果然很灵而且特效，当天就不拉了。自那以后我照此办理，不知治好了它们多少回跑肚拉稀。

小猫们屙尿弄湿了纸箱是最头痛的。母猫在时，都由它舔食干净，我自然不可能，没有那种本事。怎么办呢？好在母猫死前，我看清了它侍候小猫的技巧。于是找来一只小碗，再用根药棉纤，在小猫肛门边或后腿根轻轻地擦，这招真灵，小东西立即抬起后腿，一挣一挣地，那清清的猫尿，便一滴一滴地落进碗里去了。

但我毕竟没有母猫那样仔细，不久，两只小雄猫因尿流在腿上无法擦拭干净，后腿很快就被尿腌烂了。望着两个小生命那渗出脓水的烂腿，我好心疼。可这有什么办法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其中一只因用蓝汞医治无效，瘦弱得不再进食夭折了。

我对小猫们护理得更细心了，生怕它们再出问题。在外边做工的时候，也总是惦念着它们。为了不让它们饿着，到了该喂奶的时候，我就扔下工具，从果园里跑回来“奶孩子”。

我根据毛色分别给它们起了名字：“黄黄”、“灰灰”、“花花”；“黄黄”是哥哥，“灰灰”是姐姐，“花花”是小妹妹。

“孩子们”终于成长到了“学龄前儿童”的阶段。对于小纸箱那个“家”，再也不想住下去了，到了夜晚，不管我乐意不乐意，全都爬上床来和我睡。淘气猫小“花花”更不客气，竟然非要在我的肚皮上睡。有时我不让它睡肚皮，把它放在胸脯上，它睡不一会儿，又转移到我的肚皮上去就寝了，原因是我的“搓衣板”让它睡得不舒服。它的“智商”比哥哥姐姐高，知道最柔软最温暖最好睡觉的地方是哪里。

“花花”整天形影不离地跟着我

小猫们半大了，我实在负担不起，不得不忍痛只留下“花花”，把“黄黄”和“灰灰”送给别的文革政治犯。我偏爱“花花”，还因为它的模样，长得比我所见过的斑猫都好看：虎头虎脑，鼻梁宽宽地收向小嘴，胸脯也宽，前脚粗壮有力，当它正面向你走来，望着那一身红黄色的斑毛，你就会觉得那简直是个漂亮的小老虎，尤其它那双眼睛，大大长长地像凤眼那样斜向双耳，既美丽又生动。

时间到了1982年盛夏。离开了哥哥姐姐，小“花花”更依恋我了，整天像只小狗，我走到哪儿它跟到哪儿。我去开会，它跟去“开会”，乖乖地躺在我的大腿上“旁听”，或者在我的凳子旁眯着眼睛“养神”。我去罗汉果园劳动，它也跟去，我锄地，它来抓锄头，我怕锄着它，只好叫它走开，它就自己在地陇上玩，捕捉蚂蚱，追逐蝴蝶，赶走在地上觅食的小鸟。没有什么可追捕时它也不安静，在果藤下，在草丛中窜来窜去扑来扑去，捕捉着它想像中的大老鼠。玩得晒了，就在我带去的小板凳底下睡觉。

它晚上总要我睡，但在雨天，我是不欢迎它的，因为它那四支脚尽是泥巴，让它上床，我岂不变成了泥人张？每逢这种天气，睡觉时我就把蚊帐掖得死死的，它进不去，就在蚊帐外面叫呀，拱呀，弄得你不得不把它的猫爪子洗干净，再抱进蚊帐里去。有时，我硬是不理它，它没了办法，又舍不得离开我，就嘤嘤的跳

到蚊帐顶去睡。

和“花花”做游戏最快活！

“花花”非常淘气，回到屋里，一定要和我玩，我坐在床边读书写作，它跳上床来，噼里啪啦发狂地乱窜，还要到我手中的书或者本子上来打滚，或者抓起钢笔铅笔当老鼠抛。我生气了，把它扔到蚊帐顶上去，以为这样可以安静些，谁知这让它更中意，就像杂技演员上了蹦床，更加撒欢地狂跑狂跳了。它的快活很快让我什么都不想干了。我用小棍子系块小布片子在地上拖来拖去，它就不停地捕捉那布片，你不累，它就不会停。我干脆把小布片子系在它的尾巴上，它就坐在地上不住地转圈圈咬那够不着的布片子，这边咬不着就向那边转圈圈，那边咬不着就向这边转圈圈，圈圈转多了又咬不到，它就发脾气嗷嗷叫，逗得我笑破了肚皮，忘记了自己还是个劳改犯。我还经常和它做猫捉老鼠的游戏，我躺在床上，手指在床沿上一伸一缩来回动，它在床下看见了，马上把身子俯在地上，下巴紧贴着地皮，小耳朵往后贴着，背上的毛也耸了起来，还不住地摇动着小尾巴，轻轻地向后挪动着后腿，然后趁“大老鼠”不注意，突然一个猛扑逮住床上的“大老鼠”，咬着抱着用后腿猛蹬猛蹉，向我显示它那大猫一般的英勇。自然，它逮住我这只“大老鼠”的时候，都不是真咬真蹉，如果它真咬真出爪子，我的手臂早就鲜血淋漓了，哪还敢跟它玩？

寒风中，亲情更真切

秋天，收完了罗汉果，我离开那间小房换了住处。

到了严冬，因为那医院是建在半山坡上的，寒风吹来，无遮无挡特别冷。尤其晚上犯人在露天场地上集中开大会的时候，那北风，简直像刀子割肉锥子钻骨。在这种气候和环境里，穿着厚棉衣的人都寒冷难当，只穿着一件薄薄的“毛衣”的小猫，能不觉得冷吗？可是我的小“花花”不怕冷，每次夜晚我去那个地方开大会，它都跟着去。以往开小会时，我可以把它抱在怀里让它暖和，开大会就不能这样做了。这时的小“花花”并不去避风寒，它顽强地闭着眼睛，紧抱着四肢，俯在会场边的水泥台阶上等着我。而且，它竟能静静地卧在那里一等就是两个钟头。会一散，它马上跑到我脚边来跟我“回家”！

小“花花”在寒风中对我的依恋，实在令我感动。原先睡觉时，它都自觉地睡在我的棉被外面，这时候我也不管什么叫做卫生了，干脆掀开被子，让它钻进被窝里来和我睡。

“花花”长大了，猫的秉性，更加显现出来，每天夜晚，都要到屋外去活动几个钟头，到了下半夜，才回房来。它回来的时候，先在床前咪咪地叫两声，仿佛对我说“我回来了，快掀开被子让我进去。”如果我睡着了，它拱不开被子，就轻轻地用嘴舔我的脸和鼻子。那粗糙的猫舌和长长的猫鬚触到脸上的奇痒，再死睡的人也要醒了。自然，如果它回来时我是醒着的，就会主动掀开被子，像迎接夜归的小女儿。进了被窝，它马上做睡前的“准备工作”了，先仔细地舔自己背上、脚上、腹部上的毛，舔完了，又来帮我舔表示爱心，因为它早已把我当成它最亲密的同类了。对于它的关爱，每次我都窃笑着接受。不过遗憾的是：我不是个全身长着绒毛的动物，舔那光滑的手臂，肯定索然无味，但它还是不厌其烦地舔呀，舔呀，直到它觉得我的手臂，已经被它舐得达到卫生标准了，才把尾巴收回来，背紧靠在我的肚皮边，把头藏在怀里，倦作一团睡觉了。听见它发出轻微的、那种猫所特有的鼾声，我又心疼地暗自叹息：“小‘花花’呀，你现在虽

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小猫，可是为什么生长在这种地方？你以后的命运会怎么样呢？”我就像父母对儿女前途担忧那样为它忧虑了。

“生死茫茫俩不知”

1982年岁末，广西政治形势的发展让我感觉到，平反出狱的日子就要到来了。这时我心中盘算的一件最要紧的事，就是出狱时，怎样把“花花”带回家去？想到监管干部完全有理由不允许我带走它，便心忧如焚了！

1983年1月25日早晨，监管干部老徐突然来到我住的犯人门诊部楼下大喊：“张雄飞，把你的行李收拾好出来，快！”

听到这样的喊声，我便高兴得手忙脚乱了。有经验的犯人对监管干部这句几乎千篇一律的喊话都明白：那是出狱的通知！

我激动得旁边的犯人说些什么都听不见了，心里首先想到的，就是马上找到“花花”！我大声向楼下呼唤：“‘花花’！‘花花’！快回来——！”我最害怕的，就是在这个最要命的时候，找不到它！

万幸，听到我的呼唤，“花花”飞快地跑上楼来了。

我连忙抱起它，往事先准备好的木桶里一放，就用网兜把它牢牢地罩了起来。

“花花”对我这从未有过粗暴，自然不能理解，它在桶里拼命地往外挣，还嗷嗷大叫。”我见它太害怕了，便摸摸它的头，对它说：“‘花花’，别怕，别怕，我们要回家啦，我们要回自己的家啦！……”它用大大的眼睛望着我，有些懂了，不那么害怕了。

我提着行李和装着“花花”的木桶，紧张地走出监狱的大门。我最担心的，是老徐不让我把“花花”带走！

来到老徐的值班室了，他看了看木桶里的“花花”，竟二话不说。此时我对他真是感激不尽啊，暗中自责自己坐牢坐久了，低估了监管干部的善良。也许，这一切早在老徐的预料之中，因为他管理犯人医院，对我与“花花”的亲密，早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了。

柳城县的大埔镇与英山有百里之遥，母亲和妹妹只能当天收到我出狱的加急电报，第二天才能去接我。

那天夜晚，我住在监狱招待所，“花花”在木桶里很不安静，不停地叫着，用头顶撞着网兜，我怎么抚摸它，劝它，它都不听了，只想着要挣出网罩来，听着它在木桶里的哀叫，我心疼得几乎一夜没睡。

第二天中午，我们终于回到了阔别八年的柳城。到了家，当我与岂止是“久别重逢”？而是“生离死别”又重逢的亲人们都平静下来的时候，已是四点多钟了，我才想到在桶里已被困了一天一夜的可怜的小“花花”。

我急忙把它抱出来。

不料，它出得桶来，看见满屋子的生人，便挣开我一溜烟向屋外逃去。

我赶紧跟着它，喊它的名字，可是它竟头也不回地跑进马路对面的建筑工地上不见了。“花花”跑了，我既着急又难过。那个建筑工地旁边，是几间零乱的民房和一条长满灌木和野草的深沟，再过去就是城边的公路，它如果跑到荒郊野外去，就难找了！

怎样才能让我的“花花”回来呢？我猛然想起，在监狱的最后那一年，每当晚饭后，我都要拿着自制的小提琴，到围墙下面荒地上练琴，我拉得最多的是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每回我拉琴的时候，小“花花”都跟着去，先是在荒草坡上蹦蹦跳跳玩耍，然后跳到我的琴盒上趴着，闭着眼睛静静地听。

我何不用琴声去召唤它呢？

吃过晚饭，太阳已落进西边的远山，几朵晚霞，反射着夕阳的余光。路上的行人少了，我拿着提琴去找“花花”。

我在那个建筑工地边上，像在舞台上演奏那样认真的拉起《梁山伯与祝英台》来，弄得路人莫名其妙，以为我这个“老牢客”得了“花癲”，一到家就在路边用凄婉的琴声去召唤梦中情人了。

要奏完《梁山伯与祝英台》，需要45分钟，我才拉了一半，果然听见远处有猫的叫声了！我的小“花花”回来找我了！我也遁声轻叫着“花花”、“花花”去迎接它。

小“花花”也小心翼翼地朝我走来。我高兴极了，快步走过去，把它抱起来。

它乖乖地俯在我的臂膀里，嘴里不停地“咪咪”叫着，像个走丢了的孩子，用抽泣向父母叙述心中的恐惧和悲哀。我的眼睛也润湿了。

回到家里，“花花”看见陌生的面孔，又挣扎着要逃。我哪能再让它“离家出走”呢？只好忍痛把它关进一个木制的新鸡笼去，它便在里面嚎叫着，发狂地用爪子抓鸡笼的木条。

天快黑时，我去看鸡笼，空了！没想到“花花”竟有这么大的力气，把一根木条抓开逃跑了。我相当懊悔，怪自己不知道用绳子拴住它！

半夜，我被“花花”的叫声唤醒了，赶紧穿衣下床。我们家是平房，中间有一个露天的小院，“花花”就站在小院那边伸手能够得着屋檐的厨房瓦顶上。

看见“花花”，我心头上的愁云尽散。

我叫着它的名字，在屋檐下伸手接它，它慢慢地走到屋檐边，让我抱进房间去。我在床上抱着它，轻轻地抚摸着它身上柔软的毛，开始它还安静，但不一会儿，因为房间里的陌生和异味与它原先习惯了的那个环境不同，它又不安静了，从我的怀中跳到地上去，并用爪子抓门要出去。本来，这时我如果把它拴起来不让它出房去，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我不忍心那样做，心想它是不会离开我的，这陌生的环境，它会慢慢适应的，便开门放它走了。

果然，第二天半夜，“花花”又回来找我了。

听见它在瓦顶上的叫声，我马上出去抱它下来，把早已准备好的食物喂它，可是吃饱后，它又要走，我没有阻拦它，又放它走。

之后的两天夜里，“花花”都按时回来，只是吃饱就走。见它还这样和我亲近，我更不想用强制的方法把它留在家中。

第三天，桂林的“文革”患难朋友专程去到我家，讲桂林很多群众知道我出狱了，希望我尽快回去，人们要用板车装鞭炮，打横幅集队去火车站，燃放鞭炮欢迎我平反归来。

第四天，这是很急的事情，我哪能不立即动身赶回桂林？

临行前，我不忘请妈妈和妹妹：“花花”夜晚回来时，要喂好它。

岂料，一个星期以后我又回到柳城时，再也不见“花花”回来找我了……

母亲和妹妹告诉我：我走后，“花花”一连几天半夜里在房顶上叫。可是当她们用我的方法，唤着它的名字去接它时，它不但不下来，反而吓跑了。

“花花”跑到哪里去了呢？回百里之外的英山监狱去？不可能！去一户好心的人家做家猫？也不可能，因为它不会再相信人了！也不会再有人像我这样爱它、疼它了！它只能跑到山上去当野猫，它从此以后的命运……我落泪了。

二十四年了，每当想起“花花”，我的鼻子还发酸！我常常责怪自己：唉，为什么那年回到柳城时，不会把“花花”先拴起来呢？

《桂林晚报》回避、歪曲、捏造桂林文革历史

杨福廷、张雄飞 转自《网易地方论坛：广西》

2009年8月19日至21日，《桂林晚报》连续三天在该报“桂林城事·1949——2009”专栏里，发表了署名记者郑利平、梁剑的纪实：《1966文化大革命》、《1967“造反夺权”》、《1968武斗》三篇长文。该报及其作者，站在广西文革老派性的立场上，无视桂林文革历史的真相，使用极其卑劣的手法，对历史作任意的编造杜撰。那别有用心地回避、恶意的歪曲、捏造桂林文革历史重大事件的错误随处可见。

他们把桂林广大人民群众当作傻瓜来愚弄！他们狠狠地向无数在桂林文革中被打、被斗、被长期关押和无罪被判重刑的人们的旧伤口上，又捅上了一刀！他们竟然毫无良知地粉饰“桂林八·二〇行动”，让那数以千计在那场大镇压中被杀害的善良的人们的亡灵在九泉之下仍不得安息！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为什么敢这样做？！

对于《桂林晚报》如此严重歪曲历史，我们有责任予以澄清。

文革初期的师院“老多”

按照中央的有关部署，文革开始，广西师院（即如今的“广西师大”）的广大师生就起来造反，后来属于“老多”这一派的师生，一开始矛头是指向桂林市委派的驻校“工作队”。当时是用口头辩论的方式，大家力争说理。桂林市委又组织“工人赤卫队”，围攻师院师生；同时，韦国清坐镇桂林，调动几个连的解放军出来，还有许多警察配合，他们在助阵“赤卫队”，“赤卫队”显得很得势，时有动手打师院师生的事发生。警察都暗中带有手铐，警察虎视眈眈辩论的师院师生，显示要抓人的态势，造成一种气氛。这样，师院的广大师生就看清楚了他们的面目：我们听党的话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他们组织赤卫队来围攻，还调动部队准备镇压，于是引起公愤，凡有点良心有正义感的人，都加入了这支队伍，形成“多数派”简称“老多”。

在对待师院院党委的问题上，“老多”并没有去搞院党委，正如前面所说“老多”一开始的矛头是指向阻碍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工作队”，而6月4日的第一张矛头指向院党委的大字报，倒是另一派的学生后来成为“红旗红卫兵”的写的。

“红旗”说“老多”有人写《誓死保卫院党委》的大字报，说“老多”死保院党委是“保皇派”，所以：

第一，文革开始师院学生被打伤是被“工人赤卫队”打伤，而不是学生之间打伤。《桂林晚报》（下简称《晚报》）说“这时‘老多’与‘当权派’（维护学院及上级党委派）势同水火，不少当权派人物包括普通老师都被‘老多’抓过开大会批斗”；“李敏介绍，这些院领导职务刚被解除，学生就把他们拉去批斗。后来，调走的调走，失踪的失踪，命运都非常坎坷。‘其中最惨的是张云莹院长，因为受不了被造反派多次拉去游街批斗，因为受不了压力，张院长后来在家中含冤辞世。’”这完全是彻头彻尾的捏造、栽赃于“老多”的谰言。事实恰恰相反，现在可以站出来一个一个领导来数，师院“老多”的头头，和所有院领导人的关系一直很好，有些活着的直到现在关系依然很好。

《晚报》对文革初期的历史完全说成相反，全部颠倒了黑白。

“桂林老多”夺权真相

在桂林夺权的问题上，《晚报》所写的是一篇海外奇谈的文章，是一篇绝妙的反面“奇文”。既然写夺权，为什么不写桂林市的夺权？这是有意回避历史、颠倒历史，而历史的真实是：

1967年1月24日晚，“桂林市夺权行动委员会”在桂林市委内的小操场上，召开市党政及其下属的主要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二、三百人开大会，由市“夺权行动委员会”主任委员杨福廷宣布夺桂林市党政财文大权。1月25日，《桂林日报》上即登载《桂林市夺权行动委员会第一号令》向全市宣布了这一大事。从1月底至2月份，陆陆续续在《桂林日报》上登了九个“令”，这都是堂堂正正登在《桂林日报》上的，现在可以找出来作证。

“桂林老多”的夺权，与全国各地所有的夺权都不一样，他们是夺权夺章，以为夺到章就是夺了权；而“老多”的夺权是“夺权不夺章”，采用“双章制”即对需要监督的部门采用“双章制”，对不需要监督的职能部门完全和原来一样，“老多”不监督他们，信任他们。“老多”夺权的思路很清晰：夺权的目标是夺“监督权”；夺权的目的是要求各职能部门使用好权；夺权使用的模式是“双章制”——要监督的单位实行“双章”：即原职能部门的章行使职权，“夺权行动委员会”的章行使监督权。所以，“老多”夺权并无实权，仅仅是对监督的部门有“监督权”。原各职能部门照样行使自己的职权，先盖自己的章，然后再盖“夺权行动委员会”的章，方为有效。光是一个章都无效。

实际上，夺权的自始至终，“老多”就只夺了文革办公室的财权。只有文革经费的使用了“双章制”，其他所有的职能部门都没有用“双章”。

“老多”夺权的这一模式，除在大会上讲清楚外，开始几天，杨福廷还到多个职能部门，宣讲这一模式，所到之处，没听到一句不好的话，个个干部称赞说“老多讲政策”。夺权的第二天，市委书记刘竹溪找几个人喝酒庆贺，高兴地说已经交了权了，一身轻了。杨福廷知道后，即找他们来谈话作委婉批评，说你们不是交权，你们没有交权，夺权的目的是希望你们更掌好权，用好权，我还是叫你刘书记，……当杨说到叫他“刘书记”时，刘竹溪动了感情，口口声声称赞“老多”“讲政策”。

“老多”内部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任何一个下属的组织来争过这种“累死人的监督权”。没有发生任何一点哪怕是小小的“派系斗争”，因为“老多”内部了解夺权的真实情况的人，也是一片赞口声。

由于夺权后的发展态势良好，至2月28日，同样集中二、三百市里各级领导干部，在市人民礼堂开大会，杨福廷在大会上宣布：夺权胜利完成它的历史任务，全市一切都稳定正常，发展态势很好，夺权行动委员至此撤出。这样，夺权宣告结束。桂林市夺权的时间就是1967年1月24日——2月28日。

桂林市夺权做了些什么？

做了两件事：

第一，反经济主义。当时的经济主义，主要是文革经费的滥用。当时外地人来桂林串联，都跑去市文革办公室借钱吃饭（外地也一样，北京也一样，都是“借钱吃饭，即吃饭不要钱”。开始时，有的借一个月，有的借半个月，后来卡紧一点是借一周。这也不得了，有的人反复借（虽然登名字，但很难一下查对，有的少数借了去上馆子。而当时市委文革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又顶不住这些人吵闹，所以是有求必应，来了就借。这样，国家的钱流失严重。“老多”夺权后，采取坚决得力的强硬措施，杀这股经济主义歪风，组织了一百多人的师院学生，分成两

班，每班负责一天，到市委文革办公室值班，顶替市委文革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外地人来了，坚决不借钱，只在吃饭时发饭票。由文革办公室的人拿饭票来给我们的学生发给外地人。开始时矛盾很尖锐，我们就用学生和他们说理“对轰”。由于我们有发饭票这一合情合理的措施，我们的学生理直气壮，最后，只有他们灰溜溜地有的败阵而走，有的只好老老实实的领饭票吃饭。这样的高峰大约十多天，过去也就一切平静了。当时市文革办公室的干部看了这一切都很感动，他们说，学生辛苦了，学生辛苦了！

加上停止和紧缩各项文革开支，这一个多月的反经济主义，后来师院中文系有篇调查报告，为国家节约 130 多万元。此调查报告登载在《桂林日报》上。

第二件事：接收、上交三万多两黄金给国家。这三万多两黄金，是运动初期另一派学生组织“红旗红卫兵”抄家得的，这时，“红旗红卫兵”垮了，愿意把这三万多两黄金移交给夺权的“老多”，我们接收了。金子封在银行仓库，由解放军守卫。我们想，这么大一笔财产，我们拿着也不好，不如快上交国家，于是，去和银行联系，银行愿意接收。我们派师院中文系两个学生，和银行代表一起，按清单清点，办好上交手续，双方代表签字，三万多两黄金如数交给了国家。

这就是“老多”夺权做的两件事。“老多”在夺权中所做的事，都不是偷偷摸摸做的，都是登在当时的《桂林日报》上的。

由于“老多”夺权这一模式受到好评，“老多讲政策”成了一块“名牌”，随着各地人来桂林串联，“老多”这块“名牌”传遍祖国各地，当然也传到了中央，直到周总理。1967 年 4 月底，周总理受毛主席委托，召集广西两派代表上北京谈判。“老多”派出两名代表。北京谈判中，总理秘书郭长安曾对“老多”代表杨福廷说：“老多”不错，总理对“老多”印象很好。事情的确如此，总理在多次的两派接见中，多次表扬“老多”，并给“老多”委以重任，这事到后面再说。

对桂林市的夺权《晚报》不敢沾边谈，却在那里凭空捏造说“包括桂林市公安局在内的很多政府机要单位，在那时都被造反派接管了。”这又是彻头彻尾的捏造、诬陷，根本没有事实，正如我们前面已说清楚的那样，对这种无端捏造和诬陷，在此不想再费口舌反驳。

我们想，经历桂林市夺权的当时市里的干部应该还有不少人健在，你们试作些调查看看，是不是像你们说的那种情况？

1967 年的桂林形势

“桂林老多”夺权后另一派群众组织“红旗”垮台，桂林出现了“一边倒”的形势。桂林驻军联合支左办公室，主要是桂林军分区、桂林市人武部和 6955 部队，他们支的“左”，也就是支“老多”一派，这三方面的部队首长，常和“老多”方的“造反大军”的主要头头在一起开会，开会的地点多是在桂林军分区小会议室，每次主持会议的都是桂林军分区政委张耀青，参加的还有桂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毕可舟（后为广西军区政委）。桂林市人武部政委陈秉德，他是“桂林市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主任委员，也几次在桂林军分区小会议室和“老多”头头开会，研究全市的“抓革命、促生产”问题。记得 3 月份的一次会议，他去区里开“抓、促”会议回来传达，和杨福廷等开了一天会，共同研究办好桂林的事，开会、聊天，气氛非常融洽、和谐。那时部队首长军分区的毕可舟，6955 的政委张骥，副政委赵保立，几乎天天和“老多”头头在一起，开会开始多在桂林军分区小会议室，后在 6955 部队支左办公室（李宗仁官邸），这两处部队的办公室会议室，也就是“老多”常委的会议室。当时部队首长和“老多”头头在一

起谈话的都不是派性问题，都是如何搞好全市的各项工作问题。有时还研究开展活动，比如“拥军”活动等等。

对于桂林的这种大好形势，当时有新华社电讯，有《光明日报》报道文章，《桂林日报》上的报道更是不计其数。现在，还可以找出这些大量的记录下当时历史的“硬件”材料。

1967年4月底，周总理代表党中央、毛主席邀请广西两派代表上北京谈判。在代表分配问题上，既然是两派谈判，当然是两派代表“对等”，南宁、柳州都有“联指”对等，而桂林当时因没有“联指”组织，所以没有“联指”代表，中央分配的名额只有“桂林老多”的两名代表。在两派的多次接见中，总理多次表扬“老多”。

《晚报》文章在写到1967年的桂林情况时说“大量‘打、砸、抢、抄’现象的出现”，又说：“此时，桂林虽被造反派所控制，但却没有实施具体的管理……”

“因为夺权问题，造反派派系矛盾日益尖锐，间或产生摩擦。”前面说了，掌管全桂林经济生产大权的是“桂林市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总指挥是人武部政委陈秉德，“老多”既没夺过他们的权，也没进行过任何干扰，一切管理工作都任他们实施，前面也说过他们和“老多”关系也很好，多次在军分区小会议室开过会。而大量的报上登过的“硬件”材料现在你们也可以找来看看嘛。你们简直就是在睁眼睛说瞎话，乱给“老多”安罪名，例如说“老多”夺权后“为了征服人心，造反派随后开始更大规模的‘破旧立新’运动”，“1967年，红卫兵还对被他们视为穿着奇装异服的行人采取粗暴行动。如剪小裤脚、剃尖尖皮鞋等，后期发展到‘打、砸、抢、抄’，如砸教堂、捣庙宇、焚烧文化典籍、毁坏文物古迹等。”先生，你们把时间和当事人“弄错”了，这都是另一派学生组织“红旗红卫兵”，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打着“大破大立”、“破四旧”的旗号干的！

《晚报》用移花接木的伎俩，把1966年发生的事，拿到1967年来说，其用心何等卑劣！至于说因夺权“老多”“派系矛盾日益尖锐”，更加是无中生有！

文中一大段说到铁路方面的问题。是的，铁路方面的确是存在这些严重问题，但这不是“老多”的问题，倒是“老多”要尽力去解决的问题；这就是不久后，“老多”倾巢出动，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全力去解决广西境内全部铁路沿线的严重问题。这事后面再说。

《晚报》写的这件事是发生在1967年8月，“老多”代表曾就此事给中央写过“紧急报告”，内容一是铁路不通，是因在桂林以外的地方发生事情，火车停在桂林，“老多”正做好铁路疏导工作；二是外地人来桂林滋事。

这事是这样：柳州铁路局柳铁“4·22”派“公机联”组织的司机，那天开车到全州才湾车站时，当地“联指”开枪打死了一名司机，使“公机联”的司机不敢再往前开，车开到桂林停下了，造成铁路瘫痪。此事“公机联”告状到北京，告到周总理那里。“公机联”的司机也到了“老多”房间，详谈了此事。后来总理接见时严厉批评了另一派的错误行为，同时也教育我们说要以大局为重，要考虑国家利益，广西铁路是国家的大动脉，天天运送援越物资，不能中断，“司机死了抬下来，伤了换一个”（总理原话），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保证铁路畅通。当时告状司机穿着一条烂裤子去，说是给另一派打伤腿裤子也烂了。总理说你的裤子烂了我送一条给你。接见后，工作人员就送了总理给的一条新裤子来我们代表团给柳州“公机联”告状的司机。

8月份以来，广西境内的铁路已经严重不通了，而总理又特别关心铁路，只要车停几个小时总理就要过问。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总理采取得力措施：让“老

多”出来护路。即有了8月份广西铁路出现的严重问题，才有9月份总理派“老多”护路。

9月5日晚，周总理单独接见“老多”代表杨福廷，和总理一起来接见的是总理外事秘书郭长安。总理给“老多”两条任务，总理说：桂林是当前全国最好的，全国已没有一个城市对外开放了，准备开放桂林，让外国人主要是越南人进来，问桂林治安情况怎么样？“老多”能不能控制局面？第二条任务是当时广西境内铁路形势严峻，为保证铁路安全畅通，派“老多”护路，“把‘老多’当解放军用”（总理原话），维护铁路安全，保证畅通。听了总理交的这两条任务，杨福廷当然兴奋不已，当即满口回答了总理，保证完成任务。总理没空，很快走了，叫杨福廷再和他的秘书郭长安详细谈谈。杨向郭详细介绍了桂林情况，约谈半个多小时，郭长安听后就说：这样总理就放心了。

9月13日总理接见两派代表，又进一步谆谆教育“老多”，要求“老多”要“站在解放军立场上”，“不讲派性”，团结好另一派群众的每一个人。总理生动地讲了一个典故：“一人背举座不欢”。解释说在酒席上，大家高兴，一人不高兴，反个背面向角落坐着，这样整个酒席就不高兴了。总理说对对方组织哪怕一个人都要正确对待。

总理给“老多”护路的消息，传回桂林，桂林沸腾了。由6955部队师院军训团组织，军训团团长张体成任总指挥，组成1600多人的队伍，从9月中旬——下旬，陆续撒向广西铁路沿线各重要车站。这时，柳州铁路局、广西军区遵照总理指示下文，要求铁路职工、当地驻军支持“老多”护路。

9月24日总理接见广西两派代表，征得总理同意，“老多”代表杨福廷回广西看望“老多”护路情况，同时来广西视察“老多”护路的有中央文革广西联络组的老张同志。我们到达兴安时，桂林军分区张副司令员，是位老人了，他和“老多”护路的师生同吃同住在一起，我们十分感动。他出来接待我们，说要支持好“老多”护路，维护好铁路安全，不辜负总理期望。“老多”的护路的确是得到了广西各地驻军和铁路职工的支持。

至1967年11月初，得到铁道部的消息，广西铁路的正点率从“老多”护路前的10%多，上升到93%，广西铁路已经畅通。从“老多”护路后，铁路上没发生一起停车事件。据此，“老多”代表即给周总理打报告，要求“老多”护路队撤回。总理即批准了此报告。于是，从11月上旬——中旬“老多”护路队陆续撤回，护路时间大约一个半月左右。

《晚报》还特别写到“白沙事件”，认为这是1967年桂林“影响较大”的一次“武斗”。《晚报》用玩文字游戏的办法对事实作了歪曲，在此有必要澄清。

正确地说，应该是“雁山——白沙事件”。事实的真相是：“老多”得到雁山方面的情报：“联指”数百武装人员到雁山“打、砸、抢、抄”了我派多家群众的东西，并抓走了十几个人，又打死一个四岁小孩，要求“桂林老多”赶快去制止。由于它的正义性，“老多”和6955部队商量，为避免两派争斗，要求6955派部队保护“老多”一起去。由于对方是武装人员，当然“老多”也得出动武装人员，这样，“老多”200多人和6955两个连的解放军全副武装出动，6955部队副师长、抗美援朝全国战斗英雄郝忠云亲自带队，赶赴雁山。到雁山后，并没有交火。“联指”就往阳朔县白沙方向撤退。为了要回被联指抓走的那十几个人，“老多”和部队就跟着，雁山到白沙十多里路，也没有交火。到了白沙，“联指”认为到了自己的地区，又有有利地形，突然掉头向“老多”和部队开枪，“老多”即还击。经短暂交火，部队看到双方都是群众，怕有伤亡，和“老多”一起赶快

撤退。由于是“联指”先开枪，死的人倒是“老多”和部队方的。这就是“雁山——白沙事件”的真相。

《晚报》说“白沙事件”是“狭路相逢”，好一个“狭路相逢”！从雁山到白沙十多里路都没有交火，这叫“狭路相逢”？你们玩弄文字游戏的手法也太拙劣了，一点都经不起历史事实的检验，当然你们这样玩弄文字是有目的的：把事件的起因写得“一头雾水”，让谁都摸不着是怎么回事，以此来掩盖事实真相；又把结果死的二人写得含糊，读者也不知道死人为何方。这样，事情的本质就被歪曲了。

事情的本质是：这是一桩典型的“联指”的“打、砸、抢、抄、杀人”的暴行，“老多”和解放军去制止暴行，被联指先开枪，死的人是“老多”一个师院学生和解放军的一个班长，而“老多”和解放军作了最大的克制和忍让撤回。事件当天就结束了，事态没有扩大，它也不足以影响桂林的大局。这就是《晚报》说的1967年桂林“影响较大”的“武斗”。

此事还有后续纠葛，因6955部队出了兵，“联指”就揪住6955，把矛头对准6955，他们恶人先告状，向中央诉6955出动武装解放军镇压他们。由于事实就是那样，不管“联指”怎样做文章都掀不起大浪。后来郝忠云也到了北京参加中央首长对广西两派的接见。郝忠云对“老多”代表说：我们出动解放军的目的是保护群众，不管哪派群众都要保护，后来“联指”向我们开枪，一下就打死我们的一位班长和“老多”的一个学生，我们怕有更大的伤亡，立即撤兵。至今回想起来，文革中的6955，不仅是“老多”的大恩人，也是桂林人民的大恩人，他们崇高的品格和光辉的思想，与壮丽的桂林山河永存，他们是解放军中的一面旗帜。郝忠云不愧是一名解放军的“全国战斗英雄”！

有关1967年的桂林形势，周总理说桂林形势在全国算是最好的，唯独对桂林作了对外开放；对“桂林老多”组织，总理拿来“当解放军用”，委以维护铁路交通安全的重任，这也是全国独一无二的。此事出现后，文革初期来过桂林串联的首都红卫兵纷纷去“老多”在北京的代表团祝贺，他们说“老多”得到了全国唯一的、最大的“殊荣”，因为他们来桂林支持过“老多”，他们也感到光荣和自豪。而《晚报》对1967年的桂林形势和“老多”给予抹黑、加罪，就是在和中央唱反调，罪责难逃！

这里得声明：我们说当时桂林和“老多”的好，并非说十全十美。在当时那样动乱的年代，各种思潮泛滥；而“老多”是一个庞大的群众组织，在某些地方、局部出现些矛盾，出点问题是难免的，应当可以理解。我们说的是社会大局、社会面貌、社会主流，不能用某些局部的东西来否定大局。这点是要说清楚不应该误会的。

桂林两派大联合

遵照周总理“一人背举座不欢”的教导，还在北京总理接见时，杨福廷就向总理保证要派人去请“联指”回来。于是，叫家里立即派“老多”主要头头许瑞林同志到南宁等广西各地请“联指”回来。1967年冬一两个月时间，许瑞林同志由6955部队的团长张体成陪同到柳州时，柳州的“支左”部队首长——55军副军长孙凤章，把柳州市的“联指”常委召集开会，并要他们站起来，对他们说：“你们看看‘桂林老多’的姿态多高，专门到柳州来请‘联指’的人回去，表示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愿意向他们赔礼道歉。你们做得到吗？你们能不能也去桂林，把‘4·22’的人请回来，向他们道歉？”许瑞林去到南宁，广西军区司

令员吴华也把南宁“联指”头头召集来和许瑞林见面，表扬“桂林老多”道：“‘桂林老多’姿态高，你们应当向他们学习。”

1967年12月，杨福廷从北京谈判回来，即向“联指”提出搞大联合的倡议，双方开始接触，进展很快，春节后，1968年2月，两派签订大联合协议，成立大联委，地点设在榕城饭店（后来的“七·三”百货大楼）。为表示诚意，参加大联委的所有成员，包括两派的头头和数十名工作人员，各方面的部队首长及工作人员，领导干部及一般干部共150人左右住进了大联委，连冯邦瑞市长都住进去了。确确实实是两派及部队联合办公。不仅仅是全市两派高层组织的大联合，还要求全市所有的基层单位大联合，这样才有群众基础。于是，大联委分各条战线，各路人员到基层做宣传工作要求基层大联合，从1968年2月底——3月底，基层单位实现联合后，每天不断地来大联委报喜，鞭炮声连天。大联委大厅里挂着一块大大的“全市实现大联合示意图”，红箭头天天上升，至3月底，有80%以上的基层单位实现了大联合。

大联合形势的良好发展，说明成立革委会的条件已成熟，3月上旬末、中旬初，“老多”就提出筹备成立市革委会。大联委和筹备成立市革委的工作是紧密连接的，中间一点空隙都没有。“老多”又和大联委一样，采取了非常、超常的高姿态，提出“代表对等”，“联指”自然完全同意，未发生一句话的争论。筹备市革委会的中心就是一个问题，即进市革委会的成员问题，两派“对等”解决了，什么问题都好解决了。其最后的结果是：三结合，部队代表由部队提；领导干部代表三方提，结果是支持“联指”的略多于支持“老多”的；两派代表各自提。本来每派22人，其结果是“老多”派有一名代表部队调查认为不太理想，部队同志和“老多”商量，“老多”方不愿在本派另外一个基层组织里选人替换，所以干脆暂时少一人，留给原来那个基层组织以后再补，这样，结果就是“联指”22人，“老多”21人；进市革委会常委都是“老多”、“联指”各一人，“老多”进市革委会常委的是杨福廷）。这样的结果“联指”还有什么话说？

具体工作安排上，从大联委的联合办公到筹备市革委会有一大堆工作要做，负责具体工作安排的“老多”方是杨福廷，“联指”方是张金甫，都是两人先大体商量好某些方面的事，然后由杨福廷起草（因杨文化比张高），然后再研究定稿。过程中只有互相补充完善，没有什么争论分歧。在一个多月里，由于事情繁多，杨福廷和张金甫两人一起常常工作到深夜。

《晚报》写到：“在筹建桂林地、市革委会问题上，‘造反大军’与‘联指’一直存在分歧。”（桂林地区革委会与我们无关，我们不知道他们的情况，两不沾边，不要乱扯在一起。）你们就是用一种固定的眼光来看问题，以为两派一定总是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也用一种固定的眼光来看“老多”，认为桂林所有的乱事都是“老多”引起的。你们万万没想到，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两派的特定情况（“老多”大，“联指”小；“老多”人多，“联指”人少），“老多”采取了非常、超常的高姿态，“联指”欣然接受了。桂林市就出现了那样没有分歧的联合，哪怕它是表面的、暂短的，但到底是出现了、存在了，这就是活生生的历史事实。

《晚报》及其作者就是在那里“想当然”，瞎编胡造！

通观《晚报》写桂林这两年多的历史（1966年夏——1968年8月20日），文章三篇，洋洋数万言，有一句话算是说得公道的：即写到桂林的“夏季大混战”时，说“‘联指’先有动作”。

“‘联指’先有动作”的条件是什么？这里得把文革中两派群众组织的情况先说说。

“桂林老多”自诞生以来，它的头头主要决策者是学生、教师、工人，没有当权派，哪怕连一个小当权派都没有。与 6955 部队的关系，是在共同事业奋斗中的良好合作关系，不是操纵与被操纵关系，反而是在许多情况下“老多”行动影响 6955。而“联指”就不同了，他们上面是以韦国清为首的一个庞大的当权派网络集团，执掌着广西的党政军大权，掌管着国家机器，他们和“联指”是一种操纵与被操纵关系，这些党政军要员可以动用一切国家权力，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两相对比，他们确实是太强大了，“老多”确实是太弱小了。在他们眼里，“老多”这些小小的平头百姓，简直连蚂蚁都不如，他们想什么时候捏死你们就什么时候捏死你们，想怎样捏死你们就怎样捏死你们。所以，“联指”是具备了一切“先有动作”的先决条件，至于什么时候下手就等时机了。把这一点说清楚，就说明了当时所谓“武斗”的实质，并不是一般的两派群众组织的“武斗”，而是韦国清集团对“桂林老多”大镇压的开始。所以，1968 年发生的那场“桂林大武斗”不应该称之为“武斗”，对“桂林老多”来说，是以广西庞大的国家机器和民兵武装集团为一方，以区区的千多个人，千多条枪的“老多”学生、工人武装为一方的，一场英勇的、捨生忘死的、为保护桂林数万人民群众免受像南宁及广西许多县城那样城灾的、反军事镇压的自卫抗暴之战！

桂林形势是受广西形势制约的。桂林“联指”下手的时机，得看广西形势的发展而定。历史正是在 1968 年 5 月——发展到了这一步。

“联指”“先有动作”的时间，应该是从 1968 年 5 月 4 日算起。瞬间桂林的山河变色，乌云压城。5 月 4 日“联指”开始抢枪，曾几何时，一度平静的桂林气氛开始紧张起来，5 月 4 日后，“联指”又是接二连三地抢枪，一个接一个地抢占据点。5 月 17 日调动 12 个县的“联指”进桂林，跟着是最致命的一着：武装抢占“大联委”的办公地点榕城饭店做他们的据点，这就要命了！“老多”采用“非常的、超常的高姿态”几个月辛辛苦苦搞好的“大联合”，一下给“联指”彻底粉碎了。用“老多”的话说：“联指”杀到家门口了！“老多”只有全力以赴进行反击，才能生存。

从“联指”“5·4”抢枪后，5 月中、下旬，下面有些小“武斗”摩擦，这习惯说法叫小敲小打。

“老多”反击的第一仗，就是用武装夺回“大联委”（榕城饭店）。6 月 5 日上午，战斗打响，很快“老多”旗开得胜。但在这场战斗中，“老多”也损失惨重，初战就折损一员战将、高层领导、第一任红卫师师长戴明德中弹身亡。同时中弹身亡的还有战地记者、广西师院图书馆干部蓝仁伟同志。“老多”在胜利的欢乐中同时忍着悲痛，掩埋了同伴的尸体，挺起胸膛，继续投入反击。

从 6 月 5 日榕城饭店第一仗起，至 7 月底西山之战结束，近两个月时间，大大小小打了许多仗。前面大部分是“老多”胜，这最后的西山一战是“老多”伤亡多，吃了大亏。

西山之战结束，双方是打红爆了眼，准备着更大的决战。但是，这时的政治气候变了：7 月中旬末，中央文革要求广西两派主要头头上北京办学习班，派飞机来接。“老多”派出 30 多人的代表团，“联指”也是相应的人坐飞机到了北京。这时的“老多”已不是 1967 年时候的“老多”了。由于中央偏信了韦国清谎报军情，在“7·25”中央首长接见广西两派的会上，“老多”也受了批评。而“7·25”接见，对两派还是互有批评。中央首长所说到的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出据点、上交武器等讲的总是“两派”，还是说“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在中央的一系列文件里包括“七·三”布告，讲到这些时也是“两派”，也还是“两派革命

群众组织”。由于当时中央偏信韦国清，又支持韦国清，这样“联指”就显得政治上得势。他们没有正确理解中央精神，他们认为中央支持韦国清就是支持“联指”，中央要求那些“两派”做的事，好像就是只要求“广西4·22”、“桂林老多”做的，与他们无关。“联指”疯狂了！敢于肆意歪曲中央精神。回到广西后，更狂妄到完全篡改中央精神，把“广西4·22”、“桂林老多”当成“反革命”！韦国清和“联指”有了这种极端的思想，就产生了极端的行动。

1968年8月6日晚，韦国清、魏佑铸（广西第三把手，时任广西军区政委）接见“老多”全体代表。韦、魏口气非常严厉，就是要求“老多”交枪，才是唯一出路。当时形势严峻，政治上、军事上“老多”都失利，“老多”已被逼到悬崖上了。“老多”代表团负责人杨福廷即表示：我们愿意交枪。有一条要求，就是交枪后怕另一派乘机来屠杀我们，请解放军保护我们的安全。魏佑铸立刻喷口说：“你们不能提先决条件，你们无权提先决条件，你们只有老老实实交枪，才是唯一出路。部队怎样做是部队的事。”杨福廷表示：好，我们愿意马上交枪。魏佑铸说：“那你们就马上给家里打电话。”韦国清、魏佑铸接见结束。接着下一步一切就听从他们安排了。几位解放军带着“老多”的几个代表到学习班所在地解放军政治学院机电机要室旁的一房间里打电话，他们帮拨，先拨通桂林支左办公室，杨福廷讲，同时作电话录音，但录音不清楚，又拨通桂铁支左办公室的电话，再作录音，还是不清楚，这两条都不奏效。第二着，由杨福廷给部队写《委托书》，《委托书》内容是：“桂林老多”代表在北京向中央作了保证，“老多”立即交枪，希望家里遵照执行。特全权委托部队首长做好“老多”头头的工作。不管遇上什么情况，都要排除干扰，请求部队强制“老多”立即交枪。把《委托书》交给了解放军。杨福廷最寄希望的就是这一着了。还有第三着：即派“老多”代表鲁鹤松、梁莲珍回桂林，督促“老多”交枪。

8月12日，“桂林老多”交枪完毕。

桂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季兴华对杨福廷说：你们这次工作做得不错，在家的“老多”头头表现也不错，他们听部队首长的话交枪了。

这时“老多”在京代表心里的石头才落地。他们想：“老多”交枪了，“老多”的群众得救了，将来要挨就挨我们头头吧。

这是一段多么艰辛的历程，在那种打红了眼的情况下，“老多”作了此举。对于这么一件“惊天地，泣鬼神”，决定“老多”命运的大事，《晚报》居然敢不写！你们的大事记写到8月8日，就跳过8月12日。你们扪心自问吧：你们的心肠，是黑的还是白的？

8月12日“老多”交完枪（事后得知：“老多”在桂林北边交枪，警备司令部等就从“老多”上交的武器中，挑选好的武装南边的“联指”），8月20日桂林警备司令部就调动12县武装民兵和“桂林联指”武装一万多人，一直持续到10月中旬近两个月时间。“桂林老多”啊，说起这段历史，就是草木也生情，石头也会流泪！

然而，《晚报》对这个罪恶滔天的“八·二〇”行动，却极尽掩饰、美化之能事。

不允许为“八·二〇”行动翻案

一、先看看《晚报》对“八二〇”这段历史是怎样叙述的：

“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专门为解决广西问题发布《布告》（简称《七·三布告》），强调立即停止武斗，恢复交通，交回枪支

及物资。

8月20日，桂林市、地革委会和桂林警备司令部、政治部联合签署《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中央〈七·三布告〉的公告》。

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论》、《文革重大武斗惨案》记载，当天，由桂林驻军、‘工人纠察队’、12县的民兵一万多人，组成‘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配备武器，分别进驻一派群众组织控制的地段、据点。并在之后的连续数天，对‘造反派’组织骨干成员和同其观点的领导干部、流窜人员和有历史问题的人，进行大搜捕。当时，全市共有万余名干部群众被牵连其中，其中不少为无辜群众。1983年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时，桂林地、市委撤销了《八·二零公告》，为受害的干部和群众平了反。

这就是著名的‘八·二零’事件。自此事件后，桂林武斗基本结束。”

从这几段不多的文字中，人们可以明显看到这样的逻辑和谎言：

- 1、《七·三布告》是好的，因为它是为了制止武斗！
- 2、《八·二零公告》是好的，因为它是为了贯彻《七·三布告》！
- 3、“八·二零”行动是好的，因为它是为了执行《八·二零公告》！
- 4、“八·二零”行动不只是好，而且功德无量，因为这个行动之后，“桂林武斗基本结束”，它为桂林人民解除了一场灾难！
- 5、“八·二零”行动没有抓人呀，只有万多另一派的人受到“牵连”！
- 6、“八·二零”行动也没有杀人呀，只有“受害的”干部和群众呀，而且后来都“平了反”嘛。

二、再看看中共中央、广西区党委、桂林市委，对《七·三布告》，对“八·二〇”行动是怎么作结论的：

1、1983年5月13日，广西区党委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写报告说：“我们……认为‘七·三’布告……主要是把当时的群众组织的一些严重错误，定为反革命事件，作为敌我矛盾；同时在执行上是根据这种错误的定性，号召‘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过后又调动军队和民兵镇压一部分群众，并导致大量乱杀人的后果。”

2、中共中央1983年5月20日批复了广西区党委上面否定《七·三布告》的报告，同意他们的意见。

3、中共桂林市委在其编著的《组织史》中这样写的：“8月20日，……在持续两个半月的大规模武斗基本停止的情况下，以解除武斗据点、收缴武器、清理外来人员为理由，成立20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由桂林警备司令部直接指挥会同桂林地区12个县进城武斗人员及一派部分群众组编成万余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全市实行大规模的搜捕。……随即出现了延续一个多月的抄家、抓捕、批斗和乱打死人、乱杀死人事件。”

4、桂林市委编的《桂林市“文革”大事记》（下简称“大事记”）说：“六八年八月初，广州军区在湖南衡山开了会，会议由黄永胜主持，广西军区吴华、桂林市人武部陈秉德、警司的景伯承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是落实‘七·三’布告，研究要出动军队，武装解放据点问题。”这就是说：“八·二〇”行动，是在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黄永胜指挥下的行动。

三、我们再用《大事记》来和《晚报》作个对照：

1、《大事记》说：“从八月二十日开始，接连好几天，除从据点抓人外，各单位‘联指’也分别自行抓人。……导致以后一段时间被抓、被打、被杀、被抄家、被错批错斗者约万余人。”

《晚报》却不说抓人，只说有“万余名干部群众被牵连其中”。

2、《大事记》记载：“九月二日，‘联指’市直机关‘七·一’总部，对市直机关另一派不同观点的头头、群众和一些领导干部进行全市游斗，被游斗的有许正义（市监委副书记）、邵永清（监委委员）、王仁武（经委副主任）、蓝守贞（财政局长）、李新（市税务局长）、崔耀华（市财办副主任）、郭文刚（文化局副局长）等一百多人，以各种罪名，戴高帽、挂黑牌、反手捆绑，先是跪在盐业站院内，不少人被打，然后押上汽车，由‘工纠’武装看押，沿街游斗，游斗途中许多同志被观看的所谓‘革命群众’打得头破血流，鼻青脸肿，有的被打伤致残”

“市革委会、师院驻军对地市‘造反大军’中的邓铁桥、许瑞林、鲁鹤松、于文杰、张树枝、余有壬、邓井发（专署农委干部）、诸葛军（专署外贸局干部）等十二人以混进群众组织里的‘阶级敌人’罪名，在师院进行‘活人展览’”。（这种闻所未闻的无人道的“活人展览”，竟搞了整整 20 天！）

“九月二十七日，地、市革委会在市体育场批斗了王同连、许正义、杨德华、吴腾芳、王祝光、陈基义、陆文中、崔耀华等一大批领导和另一派群众组织头头，给他们挂上‘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坏头头’、‘反革命’、‘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反共老手’、‘三反分子’、‘国民党残渣余孽’、‘牛鬼蛇神’、‘翻天右派’、‘地主分子’、‘地主仔’、‘资本家’、‘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小爬虫’、‘政治扒手’、‘黑手’、‘黑后台’、‘黑高参’、‘黑干将’、‘牛鬼蛇神总后台’、‘反革命两面派’、‘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杀害贫下中农的刽子手’等各种罪名黑牌。”

《晚报》对“八·二〇”行动游斗、打人却避而不谈，

3、《大事记》比较真实地记载几起老桂林人都知道的有名惨案：

“‘八·二〇’以后，不仅搞了几次全市性的大游斗和批斗会，各系统、各单位也纷纷组织游斗和批斗会，有的人在游斗、批斗中被打伤致残或打死，如染织厂副厂长陈华、市体委教练汪成竹就是八月三十日的全市性游斗时被活活打死。”

“九月四日，专区食品公司游斗车开到北门食杂仓库门口时遇上兴安县‘卫革指挥部’组织来桂收尸（武斗时被打死的）一伙人，他们不问情由，手持棍棒、石头、鞋子等物，爬上汽车，乱打乱砸被游斗的同志，并边打边喊：‘打死这些国民党残渣余孽’，‘为亲人报仇’，‘推下车打’，此时，兴安中学学生蒋孝生手持‘五四’式手枪，朝着被推下车的游斗对象连续开枪射击，直至打完弹夹内七发子弹为止，将被游斗的‘造反大军’成员林伟（公司业务员）、张少均（统计员）、苏秋枫、王修澡（业务员）、马洪光（物价员）、黎光录（统计员）六人杀害。”

“九月十三日下午，市二建二〇一工区在乐群小学操场开批斗大会，会议由‘联指’头头李良佑（工区工人）主持，阳春辉（工区工人）宣布了肖菊生、锁成林、段辉余、李元禄、胡际生、粟定芬（均系该工区工人）等人的所谓‘罪行’材料，然后由该公司武斗人员李友和（人保干部）、黄广依、韦锦沅、王日光、许汉生（均系工人），将肖菊生等七人押至染织厂门口桥边，由韦锦沅、李友和、李元禄等枪杀了。王日光完成了维持杀人现场秩序后，还对六具尸体补了枪。”

“九月十五日，为纪念‘白沙事件’一周年，雁山‘联指’头头秦忠德（雁山机械厂工人，雁山地区‘联指’总指挥）、文华钧（植物研究所研究实习生、‘联指’宣传部长）莫志文（雁山公社秘书、‘联指’还总指挥）、李国荣（公社兽医站长、雁山‘联指’总部常委）等人策划，经请示万春桥（雁山公社武装部

长)同意,召开批斗会,会后在雁山农科所路口南侧集体枪杀了‘造反大军’成员(‘造反大军’常委——作者注)吴全忠(植物研究所食堂管理员)、腾秀山(植物研究所技术员)、马崇义(植物研究所研究实习员)、秦继成(植物研究所工人)、孔庆柳(师院学生)白胜山(桂林地区劳动大学学生)六人。”

《晚报》更对“八·二〇”乱杀无辜的罪行只字不写,

4、“八·二〇”到底乱打死、乱杀死多少人?《晚报》当然不敢说,我们还是援引官方资料吧——

桂林市委《组织史》记:8月20日行动后,“随即出现了延续一个多月的抄家、抓捕、批斗和乱打死人、乱杀死人事件。全市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乱打死、乱杀死和迫害致死的有××××人(不含阳朔、临桂两县),其中,有干部、职工×××人。×××人是在非武斗情况下被乱打死、乱杀死和迫害致死的。”

以上种种,只是“八·二〇”行动种种惨绝人寰兽行的九牛一毛,许许多多受害者和他们的亲属,至今回想起那些令人发指的往事,还晚上做恶梦。

《晚报》的历史杜撰者们,你们竟然无视桂林人民的真实感受,为了一己之私而美化那“联指”不散的阴魂,不惜置文革后中央及广西区党委、市委的结论于不顾,企图为“八·二〇”翻案,你们强奸民意的胆子真正不小,你们做人的良心和政治良心尽丧以至于无。

结 论

一、“老多”组织

1、在文革中,“桂林老多”是听中央的话的,一切行动都是按当时中央的声音跟着大势走的,“老多”所犯的错误的就是跟着大势犯的错误的,由此,不该对“老多”进行大镇压、大屠杀、判刑、长期关押、整治、歧视……。所有这些,都应当看成是对“老多”的迫害。

2、文革中,“老多”做了许多好事,得到中央直至周总理的肯定。“老多”组织得到了全国唯一的、最大的“殊荣”。

二、桂林形势

综观两年多(1966年文革初期——1968年8月20日)的桂林形势,什么时候对“老多”进行压制和镇压,什么时候桂林形势就乱,这有三个文件可以证明:

1、文化大革命初期之乱,有韦国清1967年11月18日的检讨证明,他承认把“革命小将视同洪水猛兽”,承认了他组织“赤卫队”,“调动几个连”的兵力,把矛头对准“老多”。(见附件一《我在广西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检讨》)

2、1968年5月以后之乱,有《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组织史》证明:“8月20日……由桂林警备司令部直接指挥会同桂林地区12个县进城武斗人员及一派部分群众组编成万余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全市实行大规模的搜捕。……号召全市人民行动起来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刮十二级台风’。随即出现了延续一个多月的抄家、抓捕、批斗和乱打死人、乱杀死人事件。全市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乱打死、乱杀死和迫害致死的有××××人(不含阳朔、临桂两县),其中,有干部、职工×××人。”(见附件二)

3、1968年7月3日之后的大乱,有1983年5月13日中共广西区党委《关于对“七·三”布告重新认识及对外表态口径的请示》证明,区党委对广西执行“七·三”布告的错误作了检查:“我们……主要是把当时群众组织的一些严重错误行为,定为反革命事件,作为敌我矛盾;同时在执行上是根据这种错误的定

性，号召‘向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过后又调动军队和民兵，镇压一部分群众，并导致大量乱杀人的后果。……从现有材料看，当时支左工作有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见附件三）

反之，“桂林老多”不受压制和镇压时，桂林形势就好，曾一度被周总理认为是全国最好的城市，成为全国的唯一对外开放的城市，这在本文前面已叙述清楚的，时间大约是从1966年11月至1968年5月，共一年半多，是“老多”控制桂林局面出现的大好形势。

三、问题思考

1968年8月20日后两个月，在全区镇压完了“4·22”和“桂林老多”，韦国清集掌大权，大批杀人犯进广西各级领导班子，剩下没死的“老多”头头和骨干，分别被判刑、长期关押、整治，对“老多”组织的人歧视。

还是辩证法公正。时间过了将近20年，至80年代初，广西各地的材料纷纷飞向北京，揭露韦国清集团的杀人罪行。中央重视这些材料，80年代中期对广西进行了“处遗”。“处遗”中少数“杀人魔王”被枪毙，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大批杀人犯下台，广西情况有所好转。但“处遗”走了过场，思想没跟上，组织处理不彻底，对“4·22”“老多”的歧视、迫害绵延下来，阴魂不散。这次《晚报》动用国家舆论工具公开大量发表文章，歪曲、捏造事实加罪于“老多”就是一大暴露。它给“老多”人又深深捅了一刀，旧伤痕，新伤口，“老多”人痛心不已。它影响了安定团结和和谐社会的创建。希望有关领导正确处理好此事，为维护安定团结和和谐社会做出不懈努力。

如何实事求是正确对待文革中的事，还是一个值得认真解决的问题。

作者简介

杨福廷，男，1936年2月生，汉族，群众（原为中共党员，1956年3月读高二时入党，因文革事，从1968年秋至1980年秋被关押12年，解除关押后已平反恢复党籍，1988年整党结束，党员重新登记时，学校党委执行广西区党委决定“不予登记”，从此不是共产党员），1961年广西师院（今广西师大）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现为广西师大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副教授（已退休），是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会员。文革中，为“桂林老多”主要头头，“桂林老多”赴京谈判代表，“广西4·22”赴京谈判代表团团长，桂林市革委会常委。

张雄飞，男，1937年3月生，汉族，1949年9月参加革命，195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为离休干部，曾任桂林市歌舞剧团歌舞队队长兼音乐指挥，因桂林文革事，1968年10月至1973年3月被关押，解除关押后被开除党籍、干籍、公职，下放到桂林钢厂当烧火工，1974年带头发起揭露广西文革在原主要负责人的支持下，发生于桂林及全自治区的无数乱打死人，乱杀死人的罪恶事件，被原广西区党委定为反革命案，后定为“反革命集团”又公开称为“张雄飞反革命集团”，1975年7月被逮捕，1976年7月被判处无期徒刑，被在桂林、广西党报及《红旗》杂志上公开点名批判，1983年1月在中央的直接指示下，才获出狱并彻底平反恢复党籍干籍公职，是广西作家协会会员、桂林市作家协会会员。

（后附《桂林晚报》复印件）

附件一

韦国清《我在广西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检讨》摘要：

“……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背离

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给广西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辜负了毛主席、党中央的信任和委托，心情万分沉痛。在这里，我再一次向毛主席认错，向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认错！……。”

“……运动开始……派出大量的工作队，包办代替，限制和压制了群众……把矛头指向一些群众，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使许多敢想、敢闯、敢革命、敢造反的革命群众，遭到围攻和压制，不少人还被扣上‘反革命’、‘右派分子’、‘牛鬼蛇神’等政治帽子，受到委曲和迫害。我感到非常痛心，并再一次向这些同志赔礼道歉。”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我回到桂林，……对于敢想、敢闯、敢于向区党委、市委的错误开火的革命小将，……极错误地认为他们是受坏人背后操纵，在‘闹事’。于是，我提出要对要害部门加强警卫，在机关、工厂成立赤卫队。防止红卫兵冲击。把革命小将视同洪水猛兽。我还请桂林步校派出宣传车，……是把矛头指向头一天上午游行的桂林‘老多’，起到了挑动群众斗学生的作用。特别严重的是，当我听到一些片面的、尚未证实的汇报后，更加害怕群众，害怕坏人钻空子，煽动‘暴乱’。八月十九日、二十日两天，先后调动几个连队，集结在郊区桂林步校，加以防范……是极端错误的。”

“在处理革命小将到区党委静坐绝食的问题上，我是十分错误的……在桂林、南宁等城市均发生了围攻南下串联队的情况，有几个县城还开了声讨桂林‘老多’的会议或游行，使革命小将受到压制和打击。在这里，我再次向南下串联队及桂林‘老多’的革命小将赔礼道歉。”

附件二《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组织史》第六章节录：

“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根据广西区革筹小组的报告，颁布了经毛泽东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布告》……，桂林市革委会执行此布告后，桂林市武斗愈演愈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再次颁布由毛泽东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七·二四’布告》……。经桂林市驻军直接干预，两大派群众造反组织签署停火协议。8月上旬，广西区革委会筹备小组、广西军区召开全区电话会议，要求各地市县革委会、军分区、人武部认真贯彻‘七·三’布告，组织‘阶级队伍’，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起最猛烈的进攻，实现全区一片红；未成立革委会的地方，一定要在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前成立。8月20日，桂林地、市革委会和桂林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先后颁布了《关于落实‘七·三’布告，立即全面地收缴武器装备的紧急通告》及《关于进一步落实中央‘七三’布告的公告》……，在持续两个半月的大规模武斗基本停止的情况下，以解除武斗据点、收缴武器、清理外来人员为理由，成立20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后改称城区人民纠察队），配备半自动步枪等武器，由桂林警备司令部直接指挥会同桂林地区12个县进城武斗人员及一派部分群众组编成万余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全市实行大规模的搜捕。29日，市革委会召开全市干部群众大会，号召全市人民行动起来，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刮十二级台风’。随即出现了延续一个多月的抄家、抓捕、批斗和乱打死人、乱杀死人事件。全市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乱打死、乱杀死和迫害致死的有××××人（不含阳朔、临桂两县），其中，有干部、职工×××人。”

附件三

1983年5月13日，广西区党委在给中央书记处的报告《关于对“七·三”布告重新认识及对外表态口径的请示》明确提出：

“……我们对‘七·三’布告进行了反复研究，认为当时中央发布告是为了防止大规模武斗，但是布告本身确实存在错误，主要是把当时群众组织的一些严重错误行为，定为反革命事件，作为敌我矛盾；同时在执行上是根据这种错误的定性，号召‘向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过后又调动军队和民兵，镇压一部分群众，并导致大量乱杀人的后果。至于‘七·三’布告的形成，主要是根据当时广西区革筹小组的报告，从现有材料看，当时支左工作有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报告本身带有片面性。所以‘七·三’布告发表后，即为派性利用，成为在几个城市、铁路沿线和一些农村乱打乱杀人的合法依据。在某些县和地方产生了有计划有组织大量杀人的事件。在组织路线上，在成立各级革委会时，把一些指挥和直接杀人的人，结合进了革委会，带来了一系列的不良后果。我区‘文革’遗留问题的严重性，与‘七·三’布告关系甚大。根据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应当把‘七·三’布告的问题按上述认识在适当范围内讲清楚是必要的。这样做，将有利于拨乱反正，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发扬党性，克服派性，正确处理‘文革’遗留问题。”

1983年5月20日，中央书记处对广西区党委的上述报告作了批复：

“……中央书记处原则同意你们来电中提出的意见。”

再揭《桂林晚报》回避、歪曲、捏造桂林文革历史

杨福廷

在我们的第一篇文章中，已阐明了《桂林晚报》(下简称《晚报》)对桂林文革初期作了180度完全相反的、颠倒黑白的报道，为使读者能更清楚认识、更深刻了解桂林文革初期及桂林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有必要再作揭露和澄清。

《晚报》所登李敏的介绍以及报纸作者的叙述，用了两条恶劣的手法来歪曲、捏造历史：一是文革运动初期广西师院(今广西师大)出现的两派群众组织“老多”和“红旗”(即当时的“多数派”，“少数派”。“多数派”习惯称“老多”，“少数派”称“红旗”)，李敏的介绍和《晚报》登载却没讲出“红旗”一派，只讲“老多”，而写的事情又是两派都有，这样就把“红旗”所干的事全部栽赃到了“老多”头上。如前一篇文章所说，写第一张大字报的是“红旗”一派的学生，在运动初期把矛头指向院党委的是“红旗”，“老多”并不反院党委，“老多”一开始的矛头是指向阻碍文化大革命发展的桂林市委派的“工作队”和桂林市委。这就看出，一开始两派就壁垒分明。《晚报》把事情写成了“一锅粥”。这种别有用心的手法是非常明显的。

现在先引《晚报》的原文：

李敏介绍，这些院领导职务刚被解除，学生就把他们拉去批斗。后来，调走的调走，失踪的失踪，命运都非常坎坷。‘其中最惨的是张云莹院长，他先后被造反派多次拉去游街批斗，因为受不了压力，张院长后来在家中含冤辞世。

文中说的“院领导职务刚被解除，学生就把他们拉去批斗”、“张云莹院长，他先后被造反派多次拉去游街批斗”。这两句前一句只讲“学生”，没讲哪一派，从行文看是指“老多”，后一句说“造反派”在当时当然指的是“老多”。

用“学生”一个模糊派别的字眼，掩盖不了事实的真相，当时正是“红旗”在校内开大会批斗了张云莹院长，张院长被批斗后在家服安眠药自杀，消息传出后“老多”对此事有看法，怕有人暗害张院长，即组成调查小组调查此事，并把状告到区公安厅，区公安厅重视此事，即派法医来与“老多”调查小组一起再次开棺验尸，得到了区公安法医的确切结论。陆文忠副书记是坚定支持“老多”的，他又是负责领导师院文革运动的，所以“红旗”就从始至终把矛头指向陆文忠，不仅在学校批斗，后来还拉到外地去批斗。李敏对文革运动初期“老多”与“红旗”两派是很清楚的，她故意不点出“红旗”，把“红旗”干的坏事故意栽赃到“老多”头上，用心极其恶毒。

另一条恶劣手法就是把时间搞乱，把事情搞乱。把1966年的事情拿到1967年去写，把1969、1970年以后的事情拿到1966年来写，把什么坏事都攥到“老多”头上。

有关把1966年“红旗”“破四旧”搞的那些“打、砸、抢、抄”的事，拿到1967年说是“老多”夺权后搞的，在前篇文章已叙写过，在此不再重复，现在我们再揭把1969、1970年以后的事拿到1966年来写：

李敏说的院领导“调走的调走，失踪的失踪，命运都非常坎坷。”从《晚报》的行文看，先是用一种栽赃加罪的手法说“老多”把他们整得如何如何，接着就说“后来”……“调走”……“失踪”……“坎坷”，意思是都是“老多”干的结果。

在未揭露事实真相之前，请读者先思考一个最简单的常识问题：能够把一个大学的党委书记、院长调走、流放的，是一个群众组织能作得到的事吗？不要说“老多”不能，就是全国的哪一个群众组织恐怕都不能。能够干这种事的时候，那已经是国家机器运转的时代了，具体说，就是 1968 年“8·20 行动”“老多”交枪后被武力消灭、即 1969、1970 以后的事了。

还有一点提醒读者注意，文革中要是真被“老多”整过的干部，“老多”被消灭后，他就飞黄腾达、官升十级了，挨整的除所谓有历史问题的人之外绝大多数都是与“老多”有牵连的。而“有历史问题的人”挨整只是个意思，因为他们都是些老问题，很快他们就得落实政策逐步解放了，此后的几年、十几年真正挨整得够呛的是“老多”的头头、骨干和有牵连的领导干部，“调走”、“失踪”、“坎珂”的灾难只能降临在他们头上，这是文革中的一条“铁律”。

这些学院的大领导被“调走”、“失踪”为何人？他们的“坎珂”又是怎么回事？这就得从 1968 年的“8·20 行动”“老多”被武力消灭时说起。先看两段官方文字：

《广西文革十年大事记》119 页：“1968 年 8 月 20 日桂林发生了严重的‘八·二〇’事件，对桂林‘造反大军’及其同观点的干部、群众刮起所谓‘十二级台风’，杀害、打死和迫害致死共三百四十五人。原来两派群众组织对等参加的桂林市革命委员会成员中，‘造反大军’的二十二个委员，在‘八·二〇’事件中，被逮捕关进监狱的有十九人。而‘联指’的二十二个委员不管是策划武斗，指挥武斗，参加武斗，指挥乱杀人，亲自杀人，策划抢夺武器，则成为执行‘正确路线’的‘精英’，保卫‘红色政权’的‘功臣’，有些人还不断升官晋级。直到一九八三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后，才得到正确处理。”

《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组织史》197 页：“1970 年 4 月‘一打三反’运动大清查阶段，市委副书记曹杰(军代表)犯了扩大打击面、混淆不同性质矛盾的错误。当时市革委会部分常委决定清查 3000 户的清查面已过宽，曹杰却提出对所有的怀疑对象进行搜查。在行动过程中，还提出‘乘胜前进，跟踪追击，扩大线索，挖地三尺，大杀回马枪’的错误口号，结果搜查 8000 多户。其中 600 余人在搜查别人的同时，也被作为怀疑对象受到抄家搜查。”

从这两条官方文字可看出，从 1968 年的“8·20 行动”后的一段时间里，是大规模的“打、砸、抢、抄、抓、杀人”不断。两三个月时间后挂牌游街和杀人停止了，但其他依然，批斗在各单位更是习以为常。1969 年 7 月师院学生到兴安县学农，《晚报》上所点到的陆文忠(师院党委副书记)、吴元庆(师院政治系领导)和我本人还有其他院领导和“老多”头头几人被拉到兴安县游斗，学生和农民一起批斗我们，批斗了数场，历时一周。之后，陆文忠被七斗八斗后，70 年代初“失踪”了，学校的老师不断在打听陆文忠“失踪”事。这种“突然失踪”的事我本人更是典型中的典型了，那时我们被关押在学校，1970 年 6 月，我和中文系、外语系的一帮“牛鬼蛇神”30 来人在学校的农场劳动，中午劳动回来，突然叫我去就被隔离关押起来了，不准再回来拿衣服等生活用具，因为当时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是被关在一起的，等他们下午出工了看守人员才把我的铺盖衣物拿给我，谁都不知觉，于是，中文系的人传说“杨福廷突然失踪了”，这一“失踪”就是几年，连我家里人都不知道，至 1974 年我被流放来宾县红河农场，大约是在 1973 年陆文忠流放都安瑶族自治县，因为开始不准我们与外界联系，别人不知我们的去向下落，故才有“失踪”的说法。所以，所谓“失踪”，正是对“老多”迫害的结果。现在说起我的这段“失踪”，我的家人和师大中文系的老

师们都记忆犹新。所以，《晚报》上所登李敏说的院领导“失踪”就是陆文忠，他是坚定支持“老多”的。陆文忠现在还健在，我和一些“老多”头头每年过年还去和他拜年。被“调走”的院领导一位是崔毅副院长，一位是李德韩副院长，李德韩就是“红旗”学生写的师院第一张大字报点名攻击的人，他先调走，后来又调回来了。因他们在文革一开始就挨“靠边”了，文革中并没表明支持哪一派的观点，但“老多”头头及我本人和他们的关系都相当好，李院长后来调回后，还两次和我闲聊起文革中的事，崔院长前几年他们夫妇从北京来桂林，找的是原来我们原“老多”的几个头头，我们和他们一起共同进餐，崔院长还用毛笔给我写过信(因他的毛笔字漂亮)。如今把这些事实摆出来，就清楚看出文革初期“老多”并没有“批斗”和“游街批斗”迫害过这些师院的领导干部，他们“后来”的“坎坷”完全是1968年“8·20行动”工宣队进校后，“老多”被消灭，“联指”一派掌权，掌管国家机器，执行错误政策造成的。

至此，可以得出结论：《晚报》是把当时的时间、人员、事件随便乱提前推移，张冠李戴，加罪“老多”，歪曲、捏造桂林文革历史的。

摆清事实后，面对《晚报》文章及当前的事实，我们提一些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从所引的第一段官方文字看出，1968年“8·20行动”后“老多”被武力消灭先是血洗桂林，不折不扣的“白色恐怖”，同时也是工宣队进学校，全广西皆为“联指”一派掌权，大批杀人犯上台当官，至1983年广西“处遗”(即由中央工作组直接指导下的广西“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之后，杀人犯才逐步下台，至1988年“处遗”收尾结束，时间二十年。在这其中，第二段官方文字，指的是1970年4月16日，特大规模的抄家，官方公布的数字是抄“8000多户”，实际上当时传说的都说是“过万户”，因为一、二年来不断抄家，有人成了“抄家癖”，觉得不过瘾，在抄的过程中节外生枝，多抄了许多，变成“过万户”。当时桂林城区包括郊区14万人口，市内不过十来万人口，十来万人口是多少户家庭呢？抄了过万户，请读者盘算看这比例是多少？这种打击面可以说是旷古未有！外地人也许不理解时间过这么长了，怎么还会有这样大的打击面？答曰很简单，就是因为文革中“老多”在桂林占绝大多数。当时我们被关押着，管理人员训话说这叫“红色恐怖”，“好得很”。不久后的一段时间，社会上又传出些恐怖的怪事，说某某是同情“老多”观点的被暗杀了(因“8·20行动”是公开杀人，现在是“暗杀”，有所不同)，某某被斗得不堪忍受跳楼了，某某自杀了，某某上吊了……都是这一类的死，老百姓说是“黑色恐怖”来了！但这“黑色恐怖”与前两种“恐怖”有些不同，制造全市“黑色恐怖”的带头人不是别人，却是“8·20行动”带队进广西师院的工宣队长翟华昌，一位堂堂的高等学府的工宣队长，桂林市工宣队的头块牌人物，他那耀武扬威的样子，“打、砸、抢、抄、抓、杀”他说了算。这位赫赫有名的工宣队长翟华昌上吊自杀了。人们说是冤鬼太多，来找到他了。或者说“天意不容”，自我报应，以他的亡灵来祭奠那些新死的冤魂！那几年的桂林，就是这些“恐怖”、“恐怖”、“恐怖”轮番袭来，整个社会人心惶惶。

广西整人是往死里整的，非常下狠心，就以我们两位作者我和张雄飞为例吧：在文革中我步步都是紧跟中央战略部署的，自己没做过任何一点别的错事，好些事我还做了好事，就这样我被关押12年，放出来后还要继续整8年，至1988年利用强制手段，违反党章，硬是要把我的党籍搞掉才放手。张雄飞在1968年“桂林老多”反围剿时是个中层头头，被关押几年放出来后，1974年至1975年，勇敢站出来写大字报揭露1968年“8·20行动”的杀人罪行，摸了老虎屁股，

结果被判处无期徒刑，与他同案的都判得很重很重，最重的被判处“死缓”。我们犯什么弥天大罪？不就是文革这点事，居然比许许多多的刑事犯还严重。另外，广西整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抓人容易放人难”，即到最后已经决定放人甚至下文放人了，还要多关一年甚至几年。比如我，上级已经下文，还挨多关大半年；有一位同志也是上级已经下文，下面就是压着不执行，在监牢里多坐了3年；“老多”百多个头头和骨干，1968年“8·20”被关押，本来1969年中央就有政策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了，但还被关押在市收容所里劳改，到1973年才放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则一直被关押到1976年。“老多”头头骨干许多人都同此命运，所以，挨整的人都是几年、十几年的。本来是冤案了，还要冤上加冤，多挨几年。有什么法律？什么人权？什么党章？更不要说什么政策了！就是这样的无法无天！

我们摆出以上情况，让世人了解广西文革的劣根相当深。前面说的大批杀人犯从官位下台是将近20年，到现在又是20年，《晚报》利用党报(它与《桂林日报》同属《桂林日报》社，是同样的管理人员)的权威，开辟庆贺祖国60华诞的专栏，打着书写桂林60年历史的幌子，在全民一片兴高采烈的庆贺声中，桂林文革的历史，就这样被它白纸黑字歪曲、捏造定了，确实很值得世人深思啊！

我们这些受害者，不能容忍再被人诬蔑，被迫写澄清事实的文章，以见教于世人，我们别无所求，仅仅是希望我们的国家安定团结，长治久安，真正建设好一个和谐的社会，永远繁荣昌盛，不要让讲假话的文人与投机者败坏了！

现在，我们很冷静、客观、非常实事求是、毫不夸张的说：文革中的“桂林老多”是全国最好的一个群众组织，好到周总理拿来“当解放军用”；也是全国被镇压得最惨、受迫害的时间最长的一个群众组织——这就是桂林文革的历史——一部血的历史。

2009年11月8日

《桂林晚报》不要捏造历史

唐品端

《桂林晚报》在8月19日回顾文革历史的纪实《1968武斗》一文中，有这样的叙述：“据资料记载……当时在阳桥北新建的一百货大楼(当时叫七三大楼)也在武斗中被付之一炬”。

这又是胡说八道。上了50岁的桂林人都记得：

一、“七三大楼”不是在“武斗”之前建造的，武斗之前和之后，“七三大楼”的原址，是当时桂林最高的建筑，叫做“榕城饭店”。

二、建造“七三大楼”的原因，是因为原来的榕城饭店，在12县武装民兵包围桂林时，被“桂林联指”武装占为据点，直接威胁了阳桥以北“桂林老多”区域的安全，为了保护数万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老多”的学生军“红卫师”，向其发起强攻，打掉了这个据点。因为榕城饭店在战斗中被炸得摇摇欲坠(可见战斗之惨烈)，“武斗”后才被拆除，在原址上盖起了大楼。

三、“七三大楼”是文革期间，桂林的帮派势力为了纪念他们因歪曲、利用《七三布告》，获得了镇压“桂林老多”的“伟大胜利”命名的。顾其名可思其义，可见建造此楼的时间，绝对远在1968年“武斗”结束之后，《桂林晚报》想胡弄桂林老百姓真是够缺德的了。

四、原来的“七三大楼”，不是被火烧掉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旧城改造时拆除的。

五、说这栋大楼“在武斗中被付之一炬”，无非是想栽赃给“桂林老多”。请问《桂林晚报》及这篇文章的作者，你们为什么这样仇恨在文革中被镇压、屠杀得最惨的“桂林老多”呢？是不是因为你们太怀念“广西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了，或者——恕我这个抗美援朝老兵直言，是不是你们的老子是血债累累的文革“三种人”呢？

三揭《桂林晚报》回避、歪曲、捏造桂林文革历史

张雄飞

先从“党的喉舌”放纵胡扯桂林文革历史说起

《桂林晚报》专栏《桂林城事·1949——2009》（简称《城事》）发表的两大版纪实《1967“造反夺权”》（简称《夺权》），是一篇回避、歪曲、捏造桂林文革历史的“好文章”。对于《桂林日报》这个严重错误，我们此前已有多篇博文进行揭露，如今不妨再说说他们是怎样放纵对桂林文革历史胡扯八扯的。

《夺权》把板子都打在“造反派”（暗指“桂林老多”）屁股上，不过他们忘记了一个历史结论：文革中的广西两大派，都是“造反派”。多数派“广西联指”因支持韦国清“有功”，而入党、升官无数；少数派“广西4·22”因反对韦国清“有罪”，被关押、屠杀无数。

这样，桂林也就有两个“造反派”。而桂林的多数派“桂林老多”因反对韦国清对广西一部分人民群众镇压屠杀，结果被斗挨打关押残杀成千上万；少数派“桂林联指”因得力充当韦国清打人的棍子杀人的刀子，结果入党提干升官发财成千上万。

所以和全广西一样，“桂林联指”是广西文革的得利者，“桂林老多”则是广西文革的受害者——也就是1983年5月13日，广西区党委给中央书记处写报告，并得到中央的批示“原则同意”所说的韦国清等人“调动军队和民兵，镇压一部分群众，并导致大量乱杀人的后果”的那“一部分群众”。而定广西两大派群众组织“都是造反派”的，也是1983年广西“处遗”时，广西区党委和中央工作组所作的结论。

既然历史是这样，那么有文德的人，就会同情被害的弱者了，可“党的喉舌”《桂林晚报》就奇了怪了，不仅不同情受害者，还想向已被“打倒”无数次的人们“再踏上一只脚”！

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简单剖析《夺权》便知。

文章所指的桂林市1967年大“夺权”，就是“桂林老多”之所为，因为那时“桂林老多”在桂林是绝对大多数，全市的权，都是他们夺的。但是，夺权的结果，可不像《桂林晚报》说的那样，什么夺权时“当场就把厂长抓起来”，“造反派夺权也不管生产，只是天天开会，贴大字报”，“桂林很多政府部门、职能机关……陷入了半瘫痪状态……造成了1967年下半年的混乱局面”。这都是杜撰的历史，事实果真像他们说的那样，周总理怎么会在1967年赞扬“桂林老多”是“全国闻名的造反派”，还明确指示把“老多”“当解放军用”呢？关于“老多”1967年夺权的详情及桂林市当时的总体状况，我们前面已有博文全面反驳，可惜没见有反反驳文章。

再看看这篇文章在“夺权后‘大破大立’”小标题下，如何把更改公社、街道、学校、景区的名称以及抄家的罪状，统统加在“老多”头上的：

关于公社更名：“1966年9月15日，……经有关部门批准公示的通知，一次性将原市区9个公社中的7个……更名。”（见《夺权》）1966年桂林还没有发生“桂林老多”“夺权”，他们就迫不及待把罪名强加在“老多”身上了；而报纸的标题又是“夺权后‘大破大立’”，他们为疯狂捏造，简直就不顾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关于街道和景区的更名：那更是1970年以后桂林掌权的造反派“桂林联指”

之所为。把这 70 年代的事返回到 1967 年来写，又是一种自己打自己嘴巴的“奇迹”！

关于抄家：一是 1966 年桂林的“红旗红卫兵”干的，这个红卫兵组织，则是“桂林联指”的前身，因而才有 1967 年，他们把抄家抄得的三万多两黄金，交给夺权后的“桂林老多”。另外一次大抄家，1987 年 8 月桂林市委整党办公室却不管《夺权》的作者们如何捏造，偏偏这样下文记下了他们的偶像们这段不光彩的历史：

“一九七〇年四月十六日晚，桂林市开展了大规模搜查活动。在查抄中，市委常委召开紧急会议，市革委会副主任、军代表曹杰提出‘乘胜前进、跟踪追击，挖地三尺，大杀回马枪’的错误主张。这次运动，全市共组织了三万一千多名骨干，对八千三百八十九名对象进行抄家搜查，导致运动中八十三人自杀，后果极为严重。”

先生们：1968 年 8 月，“桂林老多”这个群众组织，就被武装镇压消灭了，如今你们还把各种罪状加在他们头上，公正吗？

他们胡诌时简直“忘记了”一个桂林文革的基本历史事实，像上述的更名，只有在社会安定了，掌权者坐稳了屁股，才有心思去大量进行，而在 1967 年春，“桂林老多”夺权之后，桂林社会大体安定了大半年，到了冬天，由于韦国清及其支持者们，为了夺回他们的权力，就蓄意把桂林市搞乱了，到了 11 月，除了九九分队开枪“打死 3 人，打伤数人”（见《夺权》）外，还发生了小规模热兵器武斗。许多生死攸关的大事摆在眼前，谁会顾得上去做给街道学校更名的小事？

《夺权》的胡扯八扯，是无与伦比的“忽悠”老百姓，听说《桂林城事·1949——2009》还要汇集出版，那真是要对咱们老百姓搞更大的“忽悠”了。

再说这个大冤案大到什么程度

在《城事》所记的桂林大事和所写的十年文革纪实中，只在 1974 年的“城事记录”那个小栏目里，对我们这个大冤案——“桂林几个反革命分子案”，有 30 个字的记载：

批林批孔“运动期间，有些人被定为‘反革命分子’而遭拘捕判刑。1983 年月 1 月平反。”

即使这 30 个字也有 3 点错误：1，“有些人”在 1983 年以前就平反了；2，个别人在 1983 年 1 月获平反，多数人依旧没平反；3、“一九八四年元月五日，中共桂林市委作出关于为所谓《桂林几个反革命分子平反的决定》。同年三月二十三日，区党委转发了桂林市委《关于为所谓桂林几个反革命分子平反的决定》的通知”（见桂林市委整党办有关文字），只有到了此时，才能说此冤案的人，才全部得到平反了。

言归正传。

我们这个大冤案，果真只应如此轻描淡写地略说一二，根本不值得桂林“秉公执笔”的记者们浪费笔墨吗？历史的真实，远非广西某些官方文人“忽悠”老百姓那么简单！

一、从被查办的等级看

（一）1974 年 4 月 8 日，当桂林市张贴出第一张意在否定广西文革的大字报，桂林市委和广西区党委，即视此举为最危险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很快，桂林市委就把其后出现的大字报上街的活动，“报请区党委批准，定为‘反革命案件’，

并由区党委主管，报公安部备案，区公安厅派人参加，市委书记钟枫挂帅，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副书记分管政法工作的潘树彬同志具体负责，市公安局副局长吴务群协助。下设材料组、专案组、接待组，区公安厅三处处长李良参加材料组工作。”（引自市整党办文字。笔者另注：上述三个专案组，人数竟有一百多人。）

（二）韦国清亲自抓此案的查办。据原参加桂林市“三办”的解放军 181 医院离休老同志朱××提供的历史资料所记，自从将桂林大字报上街活动定为“反革命案件”，并相应成立了上述办案机构后，桂林市委办公室，每天都要向广西区党委汇报桂林大字报活动的情况；韦国清将此视为广西阶级斗争之重中之重，亲自主持办理这个案件，经常作具体批示，如连写大字报的市房地局干部陈体郁，有次私自开了公用单车的锁骑去搞串连，当市委办公室向区党委作例行汇报时，韦国清都指示“陈体郁的单车问题，也要查清楚。”而在 1975 年春汇报我的活动时，韦国清则明确指示：“张雄飞一定要抓起来！”（摘自桂林市委“七四专案”办公室向区党委的汇报记录）

（三）1976 年 4 月，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5 月，全国公开“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7 月，桂林市对这个冤案的四人龚志明、张雄飞、许瑞林、黄锦祥判以重刑。

据说，韦国清为名正言顺镇压我们，特向华国锋汇报了我们的“罪行”，华国锋听了他的汇报后表态说：“那就是反革命了。”于是，韦国清便令在桂林大张旗鼓地对我们进行了大规模批斗及宣判。此事目前虽无法证实，但可以推断：像 1977 年 1 月广西展开对“桂林几个反革命分子”全区性的大批判，如果没报请中央批准，广西区党委能自己决定吗，尤其像韦国清这样行事谨慎的人？由此可见，此案是广西最高等级的大案。

二、从“政治帽子”的不断变换看

我们这些“桂林老多”的“残余分子”，因为活在“韦老爷”的帽子工厂里，文革中到底戴过多少顶“高帽”？差点连自己都数不清了。

曾记得：1968 年 8 月，当“老多”被武装消灭时，刘少奇就成了我们的后台，我们也就成了“刘少奇的孝子贤孙”；在 1971 年林彪机毁人亡前，那些审讯我们这些囚犯的专案人员，经常气势如虹地训我们：“我们有林副统帅做后台，你们这些牛鬼蛇神，翻得了天吗？”可是有一天，他们虽然依旧气势如虹，但是说法变了：“你们知道吗？你们的黑后台被揪出来了，他就是林彪！你们好好交代自己的罪恶，争取宽大处理！”我们被他们训得瞠目结舌，无言以对！

在广西，这种历史笑话层出不穷，不信再看看下面的“史无先例”：

（一）此案在被定为“反革命案”立案侦查阶段，最早内部称之为“七四专案”；1975 年 4 至 7 月，当此案的全部成员被拘留逮捕后，桂林市便公开宣布这个案件为“反革命集团案”；而后几年，随着批判的不断升级，又公开称此案为“张雄飞反革命集团案”，内部简称为“张案”。

（二）1976 年 7 月，在广西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中，给我们戴上了“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和依靠力量”的帽子，并判以重刑。这时，邓小平自然又成了我们的“黑后台”了。

（三）1977 年元月，“张案”又被和“四人帮”联系起来，说我们写大字报的活动“是‘四人帮’插手广西的一宗严重事件”，于是，我们成了全广西大批判的重点，又被戴上了“‘四人帮’的别动队——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其实，如果讲道理和讲公平，韦国清与江青照相，和“四人帮”联手镇压我们，“四人帮”权力最高张时期，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名字排列中，他的名字不断前靠，甚至前进到仅次于王洪文、张春桥，而在江青之前的第六位，他才是真正的“四人帮”分子呢！

从政治帽子的数度变换，说明这个冤案，真正是“广西建国以来最大的反革命集团案”（官方宣示）。

三、从镇压的手段与烈度看

（一）1974年，广西区党委定“张案”为“反革命案”后，即动用广西和桂林市的公安力量，对“张案”成员进行跟踪、侦察、威胁、利诱、搜集调查“罪证”等等。

（二）利用当时的全国政治形势，紧跟当时“党中央领导人”的指示，调动广西的宣传工具，大造政治舆论，上下紧密配合，不断升级对“张案”一環扣着一環的镇压：

1、1975年4月1日，《广西日报》头版头条转载张春桥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提出：不仅要在某些领域专政，还要在一切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广西立即响应，4月1——8日，召开自治区“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大会”，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主席覃应机为大会作报告，在强调阶级斗争时露骨地说：“要准确而有力地打击极少数坏人。”

也就在这个时候，韦国清便具体指示：“张雄飞一定要抓起来”。于是，“张案”成员彭富森、许瑞林马上在4月份被抓。

2、1975年6月22日《广西日报》通栏大字标题报道区党委召开全区电话会议，韦国清在报告中说：“对阶级敌人利用资产阶级派性搞反革命活动要提高警惕团结对敌……要稳、准、狠以准为重点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这些话，显然是针对桂林“张案”的，因为在我们大字报上街之初，韦国清们就把我们的活动，宣传为“煽动派性，搞反革命”的活动了。

于是，至7月15日，“张案”23名成员，被全部逮捕完毕。

3、1976年2月19日，《广西日报》以头版头条大字标题《以阶级斗争为纲，回击右倾翻案风》，在报道自治区烈属、军属、革命残废军人、复员、退伍、转业军人代表大会代表的座谈会时，充满火药味地写道：“刮右倾翻案风的人，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翻案是为了复辟……决不允许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这明显是为其后对“张案”成员进行更残酷的镇压，制造理论根据，作舆论准备，所以，后来我们的判决书就有了“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翻文化大革命的账”这条罪状。

4、1976年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文章，定4月5日发生在天安门的事件，为“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广西又充分利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以“紧密联系实际”的姿态，先有步骤地制造舆论，后对“张案”实行镇压：

（1）1976年4月8日，也就是《人民日报》发表上述文章的当天，广西区党委在南宁组织了10万军民大游行，主要负责人安平生、乔晓光、刘重桂、覃应机等统统亲自参加游行声讨“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广西日报》则以通栏大字

标题《热烈欢呼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英明决议，愤怒批判不肯悔改的走资派邓小平的罪行》，对此进行报道。

(2) 4月9日，广西区党委在南宁又组织了更大规模的15万人大游行，声讨“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广西区党委的主要负责人又悉数参加游行。

(3) 4月10日、13日《广西日报》又在头版连续报道柳州、桂林、梧州及全自治区82个县市，举行“声势浩大”的“声讨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的大游行。

(4) 5月8日，《广西日报》头版头条以通栏大字标题《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破坏活动推向新高潮》，报道了自治区党委召开南宁党、政、军干部动员大会，区党委书记刘重桂在会上作报告说：“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中，放手发动群众，彻底追查反革命谣言、反革命诗词、反革命传单、反革命标语，坚决打击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

刘重桂罗列的这些罪状，“张案”条条都有：

A、“张案”成员张贴大字报，在街头演说时所揭露的事实，所传递的讯息，韦国清者们早就定之为“反革命谣言”了；

B、“张案”成员、精神病患者龚志明（以后的博文会详述），在精神病发作的时候，确实写了些思维混乱的“诗”，他们便将这些“诗”，用断章取义、掐头去尾、东拼西凑的手法，编制成“反诗”。这样，“张案”就多了一条“书写反革命诗词”罪状；

C、“张案”在1974年、1975年，确实张贴了不少标语，散发过很多传单，这在他们眼里，自然又是不可抵赖的“反革命罪行”了。

到了这个时候，镇压“张案”所必需的“上挂下联”，已经作得“天衣无缝”了！

(5) 1976年5月17日，《广西日报》以通栏大字标题，报道了区党委在南宁又一次组织了15万人的大游行，区党委的主要负责人又全部参加。第一书记安平生发表了题为《坚决打击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的讲话。

最后镇压“张案”的时机成熟了。更何况，在广西联系实际“批邓”，“张案”是最合适的“靶子”，因为“张案”既有“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的“罪行”，又是“建国以来最大的反革命集团”，于是——

(6) 7月下旬，把“张案”当作“邓小平在广西的代理人”、“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和依靠力量”，在桂林组织了几场万人以上的批斗大会后，便对其四名成员龚志明、张雄飞、许瑞林、黄锦祥分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15年有期徒刑，并在市中心体育场，召开了三至五万人的公判大会，而后押上大卡车游街。此外还有4名成员，在另外的地方宣判有期徒刑。其余成员，继续关押。

(7) 这里要特别控诉的是：“张案”成员陈壬午同志，于1975年7月15日被“柳铁保卫组”逮捕后，立即押往柳州，被关在柳州看守所里，9月19日，陈壬午同志因被捆绑殴打，惨死狱中！他身上的捆绑索印和累累伤痕，说明他是被害死的，“柳铁保卫组”却说他是自杀的。此案在乔晓光领导的广西“处遗”中，并没有认真追查，加之作案公安人员串供攻守同盟，这桩杀人案，竟让凶手们逍遥法外，不了了之！（以后博文详述）

(8) “张案”除了主要成员23人受到拘留、逮捕、判刑外，全市上名单受审查的有125名，没上名单而受迫害者，无法统计。例如漓江机械工人莫光义，1983年4月给中纪委写申诉信要求为他平反说：“仅因我偶然看过张雄飞等同志

写的大字报，偶然听过他们的讲演就深受株连，这类情况在我厂内绝非仅有……”莫光义因在街上看了大字报，听了讲演，回厂里对人讲了他看到听到的揭露“桂林八·二〇行动”的内容，便被开除党籍、厂籍、留厂察看两年、每月只发生活费 20 元。写此申诉信时，还没得到平反。

四、从斗争批判的声势与规模看

（一）全桂林市规模：

1、自 1974 年 4 月 8 日桂林出现第一张大字报起，桂林市委秉承区党委的旨意，就把我们当作新出现的全市性的阶级敌人了。全部被支持韦国清的派别所掌握的上至市委下至各基层单位的革委会，利用党权及政权，除了大字报的形式外，运用各种手段，如召开各种会议；举办各种学习班；对工农商学兵进行“广西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思想教育；对可能受到我们大字报思想影响的人，实行软硬兼施的“说服帮助”工作；对已经表明支持街上大字报观点的“危险分子”，则进行小范围的批判和斗争；对我们那 23 人主要成员，因为他们无计可施，就去威胁他们的家属，特别对已结婚的人，他们的妻子，就成了主要“猎取”对象，指示她们说服她们：把丈夫拉回来，要考虑老婆年轻孩子小，不要参加街上的“反革命活动”了，如果继续顽固下去，就会“受到无产阶级的专政”，那时就要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了……等等。

这一切招数果然厉害！加上市公安局的跟踪侦察和每天晚上公开出动对大字报进行拍照，弄得全市人心惶惶，有一段时间，街上的大字报数量骤然下降，甚至最低潮时，只剩下我一个人在写了！

2、1975 年 7 月 15 日，拘捕完“张案”的最后一个人后，7 月 16 日，市委、市革委在市中心体育场，召开有各基层负责人参加的万人以上大会，宣布“破获了一个建国以来桂林地区最大的反革命集团案”，并号召全市人民人人都要对“八·二〇革命行动”表态，与这个“反革命集团”划清界限。此后，从 1975 年 7 月至 1978 年 12 月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里，多次召开万人以上的大会，批判斗争清查“张案”。

3、1976 年 7 月下旬，在对“张案”四人：龚、张、许、黄判刑之前，连续在广西师院、第九中学广场，召开了三场万人以上的批斗大会。然后又押到如漓江机械厂等大单位进行巡回批斗。

4、在对“张案”四人进行宣判的那天，又在市中心体育场，召开了三至五万人的全市宣判大会。

5、因为 1975 年、1976 年、1977 年 9 月以前，桂林没有市报，所以无法查证在这段时间里，召开了多少次批判“张案”的万人大会。但从《广西日报》的报道中，可见此前桂林召开批判“张案”的万人大会，肯定不止一次。如 1977 年 5 月 15 日，《广西日报》第一版头条在通栏大字标题《桂林军民举行大会，深提狠批“四人帮”插手广西的反革命罪行》、副标题“广大军民愤怒揭批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决心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英明领导下，打一场揭发批判‘四人帮’的人民战争，把无产阶级事业进行到底”下，报道：

“【桂林讯】……最近，桂林军民五万六千多人举行大会，愤怒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别动队——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的反革命罪行。”接着用半版罗织“张案”的“罪行”。（略）

6、1977 年 9 月 29 日，在《桂林战报》的创刊号上，以头版头条大字标题《市委召开大干一百广播大会》，报道了市委书记郭鹏的报告摘要：

“……深入地系统地批判‘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张雄飞一伙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切实解决好对‘八·二〇’革命措施的认识和态度，彻底清查与‘四人帮’、张雄飞等几个反革命分子和冯邦瑞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

7、1977年10月22日《桂林战报》头版头条通栏大字标题《市委召开了全市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深入揭批‘四人帮’经验交流大会》，报道十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中共桂林市委召开“经验交流”大会，市委副书记潘树彬作报告，市委书记鹏讲话。报道强调：

“大会指出，揭批‘四人帮’，一定要联系我市的实际，揭批‘四人帮’在桂林的别动队张雄飞等几个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批判冯邦瑞等种种谬论；同时，通过举办学习班或其他形式，继续教育和帮助那些对‘八·二〇’革命措施认识有错误的干部群众，提高认识，端正态度，转变立场，同张雄飞几个反革命分子、同冯邦瑞彻底划清界限。”

8、1977年12月10日，《桂林战报》头版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打好第三战役，推动全盘工作》，号召：

“批判张雄飞一伙反革命分子妄图打倒区市领导干部的罪行还要继续深入，批判冯邦瑞反党阴谋活动也要进行。”

9、1977年11月15日，《桂林战报》头版头条在通栏大字标题《联系实际揭批“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夺取揭批“四人帮”伟大斗争的彻底胜利》下，整版报道桂林市委于11月12日，召开批斗冯邦瑞一万五千多人的大会，市委、市革委的主要负责人全数参加。在罗列“冯邦瑞在批林批孔运动期间，与张雄飞等几个反革命分子勾结，把矛头指向党中央、毛主席……恶毒攻击区、市党委坚决贯彻执行‘八·二〇’革命措施”等等“罪行”外，市委副书记潘树彬在讲话中又“指示”：

“要紧密地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充分揭露‘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在各方面的表现和影响。张雄飞、许瑞林等几个反革命分子在批林批孔期间挑起的事端和冯邦瑞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是桂林市最具体最生动的实际。”

10、1977年11月19日，《桂林战报》头版头条通栏大字标题《部署打好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报道桂林市委于11月15日召开大会，市委、市革委主要负责人全数参加，大会号召“同时还要联系揭批张雄飞一伙反革命分子妄图打倒区、市党委革命领导干部的反动言行，联系揭批冯邦瑞的阴谋活动。”该报第二版整版发表了市委副书记潘树彬大会讲话的全文《彻底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他联系实际“批判”：

“‘四人帮’在桂林的别动队张雄飞等几个反革命分子和冯邦瑞之流，也心领神会，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秉承‘四人帮’的旨意，上窜下跳、四处游说，煽阴风，点鬼火，制造谣言，大造反革命舆论。……”

11、1977年12月21日，《桂林战报》在头版通栏大字标题《镇压阶级敌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下，报道桂林市12月18日召开三万多人的公判大会，判处了文革中的“桂林老多”派“工总”的第一负责人刘天偿死刑立即执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徒刑。在罗列刘天偿的“罪状”时诬蔑他道：

“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一系列的严重反革命罪行，在关押期间仍坚持反动立场，继续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在一九七四年，与张雄飞等几个反革命分子勾结，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恶毒攻击市革委会贯彻落实‘七·三’布告所采取的革命措施，恶毒攻击中央和区、市党委领导同志，充当‘四人帮’的反革命

别动队，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效劳”。

12、1978年1月30日，《桂林战报》在头版头条通栏套红大字标题《我市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先代会”隆重开幕》下，报道市委书记郭鹏作报告总结道：

“与‘四人帮’、张雄飞等几个反革命分子和冯邦瑞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基本查清。以张雄飞、冯邦瑞为代表的‘四人帮’在广西桂林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和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严重破坏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受到应有制裁……对‘八·二〇’革命行动的认识基本统一。”

13、1978年5月13日，《桂林战报》头版头条在大字标题《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深入揭批“四人帮”》、副标题“电表厂党委总结经验认真贯彻区党委指示精神”下，报道电表厂党委的经验：

“要把矛头始终对准‘四人帮’以及张雄飞等几个反革命分子和冯邦瑞。……厂党委引导群众抓住‘四人帮’、张雄飞等几个反革命分子和冯邦瑞在本厂的影响深，流毒广的问题，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批判……”

《桂林战报》并对此发表短评：“要进一步联系我市实际，狠揭猛批张雄飞等几个反革命分子和冯邦瑞的罪行，彻底查清与‘四人帮’、张雄飞、冯邦瑞反革命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

14、1978年5月29日，《桂林战报》一版通栏大字标题《大张旗鼓地宣传学习新时期任务和新宪法》，副标题“中共桂林市委最近发出通知，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迅速掀起一个大学习、大宣传、大动员的高潮”，报道：

“《通知》指出：……联系桂林市的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以及张雄飞等几个反革命分子和冯邦瑞的谬论和罪行。要深入批判他们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横行于党纪国法之外，反对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煽动无政府主义和极端民主化，妄图捣乱无产阶级专政，实行乱中夺权的反革命罪行；批判他们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破坏四个现代化的谬论和罪行；……”

15、1978年12月8日，《桂林战报》头版头条通栏标题《市委召开基层领导干部会议传达区党委扩大会议精神，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分清路线是非，加强革命团结》，又号召：

“彻底揭批刘振林、刘天偿、张雄飞等几个反革命分子和冯邦瑞、王同连秉承林彪、‘四人帮’旨意，打倒革命领导干部，妄图篡夺区党委、市委领导权，破坏社会法制，大搞打砸抢罪行……”（王同连：文革期间任桂林市委副书记——笔者注）

15、《桂林战报》除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许多批“张雄飞和那几个反革命分子”的报道外，还在第二、三版，发表了大量各党政重要部门，如法院、公安局，宣传部，以及全市诸多大小企事业单位对“张雄飞和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的“革命大批判”文章。

16、还有各单位负责人在大会上对“张案”的“口诛笔伐”，小会上职工干部个人的口头发言批判（大多数人迫于无奈），这大概可以用百万次为单位来计算了！

综上所述，对“张案”的“革命大批判”，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真正是新中国建国以来所罕见；而对“张案”的大批判大斗争，持续时间就算从1974年4月起，至1978年12月止吧，也足足有4年零8个月之长了，这恐怕也是建国以来绝无仅有的！！

（二）全广西壮族自治区规模：

1、在1976年7月广西“反击右倾翻案风”高潮时，在区党委的指示下，把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1976年7月12日铅印的机密材料《镇压反革命，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现行反革命分子龚志明、张雄飞、许瑞林、黄锦祥的罪行材料》，下发全自治区，从此把对“张案”的批判斗争，扩大到全广西范围。（见照片）

2、1977年1月，广西区党委下达14号文件，把“张案”定为“‘四人帮’别动队——桂林几个反革命分子”，并下令在全自治区进行“三清查”，即“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系的人和事、清查与张雄飞有关系的人和事、清查与冯邦瑞有关系的人和事。”与此相配合，区党委又把桂林市公安局铅印的机密材料《桂林几个反革命分子的罪证材料》，下发全自治区，进一步把对“张案”的批判斗争，扩大至全广西。（见照片）

3、1977年1月16日，《广西日报》头版头条在通栏大字标题《认真学习毛主席〈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的重要讲话，深揭狠批“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夺取新的更大胜利》下，报道“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召开第十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区党委、区革委安平生、乔晓光、刘重桂、覃应机等负责人全数参加，大会罗织许多“张案”罪状：

“在批林批孔运动期间发生的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挑起的事端，就是‘四人帮’插手广西的严重事件，是他们在全国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几个反革命分子在‘四人帮’在外省的黑手指使下，打着‘反潮流’的旗号，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地疯狂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他们多次召开反革命黑会，四出搞黑串连，大量制造反革命谣言，书写反动文章、诗词和标语，发表反动演说，用最恶毒的语言、最卑劣的手段，咒骂和攻击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攻击敬爱的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无耻吹捧和美化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他们削尖脑袋，拼命向‘四人帮’递送黑材料、写黑信、告黑状；秉承‘四人帮’‘放火烧荒’、‘乱中夺权’的黑旨意，伙同‘四人帮’伸向外省的黑手，按照他们既定的‘四处冒烟，南北夹击’的反革命计划，建立反革命联络点，到处张贴、传抄‘四人帮’的讲话和伪造的中央文件，大造反革命舆论，大肆进行反革命煽动，妄图以攻击落实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在桂林采取的‘八·二〇’革命措施为突破口，把广西的大好形势搞乱，打倒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领导干部，以便取而代之，乱中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4、1977年2月15日，《广西日报》头版头条大字标题《深揭狠批“四人帮”插手广西的反革命罪行》、副题“广大军民愤怒揭批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决心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英明领导下，打一场揭发批判‘四人帮’的人民战争，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下，报道：

“桂林市五万六千多军民举行大会，桂林市、桂林地区、铁路桂林机务段、桂林驻军负责同志出席了大会。大会由桂林市委副书记陈秉德主持。工人、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的代表在会上进行揭发批判发言。中共桂林市委书记钟枫在大会上讲了话。”接着，便长篇幅报道揭发批判“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各种“反革命罪行”的内容。

5、《广西日报》还在同日第一版发表了“本报评论员”长篇文章《日暮途穷的挣扎》，对“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揭露和批判后，还泼妇骂街地诅咒道：

“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为了搞乱广西，可谓千方百计，费尽心机。但是，违反人民意志，阻挡历史车轮，其结果必然是身败名裂。要乱广西是枉然。经过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三千多万广西各族人民，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团结战斗，粉碎了他们的阴谋。尽管他们嚣张多时，但却没有人跟着他们‘杀出来’，他们只落得‘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十分虚弱，十分孤立，无法挽救他们最后的灭亡……”

骂完之后，“本报评论员”又满怀豪情地欢呼：

“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包括同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的继续。在这场历史性的大决战中，我们广西军民和全国军民一样，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我们终于胜利了。”

“本报评论员”最后号召：

“我区揭批‘四人帮’以及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已经普遍展开，但不能低估他们对广西的影响，还必须努力作战。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学习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旗帜鲜明地站在斗争的最前列，紧密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深揭狠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

5、1977年2月16日，《广西日报》第三版刊登了桂林军分区、桂林齿轮厂、铁路桂林机务段、桂林染织厂、桂林市郊区等五个单位大批判组和个人批判“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的“革命大批判”文章。日报还发表了《痛打落水狗》的短评。

6、1977年2月17日，《广西日报》第二版整版刊登桂林市桂林钢厂大批判组、桂林机床厂大批判组、桂林地委宣传部大批判组、广西师范学院大批判组、桂林第三机床厂大批判组、铁路桂林机务段大批判组等批判“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的文章。

7、1977年3月12日，《广西日报》第四版，刊登柳州铁路局大批判组、中共乐业县委大批判组、玉林地委大批判组、昭平县委宣传部大批判组、柳州化肥厂大批判组、梧州淀粉厂大批判组、大新县委宣传部大批判组等批判文章，对“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进行“革命大批判”。

8、1977年3月15日，《广西日报》第三版，刊登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局大批判组、广西军区警卫连个人、阳朔县委大批判组、南宁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个人、合浦县委大批判组、象州县委大批判组、东兰县委大批判组等文章，对“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进行口诛笔伐。

类似上述的单位和个人对“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的“革命大批判”文章，在1977年的《广西日报》上还有很多，不再列举。

9、1977年3月17日，《广西日报》又在头版头条以通栏大字标题发表《联系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本报评论员”文章，警告和批评各地对“四人帮”及“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的批判和清查有松懈思想，而后指示：

“‘四人帮’从组织上直接插手广西虽然不多，但不可忽视，对于江青的‘八·一八’黑批示，对于‘四人帮’的别动队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的罪行，要继续揭发批判，彻底清查。……我们一定要进一步认识揭批‘四人帮’这场斗争的严重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一个战役一个战役地、一个浪潮一个浪潮地把这场斗争推向深入。”

10、1977年12月，区党委书记乔晓光，在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大谈镇压“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的胜利：

“‘四人帮’对广西的大好形势，极端仇视，千方百计进行破坏。在他们的煽动和支持下，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四出搞黑串连，密谋策划建立京广、湘桂反革命联络点，炮制‘四处冒烟，南北夹击’的反革命计划，还伪造中央文件，恶毒攻击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坚决对他们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挫败了‘四人帮’妄图搞乱广西的阴谋。”

（三）制造全国性的不良影响：

1977年，当广西全面开展对“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进行大批判、大清查时，还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发表批判文章，从而造成全国性的对“张案”的诽谤和诬陷的不良影响。现仅举二例为证：

1、1977年“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写作组”，在《红旗》杂志第二期上，发表了题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文章，其中介绍了对“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坚决镇压的经验：

“在批林批孔运动期间，‘四人帮’通过他们在外省的黑手，勾结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挑起事端，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党中央和敬爱的周总理，否定广西文化大革命的成就。对于这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分子，我们坚决镇压，毫不手软。如果对一小撮阶级敌人不揭不斗，就不能教育群众保护群众，就不能把受阶级敌人影响的那部分人，争取过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2、1977年5月21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发表了南宁市委书记郭耀卿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的发言，攻击“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

“广西的大好形势，是在同‘四人帮’斗争中取得的。‘四人帮’极端仇视广西的大好形势，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批林批孔运动刚开始，他们就通过在湖南的黑手，指使桂林的几个反革命分子，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地进行反革命活动。南宁有几个坏分子，也秘密串连，煽动资产阶级派性，组织战斗队。社会上的一小撮阶级敌人乘机破坏……”

（四）制造超出国界的不良影响：

1、《人民日报》与《红旗》杂志，是发行海内外的，那些刊载广西批“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文章的，自然也流传到国外去了，这样“张案”成员的政治名誉，就或多或少在这两个刊物影响所及的范围内，受到了损害。

2、至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批判‘四人帮’”期间，是否对外广播了广西批判“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的消息和文章？无法查证。不过按常识分析，广西在全区范围内出现这么重大的政治事件，又进行了那么多的万人大会活动，平面媒体又刊登了这么多的大批判文章和“批邓”、“批判‘四人帮’”的重要消息，在极其重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当时，可能不对外广播吗？当时最重要的就是如何清除“右倾翻案的邓小平”、“篡党夺权的‘四人帮’”在各省市区“代理人”的政治影响，能不广播宣传如何成功地对他们进行了批判和清查吗？能不详细报道各地的情况，以说明各地对中央的支持吗？

3、可以肯定的是：“广西人民广播电台”、广西各市的“人民广播电台”，在“批判‘四人帮’”期间，必然也像广西两级党报那样，批“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批“张雄飞和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批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当年韦国清把那些诬蔑诽谤我们的不实之词，弄得满天飞，其影响远远超出广西而扩大出国门之外……

既然有平反政策规定：在什么范围造成不良影响的，应当在什么范围内消除。

那么在如今的讯息时代，我们完全有理由要求韦国清在互联网上向我们赔礼道歉，承认错误，这样才算真正平反。可惜的是，韦国清因为在文革中杀人如麻，早已被广西的十万冤魂，抓到另外一个世界戴高帽游街去了！现在我们借用韦国清们的惯用“八股”报道：据阴曹地府的可靠消息：就在今晚三更时分，他们还要召开一个十万冤魂批斗声讨韦国清的大会，但是不准我们去参加，说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因为韦国清在广西还有很多流毒，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去肃清，如果我们对韦国清从前的罪恶不闻不问，他们在那个地方，会天天睁着眼睛失眠的！

五、从受“张案”株连的方方面面看

（一）因支持“张案”成员揭发广西文革罪行的行动，原桂林市市长冯邦瑞同志及其他一些老干部，被安上“张雄飞反革命案的黑后台”等罪名进行政治迫害。1977年11月12日，桂林市委组织了一万五千人的批斗大会，对他搞胸挂大黑牌的批斗，并在党报上连篇累牍发表“大批判”文章，对他大肆诬蔑诽谤，使之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直到1983年4月，区党委才发334号文件为他平反（见文件照片）。

（二）自1974年“张案”成员揭发桂林“八·二〇行动”后，桂林的掌权帮派，就操控市委，在全市多次搞人人必须说“‘八·二〇行动’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的表态，不允许有第二种说法。

可是，在原是“桂林联指”成员的干部中，虽然1968年他们也积极参加“八·二〇行动”，但当桂林发生激烈的关于“八·二〇行动”，是“革命行动”还是“反革命行动”的大辩论时，在大量的血腥杀人案件面前，他们也受震动，良心也有所发现，于是发表了认为“八·二〇行动”主流是好的，但也有错误的看法，被铁桿帮派分子扣上“八·二〇一分为二派”的帽子并进行迫害。

此事件的起因是：1977年1月，区党委下发了在广西进行“三清查”（清查与四人帮、张雄飞、冯邦瑞有关系的人和事）的14号文件。桂林市委紧跟区党委的精神，1月举办科局长学习班，除了要“三清查”外，重点是解决对“八·二〇”的认识问题。

在七十年代的桂林，除了少数对掌权派无害的幸运者外，不是“联指”观点的干部，是不可能进入各级领导班子的。所以，当时的这个“科局长学习班”的成员，其实大多数是“联指”派的中坚分子和有功之臣，他们在自己人办的学习班上，自然有恃无恐敢讲话了，岂料即便如此，也有大祸从天而降：

“市委理论教育科副科长张××，平日对无休止地要求对“八·二〇”表态很反感，便在小组会上发言说：“‘八·二〇’的主流是好的，但也存在支流不足的问题。这些问题留待各级党委逐步落实就行了！”这一段话，被市委副书记区镇定为‘要对“八·二〇”搞“一分为二”，这是大右派的言论，若不及时改正，就要犯大错误！’”（引自官方权威资料，下同）

接着，就召开了“第14次革委会（扩大）会，即甲山会议。会议除对几位‘与张雄飞有牵连’的委员进行批判外，主要是解决对‘八·二〇’的认识问题。市革委会委员、市工交办主任王××（1968年12县民兵武装进攻“桂林老多”的军事指挥员之一，进攻隐山、桂师、榕湖饭店“老多”防线的主要指挥者——笔者注）同志因在一九六八年九月和一九七四年五月，曾分别向市革委副主任季××同志，市委副书记陈××同志提过“八·二〇”打人杀人较多，应加以注意的意见，此时被提出来，以‘恶毒攻击“八·二〇”革命行动’而被当作重点批判。”

“一九七七年八月的科局长学习班。……开班时，郭鹏（市委书记——笔者注）在讲话中指出，指导思想仍然是清查‘三牵连’和端正对‘八·二〇’的认识。开班不久，郭赴区开会。由于经过长期的谋划和准备，因此这次学习班来势很猛。王××（工交办主任——笔者注，下同）、李××（局级干部），王××（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张××（宣传部科长）、邵××（房地局副局长）和崔××（财政局副局长）六位同志，被学习班列为整个班的重点，对他们‘反对“八·二〇”的错误言行’，分别在小组、中会和大会进行轮番的批判和斗争。各小组还有自己的重点，分别进行批判。为了做到会内会外的结合，学习班的主持者发动机关的干部纷纷往学习班送来数量众多的揭发大字报，形成了内外夹攻的局面。学习班历时十五天，在会议主持者和帮派骨干的全力出击下，六位同志被迫作了检查……”

对自己人尚且如此毫不留情，对我们的镇压就可想而知了！

（三）因“张案”及由此引发的矛盾斗争，使桂林两任市委书记也难逃受排斥打击的命运：

1、市委书记钟枫，因对韦国清主持区党委，定桂林部分群众写大字报上街等活动为“反革命”，迟迟不肯表态；并私下通过桂林钢厂庞××，找张雄飞对照哈康文从湖南带回来的中央某号文件行文的不同之处；又因于1977年，故意拖延本应于4月再举办的科局长学习班不办等，被韦国清调离。后来，把持市委的铁桿帮派分子曹××、曾××、伍××等搞出来的《关于桂林市两条路线斗争若干问题》（草稿），这样罗织钟枫“罪状”：

“市委主要负责人（即指钟枫——原权威资料注）没有对张雄飞等人的斗争看作是严肃的阶级斗争，因而对张雄飞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态度不鲜明，斗争不力。……当敌人公开分裂市委常委时，他不表明自己的态度。就这样，在市委和干部队伍内部引起了分歧。当阶级敌人变换手法刮起对‘八·二〇’实行‘一分为二’的妖风，面对阶级敌人的新阴谋，本应积极教育群众，维护‘八·二〇’的革命成果，但是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却在一些会议上和其他一些场合中，强调对‘八·二〇’存在的问题，在必要的时候，适当的场合，可以讲一讲。还说‘八·二〇’的问题不能混乱。’”

2、接任钟枫的市委书记郭鹏，原任广西军区副政委（文革中支持“广西联指”的军队干部——笔者注），调来桂林后，看到在1977年8月的科局长学习班上，很多人因为对“八·二〇”有些许不同的看法就被批被斗，心中很不舒服，觉察到在市委内部，有一股以曹、曾、伍等为代表的帮派势力，在对自己阵营里的人，也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便在机关整风会上，不点名的批评上述那“几个人”。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了，那“几个人”除了公开说郭鹏“穿上龙袍不像太子”，在郭鹏等人面前又哭又闹外，还拿着会议的简报，直接去区党委向韦国清的接班人告郭鹏的状，此举发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那个韦国清的“亲密战友”，立即批评郭鹏说：“这是什么发扬民主？别人骂了你们市委，也骂了区党委，你还说什么会议开得成功！”据《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组织史资料》对郭鹏问题的记述：

“1978年4月，广西区党委下发14号文件，认为市委书记郭鹏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恰当地提出批‘几个人’的问题，造成一些思想混乱、干扰了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大方向。6月，广西区党委桂干字（1978）23号文免郭鹏中共桂林市委书记、市革委会主任职。（1986年6月……彻底平反）”。

于是，市委中的曹、曾、伍等帮派分子，也在《桂林市两条路线斗争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中，历数了郭鹏的“罪状”：

“市委领导（即指郭鹏——原权威资料注）没有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不把斗争矛头指向‘四人帮’、张雄飞和冯邦瑞一伙，而是把‘几个人’和‘四人帮’联在一起批，颠倒了敌我关系，混淆了不同性质的矛盾。……文化大革命以来，林彪、‘四人帮’对桂林插手早，根子深，流毒广，桂林市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情况错综复杂，但是市委领导对这个问题缺乏足够的认识，没有紧紧抓住批‘四人帮’这个纲，肃清流毒，拨乱反正，因而这条路线的流毒影响还在起作用。……”

郭鹏就在这种状况下，黯然地捲起铺盖走人。1983年有熟人在广州看见他，他告诉说：要去中央排队告状，要求平反。

“张案”到底干了什么“坏事”

我们在1974年至1975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的确干了许多让“韦老爷”咬碎牙骨的“坏事”，具体怎样干的？后来又得了什么“报应”？容后徐徐禀告，现在先讲个大概。

（一）我们写大字报上街、开演讲会、串连发动群众、揭露发生在1968年8月20日的“桂林八·二〇革命行动”。因为这个“八·二〇”，不仅不是“革命行动”，连“反革命行动”可能都比它好些！它是个真正的如日本军国主义、如希特勒法西斯主义那样镇压屠杀人民灭绝人性的行动。这个行动的最高指挥官，就是韦国清上将！

1、首先它背信弃义。《七·三布告》明明写着：“广西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两派群众组织中的坏人，由两派群众各自清理”。“桂林老多”执行《七·三布告》停火交枪，并按地、市革委会及驻军领导小组的《紧急通告》，于1968年8月12日18时之前，上交了武器。然而发《紧急通告》的这三个单位，却把“老多”上交的部分精良武器，武装“桂林联指”和12个县进城的民兵，组织了一万多人美其名曰“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武装。

2、1968年8月20日凌晨，这一万多人的武装及部分驻军，开进“老多”的区域，大肆抓人、打人、杀人。

3、“八·二〇”共抓人数万，仅在桂林第七中学一处，就关人四千以上。

4、“八·二〇”时逢抓必打，因此被打的人数以万计。

5、“八·二〇”乱杀人按官方的统计，共有三百四十五人。

（以上数字不含市辖临桂、灵川二县。如果包括，数字就更吓人了，仅临桂一县，文革中被杀被迫害致死之无辜，据该县整党办权威资料记载，就有两千零五十一人！）这样的“行动”，即便千年前的封建王朝开明君主也会不齿，在二十世纪竟有著名的“共产党人”们赞其为“革命行动”！

因此，我们1974年揭发批判“八·二〇”没错。

（二）“张案”的主要成员，1975年春成立“桂林市工农革命群众执行和捍卫新宪法协会”（简称“捍宪会”，后改为《论坛》，张雄飞任中心组长），并计划成立“革命群众监督委员会”，并制定了总纲和章程，也没错。

1、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

2、我们成立上述组织的目的，是因为韦国清的“王朝”不受党纪国法的任何约束，更不受群众的任何监督，他们六十年代乱抓人、乱斗人、乱杀人；七十年代他们的“文革功臣”，又利用手中的权力，大搞特殊化、走后门、以权谋私

等等不正之风。我们根据《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权利，成立群众组织来监督他们，有什么错？

（三）说我们策划“南北夹击，四处冒烟”，企图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实行“乱中夺权”。这也没错呀，对于韦国清那种靠血腥镇压人民群众建立起来的“人民政权革委会”，难道不应该推翻吗？他手中那个可以乱杀人的权力，如果能夺过来，交给不乱杀人的人，总比他韦国清好些吧？广西人民是有骨气的，即使当时的“张案”成员不出来，也会有“李案”、“王案”的成员出来和他们作毫不妥协的斗争，也会千方百计地夺掉他们手中那个镇压老百姓的权力！

（四）说“张案”成员“疯狂反对和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主要根据是龚志明的“罪状”。这恐怕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把精神病患者也当作罪犯的案例。因为龚志明在1970年“清查5·16分子”的运动中，就被桂林机务段的专案组用刑讯逼供逼得患了精神病，平日里时好时坏，好的时候什么都明白，发作的时候，就乱说乱写，他是在这种状况下，写了一些反对毛主席的东西。但这能算数吗？这能算犯法吗？他竟因此被桂林法院判了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五）说“张案”成员“诽谤敬爱的周总理”。

这条“罪状”归我，因为我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确实讲过“我认为这次运动是周总理错误路线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斗争，周恩来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错误代表”。我首先说明，我对周总理的为人，从来都是敬仰的，但当时认为个人风范与路线斗争是两码事，所以就那样说了。但我对周总理的这些议论，即使用从前的标准，充其量不过是认识上的错误而已，哪谈得上犯罪？

（六）说“张案”成员“吹捧‘四人帮’王张江姚”，“向王张江姚告黑状”。

1、关于“吹捧‘四人帮’”这条罪状，建议韦国清的在天之灵还是不要追究为好，小心以后档案解密！

2、关于“告黑状”，当时如果换了王洪文或者江青来当韦国清，换了韦国清去当王洪文或者江青，我们照样会向韦国清告王洪文或者江青的“黑状”，因为广西文革太惨无人道了！还有，你韦国清在文革期间，敢说没向“王洪文副主席江青同志”写过报告汇报过广西的文革情况吗？敢说在1974年至1976年，不向“四人帮”告“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的状吗？不说别的，就拿1974年广西按江青的指示，批“广西三个小丑”（注）来讲，你韦国清不正是“江青指示”的主要执行者吗？

（注）1974年8月，广西军区副政委、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许圣亭副部长张乃建和区文化局副局长江滨，对样板戏有意见，提出批评，被江青指责为“四个仇视”的“三个小丑”。江青和韦国清一起看样板戏时，出示她的批语。韦回到南宁，在朝阳广场大会批、在单位小会斗，又审查，搞得许、张、江“体无完肤”一无是处，直至1982年才得平反。——笔者引自龙廷驹文《驳[韦国清上将主政广西二十年]一书》

《桂林晚报》为什么不敢回顾这个大冤案

《桂林晚报》为加罪于“老多”，既然津津乐道把70年代的事移到1967年去写；那么，人们要问：你们为什么在70年代中末期长期震动全广西社会的“张案”这样的大事，反而回避不写呢？

小偷最害怕再去他偷过东西的地方，杀人犯最害怕去他作过案的现场，广西的“文革英雄”们最害怕的，是别人再说他们作过的孽！

《桂林晚报》在位的某些文人，自然不是“文革英雄”，因为那时他们要不

还是少先队员，就是还没出世。那么，他们的广西文革是非观，他们对广西文革历史的倾向性，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不是年纪决定的呢？

年纪不能说明广西文革是非观问题，其他因素也不能说明，能说明广西文革是非观的，是他们的政治立场和由此而产生的政治倾向性，以及他们的社会关系和文人的良心。

他们也不是对广西文革不知情，他们很知道这段历史，只是由于政治社会因素，让他们不想说真话，不敢说真话。

究其根本原因，是目前在广西，“韦国清正确路线”的阴魂还没散尽，“韦国清王朝”台下还有遗老，台上还有遗少，尤其是“那几个韦国清分子”，总想翻广西文化大革命的案，算他们被历史所否定的账，以洗刷自己的罪恶，所以对他们在文革中所干过的坏事，能淡化就淡化，能回避就回避，能掩盖就掩盖，能歪曲就歪曲，能捏造就捏造，总之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实在懒不了的，就少说，或者云天雾地的说得你一头露水不知他讲的是什麼？

这股政治势力，是只看不见的手，《桂林晚报》及那两位记者，因被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所操纵，所以才对发生在桂林市的“张雄飞和桂林几个反革命分子案”这样的大事，视而不见。

不过，说句公道话，做这种“买卖”的，并非《桂林晚报》独此一家，还有更有来头的《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组织史资料》和《桂林市志》，这两部洋洋千万言的大部头，也是对“张雄飞和桂林几个反革命分子案”，只记了寥寥几十个含糊其辞的文字。

真是“一统天下”呀！

2010年3月21日

韦国清广西罪行录

2011-6-13 张雄飞的博客

说明：我注意到了有年青朋友，很想了解广西文革到底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我们这些行将就木的过来人，且不说别的大道理，仅从道义上，就应该把真实的、不是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编造的情况，尽可能地告诉他们，相信他们会从中总结出积极的历史经验，推动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以使国家更强盛人民更富裕。所以我愿把多年收集到的资料，提供给他们参考。

关于桂林文革的历史，我想从两方面为年青的朋友们发帖：一是自己掌握的资料，二是自己所经历过的事情。

顺便提醒朋友们注意一个事实：在这“军政史诗”版上，有些“国军”和“民主斗士”，拼命对我“追杀”，包括把“大字报”贴到我邮箱及博客上去。他们造谣说我是“桂林造反派的头头血债累累”，所以我想请朋友们注意一下，从下面的史料中，有没有“造反派头头张雄飞”的名字？那些血债累累的，都是哪个派别的人？

桂林市“八·二〇”行动

六八年八月初，广州军区在湖南衡山开了会，会议由黄永胜主持，广西军区吴华、桂林市人武部陈秉德、警司的景伯承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是落实“七·三”布告，研究要出动军队，武装解放据点问题。

八月十七日，桂林军分区司令员景伯承在桂林步校主持召开了各县武斗民兵团负责人及县武装部第一把手会议。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吴华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他说：“桂林问题肯定要解决。一小撮阶级敌人一定要搞干净。贯彻‘七·三’布告抓两个关键：1、收缴武器。2、清理外地人员，对抗拒不交武器的要采取军事行动强行收缴”。桂林军分区政委慕石起也讲了话，他说：“你们(指各县武斗人员)来桂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有很大的贡献，坏人、坏头头、走资派、叛徒一个也跑不了”。八月十九日在“一〇四”驻地景伯承、慕石起主持召开了十二县武斗民兵团负责人会议，具体布置了“八·二〇”行动，一〇四部队康凝副政委、地区革委常委张牧田等参加了会议。

八月二十日，以桂林地、市革委会和桂林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联合署名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中央七·三布告的公告》(简称“八·二〇”公告)，借口以解除武斗据点、收缴武器、清理外来人员，组织大规模行动。行动前，收缴了“造反大军”的武器，绝大多数武斗据点已经解除，为对付“造反大军”，由市革委将“联指”武斗人员为主体组编了二千多人的“工人纠察队”(十月底一部分“工纠”改为城区人民纠察队)配备半自动等武器，纠察队主要负责人有市人武部科长王永清，工交部武装科干部郑国安等。“工纠”武装人员、各县武斗人员，其它“联指”成员以及

反戈一击的“造反大军”部分成员等共一万多人组编为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于八月二十日凌晨，进驻“造反大军”控制的地区，实行大规模的搜捕。从八月二十日开始，接连好几天，除从据点抓人外，各单位“联指”也分别自行抓人。因“八·二〇”这个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行动，导致以后一段时间被抓、被打、被杀、被抄家、被错批错斗者约万余人。

八月二十九日，市人武部政委、市革委会副主任陈秉德在工人电影院召开的一次市直机关干部大会上公开号召全市人民行动起来，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刮十二级台风。

八月三十日举行了全市性的大游斗。

九月一日师院先后游斗了崔毅、周兆祥、谢荣杰、杨福庭、甘恒彩、李日明、黄沃南等院领导及不同观点的头头。

九月一日至二十日，市革委会、师院驻军对地市“造反大军”中的邓铁桥、许瑞林、鲁鹤松、于文杰、张树枝、余有壬、邓井发(专署农委干部)、诸葛军(专署外贸局干部)等十二人以混进群众组织里的“阶级敌人”罪名，在师院进行“活人展览”。

九月二日，“联指”市直机关“七·一”总部，对市直机关不同观点的另一派头头、群众和一些领导干部进行全市游斗。被游斗的有许正义(市监委副书记)、邵永清(监委委员)、王仁武(经委副主任)、蓝守贞(财政局长)、李新(市税务局长)、崔耀华(市财办副主任)、郭文刚(文化局副局长)等一百多人。以各种罪名，戴高帽、挂黑牌、反手捆绑，先是跪在盐业站院内，不少人被打，然后押上汽车，由“工纠”武装看押，沿街游斗，游斗途中许多同志被观看的所谓“革命群众”打得头破血流，鼻青脸肿，有的被打伤致残。

九月三日，广西著名演员黄婉秋被文艺界“联指”押至十字街，脖挂破鞋，身披麻袋，跪在烈日下进行围斗，遭非人性侮辱。

九月二十七日，地、市革委会在市体育场批斗了王同连、许正义、杨德华、吴腾芳、王祝光、陈基义、陆文中、崔耀华等一大批领导和另一派群众组织头头，给他们挂上“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坏头头”、“反革命”、“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反共老手”、“三反份子”、“国民党残渣余孽”、“牛鬼蛇神”、“翻天右派”、“地主分子”、“地主仔”、“资本家”、“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小爬虫”、“政治爬手”、“黑手”、“黑后台”、“黑高参”、“黑干将”、“牛鬼蛇神总后台”、“反革命两面派”、“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杀害贫下中农的刽子手”，等各种罪名黑牌。

由“八·二〇”行动引起的抓、抄、游斗风持续一个多月，“八·二〇”以后，不仅搞了几次全市性的大游斗和批斗会，各系统、各单位也纷纷组织游斗和批斗会，有的人在游斗、批斗中被打伤致残或打死。如染织厂副厂长陈华、市体委教练汪成竹就是八月三十日的全市性游斗时被活活打死。

九月四日，专区食品公司游斗车开到北门食杂仓库门口时遇上兴安县“卫革指挥部”组织来桂收尸(武斗时被打死的)的一伙人，他们不问情由，手持棍棒、石头、鞋子等物，爬上汽车，乱打乱砸被游斗的同志，并边打边喊：“打死这些国民党残渣余孽”，“为亲人报仇”，“推下车打”，此时，兴安中学学生蒋孝生手持“五四”式手枪，朝着被推下车的游斗对象连续开枪射击，直至打完弹夹内七发子弹为止，将被游斗的“造反大军”成员林伟(公司业务员)、张少钧(统计员)、苏秋枫、王修澡(业务员)、马洪光(物价员)、黎光录(统计员)六人杀害。

凶手蒋孝生，当时二十岁，广西灵川县甘棠公社灵保大队元村人，一九七〇年应征入伍，一九七一年一月，因“文革”杀人问题暴露提前退役。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入党，后被提为灵保大队党支部书记、大队长。

九月十三日下午，市二建二〇一工区在乐群小学操场召开批斗大会，会议由“联指”头头李良佑(工区工人)主持，阳春辉(工区工人)宣布了肖菊生、锁成林、段辉余、李元禄、胡际生、粟定芬(均系该工区工人)等人的所谓“罪行”材

料，然后由该公司武斗人员李友和(人保干部)、黄广依、

韦锦沅、王日光、许汉生(均系工人)，将肖菊生等六人押到染织厂门口桥边，由韦锦沅、李友和、李元禄等枪杀了。王日光完成了维持杀人现场秩序后，还对六具尸体补了枪。

九月十五日，为纪念“白沙事件”一周年，雁山“联指”头头秦宗德(雁山机械厂工人，雁山地区“联指”总指挥)、文华钧(植物研究所研究实习生、“联指”宣传部长)、莫志文(雁山公社秘书、“联指”副总指挥)、李国荣(公社兽医站长、雁山“联指”总部常委)等人策划，经请示万春桥(雁山公社武装部长)同意，召开批斗会，会后在雁山农科所路口南侧集体枪杀了“造反大军”成员吴全仲(植物研究所食堂管理员)、腾秀山(植物研究所技术员)、马崇义(植物研究所研究实习员)、秦继诚(植物研究所工人)、孔庆柳(师院学生)、白胜山(桂林地区劳动大学学生)六人。

九月中旬的一天上午，雁山公社兴隆、罗安、枫林三个大队联合在良丰农场二队大草坪召开批斗大会，以熊德喜、熊绍海、秦税次、黎六弟、秦贵保、熊税喜、秦天忠(均为农民)、熊詹月(地主)九人参加“反共救国团”为由，决定对他们枪杀，另外还决定枪杀罗安大队的葛新荣(家庭出身地主)。会上秦贱贵(兴隆大队支部书记)，葛连才(罗安大队支部书记)先后讲了话，尔后，由良丰农场机务科副科长齐秀贵和刘双发、刘春成、葛石保、葛秋生等(均为罗安大队民兵)，在良丰农场二队猪场旁边，对以上十人执行枪杀。

据市革委会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向自治区的汇报中说：从“八·二〇”到“九·二〇”的一个月内，被当时的所谓群众专政，打死九十多人。据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调查统计，“八·二〇”以后至六八年底，被乱抓乱杀死一百六十人，批斗游斗死九十四人，自杀九十一人，总计为三百

四十五人。至于各单位私设“公堂”，随意关押、拷打、批斗这种现象就延续得更长。

“八·二〇”以来，市革委中“造反大军”的二十二名委员，有十九名被抓，而“联指”的委员，不论是策划和直接参与武斗，还是枪杀过人，不仅不追究，反以执行正确路线，保卫红色政权和“八·二〇”行动有功加官晋级。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八年十月间，市委、市革委的主要负责人虽

然多次更换，但“联指”头头曾明轩、曹铁军、伍华春等，长期担任市革委和市委要职，极力支持和依靠“联指”而被结合的某些领导干部一直被安排要职予以重用。

临桂县大屠杀

1968年5月下旬，各公社都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县武装部政委龙凤山、部长詹佩喜、副部长刘顺卿等人，以“抓革命、促生产”名义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公社革委常委以上干部和县直机关单位革命领导小组负责人及“联指”一派的头头。会议布署：大抓阶级斗争，大刮十二级台风，在农村和机关开展“七清”。龙凤山在会上说：“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第一条任务就是要抓阶级斗争，主动地、不停地向阶级敌人发起进攻，将他们一网打尽”。龙凤山还讲了开展“七清”的内容：“一清查打砸抢抄抓杀的违法活动；二清查混进群众组织暗藏的阶级敌人；三清查投机倒把和搞五风(嫖、赌、抢、偷、单干)的为首分子；四清查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的翻案活动；五清查国家和集体单位中的贪污盗窃分子；六清查和收缴武器；七清查外来人员，有严重问题的要扣

押上交”。会后，各公社都成立了“保卫革命委员会指挥部”，组织“民兵”进驻公社、大队，开始刮起了杀人台风，陆续不断地有一批又一批的无辜群众、干部、学生，被强加上“反共救国军”“暗杀队”等等莫须有的罪名，戴上阶级敌人的帽子，惨死在“三保卫”“七清”的屠刀下，躺倒在“群众专政”的血泊之中。在这段时间，南边山公社有莫光华等 18 人，六塘公社“农总”头头白先玉等 13 人，庙岭公社水口大队社员文接风，茶洞公社花岭大队抗美援朝志愿军复员军人李平和社员褚火连、褚兆福等等分别在各地惨遭杀害。

1968 年 6 月上旬末，桂林军分区调动桂林地区十二个县的武装民兵包围了桂林市，支持“联指”，以保卫红色政权的名义攻击“4·22”。我县武装部按照军分区的命令，组织武装部人员分头到各公社调动民兵进城，分配庙岭公社的民兵驻守阳桥、四塘、五通公社的民兵驻守文昌桥、会仙公社的民兵驻守桂林市人民医院、滨江大道一带，黄沙公社的民兵驻守象鼻山下，六塘公社、六塘镇的民兵驻守象鼻山下面一带河边，县直机关“联指”武装人员加强在桂林市人民医院、象鼻山一带防守。前线指挥部设在舍利塔旁原财政局内，后勤部设在麻袋厂。阳桥以北至北门以南的桂林市中心区域为“4·22”所占据的地区，指挥部设在广西师院内。双方以榕湖、杉湖为界对峙，互相越界进攻达十余次之多，使用的武器有装甲车、机关炮、迫击炮、轻重机枪、冲锋枪、新式步枪、手枪、手榴弹、炸药包等等。县一些当权派也积极参加了武斗的活动。如代县长陈裕修到县农机厂督促修理武器，副县长唐申元参加到兴安夺枪。在此期间各公社到桂林参加武斗的民兵还从本公社抓一些不同观点的群众到桂林杀害，仅保宁公社就在象鼻山河杀了廖振军、莫喜三等五人(详见一九六八年民兵进城武斗事件调查材料)。

1968 年 6 月上旬的一天，县“联指”的“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正副总指挥胥明德、韦英豪、唐秀明及常委邓子友、覃毓芳等人。开会分析民兵进城后的形势，研究将来抓住“4·22”的人如何处理的问题。首先他们决定杀人由总部集体负责，然后他们根据龙凤山指示“七清”的要求，确定了四条原则：一、公开支持“4·22”的走资派；二、“4·22”战斗队长以上的骨干分子；三、地富反坏右家庭出身这次站错队又跳得起的分子；四、历史上犯过错误受过处分这次又跳出来闹翻案冲得起的分子，这些都要镇压(杀)。会后由韦英豪主持召开“联指”战斗队长会议传达，并确定总部成员各自负责审查自己所在战线各单位上报要杀的人员名单(详见胥明德供词)。1968 年 6 月 6 日四塘公社“4·22”毛斌带领四塘中学部份学生到公社革委会，要求放出六月五日公社革委抓去的梁心衍(县粮食局副局长)，与进驻公社的武装民兵发生武力冲突，民兵用步枪朝大门射击，“4·22”这边也投了四枚土造手榴弹，打死围观群众廖家德(小学生)，社员廖来弟，“4·22”未能冲进公社革委会，只好撤退。

1968 年 6 月 12 日县“联指”韦英豪带领曲志贤、以瑞芳、李广忠(教育局干部)等武装人员到会仙公社，把正在七星大队抓生产的县委副书记李瑾科押到桂林麻袋厂关押。经过胥明德、邓子友、唐秀明等人的策划，于六月十五日晚，由胥明德指挥以瑞芳、蒋生柱等人以及六塘的一部份民兵，把李瑾科、谢崇晋(县农业局干部)、李明久(六塘“农总”头头)、彭昌林(四塘中学学生)从麻袋厂绑架到象鼻山河边，由胥明德等人将他们手脚捆紧，推入漓江淹死，李瑾科还被蒋生柱用马刀砍了数刀后推入漓江淹死(详见胥明德供词、秦良宣、蒋生柱证词)。

1968 年 6 月 17 日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发布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军广西分团”的公告，县人武部和“县三保卫指挥部”把我县“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些事件当作“反共救国团”的活动和罪行，把部份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看成

是反共救国团的成员。后来，全县被强加上反共救国团骨干分子的罪名而惨遭杀害的有 234 人。

1968 年 6 月 23 日，县武装部龙凤山带领石焕光(县武装部政工科副科长)、秦旋(县武装部管理员)到五通公社煽动杀人。龙凤山在机关干部民兵大会上说：“对阶级敌人，不能手软；要稳准狠地打击他们，刮八级十级台风不行，要刮十二级才行！”这时龙凤山的一个随从人员插话说：“六塘的民兵很勇敢，已经镇压了好几个牛鬼蛇神，大长了人民群众的志气，大灭阶级敌人的威风”。龙凤山接着说：“五通的条件比六塘好，只要公社、大队组织起来，阶级敌人一个也跑不掉，要摸准一个揍他一个”。讲到揍他一个时，龙凤山还作了一个手势，他伸出右手，母指竖起，食指伸直，其余三指勾住作手枪状。龙凤山还说：“搞阶级斗争哪有不死人的，上面讲现在死人还不算多，现在死这么一点人，没有过去一个战役死的人多，还比不上一场瘟疫病。为了革命，死几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现在问题大的是怕没有造反派的那种冲杀劲，有没有冲杀劲，就是这场革命的标志”。在龙凤山的煽动下，五通“保革指挥部”决定六月二十九日墟日开群众大会，先拿从上海下放为的药剂师丁志瑜(过去曾被划成右派)开刀。并提出要杀害的李秀亮、于仁龙、肖德旺、董勋等 14 人，除董勋逃脱外，其余 13 人均先后被杀害(详见金子俊 1982 年 5 月 30 日证词)。

1968 年 6 月 27 日，蒋善忠从永福经过两江时被守卡民兵扣押，县“联指”宣传部于 6 月 28 日发出传单说：“阶级异己分子蒋善忠自投落网”说“罪恶累累的蒋善忠将寿终正寝”。

1968 年 6 月 30 日，龙凤山到保宁公社，在公社召开的“七清”三级干部会议上放火加温说：“在‘七清’对阶级敌人刮十二级的台风中，由群众决定，群众要如何处理就如何处理，对坏人打死了就打死了，杀就杀了，这是群众的事，我们不要害怕，不要干涉，不要泼冷水”。在龙凤山的煽动督促下，公社在七月十日召开大会枪杀了上祥大队社员周树保、卢英功。事后，龙凤山又到两江放火，要公社开大会压邪气，还特地交待说：“这个大会，我在这里，你们不要开，我走后你们想怎么开就怎么开”(详见罗传琦、雷金生证词及两江“处遗”汇报材料)。

1968 年 7 月 2 日，两江公社在彭土养(公社主任)的主持下，在两江车站旁边岭坡上召开万人大会，枪杀了两江供销社副主任肖育华、山口大队社员廖大桥、宝山大队地主仔李怀秀等三人(见 007 卷 4 页)。

1968 年 7 月 3 日，县“联指”派人跟随桂林“联指”到兴安抢枪，副县长唐申元自告奋勇给抢枪“联指”带路。

1968 年 7 月 3 日，中央发布了解决广西问题的布告(简称“七·三”布告)。这个布告根据广西革筹小组的汇报把一派群众组织的错误行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提出两派都是群众组织，停止武斗，撤除据点，混进两派群众组织的坏人两派各自进行清理。

1968 年 7 月 3 日，县“联指”胥明德又指挥李广忠、秦良宣、贾伦传等人将蒋善忠(县工交办主任)、卢定宣(县林业局副局长)、刘一峰(县供销社教导员)、李源森(县农业局干部)等四人，从麻袋厂绑架到象鼻山河边，用棍棒、手榴弹打昏后推入漓江淹死(详见胥明德供词)。

1968 年 7 月 8 日—7 月 10 日，龙凤山、刘顺卿、詹佩喜等人，在县召开了各公社主任、武装部长会议，汇报总结“七清”，布置搞“三查”，向“阶级敌人”刮起更大的台风。会议先由各公社汇报六月份开展“七清”运动的情况，会上六

塘、南边山、茶洞三个公社作了较为全面的汇报。

重汇报了他们采用大宣传、大斗争、大游斗的经验，说他们搞了一个被红卫兵“兵管”遭到打砸抢严重破坏的六塘中学现场展览会，打击了几个重点分子，进行分化瓦解，出现父送子、兄送弟投案自首的现象，并讲他们已经杀了十三人。

南边山汇报开展“七清”后，破获了以“农总”主要成员为主的反革命纠合案，约有五十多人，他们和机关单位的坏头头相勾结，想搞垮革委会，这些人成份复杂。讲他们已经杀了十八人。现在社员开会积极了，再没有人敢搞盗窃、赌博，也没有人敢进山乱砍乱伐了。朗联大队原来闹分队，杀了“农总”头头莫光华后，现在已经又合起来了。

茶洞公社汇报他们破获了一件“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军茶洞地区第一分队”的“反革命纠合案”，抓了十一人。

在汇报中也反映出有一部份公社革委会主任担心这样搞下去会重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怕杀人多了以后追查起来负不了责任。针对这个问题，龙凤山在会议总结中特别提出要肯定成绩，认为前段运动存在的问题：一是运动发展不平衡，一些单位落后的原因，主要是对这场阶级斗争认识不足；二是政策和策略掌握不够好，把这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简单化了，急急忙忙地把人杀了，使一些线索中断，不利于一网打尽，这个问题不能向群众泼冷水！罪大恶极的不杀不好，但杀人多了也不利于团结，要留一些活靶子，当反面教员。

针对存在问题，他提出：“首先要求各级领导正确认识当前这场斗争的性质，弄清楚这样搞下去到底是毛主席革命路线还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说：“我们开展‘七清’运动是根据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提出来的，是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战略措施。“七清”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决不是什么两派的斗争，我们搞“七清”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绝不是什么镇压群众的反动路线。只有这样认识才能全心全意地领导好这场运动。他说：“我们这场运动是对准一小撮走资派，对准叛徒特务，对准不服从管制的地、富、反、坏、右，对准国民党两的残渣余孽，矛头指向这些阶级敌人，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矛头指向群众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龙凤山在讲话中要求把“七清”集中为“三查”，刮更大的十二级台风。龙凤山布置说：“三查”即：一查走资派的幕后活动；二查叛徒特务；三查阶级敌人牛鬼蛇神的活动。具体方法：1、收缴武器搞展览；2、把搞出来的材料进行整理，有系统的向群众宣传；3、大造声势，召开大斗争大批判会，4、发动民兵到后进地方去搞大串连；5、摸准后，群众还不起来，可以把石头搬掉；6、利用一切宣传工具宣传中央（“七.三”布告）的精神。龙凤山在会上还批评了前段行动较慢的黄沙、会仙等公社。会后，刘顺卿特地找黄沙公社在桂林参加武斗的武装部长风有桂，要风有桂从桂林带十来个精干的民兵回去，限期打开局面，否则要犯政治性错误。此次会议后，各公社不断地开大会杀人，县武装部也派出武装部的人员同县“联指”人员分别到各公社参加杀人大会，各公社杀人大会上都是先宣读中央关于解决广西问题的“七.三”布告，然后进行杀人（见茶洞公社1968年会议记录和祝家才笔记本，风有桂证词）。

1968年7月7日，渡头公社覃日飞（公社主任），陈全辉（副主任、武装部长）带领民兵包围栗村“4·22”派“农总”的据点，到13日攻下据点，抓获周德晃、粟新生等10人。7月14日，在栗村召开群众大会，枪杀了栗村社员粟亮梅、粟金福等三人。

1968年7月15日，茶洞公社在现在的食品组对门的岭坡上召开大会，银

发忠主持会议，廖世权(武装部长)讲话，廖火桥宣读被害人银可英、周国祥、梁个生、龙冬成、褚田生、梁田妹、吴水林的罪状后，由“民兵”将这七人杀害(详见银可英等人死亡结案报告)。

1968年7月16日，庙头(今庙岭乡)召开大会，梁承光主持会议并宣读“七.三”布告，李庭康讲话后，由被害人所在单位的“代表”各自宣读被害人宋振治、朱黑子、朱全保、栗跃文、李矮子、阳称保、唐树生的所谓“罪状”后，公社“保革”指挥部成员、公社秘书刘正哲大声问会场群众，这七个人该怎么办?群众呼喊“该杀”!刘正哲叫唐保胜安排民兵将七人推出会场，在公路旁的岭上开枪打死(详见宋振治等七人死亡结案报告)。

1968年7月16日—7月18日，县“联指”“三保卫”指挥部(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革命委员会)出面，召开各公社“保革”指挥部负责人紧急会议，韦英豪在会上布置说：“我们这次行动，开门见山地说，就是把“4·22”中的主要骨干分子和把各公社大队‘七清’‘三查’中清理出来的四类分子、国民党残渣余孽和其他危险分子，刮他一次十二级台风”。胥明德也布置说：“这次行动是清理社会上一切牛鬼蛇神，具体对象是：一是对立面的主要头头和一切有民愤的对立面骨干分子；二是还有活动能力还没改造好的四类分子；三是对现实不满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子女；四是机关学校企业单位中国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伪军政人员和历史上有问题搞不清楚的人”。会后各公社回去贯彻，以“群众专政”的名义，又把公开大规模杀人推向高潮(详见刘副林、秦志文、秦良宣、崔树元、陈荣初等人的证词)。

1968年7月22日，四塘公社召开万人大会，蒋运发(公社武装部长)主持会议，袁书勤(公社主任)讲话，宣讲“七.三”布告，大抓阶级斗争，会议进行到一半，武装人员就将覃雨林、廖龙寿、龙才息、周顺弟、龙运赏等八人拉出会场杀害(详见覃雨林等人死亡结案报告)。

在同一天，庙头公社革委常委梁承光带领民兵到独秀峰大队督促大队杀了苏三喜等三人。八月中旬又带民兵到秧塘枪杀了杨炳兰等六人。八月十三日又到二塘大队杀了苏桥生、阳冬副、陈发息、黄乔金、李全海五人(详见苏三喜、杨炳兰、陈发息死亡结案报告)。

1968年7月20日，两江公社在墟场召开万人大会，银为斌主持，彭土养讲话，李实强宣读了被害人秦克纯、李有小、刘玉成、秦守钊等四十一人罪状，由匡国柱、李运华指挥“民兵”在两江小学厕所旁和老鼠钻仑(地名)分别将这四十人杀害(详见秦克纯等四十一人结案报告)。

1968年7月23日，渡头公社革委和“保革指挥部”召开大队支书、大队长、“七清”领导小组长会议。会议由陈全辉主持，徐天寿介绍两江在7月20日公开枪杀四十一人的“盛况”后，要求各大队汇报“4·22”骨干以及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的活动情况，报要处决人员的名单和罪恶材料，决定7月24日开誓师大会。当晚(7月23日)陈全辉和覃日飞召集徐天寿、周业光、黄永光等“保革指挥部”成员审查、决定了在誓师大会上要刮台风的人员名单。7月24日，在栗村大队的长岭上召开大会，陈全辉任总指挥，周业光主持，徐天寿宣读了被害人粟桥生、粟冬弟、粟新生、粟大三、粟秋苟、徐霭平、徐宝森、周成光、周德录、廖竟业、刘刚斌、王志明、卢邦伍、卢生保、粟生、李家元、徐曾寿等十九人的罪状，由黄永光安排“民兵”执行枪杀。其中：廖竟业等四人是在会场旁边的菜地上打死的，其余十五人是用汽车运到老墟杀害。这一天谢家大队在到公社开会途中还枪杀了二人(见粟天才等二十一人死亡结案报告)。

1968年7月24日，县武装民兵团召开了全面落实中央。“七·三”布告誓师大会，县武装部副部长刘顺卿在会上大讲“七清”、“三查”刮台风的成绩，并讲：“在杀人问题上，我们只能搞阶级报复，不能搞私人报复，什么是阶级敌人？“三查”已经讲得很清楚，就是走资派、叛徒黑手，我们打击的锋芒，一定要稳准狠地指向阶级敌人”。会后还派人分头到各公社传达这个讲话的精神。刘顺卿的这些讲话，为后来大肆屠杀无辜群众，起了推波助浪的作用。

1968年7月25日，县“保革”指挥部向全县工人、贫下中农、干部、学生发布《关于坚决贯彻、誓死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七月十八日批示，全面落实中央“七·三”布告总动员令》，提出了以“七·三”布告为武器，更加深入地开展“一批三查”，更好地向阶级敌人发起更加猛烈的进攻。同时还翻印发出与他们《总动员令》内容相同的桂林专区革命委员会七月二十一日公告。

1968年7月24日，南边山公社在车站梨子园召开万人大会。林志忠主持，吴殿龙作报告，张崇德宣读石钟纪、黄联辉、银发璋、陈慕文等十六人所谓罪恶材料，然后由莫才刚指挥民兵将陈慕文等十六人押到朗联大队三角地(地名)杀害(详见陈慕文等十六人死亡结案报告)。

1968年7月26日，六塘公社召开万人大会，鸣枪二十响后，石继唐(公社革委主任)宣读“七·三”布告，廖家祥(民兵团政委)宣读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三忠于”信，会上“联指”代表秦志文、镇革委代表、工人、贫下中农、学生、教师代表作了发言后，由廖家祥宣读了被害人唐四生、胡敦秀、张有才、翁守约、翁善可、张开宏、白野、白月秋、海绍兴、杨俸先、郭荣钧、诸葛高、李世纯、滕建德、滕茂清、李正斌、李日亮、周义才、李贱荣、邱水渭、李永荣二十一人所谓的罪恶材料，然后用汽车将以上二十一人押运到六塘墟北面翁家塘(地名)杀害(详见杨俸先、海绍兴等二十一人死亡结案报告)。

1968年7月27日，会仙公社在会仙中学大礼堂召开大会，全貽斌主持，张国良讲话，宣读“七·三”布告，刘副林传达县总部紧急会议精神，秦新胜宣读了被害人张群英、兰雪英、陶培英、廖乔松、李文喜、张国威、蒋小弟、蒋祖祯、龙猪仔、李振荣、莫世聪、吕祖旺、秦大悦、刘枝玉、龙凤生、吕六发、秦保生、石来喜、蒋祖相、秦天然共二十人的所谓罪状，宣布完后由执行“民兵”秦继忠、白云姣、李社苟等二十人押往牛行上(地名)全部枪杀(详见会仙乡关于张群英等二十人死亡结案报告)。

1968年7月30日，茶洞公社副主任彭忠才带领“民兵”到仁义大队界底村召开批斗会，仁义的徐乔生(支书)主持，彭忠才讲话，蒙老火(仁义治保主任)、梁焕兴(温良支书)先后宣读了被害人李福全、周老乔、彭水成、梁老征、李必信、蒙维勤、姚老征、梁大升八人的“罪状”，然后全部枪杀(温良大队在会前还召开了生产队两委会，宣布处理人、员名单，大小队干帮、贫协都表示同意，并签了名)。(详见茶洞乡李必信、李福全等八人死亡结案报告)。

1968年8月3日，宛田公社召开批斗杀人大会，会前李志武(公社革委主任、武装部长)召集社直各单位负责人，派头头朱明光、杨光华、蒋吉贵等人作了研究和布置，决定批斗枪杀李光烈、石旺德、于宝鼎、于春华、于老庆、于安庆、阳万春、孙业强、秦剑新、蒋崇清、曾凡远、李洲田等十二人。大会由朱明光主持，谢茂林宣布孙业强、蒋崇清等五个国家干部的“罪状”，于景山宣布于春华、阳万春等七人罪状，蒋吉贵安排“民兵”执行枪杀(详见孙业强等十二人死亡结案报告)。

1968年8月4日，临桂县民兵团向地、市“造反大军”发出声明：必须交

出我县“阶级敌人”秦乔苟、黎运钊、谢务咎、唐家副、胡本庆、曾昭悦、阳守基、卢永芳、张兆祥、龙炎运、阳武胜、朱玉林、黄国杰、张云高、李开旺、海鸥、。阳彬林、刘老贱、蒋小光、王振庭、申柏球、王保林、陈树保、覃明元、李季有。在这二十五人中除张兆祥、申柏球、覃明元幸免于难外，其余二十二人均在“八·二〇”以后惨遭杀害。

1968年8月7日，县武装部以龙政委指示的名义给各公社发了一个电话通知。说：“对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要支持，现在是贫下中农帮助解决问题的时候了，要支持贫下中农，不要怕乱，乱杀人要防止，但不要急刹车，不要泼冷水，对过急行动，不要当面指责，不要影响发动群众……。”(见蒋运发记录本)

1968年8月17日，桂林军分区在一〇四部队召开各县民兵团长、县武装部负责人会议，部署进入“4·22”派据点，强行收缴武器的问题。军分区政委慕石启在会上讲了话，说：广西形势大好，南宁抓了八千多人，桂林也要象南宁一样，桂林的问题一定要解决，桂林是贫下中农的天下，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今后转入政治斗争，现在是收缴武器清理外地人员，各地要成立纠察队，对外地人员一个个地清理，牺牲同志的家属要照顾安排好，桂林不是一般的武斗，而是激烈的阶级斗争。会后，县武装部和民兵团作具体布署和分工。

1968年8月20日，桂林地、市革委会发出贯彻执行中央“七·三”布告的《公告》。原桂林军分区调来的桂林地区十二个县的武装民兵仍在桂林“4·22”据点外围固守。这天，在桂林警备区和桂林市革命委员会支下，以部队出面，桂林地、市县“联指”武装人更配合，以贯彻执行党中央“七·三”布告为名；进入“4·22”据点，强行收缴武器。我县武装部和九九分队除留值班外，由部长詹佩喜，刘顺卿等人带队进入阳桥以北的据点收缴武器，大肆抓人。我县仅被抓到军管会关的四十余人中，除少数释放和周德生一人在杀场死里逃生外，大部分被杀害。当时就被枪杀和未经关押被杀的人数无从统计(见陈荣初，蒋作倡证词)。

1968年8月21日，县“保革”总部正副指挥长韦英豪、胥明德在县卫生局召开了有总部成员、县直各单位“联指”战斗队长参加的会议，研究和部署处理在押人员。决定从据点清理出来的人分三种情况进行处理。凡是“4·22”战斗队以上的骨干、国民党残渣余孽、家庭出身不好，本人又站错队，冲杀得起的，都要刮十二级台风(杀掉)。“4·22”总部成员由总部负责完善手续(杀掉)。战斗队以下，认为也应该杀掉的，要先报总部审批；二凡是不属上属人员，但又冲得起，比起上述人员又好一点的人，就送军管会关押起来；三对一般不大起作用的就尽量放出去抓革命促生产，但也要和群众商量决定(见莫增克、李广忠证词)。

1968年8月23日晚上，由“联指”胥明德指挥带领邓子友、李广忠、黎寿息、贲伦传、苏泽沛、廖瑞祥、廖显朝、秦丙未等十多名武装人员，将关押在麻袋厂的熊和钧、王福才、粟德钧、谢渊太、莫锡发、韦新亨、谢大朝、黄惠芬、邓惠萍(蒋善忠之妻)共九人绑架到秧塘飞机场杀害(详见胥明德案卷)。

1968年8月26日，成立临桂县革命委会，县革委有委员共五十二人，以龙凤山、詹佩喜、刘顺卿、唐申元(副县长)、蒋明光(县监委书记)、曲志贤(财办主任)、周建民、何奇舜(茶洞公社书记)、石继唐(六塘公社书记)、杨光华(宛田公社书记)、韦英豪(县团委干事)为常委，龙凤山任主任，詹佩喜、刘顺卿、唐申元为副主任。革委会成立，乱杀人并没有停止下来，而是变本加厉的加速进行着。县革委成立后立即把原来“联指”控制的武装班扩充为纠察队，由邓子友任队长，李开成、李广忠任副队长，崔树元任指导员，参加纠察队的人有九十三人(见 011

卷 223 页)。

1968 年 8 月下旬末，县革委会副主任唐申元、常委韦英豪等人分别找还在驻桂的各公社民兵团负责人交待说：“要抓紧清理公社大队关押人员，要搞的对象赶快搞去，下一步要转入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怎么搞法可交群众讨论处理，由群众专政”根据这个部署，全县又再次出现乱杀人的高潮，白天黑夜突击杀人(见庙岭乡唐良胜证词)。

1968 年 8 月 27 日晚上，庙头公社在沙塘大队公路边山脚下枪杀了莫英豪(该公社党委副书记)、陈国良、梁英跃、彭丽霞等四人(详见刘正哲案卷)。

1968 年 8 月 29 日晚上，县“联指”的“保革”指挥部胥明德、唐秀明，带领李开成、邓子友、以瑞芳等十多名武装人员，将关押在麻袋厂的潘其万、李景发、牟新生、赵良才等十多人绑架到秧塘飞机场杀害(见胥明德案卷)。

1968 年 8 月 30 日，县“联指”“保革”指挥部韦英豪、胥明德、唐秀明带领“工人纠察队”包家明、李广忠、邓子友、秦世达、周冬生、邓智辉、秦康息、付善元、贲伦传、曲志贤、秦良宣、以瑞芳、周维新、刘素珍、伍天锡等武装人员，乘坐四辆大汽车，将关押在麻袋厂的“4·22”头头秦乔苟、胡本庆、梁承义以及周英丽(李瑾科之妻，民政科长)、唐德秀(秦乔苟之妻)、林再(刘锡臣之妻，农业局会计)、马家副、卢永芳、谭广三、秦金珠、李开明、胡明富、卢连生、陈树保、翁玲(学生)、刘日明(学生)、秦天生、刘作英、李进、周业彰、王振庭(县人委办副主任)等二十多人，挂牌到六塘墟游斗后，在杀人冲(地名)，在韦英豪、胥明德、唐秀明等指挥下，全部杀害。在游斗杀人的前一天下午，韦英豪在麻袋厂召开了工纠队员会议，作了动员准备工作，他说是县革委决定要把“4·22”的坏头头拿到六塘、两江、五通三大墟镇游斗，要求除看家值班的人外，都要参加(详见韦英豪、胥明德案卷)。

1968 年 8 月 31 日，县“联指”的“保革”指挥部胥明德和“工纠”成员，将周克仁(副县长)、王文启、李继全、龙宗培(在刑场逃脱后在二塘又被抓)、徐承汉、褚振益、周秦芳、覃光恒、罗家复、罗俊烈、唐超、李双荣、王长青、章守先、熊保功、粟振德、周德生(杀场逃脱幸存)、秦明珠、廖日光等二十三人绑架到秧塘飞机场杀害(详见胥明德案卷)。

1968 年 9 月 1 日，南边山公社由朗联大队支书毛合全和彭乔次等人指挥，在黄竹山(地名)杀害了宾文活、经继修等八人(详见南边山乡宾文活等八人死亡结案报告)。

1968 年 9 月 3 日，茶洞公社再次召开万人大会，“八·二〇”从桂林抓回来的毛开兰(公社团委副书记)、王纯亚、李习民、陆森隆、黎秀珍等 12 人，在批斗会上被用棍棒活活打死，其中毛开兰被入挖去心肝。这天，会仙公社也开大会，杀害了李继西、李者田、周裕业、周妹妹、谢六生、龙寿范、李国华、梁关材、刘肇书等十人(详见茶洞乡、会仙乡有关王纯亚、李继西等人死亡结案报告)。

1968 年 9 月 5 日，胥明德带领包家明、蒋永辉及农械厂的秦德威、司机周文友把关押在二塘农械厂的袁清渭、文邦才及林云仪三人绑架到二塘水利桥头附近杀害(见胥明德案卷)。

1968 年 9 月 7 日，五通在新墟场召开大会，由全子俊宣读被害人于仁龙、彭茂功、彭茂述、苏永杏、黄仲华、秦芝保、于火炉、李宁发、苏启祥、林茂长、苏桂荣、苏年达、于衡瑞、吴德胜等十四人的“罪状”，由钱喜春布置杀人凶手。会后将以上十四人拉到五通大祖(地名)杀害(详见五通镇关于仁龙等十四人死亡结案报告)。

1968年9月5日，庙头(今庙岭乡)游斗杀害了马云高。

1968年9月上旬末，县革委会挑选了“三保卫”中的积极分子组成贫下中农宣传队进驻县管的四所中学，领导学校斗、批、改。每个“宣传队”都派有一、二名领导干部参加。

“贫宣队”进驻学校，四塘中学仍杀了四人，被迫自杀一人，两江中学1968年11月18日，批斗中还打死教师刘义友。

1968年9月18日，在县革委召开的全县贫下中农代表会上，经龙凤山等人同意，将关押在军管会看守所的刘锡臣(县委常委、县法院院长)、龙炎运(县检察院副检察长)、李志辉(县工会干部)、谢务咎(临桂中学学生)拉到大会主席台上亮相、批斗，被打成重伤后，由胥明德等人指挥“工纠”队员将刘锡臣等四人和被关押在红卫(今民主路)小学的茶洞一教师共五人一起拉到秧塘飞机场杀害(详见龙凤山、胥明德案卷)。

1968年9月26日，由胥明德指挥，从军管会看守所将经过军管会以冲击军管会罪批捕的，从河北省刘锡臣老家抓回来的刘镇光(桂林市二中学生、刘锡臣之长子)以及按县革委通知到军管会自首同意给回原单位上班的蒋益寿(县粮食局干部)刚走出公安局门口，正好碰上胥明德拉刘镇光上汽车，也一起被抓上车，绑架到秧塘飞机场杀害(详见胥明德案卷)。

1968年10月初的一天，县“联指”“保革”指挥部从军管会要出从湖南抓回的黎运钊、胡德猛、冉洪彬给县机关群众批斗，用棍棒将黎运钊打成重伤，后黎死去。其余二人也被打成重伤。(详见胥明德案卷)。

1968年12月6日，县革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早已惨遭杀害的县委副书记李瑾科、副县长周克仁的“罪行”材料，通过定性决定，李瑾科定性为“死不改悔走资派”；周克仁定性为“历史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1968年在乱打死人期间，全县共发生了一千二百余起乱杀人案件。其中5月份以前打死五人，6月份打死七十一人，7月份打死四百七十五人，8月份打死七百五十八人，9月份打死二百二十四人，10月份二人，11月份一人，时间无法查明的四十五人。

阳朔县大血案

1968年6月初，桂林“造反大军”夺了桂林军分区军械仓库的枪枝、弹药，抢走了物资、打伤了警卫人员。军分区“支左”办公室主任郝群给阳朔人武部打来电话，电话用暗语说：“分区仓库花生米(即枪枝、弹药)给老鼠(即“4. 22”一派组织)吃光了。你们有没有老鼠药，请赶快送来。”

阳朔县人武部值班员蒋凯接到军分区的电话后，即将电话记录交给部长、县革委主任辛恒山。在家的部领导作了简单的碰头。辛恒山连夜召开了武装部副科长以上人员参加的部党委扩大会，传达了军分区的电话精神，经过讨论，多数同志同意出兵桂林。县人武部党委扩大会议后，辛恒山部长、王瑞武政委在人武部小会议室召集了县革委常委紧急会议。出席人员有：县革委副主任黎成称、县革委常委邵连岗、张洪新、远景宇、张林生、邱行举等人。传达了分区的电话精神和入武部党委决定，县革委常委也一致同意出兵桂林。6月3日，由县入武部参谋蒋凯向各区武装部下达出兵桂林紧急命令：其他人员做好出发前准备和调动车辆工作。

各区和县直机关接到县人武部紧急命令后，立即带领一个民兵连(除兴坪区重点部署防守外)，全副武装，深夜乘车出发，于四日黎明前到达桂林，住在桂

林“东方红”饭店。在住地成立了阳朔民兵团和指挥部。团长郇连岗、政委远景宇、参谋长张占奎(县工交政治部主任)、政治部主任李仁(县委财办副主任)、后勤部长孙秀国(县财办主任)、赵兴珍(商业局局长)。下属七个连，约七百余武装民兵，编成班、排、连，配备了各级干部，并送行战斗编组。

武斗前期，民兵“失利”，桂林武斗总指挥分析其主要原因之一，是武器不好。七月四日桂林武斗总指挥部曹铁军等人在“五一”饭店召开了郊区和桂南各县头头会议，布置动员武装民兵到兴安四五三国防仓库夺枪。郇连岗参加会议回来后；即交待郑国j洋(白沙区干部)、杨先发(工商局干部)，带领阳朔民兵一百多人，星夜乘车由阳朔经恭城赶至兴安夺枪。

兴安夺枪后，地、市和县民兵枪多弹足，总指挥部于七月八日在芦笛岩附近(苗圃，)召开南北联合作战会议，讨论了夺枪以后的行动，策划在西山一带组织一次大打，南北佯攻。西线突击的作战方案，确定了作战的时间，还决定调动北片的民兵团到西线充实力量，对“造反大军”发动一次总攻击。阳朔郇连岗参加了这次会议，并接受了战斗任务。郇回团后召开了各连的领导会议，传达战斗命令，积极地做好战前的准备工作，郇与连队干部亲自到前线察看地形，派人侦察对方火力配备和布防情况。这次武斗从七月十三日打响，十九日结束。阳朔民兵团分别拿下了西山、白崖山等。这次武斗，消耗弹药八万多发，发射六〇追击炮弹60多发，对方死亡100多人，阳朔死亡8人。以后阳朔民兵团又参加了桂林的打击一大片的“八.二〇”统一行动。

8月28日，阳朔武斗民兵回到县城，并在阳朔镇小召开了“庆功”大会。进城武斗历时八十六天。武斗人员个个吃饭不花钱，人人发给棉毯、雨衣、水壶、胶鞋、毛巾、衣服等。耗费国家资财八万多元。阳朔民兵死于武斗12人(干部5人，农民7人)。武斗期间，桂林交通堵塞，工厂停工、商店关门、学校停课、机关无法办公、近郊农民不能正常生产、人民不能正常生活，使整个桂林城陷于一片混乱、瘫痪、恐怖之中，各类建筑物受到严重地破坏。

桂林武斗期间，到桂林武斗的民兵多次回本地搞杀人“垫底”。6月14日下午，赴桂林武斗民兵干部林定权和十余个民兵乘汽车从桂林回葡萄区。当晚以上桂林的诸葛军对证为名，将对立派的阳致政、张雄、蒋任、廖祖偿、张步勋用布蒙住眼睛推上汽车，拉到桂阳公路西侧的柚子弯附近枪杀。6月30日，赴桂林武斗的民兵干部容木胜、苏成忠专程从桂林带回一个武装民兵班，经黎元发签字批准，从白沙区工农兵指挥部“牢房”提了孙锡华、宾正荣、李光祥、韦有恒、容作飞五人出来民兵李桂发、潘武炎奉命将孙锡华推到现白沙邮电所(原草坪)枪杀；宾正荣、李光祥、韦有恒、容作飞四人被容木胜等民兵推上汽车押往桂林，在将军桥附近的铜鼓山脚下集体枪杀。7月15日赴桂林武斗指挥部将在武斗被打死的县百货公司黄金成尸体运回阳朔。16日在公园开追悼会。一派群众组织乘机煽动杀人垫底。当天把关押在文化宫的程忠纯(县百货公司干部)、苏良钰(县委委员、粮食局局长)、李超(县合作社干部)分别打死和枪杀。

1968年6月上旬，赴桂林武斗后，为巩固“后方”成立了“阳朔县工农兵保卫革命委员会指挥部”。简称，“工农兵指挥部”。白沙、福利、兴坪、葡萄、金宝、高田六个区也相继成立了工农兵指挥部。各区下属的乡也相继成立了工农兵指挥所。县工农兵指挥部总负责人是吕明忠(干部)、负责人莫孝良(工人)王天德(农民)莫桥芳(红卫兵、朔中学生)，成员若干人(均是“联指”观点)。下设宣传组、保卫组、后勤组、纠察队。工农兵指挥部(所)成立后一直得到县(区)革委的支持。1968年7月20日县革委的简报稿中指出“对工农兵指挥部领导成员和工

作人员以及武装民兵、纠察队要进行认真审查。如发现混进坏人，要通过群众组织采取适当措施把他们清除出去。以保证阶级队伍的纯洁。防止坏人混水摸鱼”。工农兵指挥部(所)的活动实际上是武斗活动，是一派专政。

“阳朔县工农兵保卫革命委员会指挥部纠察队”是专设在文化宫执行关押看守任务的，故称“文化宫纠察队”。主要人选是由军管会和工农兵指挥部指定的。大队长朱名贵、副大队长诸葛景、副指导员廖发柏、负责审讯的谢志辉、莫家合，负责行政的莫嘉明、陈文辉。纠察队下设三个排和一个机动班，共 61 人，由军管会配备武器，实行昼夜值班看守，有交接班登记簿和拘留人员花名册。自 1968 年 6 月 7 日起至 9 月 1 日止的 98 天中，被纠察队关押在文化宫的共 237 人，其中本县的 13 人，外地的 106 人，干部 61 人，工人 133 人，医务人员 4 人，教师 3 人，学生 10 人，居民 6 人，农民 9 人，不明职业者 10 人。被打死和迫害致死的有沈治忠、黎兆凡、莫崇跃、莫文初、吴尚贤、吴章龙、莫军、肖水养九人。

6 月 25 日晚，福利区工农兵指挥部值勤民兵莫有生去换岗时被站岗民兵开枪误杀。六月二十六日晨，唐绍文召开工农兵指挥部成员紧急会议。决定杀杨忠、韦树才为莫有生“垫底”。会后唐绍文交代看守所所长黄志诚布置民兵黎永禄、莫杰松将杨、韦押往阳朔，在路上将他们“干掉”(即打死)，黎、莫两人又叫了十多个民兵一起把杨忠、韦树才押往阳朔方向，行到古榕塘时，黎、莫等人即开枪将杨忠、韦树才打死。枪杀杨、韦的人尚未回来，福利镇街头已贴出预先写好的海报，主要内容是：杨忠、韦树才在押往县城途中逃跑，被我民兵开枪击毙。7 月 7 日下午，高田区工农兵指挥部副指挥长梁桂万等人策划，杀害对立派覃德业、李启维、万成康、龙意富、徐正书、冯家潘六人。当晚，以押万、龙、冯三人到蒙村，押覃、李、徐三人到平塘村批斗为名，在返回高田途中，分别在雷劈山、大祖坟(地名)由民兵开枪打死，7 月 8 日晚，县工农兵指挥部在手工业联社楼上召开了一个前、后方合谋研究杀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吕明忠、李先德、陈益昌、英桥芳、王天德、蒋正本、牟科永、麦建元、朱名贵、邱建生等人。吕明忠主持会议，他说：“最近形势很好，两派到京开会，情况必然要变，所以前方(赴桂武斗)同志回来要求处理一批。……”在讨论中有五人发言。李先德说：“后方同志将阶级斗争盖子揭开了，我们向在家的同志学习。我们回来是与大家交换心情、统一思想。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蒋正本说：“要抓紧干”。王天德问：“材料怎样”？吕明忠说：“材料够了的”。邱建生说：“现在就干”！会议提出的名单是：苏良钰、程忠纯、吴尚贤、李超、廖杰、张伯勋、覃荣华、戴开志。在讨论如何处理这些人时，有的提出先抓几个到桂林干掉，有的提出由各单位组织群众利用批斗的形式，由群众打死较好。最后还是统一同意第二方案。结果，已被关押在文化宫的程忠纯、苏良钰、李超于 1968 年 7 月 16 日分别被枪杀和打死；张伯勋、覃荣华于 1968 年 7 月 30 日在游斗中被打死；吴尚贤于 1968 年 8 月 3 日晚工农兵指挥部在大礼堂召开的批斗会上被打死；戴开志于 1968 年 8 月 21 日从文化宫拉出来在游斗中被打死；廖杰因原单位部份领导不同意搞死，只被打成重伤，拖至 1972 年死亡。县公检法军管会根据县工农兵指挥部上报材料定罪。决定在批斗会上拘留县邮电局干部莫崇跃。8 月 3 日晚，工农兵指挥部在县人民礼堂召开拘留莫崇跃的批斗大会。由纠察队从关押在文化宫的人员中捆绑，押解 20 多人到礼堂台上作陪斗。批斗大会由牟科永(教育局干部、指挥部成员)主持；会议准备执行拘留莫崇跃时，蒋彬(县委组织部干事，赴桂武斗直属民兵连指导员)和一部分民兵进入礼堂并冲上舞台，蒋抢过话筒，高喊：“保卫红色政权的战友们、同志们，我们在前线流血牺牲，他们在后方这么安然，我们的血不能白流，血债

要用血来还”等话。在蒋彬的煽动下，先后约有 40 多人冲上台轮番斗打被批斗人员。莫崇跃、莫文初、吴尚贤、吴章龙、刘汉和被打死；其余 20 余人全部被打成重伤。8 月 20 日晚，福利粮所在福利区礼堂召开批斗普益粮站干部廖大文大会。廖是 7 月初被工农兵指挥部关押的，在此期间廖被斗打多次，经受不起折磨，撞柴油机自杀未遂，后被抬到大光亭。秦芳、莫桥福、李继忠等粮所负责人研究决定，再次批斗廖大文，经指挥同意，令被关押的黎光辉等人把廖抬到会场。批斗会后，由本单位职工陈永吉、管德疆二人，用绳子把廖大文头在前，面朝下，手反绑着，从礼堂沿着福利老街，在那高低不平的石头路上拖到漓江边鲤鱼洲上，约一里半路程，廖大文被活活拖死。

1968 年 9 月 1 日，县工农兵指挥部撤销。区、乡的工农兵指挥部(所)，也先后解散。

1968 年 6 月 13 日，县革委会在高田区召开各区革委会领导和县下乡工作队队长会议，由县革委副主任黎成称传达贯彻专区革委会召开的兴安会议精神；部署开展“三查”工作。会议布置从 6 月中旬至 10 月份，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一个查“走资派”、“叛徒”、“黑手”，查地、富、反、坏、右的破坏活动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三查”运动(后束发展为“三查一清”运动，增加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内容)。会后，经县革委批准，县直各单位、各区、乡、大队都成立了“三查”领导小组，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在全县开展“三查”运动。六月二十一日县军管会向各区公安员、派出所发出三点通知：1、取消“四大”的政策界限以公安六条第四、五条精神掌握。2、审批权限，社会上由军管会审批，国家干部由革委会审批，乡、区签署意见报到“三办”和军管会。3、县区革委委员要批斗的，需事先上报材料，批准才能批斗。我们掌握真正是坏头头可以抓起来。6 月 25 日县革委又召开紧急会议，宣读了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公布的“关于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反革命案件的公告”，传达区革筹和军区的有关指示，强调开展“三查”运动，“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的进攻。”6 月 27 日至 30 日，各区先后召开了革委扩大会，参加会议的除革委成员外，还有区干部、乡民兵营长、治保主任以及区属各单位的负责人。各区的会议学习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述。7 月 20 日县革委又召开了全县三级干部会议，总结了“三查”运动的情况；提出了“把公开的暗藏的阶级敌人统统挖出来，并把他们从政治上、思想上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夺取‘三查’运动的全面胜利”的要求。

6 月中旬，以县革委常委冯仁基为组长，邱显福、莫子正等同志为组员，组成工作组，遂驻县良种场搞县直机关“三查”试点，历时一个月时间，由于推行极“左”路线，十几位干部、职工被批斗和吊打。工作组总结“三查”试点经验，向全县推广。6 月 16 日工人莫振云被押上桂林途中在良丰农场附近被枪杀。7 月 7 日，工人李志年、莫继荣、周祯被毒打后丢下工农桥河里淹死。工作组离场后，9 月 12 日，良种场曲一派群众组织还把工人董日新挂上“黑牌”拉到县城游斗而被打死。6 月 30 日，县革委主任副黎成称在县人委院内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三查”核心小组，负责县人委机关的“三查”工作。7 月 1 日上午，黎成称在县人委院内召开的干部、职工大会上作了“三查”动员报告。下午，又召开骨干会议，确定“三查”对象，先后被批斗、吊打的干部 32 名，县水电局副局长苏志生被批斗后含冤上吊身亡；农业局干部朱方瑾被批斗后含冤投河自杀身亡；县水电局干部夏玉林被打伤后两年医治不好而死亡；农业局干部韦仲昆被错误开除干籍，遣送回家后不久死亡。副县长阎秀清等十二位同志被打伤后得不到

治疗和休息而留下残疾。7月10日晚，葡萄区福旺乡干部徐保发等人，在乌龙村召开群众大会，批斗黄八生、潘卒西“反攻倒算”问题。黄、潘被群众打成重伤后，徐保发指派容上六找人把他们埋掉。容带领民兵押着“四类”分子把黄八生、潘卒西拖到帽子山推下石灰窑活埋致死。7月13日晚，葡萄区林家旺村第十二队队长林初耐等人，策划决定要把被诬陷为参加“飞虎暗杀队”简被关押在乡政府的本村社员林九准等六人杀掉。当晚，林初耐等人怂恿不明真相的群众四十多人，手持木棒，到乡政府以把林九准等人拉回村里批斗为名，将林九准、林用忠、林杰、林素、林五高、秦中意六人提出来捆绑后，押到丙弯里板栗林打死。7月16日晚，白沙区五里店莫志林在本乡主持召开批斗陶天喜、练仕善、刘德展、刘五一“参加陈大岩策划暗杀干部群众黑会”罪行的群众会，在乡干部骆文甫讲完话后，诸葛桥等十二人即将陶天喜等四人用棍棒打死和枪杀。8月17日晚，兴坪区西山乡十八门楼村召开群众大会，批斗秦社林父子五人。批斗后，乡“三查”小组组长、民兵营长徐光养带领民兵多人，将秦社林、秦金发、秦远荣、秦水荣、秦年生五父子押至东门尼龙光亭公路附近枪杀和用石头砸死。在“三查”运动期间，全县从上到下，开展了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刮十二级台风”，对阶级敌人进行大扫荡。在“三查”中，全县到处抓暗杀团(队)，许多地方出现揭出问题必抓，逢抓必斗、逢斗必打；出现到处随便打死人的严重情况。据统计，全县被批斗的有2513人；被打死和逼迫自杀的共601人；伤残留下后遗症的727人之多。

1968年8月10日，阳朔县革命委员会、阳朔县人武部党委为了大力宣传“七.三”布告，决定由辛恒山、王瑞武、黎咸称、邵铁男、冯仁基、邱行举、张林生组成领导小组。辛恒山任组长，王瑞武、黎咸称任副组长。下设办公室。各级革委会和革命领导小组也相应成立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强调要以最大的政治热忱，最坚定的决心，最主要的精力，最快的速度，宣传、贯彻、落实好“七.三”布告。、采取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组织强大的宣传队伍，深入街道、厂矿、生产队的田间开展宣传活动，做到人人学习、宣传。要求在布告发布后三天以内，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于是动用了一切宣传工具，在凉亭、渡口、商店、墟场、村头设立宣传站。组织了县、区1825人的135个“七.三”布告的宣传队，号召以“七.三”布告为武器，深入开展“三查”运动。

桂林武斗紧张期间，兴坪区工农兵指挥部和“三查”领导小组加紧抓“四类”分子和“坏头头”，并布置民兵各处设卡戒严。“2.12”群众组织的卢光寿等12人感到在家不安全而外出东藏西躲。1968年8月10日晚，上山躲避的一些同志与守卡民兵相遇，投了两枚手榴弹。因此，县革委和人武部认为外出躲避的人员的性质变成上山为“匪”，所以决定“剿匪”。于是，由县人武部副政委宋广盛到兴坪区坐阵，下令调动兴坪、福利武装民兵和下乡宣传队几百人到湾寨、老屈家进行围剿。8月17日，上山躲避的兴坪区卫生所护士冯天秀被围剿的民兵开枪打死。其余人员全部被“抓获”或“投降”。后进行游斗，有的在游斗中被打伤。卢光寿被定“抗粮抗税”罪而判刑9年(已彻底平反)。

1968年9月上旬，县革委常委研究决定批斗莫楚翘(县委副书记)、王范滋(副县长)、阎秀清(副县长)大会；成立了批斗莫、王、阎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9人组成：组长邵铁男，副组长张林生，成员：莫孝良、谢志辉、黎桂荣、吕明忠、蒋彬、牟科永、赵祖章。几天后，在县人民礼堂召开县直机关干部、职工约1200人大会。批斗大会由县革委常委张林生主持，县革委常委远景宇、张洪新、邱行举作了批斗发言。会上还拿老干部陈照、李绍新、陆绍益为陪斗对象也进行了批

斗。自治区革委巡回批斗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五位领导人押到我县“亮相”时，我县也把被“打倒”的一些县领导莫楚翘、王范滋、阎秀清进行挂牌“亮相”。在县手工业联社、土产公司、交通局等几个地方靠近街的凉台上搞街头示众，即“活人展览”。随后，在荔浦县召开的南四县(荔浦、平乐、恭城、阳朔)、几万人大会批判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时，我县又把莫楚翘、王范滋押去荔浦陪斗。9月28日至10月3日，县革委召开的首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大会第一天，由武装民兵押着莫楚翘、王范滋、阎秀清、陈照、李天顺、李绍新、陆绍益等十余人上台“请罪”，并对莫楚翘、王范滋、阎秀清进行了批斗，致使他们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1968年9月15日，县革委派出以邮电局干部陈家晃、人武部干部赵德兴为首的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阳朔中学，领导学校的斗、批、改运动。宣传队进驻学校以后，继续以派划线，批斗了一大批不同观点的学生和教师。9月24日驻校宣传队和校革委、教育局共同研究，报请县革委批准，处理了一批学生和教师：被开除学籍的学生有赖和兴、谢正发、黄为灵、何祥生、李梦荣、罗晓明、陶德树、袁明、唐良辉、张继连、刘义光、诸葛水生、陆日学、赵家仁共十四人，勒令退学的学生有周光达、莫现英、费连有、诸葛玉珍、李小云、苏越、唐少云、朱名喜、苏桥兴、刘启发、张普发共十一人，受到严重警告和警告处分的学生有莫永昌、黎振全、苏进宏、汪守亮、郑有权、阎柏荣、伍凤桥、胡波萍、刘水凤、蒋业民、徐朋光、曾凡荣、贲龙桥、诸志群、容作景共十五人；还审查处理了韦崇斌等11名教师。这宗错案，直至1984年6月30日，处遗”时，才得到彻底平反，恢复其政治名誉。

“刮十二级台风”乱杀人事件（玉林专区文革参考资料）

玉林专区革命委员会于1968年3月28日成立后，玉林军分区玉林专区革委会、玉林专区公检法军管会的主要负责人，在极“左”思潮和派性思想的指导下，先后召开专区公检法军管会紧急会议和玉林专区革委会首次政治工作会议，错误地提出和部署反击”右倾翻案风”，主动地、猛烈地、全面地向阶级敌人进攻，实行群众专政，“刮十二级台风”，为建立革命、生产新秩序、保卫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做出成绩。会后，在这个错误思想指导下，县、公社、大队层层贯彻落实，把刮十二级台风逐步具体化，刮什么对象，甚至刮那个人都作了研究。造成了一场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有部署的乱抓、乱杀人的严重事件，在贯彻“7·3”布告后，继续“刮十二级台风”，死人事件在继续发生。从1968年4月底开始到同年10月底止，全专区连续刮了三次“十二级台风”（第一次是专区公检法军管会紧急会议后，第二次是专区政工会议后，第三次是贯彻“7·3”布告后）。在“刮十二级台风”中，全专区被打死、杀死、迫害致死的有7354人，占全专区在“文革”中被打死、杀死、迫害致死的10156人的72.41%，恶果极为严重，给玉林专区人民群众带来严重灾难和极大损失。

玉林专区围绕着支持韦国清(区党委第一书记)打倒伍晋南(区党委书记)和支持伍晋南打倒韦国清的争论，逐渐形成“联指”和“4.22”两大派群众组织。两派为了各自的利益，双方都建立了武斗据点，构筑工事，自制和抢夺武器弹药，组织武装力量，准备武斗。

因“联指”支持韦国清与地方部队的观点一致，1967年6月，玉林军分区和容县武装部的支左负责人公开表态支持“联指”，视“联指”为朋友，反对“4.22”，视“4.22”为敌人。从此，“联指”组织不断扩大，到1968年4月，全专区“联

指”观点的人数占持派性观点人数的70%，形成地方部队支一派压一派、大派压小派的局面。

1967年6月至9月，玉林专区“联指”曾先后9次向“4.22”总指挥部发出大联合的倡议书，要求大联合共同斗争“走资派”，因各地两派武斗不断升级，对立情绪加剧，“4.22”总指挥部未予答复，“联指”认为联合搞不成，立心消灭“4.22”，于是在专区各地先后发生了从1967年6月24日至1968年4月13日止共10个月的“联指”攻打、摧毁“4.22”据点抓俘、审俘、杀俘。镇压“4.22”的严重武斗事件。在专区、各县县城以及公社一级较大的武斗基本结束后，于1968年3月21日至同年4月13日，先后成立了玉林、容县、北流、平南、桂平、陆川、专区、博白、贵县革命委员会，一些思想极“左”，派性严重的地方部队支左领导人、地方领导干部，和在武斗中镇压少数派的所谓有功人员，杀人主谋、凶手，进入了各级革命委员会。这些人不但没有得到处理，而且还委任予革委要职。少数派虽安排一些代表为革委委员，但无讲话权利。各级革委会实际成了支韦打伍一派观点的人掌权的组织。这样的人进入各级革委会，掌握各级革委会大权，为了保权，立心彻底搞垮“4.22”，一场人为地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有部署的“刮十二级台风”，乱抓、乱杀人的事件开始发生。

玉林专区革委会成立前，玉林军分区党委中一些负责支“左”的领导同志存在着严重的极“左”思想和派性。并以此指导工作。主张群众专政，支持“联指”杀人，这是“刮十二级台风”的前奏。

据“文革”中容县十里公社公安员、革委会委员、现县供销社干部梁德念保留的笔记本记载：1967年11月18日下午，玉林军分区副司令员、专区革委成立后任革委会生产指挥副主任的周德银在讲话中说：“关于专政问题，由于对政策、方针贯彻领会不够，产生了一些问题(打死人太多了，杨梅提出超石寨是不对的)，但是不能给群众泼冷水，只要我们掌握政策就成了。专政由群众专政，处理由群众处理，但处理不等于处决。应斗就斗，应游斗就游斗，应管制就管制，由群众打死就打死(少数)，但不能过多，要掌握好政策。

玉林军分区司令员、专区革委成立后任第一副主任的曹德潜，1968年1月8日在玉林专区第三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解答学员对他报告提出的各种问题时说：“我们从来都是支持‘联指’的，以前是开了党委会讨论决定的，‘联指’贫下中农、工人多”。他还说：“小动作打死一两个人问题还不大，不能打死太多，死多了就不好处理了。”

1968年3月28日玉林专区革委会成立后，玉林专区公检法军管会玉林专区革委会以建立革命新秩序，保卫红色政权——革委会，保卫抓革命、促生产为由，先后召开专区公检法军管会紧急会议和专区革委会首次政治工作会议。两次会议都是动员和布置“刮十二级台风”(即杀人)的会议。

1968年4月18—20日召开专区公检法军管会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县(镇)公检法军管会负责人和地方公检法领导干部。会上专区革委会保卫部主任、军分区参谋长、专区公检法军管会主任达志作报告。根据北流县革委常委记录本记载：达志参谋长在报告中说：“形势越来越好，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加强敌情观念，坚决打击阶级敌人，要清理外来人员，建立革命新秩序，收缴枪支弹药，对敌人要采取进攻性手段去搞，采取坚决措施，掌握一些机动部队，组织工农纠察队。这个组织是打击阶级敌人的。”玉林军分区政委、玉林专区革委会主任甘照寰到会指示说：“公检法机关要建立新的革命秩序，要保卫抓革命、促生产。目前要抓什么？(1)社会上有很多流散枪支，要收缴。(2)要清理外

来人员、走资派、当权派要回来。(3)广州“刮了一场十二级台风”，很好，对坏人要打击、要准、稳、狠，稳是打击为首分子，当前主要是右倾翻案。要搞好这项工作，要求红五月到来前搞出成绩来。据“文革”中陆川县革委会主任、现广西日报社社长杨志庆的笔记本记载了方希俭传达专区公检法军管会紧急会议的内容，其中有达志的讲话。讲到“五一”节就要到来了，要建立一个新秩序，要打击阶级敌人，一些逆流也阻挡不了革命的洪流，陆川、贵县的干劲大，要象广州市一样，刮十二级台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要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进攻，要有最大的决心。也有甘照寰的讲话。讲到刮十二级台风，这是对无政府主义的打击和抵制，争取在“五一”前搞好。公安六条整顿的人，要加以打击，阶级敌人要坚决打击，打一批、压一批，不要心慈手软，要主动进攻，要不停顿地进攻，要不断进攻，不要等待，无所作为的人是让敌人来破坏我们，这是右倾，这是立场问题。桂平、博白两县参加会议的同志回去向县革委汇报时也有类似的内容。这次专区公检法军管会紧急会议主要内容是收缴社会上的枪支弹药，清理外来人员，成立工农纠察队，但甘照寰、达志在会上讲话中提出学习广州“刮十二级台风”，他们俩人尤其是甘照寰在这次紧急会议中，实际是“刮十二级台风”的动员者。这次紧急会议实际是“刮十二级台风”乱杀人的动员会议。

玉林专区革委会首次政治工作会议，是在专区公检法军管会紧急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即4月23日召开的，会议29日结束)。出席和领导这次会议的是甘照寰、孙景芳(玉林专区革委会副主任、玉林军分区副政委)，蒋昌永(玉林专区革委会副主任)等人。参加会议的有专区直属机关、厂场、学校的革委会主任，各县革委会主任、副主任和革委政治部主任及各组长等共109人。甘照寰在会上讲了形势和革委会成立后的任务是搞大批判，搞斗批改，反击“二月逆流”。孙景芳也讲了话，提出狠抓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主动地、连续地、狠狠地向阶级敌人发动进攻，坚决打退“右倾翻案风”。4月27日，蒋昌永在会上做了目前农村形势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十分明确地号召要“刮十二级台风”，并提出了具体路线、方法，说：目前农村阶级斗争尖锐复杂，要狠抓阶级斗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从城镇到农村都要搞。“刮十二级台风”，大刀阔斧干，路线是依靠贫下中农，发挥群众专政的力量。保卫部门要紧密配合，坚决支持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大发动、大批判、大斗争，集训四类分子。孙景芳在总结报告中讲到当时形势时说：全国各地出现了一股右倾翻案风的反革命逆流，在玉林地区有十种表现：一是为被打倒的“走资派”翻案；二是说玉林地区阶级斗争盖子还没有揭开，还要大乱；三是打着“维护”三个“照办”的旗号，肆意残踏、破坏三个“照办”；四是把矛头指向解放军；五是大肆攻击和破坏“三代会”；六是为王、关、戚形“左”实“右”的极“左”思潮翻案；七是为大毒草今日的“哥达纲领”和《邕江风雷：三·二九声明》翻案；八是疯狂攻击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委会；九是翻四清伟大成果案；十是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国民党员、伪军官公开跳出来翻案。所以要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彻底粉碎右倾翻案妖风，掀起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从甘照寰、孙景芳、蒋昌永三人的讲话可以看到，这次会议的中心内容是号召反击“右倾翻案风”，击退“二月逆流”，要刮“十二级台风”。所以这次首次政工会议，是一次全面组织、发动和落实措施的大“刮十二级台风”的会议。这次会议是继专区公检法军管会紧急会议之后又一次对玉林专区“刮十二级台风”(即乱抓乱杀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造成一场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有部署的乱抓、乱杀人的严重事件，

后果极为严重。

专区公检法军管会紧急会议和专区革委会首次政工会议后，各县(镇)迅速把会议精神传达贯彻，由上到下层部署落实。在县、公社、大队分别成立各种专门机构，成立各级工农纠察队和民兵组织。在这个基础上，开始大抓阶级斗争，大造“群众专政”、“刮十二级台风”的舆论。全专区各地相继出现乱抓人、乱杀人的严重事件，大批无辜干部、群众死于这次灾难之中。这些无辜的死者，大多数是参加“4. 22”少数派组织和支持“4·22”观点的干部、群众。也有所谓历史问题或出身剥削家庭的人、四类分子。地下党员、游击队员和领导干部变惨遭杀害。陆川、贵县、桂平等县，在贯彻专区公检法军管会紧急会议和专区革委首次政工会议精神“刮十二级台风”最快、最猛，死人最多的重灾区。

参加专区公检法军管会紧急会议的陆川县公检法军管会主任、县革委保卫组副组长、县人武部科长方希俭和县革委常委、保卫组副组长陈伟全，向县革委会主任杨志庆和人武部副部长周国会、李光仁和县革委副主任陈健等人汇报专区公检法军管会紧急会议精神后决定：1、定于4月23日至24日，召开县公检法军管会会议，各区革委会领导、武装部部长、公安员各来一人参加。出席县革委扩大会议的国家干部也参加听传达报告；2、建立革命新秩序领导小组并定出了参加领导小组人员名单；3、成立工农纠察队，县机关120人，农村60人。机动民兵连两个，机关100—150人，区30人，脱产的10-15人，公社武装民兵班16人，集中公社住宿，听候公社使唤。

1968年4月23日开会，在会上方希俭传达专区公检法军管会紧急会议精神时说：“这次会议是抓阶级斗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对阶级敌人主动进攻，坚决打击，‘刮十二级台风’的会议。方在传达中又作了发挥，刮什么对象都讲了，他举例说：玉林南江有个小偷，被群众杀掉了。这就是群众专政，群众专政好得很。我们也要发动群众，采取群众专政的办法，向阶级敌人猛烈进攻，‘刮十二级台风’。要求到会人员回去后立即传达贯彻到公社(大队)，在‘五一’节前做出成绩来。县武装部副部长周国会在会上讲话布置：1、各区、公社要建立革命新秩序领导小组(组机构。区5—7人，公社(大队)3—5人，各区成立工农纠察队20—30人，其任务是：清理外来人员，对坏人专政，建立革命新秩序的。对搞武装行动的阶级敌人要彻底干净消灭；2、是关于清理外来人员问题，主要是‘文革’以来出走的坏人，一定要清理好；3、是一次缴武器的问题，现在做好准备，到时就收。在总结会上又说：“文化大革命中，敌人已暴露得很清楚了，我们要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主动展开进攻，坚决打击敌人。敌人要搞破坏，我们就要搞反破坏，敌人搞武装进攻，我们就要武装进攻敌人，但不能搞派性。清理外来人员，坏人要抓，外来人员要赶，坏人窝藏坏人，连窝藏人一起处理，交给群众专政”。这次会议，实际是陆川县军管会传达贯彻专区公检法军管会紧急会议，落实具体措施，实行“刮十二级台风”乱杀人的动员会议。

会议结束后，各区即召开公社(大队)支书或大队革命领导小组长、民兵营长、治保主任及区直机关革命领导小组负责人会议，传达贯彻县公检法军管会会议精神，建立革命新秩序领导小组和工农纠察队动员和布置“刮十二级台风”杀人行动。从1968年4月26日开始，全县城乡就发生了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有部署的乱杀人事件。温泉公社召开大队革命领导小组长、民兵营长、治保主任、下乡的公社干部会议，部署杀人。会议由武装部长詹树良主持，革委副主任谢炳新传达。参加会议的公社领导有革委会主任宁俊品、宣传委员冯立权、组织委员李佩膺、武装干事罗立信。会议不仅布置“刮十二级台风”乱杀人，而且公社还

派出纠察队协助大队杀人。会后，吕谓光(大队支书)与纠察队员吕官仁、林正辉押解吕纪和、吕镜才到温汤桥头枪杀。梁柏成(大队长)和纠察队杨诗海、吕育新、吕桂青押解李猛、黎焕南、孔祥其、陈进坤等 4 人到党校门口枪杀。全社队队行动，共杀了 86 人。

马坡公社贯彻县刮台风会议，是由革委主任丘懋球主持，公安员陈一春传达，武装部长陈昆荣补充说：“现在向阶级敌人主动进攻，是上级的命令，不能违背命令，谁不执行谁负责，追究谁等等。会后，队队杀人，全社共杀人 71 人。

平乐公社平乐大队，在大队干部研究提出专政对象名单后，贫下中农代表讨论通过，然后敲锣打鼓押解要杀的人去杀掉，结果全社杀了 61 人。

沙坡公社 4 月 28 日召开革委常委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宁春光、甘琼瑶、宋茂权、卢世玉、吕铨、卢秀南、林考成、罗德南、陈瑞华、陈祖燊。会上公社武装部长宁春光传达方希俭的讲话。经过讨论研究，确定了专政对象名单并决定于 4 月 29 日晚为杀人的统一时间后，29 日公社召开大队干部和机关头头会议。宁春光在总结时说：“时间要快，任务要在今晚 12 时前枪杀完成”。各大队领了专政对象名单回去，当晚队队杀人，全社一晚之间就枪杀了 103 人。

县城在军管会主任方希俭、副主任陈超富部署下，于 4 月 29 日下午由纠察队直属班长吕志在县档案馆召开重点单位的头头杀人行动会议。吕说：“召集你们来开会，是军管会部署的。各公社刮台风，前几天已经布置好了。县城今晚也要“刮十二级台风”，这是保卫红色政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你们单位有哪些家伙，今晚要专政的，把名单报上来，交军管会审查”。散会后，吕志把各单位报来的专政对象名单(居民的专政对象名单是由军管会陆城派出所李汉升开列上报的)交军管会副主任陈超富审批。于当晚，全城划分万丈、北街、南街三个片，由吕志、吕德儒、谭均康等三人各带领纠察队，把专政对象分别押解到万丈黄泥城脚、长河龙塘铺岗坑和欧阳山勒死、刺刀刺死。三处地方共杀 16 人。

陆川中学教师陈作才，在 4 月 29 日上午被塘候大队民兵用枪杀死在学校门口球场后，下午，吴仁煜、吴兆广、陈树明、谭俊才、谢敏贤、谢庆南、江善玉、林汉元、万家福、罗福祥、李继芳等人，在香花木根开会研究如何处理尸体问题、会上吴兆广提出由揪出靠边站的老师吕浪、吕泉、吕玉焱、周耀磊四人抬去埋，同时把这四人一起干掉，一起埋葬的意见。主持会议的吴仁煜表示同意。决定由江善玉、林汉元具体负责处理。结果四位老师在民兵押送下抬着陈作才尸体去埋葬，待挖好坑后，持枪的民兵把四位老师杀死，同埋一坑。非常残忍。在这次“刮十二级台风”中，全县城被杀害的有 50 人。

米场公社回去开会贯彻，革委主任梁家祺传达后，在 4 月 29 日集中专政对象到米场街游斗，先来先斗，后来后斗。游斗后在街边枪杀 16 人。旺荐大队在 4 月 28 和 29 日两天，枪杀了 14 人。，其中林承业、林承聪一家被杀 5 人。只因两个小孩逃脱，才幸免一死。陆川县各公社在贯彻军管会紧急会议后，“刮十二级台风”乱杀人事件到处发生，全县 11 个区(镇)，155 个公社(大队)，除一个公社(大队)没有杀人外(以后也杀人)，其余 154 个公社(大队)都进行了杀人。4 月 23 日县军管会会议结束后，26 日便开始杀人，4 月 29 日达到杀人高峰。短短的几天，全县被杀的干部群众达 814 人。从县北到县南的公路两旁到处是被害者的尸体，真有陈尸百里之势。4 月 30 日，专区公检法军管会副主任邓身桐等。4 人到陆川县制止乱杀人，5 月 1 日向专区革委会和军分区领导作了汇报。5 月 2 日专区革委会召开各县电话会议，甘照寰讲了话，他一方面说不要象陆川县那样乱捕人、乱杀人，另一方面又说，在政治上主动向阶级敌人进攻，猛烈开展革命大批

判，要发动和依靠群众专政，加强对五类分子的监督改造，没有制止乱杀人的措施，全专区乱杀人的事件并未制止住。邓身桐于4月8日到陆川制止杀人起至5月5日止，六天时间内，陆川又杀了112人。在贯彻专区军管会紧急会议后，陆川县在4月26日杀人开始到，5月19日止，全县“刮十二级台风”共杀死了1229人。这个事件，陆川称为“4·29”。事件。

陆川县革委会于5月5日至10日召开县革委政工会议，贯彻玉林专区革委首次政工会议精神，部署开展一批(右倾翻案、右倾分裂、右倾保守)三查(黑线、黑手、黑后台)，大批判运动，这次会议实际是继公检法军管会会议的又一次“刮十二级台风”屠杀干部、群众的会议。县革委政工会议后，县革委机关在5月19日贯彻县革委政工会议精神，举办第一期学习班，在学习班中，把参加“4·22”组织的或支持“4.22”观点的领导干部、职工，“文革”中被罢了官的领导，“红联”斗、批、改办公室认为属于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的人列为批查对象。经学习班的李俞才、吕学荣、罗德培等人，提出在陆川街日把批查的对象放出街游斗的意见，县人委机关斗、批、改领导小组长李里明请示负责学习班的县革委副主任刘汉华同意，县人委斗、批、改办公室李里明、罗国南、李俞才、李茂英、朱和基、林恺琪等人开会确定，在陆川街日把莫永祺(县财贸政治部副主任)、何为礼(县农业办公室副主任)、陈炽光(县农业局副局长)、吕梁(县农办室秘书)、何星光、罗康民等6人，于5月20日下午4时，推出陆川街游斗，接受所谓批判，其他单位也把批查对象推出街游斗。实际上是放出街给坏人杀掉。在游斗中，莫永祺在游斗到检察院门前就被周广胜(原南下转业干部，曾任区长，因乱搞男女关系被开除干籍作工人安排)等人打死，陈炽光在游斗到十字街时，被县畜牧站干部吕志明等人打死；何为礼在游斗中，头部被打伤流血走回县革委会见到县革委会副主任刘汉华，军管会副主任陈超富，何向他们跪下要求救命，刘、陈不理睬。何又向造反派头头李里明求救，李不但不理睬，反而和李俞才等人把何为礼推出大门外，被迫到县革委门口的人毒打。何被迫跳下革委门前的三教塘躲避，但竟被迫打的人用砖头把何打死于塘中。烟糖公司干部宁金声、新华书店的丘承执也在街上游斗被打死，仅5月19日和20日两天把批查对象推出街游斗被打死的就有6人。原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明加，在县文艺队周华仁的勒令下，戴高帽、挑担游街时，被陆中某学生打致重伤，李拼命逃脱而免于致死。吕梁在游斗时亦被打伤。由于县革委举办学习班，把批查对象推到街日游斗被群众打死，为基层树立了杀人榜样，致使贯彻政工会议，开展一批、三查大批判以来，又发生了“刮十二级台风”乱杀人的“5·20”事件。全县被杀死，被害致死达400多人，又一次带来严重恶果。贵县“4·13”事件发生后，“联指”民兵进城围攻，炸毁“4·22”据点。捕捉和关押数百名“4·22”群众。正在进行审讯，公开杀害一些所谓危险分子的时候，即1968年4月21日至23日贵县公检法军管会召开会议，传达贯彻玉林专区公检法军管会紧急会议精神，部署收缴枪支弹药，成立工人纠察队，清理外来人员，对阶级敌人“刮十二级台风”(杀人)，使贵县“4·13”事件杀人有了借口，事态不断扩大。不少的干部、群众死在这个灾难之中。

1968年4月13日，贵县举行庆祝革委会成立大会，由于县人武部，驻军支左办公室有意把“联指”头头林如健作为“4·22”代表安排，占了“4·22”在革委会委员的席位，引起了“4·22”不满。说革委会是武装部包办代替的“派委会”、“假委会”，并冲击庆祝大会，“联指”开枪打死小孩刘小园，“4·22”抬尸冲击大会主席台，在混乱中将贵县革委会牌子砸烂，撕毁大会横额标语，抢去大会喇叭等，致使大会中途而止。这是贵县“4·13”事件。“4·13”事件发生

后，“联指”头头林如健、谭发祥等人认为“4·13”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并以此为借口，于4月13日晚划策，14日成立以“联指”头头林如健、谭发祥领导下的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简称保红部)，“保红部”由黄子旺任总指挥，谭发祥、刘细忠、陆秀邦、黄耀忠任副总指挥。“保红部”下设作战部(指挥部或办公室)、宣传部、后勤部、审讯组。作战部是直接指挥杀人，批准杀人的机构。是由“保红部”的核心人物组成的。他们是林如健、谭发祥、黄子旺、刘细忠、陆秀邦、谭达钦、振礼、谭发联、叶于强、丘子山、韦玉星、甘细金等人。县革委常委韦守杰和陈炳然也参与“保红部”的活动。“保红部”成立后，以保卫红色政权——革委会为名，一方面策划调动除木格外的各区武装民兵1000多人进城，另一方面，运用“联指”小报和在革委会多次会议上大造舆论，硬把“4·13”事件说成为反革命事件。在这同时，“保红部”的核心人物频繁开会研究策划镇压“4·22”方案。在实施方案中，贵县“保红部”指挥覃塘、龙山两区民兵于4月15日至18日先后攻下和炸毁朝阳饭店、粤东会馆、县医药大楼、东风街和邮电大楼、贵县高中等“4·22”据点。攻下“4·22”据点后，“保红部”决定于4月19日，全城戒严，清理街道，抓人杀人。各区民兵按街道地段和清理任务，分片包干，昼夜清理搜捕“4·22”群众，在10天时间内共捕捉了数百名“4·22”群众，除一些被当场打死外，其余分别关押在县革委大院、附城粮所、贵城派出所、农械厂“保红部”私设的监牢里。“保红部”的核心人物林如健、谭发祥等人借口为了稳定局势，避免反复，决定杀掉一些所谓危险分子。于是开展审讯定性工作。在4月17日晚在棉新街开枪杀死林师兴、黄文骏2人，18日又在街头枪杀了易杰生、罗章炎等5人，19日在小铁路边又枪杀了磷肥厂韦善松，20日把物资局干部韦可仁拉去垫黄练进城搜捕江南电影院时被炸死的民兵黄世甜的尸底。21日在小铁路边又集体枪杀了磷肥厂陈石考、姜志伟、姜维新、姜瑞和等4人。就在贵县“4·13”事件发生后，“联指”“保红部”策划围攻开始屠杀“4·22”派群众的时候，即1968年4月21至22日，贵县公检法军管会召开会议贯彻专区公检法军管会紧急会议精神，部署收缴枪支弹药，成立工农纠察队，清理外来人员，对阶级敌人“刮十二级台风”(即杀人)，使贵县“刮十二级台风”，大批屠杀“4·22”群众有了借口，事态不断扩大。4月下旬，贵县“保红部”在县城各街道召开群众大会，到处公开杀人。在棉新街群众大会上公开枪杀陈湛棠、梁鉴2人；在工农兵十字街召开群众大会，枪杀了谭裕昌，活活打死林德义和高耀光，在西五街群众大会上公开枪杀了梁玉群、李文澄2人；在永明街菜市的群众大会上公开枪杀了黄立权、谢祖泽2人；在兴隆街群众大会上公开枪杀了卢伟滔、陆夏伟2人，在人民电影院群众大会上枪杀了倪国英。当公开杀人被军管会制止后，他们改换了杀人手法，在半夜成批拉到郊区或江边杀害。4月21日半夜，“保红部”用汽车往附城粮所监仓拉10人到糖厂独山集体枪杀；4月24日第二次半夜用汽车拉9人到石牛水库用刺刀刺死；4月26日第三次半夜用汽车拉7人到石牛水库附近杀害，4月27日第四次半夜用汽车拉8人到蓝田大队石灰窑附近杀害；4月28日第五次半夜用汽车拉8人到附城龙山路口蓝田瓦窑附近杀害。仅上述五次深夜被秘密集体杀害的就有44名干部职工，后来有一次半夜用汽车拉谢振清(原农机三厂支书)等人到大圩路口准备杀害，被军管会发现，及时开车赶到，才制止了这次屠杀事件。当时贵县城区成批杀人成风。从“4·13”事件发生后，特别是从贯彻专区公检法军管会紧急会议后，到5月中旬的一个月里，城区被杀害的干部、群众共11批，76人。加上在县革委大院杀的，在江边杀害和被迫致死的共230多人。在县“保红部”血染贵城的影响下，各区、社也仿照

县城的做法；纷纷成立“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贫下中农联合指挥部”、“镇压反革命指挥部”、“贫下中农法庭”等所谓杀人专政机构，使这股杀人风在全县范围内迅速蔓延，席卷全县。4月17日大岭区“农联”召开群众大会，公开枪杀李以义、宋世环等5人，4月23日东津区公安员李乃寿在区西楼召集区“农联”负责人李寿能、李雄延、洪承隆、甘荣光、李秀延、谭健兴、莫信良等人会议，说：“现在我区形势很不妙，声势不大，跟不上形势，据了解一些地方大杀特杀了”。会议确定当天在东津街由区“农联”召开群众大会，搞示范杀人。第一批公开杀了余树荣、维新乡的吕德辉、雷宁乡的莫旺昌等8人。1968年4月27日东津区召开革委政工会议，李乃寿在会上说，凡有现行破坏和不服从管制的四类分子，每个乡报来2—3名。当晚召开“农联”紧急会议，部署于4月28日搞第二批杀人。分别由李寿能、谭健兴、洪承隆、甘荣光、陈奎先等5人和由李雄延、梁桂祥、李秀延等3人负责，在中和圩点枪杀了甘乃余、甘乃塘、黄锡英、吕文有、罗桂祥等5人，和在武乐点枪杀陶业、李瑞金、谭耀西等3人，共杀了8人。4月29日，李乃寿在第二批杀人后，又召集谭健兴、李寿能、甘荣光、洪承隆、梁学强、梁佳盛、梁桂祥等人开会，总结杀人经验，决定在4月29日在东津圩由民兵李静乾、甘开凤、梁彩夏、覃木生、梁武清执行，第三批枪杀李兆汉、甘沛池、陈文乾、陆春荣、梁炳滕等5人。该区由于搞示范杀人，在4月底全区出现杀人高潮，全区公开杀害了群众38人，加上批斗致死的共130多人。

4月23日，新塘区原副区长谭烈高带领工作组到该区的新江、香江两个乡组织指挥杀人。由“贫下中农指挥部”成员及民兵在新江非法抓了13人关押在大队(乡)楼上，香江抓了3人。并召开杀人预备会，指定每个大队定一个为枪杀对象，第二天即召开群众大会枪杀甘熙文、甘德益两人。谭烈高组织指挥示范杀人后，新塘区“贫下中农指挥部”在区礼堂又召开支书、乡长、治保主任、贫指主任、区干部会议，研究各片杀人名单。新塘区革委主任谭秉礼说：“瓦塘淡炳忠历次是运动员，留他做什么？最后，‘贫下中农指挥部’在礼堂审核枪杀名单，决定杀15人。其中瓦塘片4人，新塘片11人。瓦塘片在4月27日召开群众大会，枪杀了淡炳忠、黎炯章、邓启芳、陆观和、姜汉才、邓亚苟等6人。新塘片在4月29日召开群众大会，枪杀了岭蒙的伍贵威、岭表的梁栋、郑耀珍，永和的谭帝保、谭琼梅，永新的谭汉光、谭星龙，边岸的梁寿山、梁国保、梁水椽；瓦塘的邹水源等12人。两片杀人数字都比原定杀害人数增加。在杀人中，新塘区原副区长谭烈高，参加新塘片的杀人大会，并亲自打死了谭帝保。

其他区、社在此期间，“刮十二级台风”乱杀人的情况也是相当严重的。

1968年5月2日，贵县革委会分别召开县革委政工会议和革委扩大会议，层层传达贯彻玉林专区革委会首次政工会议精神，到5月17日贯彻落实到生产队。由于县革委领导人多次在各种会议上反复强调要反“三右”（右倾翻案、右倾保守、右倾分裂），“刮十二级台风”，主动向阶、级敌人进攻。致使“4·13”事件后，发生乱抓人、乱杀人事件，不但没有收敛，而且给乱抓人、乱杀人推到新高潮。县革委政工会议决定：一、确定清理阶级敌人的范围。除继续清理“4·13”期间的黑手、黑头头、外来政治犯、战场上敌对分子和违犯戒严令，家中藏有武器或收藏坏人者之外，会议还决定增加清理“走资派”特务、叛徒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扩大了清理阶级敌人的范围。二、5月12日县革委成立了工农纠察队180人。其中民兵100人，工人40人，干部40人，工农纠察队逐渐取代“保红部”。县革委机关和各区都成立专案组负责本单位专案工作。三、在县革委政工会议期间，县革委会主任、武装部长张金会批准执行第二

次全城戒严，清理并拘留了 79 人。四、“保红部”在工农纠察队成立的当天，由“保红部”的核心人物林如健主持再次开会研究杀人问题。会上报杀 12 人，实杀 13 人。由木梓民兵执行。五、杀人问题蔓延到农村。

5 月初木梓区武装部副部长胡建桂在区前楼会议室主持召开区直单位、各大队支书或民兵指挥部负责人会议，胡在会上说：“各大队要找出一些典型来，象公社一样，过段时间就不得杀人了，文件快要下来了，不杀就要刹车了”。在胡的鼓动下，会议结束后，龙塘大队民兵指挥长梁家清，于 5 月 4 日派民兵把李卓昌、谭伟文、黄占元三人拉去枪杀。5 月 5 日又拉陈慰慈、梁杰南、苏翰南等 3 人去枪杀。大兴大队支书梁子能开会回去后，于 5 月 4 日上午 8 时把邓海光、李振光、李锦兆、李以新、梁观益等 5 人拉去枪杀。5 月 6 日木梓区武装部副部长胡建桂亲自找官联大队民兵营长苏世敬责备该大队迟迟不成立民兵指挥部和行动杀人，并令苏世敬带 5 个民兵立即返大队执行杀人任务。结果，大队成立了民兵指挥部，并按照胡建桂的指示把要杀的对象找到大队审问，经大队和民兵指挥部决定，把黄育光等 12 人分 5 批拉到官联大队生鸡桥头、尖咀田、牛棉坡、岭咀、武思江边进行枪杀。

5 月 7 日，贵县高中蒙庆山获悉三里民兵抓获了 16 名贵高“4·22”派学生，于是带领覃福承，黄振(学生)、秦云等人各带手榴弹、大刀和步枪前往三里。当晚 11 时许，蒙庆山等 4 人跟随黄彩彬及武装民兵数十人前往龙田大队，把李志平、宋旗凯、沈志高、刘子嘉、刘丹明、沈大川等 6 人，押到荣田村瓦窑水沟处由黄振、秦云用大刀把李志平等 6 人活活砍死。

5 月 7 日，木格三安大队由于没有打死人，受到公社书记、革委主任谢信炎的点名批评。谢说：“三安右倾，李茂(支书)你们回去要‘刮十二级台风’！”结果，三安、早礼、木格、云垌等大队便迅速行动杀人。这个公社三、四月份只死 7 个人，五、六月份贯彻专区革委会政工会议，“刮十二级台风”，便杀死 186 人。

覃塘区的丘朝基参加县革委扩大会议回来后，召开大队支书、治保主任、贫协主席会议，传达县革委扩大会议精神，布置抓阶级斗争，“刮十二级台风”杀人。丘在会上说：计划打死的就挂牌，不打死的就不挂牌。还叫各片自行安排游斗的次序。表扬覃塘、谷罗等大队抓阶级斗争得力，批评六务大队和根竹没有杀人，会后，丘朝基亲自布置根竹片(即江口、新民、民权、根竹四个大队)，以片召开批斗会，派贫下中农指挥部成员韦敬保、辛玉林、李金全等四人去主持，致使当天就斗、打死李东贵、吴汉高、庞振福、董长城、朱传、朱厚政、李雷强等 7 人。丘朝基批评六务大队后，派陈延明主持批斗会，结果六务大队一天就斗死李天开等 6 人。周村大队枪杀了叶亚添等 4 人。覃塘大队一天就斗死卢志斌等 4 人，由于丘朝基直接指挥、鼓动授意，致使这个区在三、四月份就死 34 人的基础上，五、六月份又有 70 名所谓阶级敌人被打死。

6 月 17 日，贵县木格区为了贯彻专区和县公检法军管会会议和政工会议；收缴散发在社会上的枪枝弹药的指示。区革委副主任人武部长李振轩召集在家革委常委会议，研究收缴黑枪黑弹的突破点问题，会议认为早礼杨屋山“4·22”派人少，又有武器，而且周围都是“联指”群众，容易突破，决定作为收缴黑枪黑弹的重点。如不交枪，就强行收缴。并且决定由区革委副主任陆千荣和区武装干事李翠奇带宣传队先出发，民兵跟后作后盾(这些宣传队和民兵都是“联指”观点的)。结果导致“6·17”事件的发生，“联指”民兵围攻，进驻搜捕屠杀“4·22”群众的严重流血事件。6 月 17 日早上，陆千荣、李翠奇按计划带领宣传队骑自行车前往早礼，十点钟左右，早礼“4·22”梁永汉、梁炳绍在平悦路小买铺正

和当地“联指”民兵发生争论，发现宣传队，自知人少争不过对方，便边争边走，民兵边争边追，追至马安塘时，另一“联指”群众高延义见状助威，并用铁叉标中，梁永汉的后腰，倒在地上。民兵追上把他推下石灰池整死，梁炳绍立即回家向梁永仁(死者哥哥)报告永汉被打死的消息。梁永仁听后带上几个人到公社(大队)大喊大嚷要找梁永汉。这时宣传队正在开会，李翠奇、梁耀琼闻声出来制止，梁永仁便质问李翠奇，“梁永汉那里去了？”李不回答。梁永仁便火冒三丈，把带在身上的一枚手榴弹从窗口丢入屋内，因手榴弹落在床上有棉被阻挡，没有伤到人。李翠奇指着梁永仁说：“你为什么丢手榴弹？”即被梁永仁的随同抓住了手，紧接着梁永仁用土制短粉枪对准李的头部开枪，把李打死，然后又追打梁耀琼。打死李翠奇十分钟左右，区里配合宣传队的武装民兵赶到，当即包围杨屋山，派民兵追捕凶手，乘机搜捕“坏人”，当晚就炸毁了群众房屋 13 间，大队长陆有权(4·22)当场被炸死。一夜之间就捕杀了“4·22”观点的干部、群众 16 人。民兵把梁永保、梁永助、梁宁裕 3 人绑在榄子木根进行枪杀时，被教师陈杰玲看见，民兵怕陈报讯，便又将陈杀掉。手段极为残忍。这就是贵县木格“6·17”事件。

“6·17”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原湛江区公安员莫汝平、武装干事梁翠宁、农代会主任阎朝贵等 8 人，带着手枪，骑自行车到木格了解李翠奇被打死的情况，回路时，被木格岭塘大队守路的“4·22”群众检查，扣留在塘护小学，经请示县公检法军管会后，于次日才放回湛江。由于 6 月 17 日和 18 日连续发生两件事，陆千荣于 6 月 18 日向县革委办公室报告了李翠奇被打死的情况后，湛江、木格又分别向县“保红部”和正在县里参加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会的区革委会主任汇报。木格革委主任谢信炎即向县革委会主任张金会汇报，要求派民兵去支援，张金会不同意，要谢安心参加会议，相信在家的同志会处理。谢信炎由于派性作怪，串通县“保红部”的黄子旺、林如健、谭发祥等人，先后在贵县饭店四楼和桥圩秘密开会策划，决定调动各区民兵围攻木格新联，岭塘两个大队。木格区革委主任谢信炎任总指挥，湛江革委主任、县“保红部”负责人黄子旺任副总指挥(后黄实际任总指挥，谢任副总指挥)。6 月 20 日，由木格区李振轩(革委副主任、人武部长)，干部李天保、张金保、木梓区谭秉汉(革委主任)、干部苏国贵、新塘区刘锡棋(革委副主任、武装部长)、崔锦舜(革委常委)、谭烈高(区干部)，桥圩区罗裕忠(革委主任)，八塘区苏汉英(革委主任)，湛江区黄子旺(革委主任)、熊义富(革委副主任)，东津区李硕成(革委副主任)、李乃寿(公安员)，庆丰区黄必善(革委副主任)，大岭区甘旺衡(革委副主任)，石卡区李益慧(革委常委)，大圩区梁雁春(武装部长)和玉林山心区等 12 个区的革委主任或副主任或武装部长或常委率领武装民兵共计 1000 多人，对木格区的新联、岭塘两个大队的谭冯、腰岭、社塘、岭护、行塘等 5 个村庄实行包围。对“4·22”观点的干部、群众乱抓乱杀。武装民兵进村后，召开群众大会，当众宣布这次进村是收缴黑武器、清理外来人员和抓“4·22”坏头头。接着便按照谢信炎等人提供的所谓“坏头头”的名单，责令大队干部找出来，进行逼供信，到处搜查，抓人，打人杀人。李振轩、朱远球率领民兵进入行塘村后，责令原社长郑绍武逐个找出“坏头头”当即抓了区干部谢树照(回在家)，小学教师郑仕全、信用社会计谢经寿、团支书谢经贤、县土产仓干部郑社全(回在家)等 5 人，送区里审查关押。除释放 2 人外，其余谢树照、郑仕全、谢经贤等 3 人，责令大队写条子领回去斗打死去。桥圩区民兵在进入社塘村章面岭时，谭达纪(15 岁)、谭达宁(16 岁)、谭达德(17 岁)、谭利水(15 岁)、谭金生(17 岁)五个青少年学生因与民兵辩论，即被罗裕忠(桥圩区革委主任)下令民兵抓起来，押到和平大队，除谭金生 1 人放回家外，其余 4 人均被杀害。

20日下午谢信炎和黄子旺、谭烈高、谭秉汉等人汇合谭冯村后，在该村五中队禾堂开群众大会，谢说：我是代表区革委和民兵一起来收缴黑武器、清理外来人员，抓坏人的……，你们的村庄过去是革命村庄，现在变成反革命村庄，幸好你们不开枪，如果你们开一枪，我们民兵就打你千枪万枪，你杀我一个英雄民兵，我就杀你千个万个……。会后，诱捕了谭东，当晚夜深用县“保红部”派去的汽车运送到分水坳盘岭水库杀害。在武装民兵进村的三天时间内，新联大队的所谓“4·22”坏头头被抓去后杀害的有谭东、谭东蓝、谭达记，梁子立、谭献章等14人(其中外来人员3人)，被炸伤、打伤的有谭连助、谭福盛等4人，岭塘大队被抓去杀害的有党耀林、李丕进等2人。两个大队被抓56人，其中被杀害的16人。

6月23日，各区民兵撤离新联、岭塘两大队，谢信炎又以搞清理和巩固工作为由，留下木梓、新塘、石卡、大岭四个区的部份民兵作后盾，分别由苏国贵、谭烈高、李益慧、甘旺衡等人带领，和朱远球带领的木格区民兵，继续在新联大队，协助木格搞清理和巩固工作，结果继续大批地杀人，后果严重。

6月23日，谢信炎召开区革委常委和区干部会议，决定抽调区直单位和部份大队干部、学校领导，组成所谓宣传队。由谢信炎、陆千荣、郭士莲(常委、妇女主任)、雷毓云带领，先后进驻新联岭塘大队搞所谓清理和巩固工作。在宣传队进驻新联大队和进驻民兵汇合后，布置每个生产队挑选两名民兵建立所谓保卫红色政权民兵组织，强调要继续清理收缴黑武器，发动群众“反戈一击”，抓“4·22”“坏头头”，对所谓阶级敌人实行专政。由于在谢信炎的派性观点指导下，宣传队在新联大队先后召开了三次批斗大会，进行大规模杀人。每次批斗大会宣传队都事先把木棍拿到会场，强迫成批打死人。手段极其残忍。第一批在谭冯学校开批斗会，要原大队支书谭积业主持会场，宣传队李益慧(石卡区革委常委)在会上讲话后，开始批斗。当场打死了邓开礼、邓月波(父子俩)、谭初基、谭自华、谭育德、谭乃才、谭章等7人。第二批在社塘三队禾堂，混岭、社塘两个片合并开批斗会，谭积业主持会场，宣传队陆千荣(木格区革委副主任)讲话，批斗会上打死了吴炳煜、吴高安、吴炳助、谭秀英、吴金华，吴其安、黄崇珍、谭科贤、谭科泽、谭良柱、吴进刚等11人。第三批在社塘村三队禾堂，召开全大队批斗会，朱远球(木格区干部)主持讲话，原计划打死谭章全(团支书)、吴匡民、谭洁珍等3人。谭职槐、谭职卫、谭科志、谭步志、谭连权。谭连可等6人作为陪斗。结果连陪斗在内共打死了9人。谢信炎、陆千荣、朱远球等人还强令地、富分子逐个拉去成堆掩埋，不准受害者家属收尸。

7月中旬，陆千荣、郭士莲，朱远球带领宣传队和本区武装民兵转移到岭塘大队搞清理和巩固工作。先开生产队干部会议，建立所谓保卫红色政权民兵组织，推选李炳贵(复退军人，后任大队党支书，现为贵钢工人)为队长，郑家富(复退军人，留党察看一年)为副队长。首先组织批斗原大队党支书谭德秋、社长郑绍武，后分片召开批斗会。第一批岭护片在岭护小学开批斗会，由李炳贵主持讲话，当场打死党文照、周丽娟、梁彩、李贵、李育林、党柱南、杨月英、谭木祥、梁桂芳、谭观龙、谭桂光(烈属)等11人。行塘片在行塘小学开批斗会，郑家富主持会场，会上打死李响芳、谭木英2人。第二批在岭护学校开全大队批斗会，郑家富主持会场，李炳贵讲话并宣布被斗人的“罪状”，陆千荣、郭士莲、朱远球等人参加了大会。会上打死谢经贤、郑仕全、谭德铨3人。宣传队进驻新联、岭塘两个大队后，组织批斗共打死47人。其中新联大队被打死30人，岭塘大队被打死17人。从“6·17”事件的发生到12个区的武装民兵围攻进驻新联、岭

塘两个大队屠杀“4·22”观点的干部、群众的影响下，全木格区被打死、杀死和逼害致死的干部、群众、学生达 490 人之多，极为悲惨。

据统计，贵县革委政工会议后，各地继续向所谓阶级敌人猛烈进攻，“刮十二级台风”乱抓一乱杀人，至使一大批人遭难。全县五、六月份就有 2129 人被斗、打、杀死。

1968 年 4 月 22 日，桂平县革委召开革委常委会议，由县公检法军管会负责人费志功传达专区公检法军管会紧急会议精神，强调要狠抓阶级斗争，清理外来人员，收缴黑枪黑弹，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刮十二级台风”，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县革委决定，4 月 23 日召开县城各单位领导班子会议，24 日召开机关干部、职工大会，贯彻、宣传大造“刮十二级台风”声势。组织 150 人的工农纠察队，队长：徐文中，指导员王日章。纠察队全部武装起来。接着在公社革委一级进行传达，4 月 30 日，石咀公社革委会成立了 30—40 名的工农纠察队。召开机关干部、居民大会动员，布置各大队进行大游斗，5 月 6 日南木公社狠抓阶级斗争，“刮十二级台风”全面动员，每个大队有 7—8 人专门研究“刮十二级台风”（杀人），发生乱杀人的事件。

1968 年 4 月 30 日，县革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专区革委会首次政工会议精神，研究如何狠抓阶级斗争，“刮十二级台风”的问题。主持人冯祖茂，常委冯祖茂、李合盛、倪松波、陈家文、罗杰伟、梁一俊出席会议。杨立江、戴文高、闭炎秋列席会议。经研究决定，以到沙坡公社办学习班的方法进行全面贯彻，由冯祖茂带工作组深入沙坡公社做准备工作。

5 月 2 日，沙坡会议前，桂平县革委会先在县城召开革委会副主任会议，由冯祖茂传达专区政工会议精神，并作了会议总结报告，强调进一步克服右倾思想；把抓阶级斗争，“十二级台风”刮起来刮到底，布置作好参加沙坡会议的准备工作，要求留家的副主任要边贯彻边行动，配合沙坡会议，做到会内会外热。5 月 8 日至 16 日县革委会在沙坡举办桂平县第三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会议，由冯祖茂主持办班。传达贯彻专区革委会政工会议精神，研究如何狠抓阶级斗争，“刮十二级台风”的问题。参加会议有县革委的全体成员，各公社革委会的领导、大队主要干部、县直和社直单位的领导成员 1479 人。会议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为指导思想，选择了二十三条有关阶级斗争语录和《文汇报》社论《再刮它一场十二级台风》等四篇文章印发。县革委副主任冯祖茂在学习班上作报告。他在报告中列举“阶级敌人”破坏的“十种表现”后，又批判了七种右倾思想。接着又提出了开展“三查”（查阶级斗争观念、查敌情、查斗志），要主动地、猛烈地、连续地向阶级敌人进攻，并举起右手振臂高呼：“冲呀！冲呀！冲呀！”，发起要向阶级敌人“刮十二级台风”的冲锋号，明确布置“凡是群众要求斗争的人，都不要保”，“不要给群众泼冷水”。原县委副书记张朝光、副县长谢兆平被拉到会上；交给参加学习班的干部、群众对他们进行残酷斗争。结果张朝光被打致重伤。沙坡食品站有个刚从学校分配来的女青年朱卫东，她原属“4·22”观点，由于说了一些坚持派性的话，会议即把她列为“公开反对共产党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对她进行斗打致伤，并被剪去头发。

沙坡会议期间，首先在沙坡公社“刮起十二级台风”，村村垌垌摆战场，参加批斗会的有 15000 多人，对在机关、学校中出身不好的，历史上有过失的、四清中被批斗过的、参加过“4·22”或者有“4·22”观点的、以及农村中的四类分子或有偷、奸行为者共有 150 人，被列为阶级敌人，对他们进行狠批猛斗；有

个“4·22”头头的父亲蒙运海跑上山躲避，参加沙坡会议的代表，民兵百余人实施围山捕捉。并采取放火烧山逼迫就擒的办法，当发现蒙运海时，带队人陈琼叙便立即开枪(未击中)，接着被另一民兵开枪击中受重伤，后叫四类分子抬回沙坡，因不进行救治，当晚死亡。

沙坡会议结束时，冯祖茂在会上作总结报告。冯说：“这次会议是样板”，号召向沙坡学习，大打人民战争，再次强调要向阶级敌人“刮十二级台风”。会后，在全县范围内贯彻，从城镇到农村掀起乱斗、乱打、乱杀人的。“对敌”斗争新高潮。全县有19个公社(镇)召开了万人的所谓对敌斗争群众大会，参加斗争的有278500人，被斗争的有2000多人。1968年五、六两个月，全县被斗、打逼害致死的共有417人。其中当场打死的有261人，斗打后死亡的有47人，被迫自杀的103人，失踪的6人。

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针对广西问题，发布了“7·3”布告。内容是：一、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二、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运输；三、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四、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解放军武器装备；五、一切人员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又发布了“7·24”布告，主要内容是针对陕西问题，重申了“7·3”布告精神，要求任何群众组织、团体、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不得违抗。这两个布告发布后，专区和各县(镇)分别发出贯彻“7·3”和“7·24”布告的通知，号召以“7·3”布告为强大的政治威力，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做好“三查一清”活动，清理阶级队伍，再次掀起“刮十二级台风”杀害干部、群众的事件继续发生。这些受迫害的干部、群众多是参加“4·22”群众组织和“4·22”观点的干部、群众。各地成立革委会时，代表“4·22”少数派或持“4·22”观点参加革委成员的同志，在这次所谓深挖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运动中，亦受到审查批斗和迫害。

贵县革委把“7·3”布告当作是对阶级敌人发起新的猛烈进攻的进军号。7月8日上午县革委召开各区电话会议，传达“7·3”布告，9至11日，县革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学习“布告”精神，研究贯彻执行措施，印发“7·3”布告，组织宣传队下乡，把贯彻执行“7·3”布告作为七、八月份中心任务来抓。21日上午，县城召开宣传贯彻“7·3”布告的誓师大会，22日，张金会参加军区扩大会议回来后，召开县直单位革委主任、工代会组长会议，介绍南宁贯彻执行“7·3”布告的情况。22日晚，张金会签发了县革委保卫部的紧急戒严令，于是县城从23日上午4时到24日晚全城实行戒严。这次戒严清理出外来人员229人，其中南宁来的54人，柳州来的69人，桂林来的10人，本县各地流入的32人，其他县来的64人。对清理出的外来人员，采取三个办法处理：1、未发现违法行为的限令回原单位；2、有一般违法行为的，武装部押送回原单位；3、本县流入的五类分子、坏头头，由公社民兵领回批斗处理(这批人后来在押回单位时大部分被杀害)。7月17日至23日，县“保红部”派张子健、叶其伟等人到南宁查捕“4·13”事件后逃往南宁的少数派5人，并分两批在南宁郊区全部枪杀了。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7·24”布告后，1968年8月15日晚上，贵县革委常委开会，由革委会副主任郭殿臣传达自治区会议精神。他传达了广西军区焦红光副司令员的总结讲话，其中有：我们要广泛宣传“7·3”、“7·24”布告，进一步开展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声势要

大，发动群众起来揪坏人，收缴武器，再“刮它十二级台风”，把一切阶级敌人搞出来。传达后，全县进一步掀起了大批大斗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叛徒”、“特务”的高潮。由大队民兵或群众对上述人员实行“专政”，据统计，七、八、九月全县又有 850 多人被打死、杀死、迫害致死。

1968 年 7 月 7 日凌晨 2 时许，桂平县革委会接到中央 1968 年 7 月 3 日发布的解决广西问题的布告(简称“7·3”布告)。7 月 14 日，县革委常委开会，成立贯彻《7·8 布告》领导小组，潘炎华任组长，李合盛任副组长。潘炎华在会上提出：“当前总的指导思想，是以布告为动力，进一步开展‘三查’(查走资派的幕后活动、查叛徒、特务，查地、富、反、坏、右的破坏活动)，清理阶级队伍掀起革命大批判的高潮。稳、准、狠打击阶级敌人”。县革委会还连续发出(68)37、38、45 号文件，强调要深挖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7 月 21 日，县革委会在县城召开有 8000 人参加的贯彻《7·3 布告》誓师大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7 月 22 日晚上，潘炎华主持召开公社革委领导电话会议，革委会主任潘获枫讲话，要求各公社再开万人“对敌”斗争大会，提出“斗则进、不斗则退，的动员令，布置各公社认真贯彻《7·3 布告》，并规定各公社都要召开万人大会，发动群众，把“十二级台风”刮得更猛。这次电话会议后，各公社立即筹备再次召开万人大会。大多数公社、大队又出现乱斗、乱打死人的事件。7 月 23 日这天，全县各公社、镇参加万人大会的总人数达 37 万余人。7 月 25 日至 28 日，县革委会在蒙圩公社又召开各公社革委主任和县直单位负责人碰头会，总结前段贯彻《7·3 布告》经验，部署下一步做法。强调把贯彻《7·3 布告》作为头等政治任务来抓。会上还批斗了公安局长、革委成员、革委保卫组长彭勳君(曾参加专区公检法军管会紧急会议)、副局长梁光河、副检察长黎文志、公安干部吴伟忠等 4 人。蒙圩会议后，全县再次“刮十二级台风”揪斗各级革委会成员(“4·22”派成员，或“4·22”观点的成员)的所谓深挖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作为主要特征。8 月 18 日，县革委会在县人民礼堂召开各公社、镇正、副主任、县直单位负责人会议，潘炎华在会上提出：“要进一步贯彻执行《7·3 布告》，迎接自治区革委会光荣诞生，我们要大战八、九月，把一切阶级敌人挖出来，清算他们的罪行。我们不趁《7·8 布告》东风，大批敌人残渣余孽，我们就失去战机。各公社、大队和县直单位贯彻这次会议，继续“刮十二级台风”。县“三代会”(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密切配合，以“三代会”名义发出一、二号通告，声明要“追穷寇”。把“阶级敌人”打得落花流水。县城的纠察队和公社的“农联”，趁机乱斗乱罚没收乱抄家，迫死人命不断发生。自贯彻《7·3 布告》以来到九月底止，全县被斗打、迫害致死的达 255 人。其中当场斗死打死 155 人，斗打后死亡的 35 人，自杀的 60 人，失踪 3 人。

陆川在贯彻“7·3”布告后，陆川“红联”组织对南宁围攻“4·22”据点表示支持。并派人到南宁领出陆川“4·22”被俘人员，进行审讯、搞活人展览和杀害，使被俘人员备受侮辱。

1968 年 7 月 11 日，陆川县“红联”派谭镜勳、陈树明两人带领各公社“红联”代表(每公社 1 人)到南宁，送给南宁“联指”手榴弹两箱(县“红联”自制的)，以支持南宁“联指”攻打“4·22”据点。这些代表在南宁期间，先后两次从南宁“联指”领出陆川跑到南宁据点的“4·22”群众共 12 人。第二次领出 6 人，押到邕江边杀死后，把尸体推下邕江。第二次领出 6 人，在朝阳旅社交给南宁“联指”学生红卫兵看守，以后下落不明。

7 月下旬，陆川“红联”组织有吕志、吴绍盈参加的 30 多人的慰问团，带

着各机关、大队、生产队捐赠的物资，计有猪、鸡、鸭、粮食、蔬菜、水果等六个汽车送到南宁，慰问参加围攻“4·22”的解放军和“联指”人员。

8月下旬，县武装部和公检法军管会派武装部科长庞宗贤，带领军管会和县“红联”指挥部的丘俊明、罗建光、陶忠卫、占友文、张寿勋、吕学荣等人到南宁领回在南宁抓获的陆川造反大军人员86人。解回玉林，关押在专区幼儿园审讯。在审讯时，县军管会又增派王才元、覃继华、陈伟到去审讯。在押解途中，平乐公社一位妇女，因在裤头收藏5元钱不交，被丘俊明、张寿勋、吕学荣拳打脚踢致重伤，在专区幼儿园死亡。在玉林专区审讯20多天后，剩下85人解押回陆川县收容所关押，继续审讯。9月，经县武装部领导批准，由县公检法搞所谓活人展览。在展览中，女的剃成阴阳头、男的挂牌，加以各种丑化，公开宣传。在县收容所关押期间，陈庆元、罗培盛等人被吕志领出杀害。罗宗芳被刘炳光等人领出杀害，有的被折磨死于狱中，有的后来释放。

以上是陆川、贵县、桂平等三个县在贯彻专区公检法军管会紧急会议后专区革委首次政工会议和中央“7·3”布告，连续三次“刮十二级台风”，乱抓、乱杀人事件的写照。其他北流、博白、容县等各县在贯彻上述会议和“7·3”布告，“刮十二级台风”，是与陆川、贵县、桂平三个县同时贯彻进行的，乱抓、乱杀人也是严重的，因事件的发生起因、经过相同，各县大事记、大事件有记载，这里就不记载了。

玉林专区在专区革委会成立后，“刮十二级台风”乱抓、乱杀人，是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有部署、由上到一下层层布置进行的。玉林军分区、玉林专区革委会、玉林专区公检法军管会的主要负责人，提出反击“右倾翻案风”、主动地、连续地、猛烈地、全面地向阶级敌人进攻，实行群众专政，“刮十二级台风”，县、公社、大队则把“刮十二级台风”逐步具体化，出现乱杀人的情况后，玉林军分区、玉林专区革委会、玉林专区公检法军管会的主要负责人也制止过，但是很不得力，只不过是扬汤止沸，所以是制而不止，越演越烈。给全区人民群众带来严重灾难和极大损失。

在“处遗”工作中，根据党纪国法，对杀人主谋、杀人凶手逮捕法办，给予应得的惩罚。对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也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对受害者进行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对受害者遗属发给丧葬费，抚恤费和抚养费。安置了死者遗属工作，为消除裂痕，增强团结，做了大量工作。

宾阳惨案

一九六八年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宾阳县在贯彻中央“七·三”布告的十多天内发生了乱打死三千六百八十一人的严重事件。杀人数量之多，手段之残忍，骇人听闻，在宾阳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演出这场大批乱打死人的历史悲剧，是当时县主要领导王建勋、王贵增等组织策划进行的。

（一）

一九六八年七月，中央为了解决广西“文革”中出现的打、砸、抢、抄等严重问题，发下了“七·三”布告。《布告》声称：“最近两个月来，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蒙蔽和欺骗一部分群众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强调：“要牢牢地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

七月二十日中午，县革委副主任、县人武部政委王贵增在县革委召开区、镇

干部和下乡宣传队的电话会议上讲话强调：“把阶级敌人揭出来，广大群众公认为坏人的，要坚决打击，坚决处理。有些事情你们可请示，有些有把握的不请示。”又说：“三个镇(芦墟、新宾、黎塘)坏人不少”，“我们是否有心慈手软？应干就干，怕什么？”根据电话会议精神全县一百七十三个公社(后改为大从)普遍召开会议贯彻，并同时以社为单位举办贯彻落实“七·三”布告骨干学习班进行所谓“武装思想”。

七月廿四日，宾阳县革委成立，由王建勋(六九四九部队副师长、县革委主任)、王贵增(县武装部政委、县革委副主任)、凌文华(六九四九部队独立营副政委)、黄智源(六九四九部队教导员、县革委常委、支左办公室副主任)等四人组成的贯彻落实“七·三”布告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立后，即指示县公、检、法军管会及时了解和掌握“敌情”。宾阳县公、检、法军管会副主任蒙伍存(人武部军事科副科长)以军管会的名义用电话通知基层公安员搜集“敌情”，又给基层派出所、法庭发出宾军管办字(68)第5号《关于掌握情况的通知》，要求在七月二十日前将“敌情”汇报到县。

七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时，王建勋叫新宾镇革委副主任兼武装部长李发新通知该镇革委主任何其清到新宾区谈话，新宾区革委会主任何作人也在座。在谈话中王建勋对两何批评说：“你们新宾地区贯彻‘七·三’布告很不够，行动不力，阶级敌人还很嚣张，如东风街的反革命分子伪军少校黄德三，还穿着伪军服到部队门前示威，乌龙四(罗桂昌)这家伙还跳得很高，你们要很好发动群众批斗他们。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在批斗中，即使群众有些过激的语言或行动，我们也不要出面指责、制止或泼冷水。但有一条，不准动用武器。回去后找各单位头头来开个会，贯彻下去。”

七月二十六日，县革委在新宾派出所召开三区(芦墟区、新宾区、邹墟区)、两镇(芦墟镇、新宾镇)公安员、派出所长会议，王建勋在会上说：“对坏人处理，杀个把不要紧。杀人犯的要干掉，民愤大的可以干掉。‘七·三’布告是什么时候了？坏人可以专政。”还说：“掌握斗争的深度广度，轻的交给群众搞，要相信群众，真正死就死吧！我们对他们不能讲理，两个阶级，不是我们消灭他，就是他消灭我们，和平共处是不行的。”王建勋在讲话时还点名：“对罗桂昌(劳释犯绰号乌龙四)要专他的政，但革委会不要开这个口。”

“三区二镇”会议一结束，各区镇都赶回去召开区革委领导和各公社领导会议，传达王建勋的讲话，大造杀人舆论。七月二十六日新宾镇在派出所楼上召开镇直属机关、派出所、各街道、农业大队负责人会议。何其清在会上传达王建勋在新宾区的指示精神后，派出所所长黄兆仁即将四类分子名单和他们的表现逐个向与会人员介绍，接着各个街道、单位作补充。东风街主任谢绍忠说：“东风街黄德三、罗桂昌跳得很凶，也很嚣张，黄德三还穿着伪军少校服装去部队门前示威，应该批”。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在会上也提出了要批斗的一些名单。何其清、李发新、黎业洪(镇革委常委)、黄兆仁都一一将这些名单记录了下来。会议最后决定先由东风街组织批斗黄德三、罗桂昌。当晚，东风街革委组织群众在南桥头召开批斗黄、罗大会，还拉陆沛周(新宾镇联中老师，“四·二二”派)去陪斗。斗争大会开到十点多钟，黄、罗就被群众用石头、木棍当场打死。拉去陪斗的陆沛周被押回镇审讯，逼他交代自己是“反共救国团”成员问题。陆沛周不承认，何其清认为陆不老实交代，便说“做去！做去！（打死去）”。谢绍忠便叫赖德亮说：“阿亮，将陆沛周押到指南针处”。赖德亮将陆沛周押到指定的地点，叫陆沛周跪下，谢绍忠当即开枪打死陆。

七月二十七日早上(即打死黄德三、罗桂昌、陆沛周第二天早上),何其清在镇革委会议室召开有关人员会议,具体布置当天杀人的行动。参加会议的有:何其清、李发新、黎业洪、黄兆仁以及纠察队员曾祥稳(农业大队文书、纠察队副队长)、宋日光(南街主任、纠察队副指导员)、谢绍忠(东风街主任、纠察队队长)、张光礼(市管委负责人、纠察队员)等十多人。何其清首先说:“今天是新宾墟日,各区有人来参观我们贯彻‘七·三’布告情况,我们要抓一些人来游街,大造落实‘七·三’布告声势”。何讲完话,大家拟出了游街人的名单。李发新吩咐纠察队按照名单去抓人,并把抓来的都挂上牌子游至预定的地点打死。李发新布置:“分三个地方执行,下是指南针脚下,由宋日光负责带队打死五个人;二是去三中岔路口,由曾祥稳带队负责打死四个人;三是由谢绍忠带队去武陵路口打死三个人”。当天上午何其清还派张光礼、谢绍忠到公安局看守所押罗龙生、湛世君(“四·二二”派宾中学生头头之一,现黎塘水泥厂工人)回新宾镇。去前,何其清交代张、谢两人:“回到半路将罗龙生当作逃跑处理。”张、谢两人按何的布置,将罗龙生押回到邕柳公路与往南街三岔路口时,开枪打死罗,并将事先写好的所谓“反共救国团骨干——罗龙生”牌子放在死者身上。湛世君幸存被押回新宾镇。

同一天,李发新还派张光礼、黄振多到古辣公社义陈大队抓回插队青年黄宁基,当晚交给纠察队批斗,没有得到什么结果,黎业洪、张光礼、黄祥基、周作标、宋目光、曾祥稳等人就将黄宁基拉至新宾风景路用绳子勒死。

七月二十七日晚新宾镇革委还召开了所谓落实“七·三”布告和执行王副师长指示的总结会,李发新在会上把上述杀人事件总结为所谓“行动迅速”,“执行指示坚决”。

七月二十七日,原新宾区蒋何公社革委主任黄宝荣,在公社干部、民兵骨干会议上传达完王建勋的讲话精神后,组织与会人员研究所谓“专政”名单,布置当晚分片批斗四类分子,并按原定计划于晚上九时把“专政”对象二十七人拉至周背岭(地名)进行集体枪杀。

七月二十七日,王建勋到新桥区检查,对区革委副主任韦文英说:“新宾的风吹到你们这里来了吗?”新桥区根据王建勋的授意,于次日在区小食堂召开公社支书、工作队长、区直机关领导紧急会议进行策划并于二十九日召开大会,各社把所谓“专政”重点人和“二十三种人”押来批斗。这天斗争大会共打死八人。

七月二十八日,县人民医院“联指”派头头之一卢尚宝,根据“三区两镇”会议精神,将所谓有问题的院长李贵生、副院长兼内科主任邓启俊、外科主任刘大德、妇产科主任刘霄桐、药剂师卢长祥、会计梁志颖、总务杨志共七人,集中挂牌,并派医院职工陈国亮负责将他们列队从新宾至县城芦墟游街示众,当游到芦墟中心十字路口跪下“请罪”时,全部被群众用石头、木棍打死,有的被打得脑浆四溅,惨不忍睹。当驻医院宣传队长李明回县向王建勋汇报这一事件的情况时,王建勋说:“医院一百多人死他十几二十多个算什么?现在刚刚开始!还要回去给他们讲清,要鼓起劲,挺起腰杆干下去,不要死了几个人就怕了。”李明听了王建勋的话,杀劲也鼓起来了,七月三十日亲自点名派人将骆毅(医院干部)、陈颖佛(医院干部)拉到新宾街给人打死。

(二)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为了在全县范围进一步落实“七·三”布告,宾阳县公检法“军管会”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全县各区镇派出所长、公安员和

县公检法机关全体干部。二十八日没有开会，到会人员上街观看芦墟街打死人现场，二十九日上午，会议正式召开，会议由县人武部军事科副科长兼公检法军管会副主任蒙伍存主持并讲话，蒙说：“我们打击的锋芒要对准判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二十三种人’，有破坏活动的也要搞一搞，斗一斗，对投机倒把的也要扫一扫他。”“对四类分子要干掉他四分之一”“我们的同志此次下去，以当观察员的身份出现，主要的任务是观察，当好革委的参谋。”，“要下去点火，现在形势你们都看到了，要向阶级敌人猛烈进攻，要声势浩大，不能右倾。”，“真正的坏人被群众杀了，也没有什么奇怪，绝对不能去泼冷水。”，“发现有重大线索的阶级敌人，要马上弄清，我们要亲自出马，进行审讯”，“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宾阳有，总头子在广州，头头来过我们这里，吴镇裕是骨干。”，“边斗争，边追查罪恶事实线索和根据，这样才能稳、准、狠，不然该死的没死，不该死的早死了。”，“群众已经认为是坏人的，必须先斗争搞臭再‘专政’，最好是发动群众用石头和木棍打死他们，杀坏人不要用枪，不要子弹，更不能采用成群来用枪杀，这样教育群众不大，要在群众中零敲碎打。”接着，六九四九部队副师长兼宾阳县革命委员会主任王建勋讲话，他说：“我们打这一仗，时间从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为一段落，这段斗争的锋芒主要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次要的是投机倒把分子，赌头、闹分队的为首分子，县的重点在新宾、芦墟，现在新宾已拉开序幕，不要看不惯，气可鼓不可泄，这些人交给群众‘专政’，用不到三天时间就干掉了，又不花一枪一弹，这个任务要执行，但又不能开大会，大张旗鼓去发动，只能个别点火，群众认为是坏人的要‘专政’，你们不能束缚群众手脚，群众起来了不能泼冷水。”“这次行动，时间三天，行动好坏是衡量那个地区领导的觉悟如何了，今天我讲的，只能是在座的知道，回去后不能说是上级布置，就是你们讲我也是不认帐的。”

王建勋说完后，蒙伍存通知事先安排好的派到各区、镇充当观察员的公安员留下，宣布分工名单，每个区派一至二人，当时被派下去的人员有的不懂工作如何进行，纷纷提出各种问题，蒙伍存一一作了解答。会议就这样结束。

七月二十九日下午，县革委在大礼堂召开全县各区武装部长和小公社民兵营长紧急会议，会议由宾阳县人武部政委兼宾阳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贵增主持并讲话，他说：“区镇武装部要办民兵营长学习班，学习内容是对‘七·三’、‘七·二四’布告的理解。”，“以生产队为单位办基干民兵学习班，内容方法与上面同。”“毛主席叫我们向阶级敌人进攻，但要稳、准、狠，把这场对敌斗争的人民战争进行到底，只要是阶级敌人，不管什么观点，都要斗争，要点革命火。是坏人一个也不能放过，是好人一个也不能损害。”。王建勋接着在会上讲话，他说：“这几天都动起来了，有的动得有力，有些动不力，有些还在那里拖拖拉拉的不动，各区应分别讨论一下，回去统一行动。两个布告一个批示主要精神就是发动群众，猛烈地、主动地向阶级敌人进攻。主要斗争锋芒是哪些人？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这些牛鬼蛇神。在农村在城镇都要对准这一小撮阶级敌人。还有其他事情也要扫一扫，投机倒把首要分子、头子、赌棍、赌头，分队的地方查一查，谁在里头搞破坏活动，叫生产队长交出来。”，“现在先抓外边，后抓内边坏的。……运动开展，民兵营长、公社干部抓几个坏人是可以的。但是发动群众起来，由群众处理，群众整他，不要浪费子弹，由群众斗他、整他、处理他，这样才能发动起来。把罪大恶极的交群众处理。”，“群众起来后，甚至打死些坏人，革委会成员不能泼群众冷水，民兵

营长也如此。……”不能讲可以杀人，谁个讲就变为幕后指挥。如果是真正坏人，群众认识，由群众斗，就会报销。”民兵营长紧急会议当天结束。

七月二十九日晚上，县革委会召开了革委工作人员会议，王建勋在会上说：“对群众的看法，群众未发动起来前，说敌人猖狂，要杀几个，群众起来，又东指责西指责，又认为乱了，你是站在群众面前领导群众前进呢？还是站在群众后面指手划脚制止群众运动，如果不是领导群众，那就考虑你的立场问题了。”

县革委召开的上述公检法“军管会”，区武装部长和小公社民兵营长会，县革委工作人员会，是组织、策划、布置杀人的一系列会议。特别在会上对新宾严重杀人事件在会上不但没有受到批评，而是当作杀人序幕，导致了后来在全县发生了一系列的严重杀人事件。

①七月二十九日，大桥区罗江公社民兵营长李庆生，从县民兵营长会议结束回到小公社，当即召集公社“抓促”领导小组成员开会，参加会议的有该社“抓促”领导小组组长李毓军，副组长李帝严，成员李树杰、陈宽文、丁孔德、丁家进、陈利文等八人。李庆生主持会议并传达王建勋等人在民兵营长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并在会上策划打死吕村的蓝学珍、吴善成。老罗村丁造德。黄岭村陈志道。新罗村的丁祖才。长江村的严付邦、严洗仁等八人。30日晚在公社召开群众大会，由各村民兵连长把要杀的人押到公社批斗。当晚参加会议的群众约有二、三百人，会上李毓军讲话，号召群众向“阶级敌人”开展猛烈进攻，接着批斗丁造德，然后由李庆生宣布上述八人的罪状。会一结束，即由长江村的民兵骨干，积极分子严一民、严振才，黄岭村的陈利文、陈京虞，老罗村的吕启华等人将这八人拉到老罗村的卯息岭瓦窑地方乱棍打死。

八月二日下午，该社“抓促”领导小组又召开全体成员会议，参加会议人员：李毓军、李庆生、李帝严、李树杰、陈宽文、丁孔德、丁家进、陈翻文等八人，会议由李庆生主持，由李毓军传达区革委八月一日召开的“进一步贯彻落实‘七·三’布告会议精神”。会议正在开始，原大桥区革委副主任雷福贤、干部李开贤来到罗江公社检查落实“七·三”布告(敌打死人)的情况，雷即找李毓军汇报，并对李说：“你们要吸取第一批的教训，都是打些老太婆，有活动能力的伪军官、伪职员都没有打。”还说“我来不是要生产进度，是来要你们打死人的进度的。”并伸出他两手掌对李说，你们公社起码要搞他一百个(打死)。雷、李走后，公社“抓促”领导小组成员继续开会，大家讨论，仍由各村提出要打死的人名单：吕村的李树辉、吕孔昭，黄岭村的陈简文、陈昭道，新罗村的丁祖琪，长江村严济邦。研究决定后即分头回村通知群众及民兵，下午在公社召开批斗大会，并叫各村民兵连长下午三时将上述六人带到公社。下午四时左右大会开始，到会群众约三、四百人，李庆生主持会议，李毓军讲话：号召群众继续向阶级敌人开展猛烈进攻，以实际行动落实“七·三”布告。后由李庆生宣布六人的罪状和对他们实行“专政”，接着参加会议的纠察队、民兵骨干把这六人拉到公社西面的瓦窑边打死。到现场的公社“抓促”领导成员有李庆生、丁家进、陈利文。长江村地主分子严济邦被打死后，在场的陈其家、李树恩(久患哮喘病)，听说吃人肝可治哮喘病，想取严的肝吃，但因久病体弱，无法动手，正在旁边的陈经邦(曾做过屠夫)看见后，即手持杀猪刀割开严的腹部，用木棍撬出肝，陈其家用刀割下挂在学校边的桉树枝上，然后和李树恩分别拿回家煮吃。严的肝被割后，肠子外流，遍身血污，其惨景真是目不忍睹。

②七月二十九日，甘棠区甘棠公社民兵营长梁汉生参加县的民兵营长紧急会议回去后，召开公社干部及生产队干部会议传达贯彻王建勋的讲话精神，会上布

置分片规划“专政”名单，会后打死二十五人。三十日，公社“抓促”领导小组成员姚尚强带领民兵将王宗博拉到遗爱桥头用木棍、石头活活打死。为了防止其弟日后报复，又派人到甘棠中学等候，待其弟王宗升从峦城取鱼苗回来时又将他打死。打死这两兄弟后，又抄家。八月三日晚，姚尚强兽性发作，窜到王宗博家对其妻颜秀清进行威胁并将颜强奸。颜秀清被强奸后，隔两晚，关有志又闯入屋内，企图强奸颜秀清，后因颜哭喊，关强奸未得逞。颜秀清和小婢陆爱玲年轻守寡，感到无法在这里继续生活下去，逼得颜秀清带着小女儿改嫁到邓村大队，小婢陆爱玲也改嫁到那宁大队，房屋被生产队没收作牛栏和仓库，王宗博的女儿王丽竹跟母改嫁到邓村大队那洞村后，一直受人歧视，讽刺打击，精神上受到极大摧残，致使神经失常。

七月底，王建勋打电话批评甘棠区革委主任、武装部长李洪旺说：“你们贯彻‘七·三’布告抓得不力，要依靠群众，充分发动群众，不要束缚群众手脚。”李洪旺受批评后下到高棠公社，当晚就组织群众批斗并打死四人。该区到八月一日，共打死一百六十多人。

③七月底，王建勋打电话给思陇区，批评他们：“你们行动太慢。”思陇区受到王建勋的批评后，立即召开区革委常委扩大会，并采取紧急措施，决定将南关、胜龙、平安、黄冠等四个公社和区直机关等单位的所谓“专政”对象共三十七人，统一集中到六进坪(地名)全打死。

④七月二十九日，原古辣区义陈公社民兵营长陈汉章参加了县革委会召开的民兵营长会议，会上听取了王建勋关于向阶级敌人“猛烈进攻”的讲话后，在会议讨论期间，便规划了本社专政对象名单：韦恒有、韦锦枝、赖焕香、彭树林、陈文中、赖仓玉、李武基等七人，报给区革委副主任黄明安。

县民兵营长会议结束的当天下午，陈汉章回到本公社，向大队支书陈梦清、公社主任李世安汇报会议精神，征得他俩同意，决定开支委会传达县民兵营长会议精神，然后，三人分头通知各片支委。

七月三十一日，支委会在社办公室中楼召开，陈梦清主持会议，陈汉章传达县民兵营长紧急会议精神，陈汉章把他在县规划的名单讲给支委听，然后组织大家讨论。最后，会议决定召开支部扩大会议和群众誓师大会。

八月一日，该社在古辣镇宾墟三眼铺召开了支委扩大会议，公社定工干部、党员、生产队长、贫协代表、民兵骨干约七十人左右参加了会议，古辣区下乡宣传队蒙泽前、韦世典、吴绍青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由陈梦清主持，陈汉章传达王建勋的讲话精神，要求迅速行动起来向阶级敌人开展猛烈进攻。区干部韦世典代表宣传队在会上讲了话，强调要打主动仗，不要打被动仗。会上，陈梦清还布置要求公社定工干部“原在哪个片就负责那个片的讨论，要联系本社、队实际，把‘专政’对象落实好。”

当日下午，各片负责人向陈梦清、陈汉章汇报“专政”对象数字，大陈片负责人报“专政”名单七人；义陈片负责人陈庚秀报八人；平南片负责人李世安报四人；黎元片负责人陈梦清报二人；小满片负责人陈汉章报二人；七联、龙泉片报四人，总共二十七人。“专政”名单落实后，陈梦清布置八月二日开群众大会，地点在陈屋家庙，四类分子集中在镇宾墟中间地坪。“专政”时(即用棍打死人时)由各村自己行动，布置完后散会。

八月二日，按骨干会议的布置，群众誓师大会在陈屋家庙召开，参加会议的群众有二千人左右。陈梦清主持会议，陈汉章传达县会议精神，会议开了两个钟头后由治保主任胡付香、陈庚秀负责组织批斗“专政”对象。批斗后即由各片民

兵将“专政”对象拉到原公社办公室铁门外捆绑，然后由陈茂秀、陈汉宁、陈庚秀、陈锡英等人集体押到古辣墟北面渡塘岭，由凶手韦统和、韦悦应(已死)、韦精忠、韦子宣、陈济林、陈汉宁、陈锡英、黎宁林、李友邦、陈庆齐、陈圣元(已死)等人用木棍打死，在这一事件中，受害者共有二十四人，全部是群众。

⑤七月二十九日，原大桥区丰州公社民兵营长兼“抓促”领导小组副组长黄伟善参加县民兵营长会议，当天下午回去在公社办公室向该社党支部书记黄永宋、主任江超世、文书兼“抓促”领导小组组长江明昌等人汇报，当天决定次日召开生产队干部以上的会议传达民兵营长会议精神。七月三十日，黄伟善传达完六九四九部队副师长王建勋关于贯彻“七·三”布告的指示，接着经黄永宋同意，领导班子留下研究，决定当晚分片召开批斗会以及交群众斗争处决的名单。黄永宋强调说：“今晚分片召开批斗大会，各片要注意斗争锋芒，各片负责人一定要把关，有些家属可能出来帮，我们眼珠要动。”因此，当晚各村斗争后，将张维玉、江现豪、恩德华、江国信、江家驹、程烂忠等六人打死。

七月三十一日，又在公社召开全社党员、干部骨干大会，斗争打死江超信一人，事前经黄永宋参加的领导班子会议研究统一布置，黄永宋还在大会上讲话，指出：“抓生产很重要，但也要抓革命，抓革命才能促生产，做到革命生产两不误。”

八月一日，大桥区革委召开各公社“抓促”组长、民兵营长会议，布置进一步贯彻落实“七·三”、“七·二四”布告，江明昌、黄伟善参加这一会议回去当天，召开公社干部会传达，到会的有黄永宋、江超世、罗江寿、巫连辉(信用社会计、“联指”派头头)、江超群(治保主任)。巫连辉也在会上汇报区干部黄及应(团委书记、“联指”政委)对他讲的话：“大桥这边形势发展很快。”“你们要发挥无产阶级专政威力。”与会者认为应该赶上形势，讨论决定：(1)将集中在公社训示的三十几个人全部“专政”(处死)。(2)第二天(8月2日)召开党员干部骨干会传达会议精神后执行。(3)各片负责处决本片的人。最后黄永宋布置说：“各片回去负责通知各片的人，早点来公社集中。”

八月二日，全公社骨干一百多人集中在公社旁边的草坪里开大会，由黄永宋主持会议并在会上讲话指出：“对党不满的分子今日一笔勾销。”散会后，分片(组)讨论，题目是集中到公社训示的人该不该杀？各片如何实施？讨论中，黄永宋到各组检查，对下州组的骨干讲：“你们的人是否到齐，如不齐，要马上派人去叫来”。明新组黄祖奇(队长)向黄永宋提出陈乃成不该杀，经黄永宋同意，同时令其将陈带回家。在讨论到如何实施时，很多人不出声怕下手。为此，江明昌到巫连辉家，想征求黄永宋和巫连辉的意见。在巫家门口碰见巫，江问巫：“各片不敢动手，怎么办？”巫讲：“吊你妈，费那么多神气，统统推到煤坑去，既不费力，又不污，干干净净几好，象红桥那样，血和脑浆飞出来到处是污。”当时黄永宋坐在巫连辉床上，江进屋问黄：“宋哥，你还有什么交代吗？”黄永宋说：“因我身体不好，我已经交代巫连辉出去了。”江也认为推入煤坑是个好办法，便跟巫到各组讲这一意见，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由明新片带头执行，用绳子分别一个或两个捆绑串在一起，驱赶到煤坑，拥推和逼跳下水溺死。风山组因迟迟没有行动，黄永宋去指责讲：“你们风山片是怎样搞的？”在场的韦保杰(党员，已死)就对本片的人讲：“醒水呀！弟队。”随即将本片的韦继堂等三人赶到煤坑推下去溺死。当日推入煤坑溺死二十九人，其中男的二十二人，女的七人。明新村的谢福英，原是船家女，被推下坑后，游在水上叫喊，新村的民兵陈洛文用矛枪戳了四枪致死。

八月三日，继续召开党员、骨干大会，斗争张天渊、江国钦，斗争后两人捆在一起推入煤坑，黄日见也被抓来推入煤坑，当天共溺死三人，最后黄永宋作总结讲话说：“我们有些党员还未醒，张天渊被推入煤坑后还喊反动口号，让这些人活着怎么得了。”

七月三十一日，原大桥区连朋公社在区革委常委黄及应、李开贤的督促检查下，由治保主任宋凤康主持召开了全社党员、干部和民兵积极分子会议，传达贯彻王建勋七月二十九日在县公检法军管会召开各区(镇)公安员、派出所所长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并研究决定了第二批处决的“阶级敌人”二十五人名单，当天晚上将这些人全部抓到公社关押，第二天(八月一日)，天刚蒙蒙亮，治保主任宋凤康亲自率领纠察队先将 16 人五花大绑押到公路旁，用木棍活活打死，此时，王建勋坐小车经过，还下车观看了现场。中午又将余下的 9 人绑赴车箭岭打死，打死后，宋凤康还指定专人逐个进行检查，发现宋凤义尚未断气，就用刺刀将其腹部捅开，肠子流到外面，用刺刀割断宋凤伦的喉咙。其中，宋安义一家被打死 6 人，这家 6 人被打死后，宋学理的父亲宋安上又被、多次批斗，打断肋骨，被迫自杀。他们的家属也受到株连，生产队评工记分给低等，自留地作物被人毁坏，家禽被人毒死，屋瓦被人用石头打烂，小孩上学被歧视毒打，她们感到在连朋再无立足之地，宋安义、宋安伦、宋其康的妻子被迫拖儿带女改嫁他乡，宋安上的妻子年纪大了无法改嫁，逼着将十六岁的女儿宋凤秀出嫁到陆川县，自己带一个女儿跟去，当宋凤秀回来、迁户口时，治保主任宋凤康还勒索 30 元钱才给证明，宋其康的妻子韦芬林改嫁时，接亲的人还被捉来灌狗屎。

⑥七月三十一日，武陵区新塘公社在办公室召开全社共产党员、生产队干部会议，会议由该社党支部书记黎见宽、民兵营长何仁贤，治保主任霍仁祥分别主持，县公检法军管会派往武陵区的观察员施汝楷在会上宣读“七·三”布告，同时介绍了邻近公社贯彻落实“七·三”布告打死人情况，黎见宽传达武陵区革委会召开的关于贯彻落实“七·三”布告向阶级敌人猛烈进攻的会议精神，民兵营长何仁贤传达县民兵营长紧急会议精神，治保主任霍仁祥也在会上讲了话，然后分片讨论规划打死人名单，新塘片参加会议的人员刘正标、黎见保等人提名说：“刘日恒放毒到生产队的秧苗田里去，破坏农业生产，刘华恒(刘日恒同胞兄弟)不服从管制，不听从生产队安排工作，黎见盛是恶霸，不服从干部安排，对村上人态度恶劣，打骂了不少人，这三个人应该‘专政’。”因此，当天的大会就决定打死刘日恒、刘华恒、刘清恒、黎见盛、黎见浩等人。并要求全社的四类分子一同押去武陵游墟。

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下塘村民兵连长黎见保和该村干部黎见锦等人在下塘村“三支训”主持召开该村党员、队干会，参加会议的人员还有黎英豪、黎天进、黎天晓、黎天良、黎兴高、黎朗座等十多人，会上黎见保、黎见锦讲了当天他俩到公社开会精神，黎见保说：“本村的黎见盛、黎见浩两人，公社会上已定为打死对象。”还说：“我看黎见识、(黎见盛、黎见浩、黎见识均系三胞兄弟)黎天然(黎见盛的长子当年 16 岁)也一起送去游墟，不然的话，不打他们的威风，恐怕以后那也会报复，铲草要除根。”到会的人员也同意一起铲除黎见盛家的男人。

八月一日上午，上刘村三队队长刘正标按照公社干部黎见宽、霍仁祥的指示，安排刘日恒去耙田，上午九时许，公社民兵营长何仁贤带领黎见保(身带尖刀)、磨用羽、黎天晓、黎见华、霍仁祥和黎启余等人到田头捉拿刘日恒刘正标叫刘日恒上田基后，磨用羽即把刘日恒绑住看守，霍仁祥、黎见保等人抄了刘的家，然

后将刘日恒、刘华恒、刘清恒押到新塘公社办公室集中。与此同时，党支书黎见宽利诱刘日恒的长子刘正甫与其父划清界线，刘正甫手拿一条犁柱木，朝刘日恒头部打去，当场死亡。治保主任霍仁祥带队将上吊自尽半死的莫绍明拉到公社办公室集中，然后安排其他四类分子抬去武陵游墟，抬到途中高挂村新坝处，磨用发就命令抬去的人将莫绍明丢下水中，然后逼迫莫绍明之母亲凡注槐等人用脚踩住莫的身躯，压入水里活活淹死。民兵营长何仁贤带领刘正标、谢耀章、何星群等人一起将刘华恒、刘清恒、黎见浩、黎见识、莫绍杰、莫树祥、黎见伦、何君富、刘正华、黄注臣等十人押到武陵游墟，全部被赶墟的群众打死。

八月一日，黎见盛见势不好，逃到古辣新胜公社马安村亲戚家躲藏，后被该社党支委陈学胜等人发现，抓后指派民兵送回新塘交给治保主任霍仁祥，霍将黎捆绑在办公室旁边的一棵苦楝树下暴晒太阳，下午一时许，黎叫肚饿口渴，要求给点水喝，而看守民兵却不肯给，黎见盛由于经受不了饥渴和烈日暴晒的折磨，于下午两点钟左右惨死在苦楝树底下。

八月二日早上，黎天然约黎天送一起扛猪到古辣墟出卖来还信用社贷款。黎见保闻讯后，带领磨用发、黎天进、黎天良、黎英豪、黎兴高、黎天晓等十多人到途中拦截，当黎天然回到老坝头江桥时，被黎见保等人截住，并被绑住手脚，由黎见保、黎天进、磨用发三人一起将他丢下老坝头江淹死。

黎见盛和兄弟黎见识、见浩以及儿子黎天然被迫害致死后，留下其母和妻子李子盛及见识妻莫果珍带两个幼女度日，她们处处受歧视，不久莫果珍被迫携带两个女儿改嫁他乡，留下两个老人孤寒度日，黎见盛一家留下的六间房屋也被生产队全部没收为仓库，国家补贴的孤寡老人补贴费，也被生产队截留占用，黎见盛之母因经受不住打击，于七八年病故。弄得黎见盛全家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催人泪下。

⑦七月三十一日，原武陵区上施公社老廖村黄树松纠集生产队副队长黄树强、民兵黄炳光等十六人开会，研究如何落实县革委关于贯彻“七·三”布告精神，会上黄树松提出要打死黄干先等四兄弟，理由是干先的父亲生前埋有枪枝弹药在祖坟里不交出来，后到会人员通过。晚上就召开群众大会，批斗黄泽先、黄干先、黄仲先、黄更先四兄弟及侄儿黄炳豪，斗打后黄更先见势不好，趁人不备之机逃跑，其余四人就被用绳索捆绑拉到牛栏岭黄家祖坟处，参加押送的民兵有黄树松、黄秉峰、黄龙先、黄成先、黄官先、黄勤先、黄启先、黄景文、黄景就、黄景兰、黄应先、黄秉光、郑忠、施吉星、施居信等十多人，这时已经是下半夜了，押送的人将坟地挖开后，没有发现什么枪枝子弹，郑忠就问黄泽先：“你在土改时，喊我不要动干什么？”泽先说：“没有这回事。”话音刚落，郑忠第一棍把黄泽先打倒，紧接着其他人也同时把黄仲先、干先、秉豪陆续打倒。一下就把黄泽先等四人打死了，在场的人均动手打。打死人后，已经是次日凌晨四点多钟了。这帮人回家后接着黄树松又带队抄了黄泽先家，将所抄得的财物搬到本村小学，当晚全部瓜分干净。

八月一日上午，黄树松约本村的黄应先、景就、秉晖、启先成先、龙先、勤先等人又到县防疫站拉黄泽先之弟黄振先回来准备打死，这些人把黄振先押回到武陵墟时，当时武陵区干部采取措施进行保护，黄振先才免于一死。八月四日，逃跑的黄更先被抓回来，派民兵黄焕先送去公社押回来，走到半路黄焕先便将黄更先打死。

同一天上午，趁人出工之机，黄树松以找黄振先的妻卢秀丽谈心，了解卢秀丽与黄振先夫妇离婚是否事实，叫卢回家拿离婚证书为借口，要求卢与他搞一次

两性关系，并厚颜无耻地摸弄卢的胸部和大腿，进行人身侮辱，卢当时不同意他奸污，才未得逞。

黄泽先一家五人被打死后，其母亲施黄氏当时因伤心过度而双眼失明。黄泽先的妻子施桂华带着三男一女被迫嫁到黎塘区吊塘村，后来生产队还将黄泽先家的房子拆掉，造成了家破人亡。

⑧七月三十一日，芦墟区人武部部长赖增杰到河田片召开河田、德明、中兴公社和原王明公社的深柳大队的干部会议，会上首先宣读“七·三”布告，尔后大讲：“‘专政是群众专政’要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的进攻，对阶级敌人不能心慈手软，对阶级敌人心慈手软就是对贫下中农的残忍，忠不忠看行动，其他公社已经行动打死人了，我们敢不敢向阶级敌人进攻。”在会上还批评德明、中兴公社行动慢(即未杀人)。并布置以公社为单位讨论回去如何贯彻落实“七·三”布告，强调定好专政对象名单。当时在会上讨论规划名单的有德明、深柳等单位。德明公社将规划二十七人的名单交给赖增杰。中兴公社支书李贵德、民兵营长吴日林对赖说回去开会再规划名单。会上还布置各公社回去召开干部会、群众大会、四类分子训示会并说他要亲自到各公社检查去督促和参加各种会议。河田会议后，德明、中兴等公社先后召开干部会、群众大会和四类分子训示会。赖增杰亲自到各公社去检查落实情况。这样，在赖增杰的亲自组织、指挥、检查督促下，德明、中兴、深柳二个公社二个大队共被打死五十六人。中兴公社于一九六八年八月一日召开公社干部会议，传达河田会议精神，研究规划“专政”对象名单四人，还决定召开群众大会。次日在中兴公社召开全公社群众大会和四类分子训示会。会前还召集了公社干部会，由吴日林向赖增杰汇报规划对象名单，然后召开群众大会，赖增杰在群众大会上讲了话，讲话完后离开中兴公社。群众大会前，民兵向赖增杰汇报六炭村吴日生(规划对象)关门拿刀在家，拒绝参加斗争大会，赖增杰听到汇报后，便亲自带领民兵赶到吴家，拿着手枪对着吴日生令他放下刀后叫民兵捉其到公社参加斗争大会，在批斗中民兵吴日标用柴刀割去吴日生的右耳，这时吴日生妻子带着三个小孩(大女儿吴来英八岁，背着二弟二岁，拉着大弟六岁。)赶到现场哀求：不要打死吴日生。结果连他们也被民兵用石头猛砸。当场两个男孩被打死，女儿吴来英当时被打重伤昏迷未死，第二天，被人发现后背回，吴日生的爱人韦清才被打死时，身上还怀有七个多月的小孩，这一家的惨案，群众称之为“四户五命六含冤。”

⑨八月一日，原武陵区理化公社在公社办公室隔壁的晒场里召开全社群众大会，批斗丘华山等十多人，会后丘华山等七人被凶手打死。丘华山被打死后，其儿子丘启宗、丘启天、丘启元(16岁)三兄弟害怕而逃到六蒙山区，当时被六蒙公社民兵捉住，六蒙民兵营长黄贵荣打电话给理化公社干部，告知了这一情况，并要求派人进山带他们回去。与丘启宗同村的公社干部丘昌辉获悉后，当即写了张证明带回村与该村的公社革委委员丘昌渭商量，决定当晚召开党员、骨干会讨论。当晚，丘昌渭、丘昌辉等人在新安村小学校主持召开全村的共产党员、民兵骨干会议，会上讨论了丘启宗等三兄弟外逃问题，为了灭绝全家男性，会议最后决定派丘昌渭带领丘昌海、丘昌紫、丘昌敬、丘德恩、丘德琼等七人到六蒙老毛村。次日(8月2日)早上，他们与六蒙民兵营长黄贵荣交接人后，便将丘启宗等三兄弟押回来，约莫走过几个山弯，丘昌渭等人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便将他们按倒在地上，一阵口号声过后，丘启宗、丘启天、丘启元等三兄弟便倒于血泊之中，惨死在丘昌渭等人手里。人死后，这帮凶手从死者身上搜出七元多钱，回到武陵饱食一顿。打死人后的第二天，丘昌渭还带领该村几十名民兵抄了丘启宗的家，将

家中的书籍及贵重物品抢劫一空。

⑩八月二日，原黎塘区补塘公社在本社办公室召开大队定工干部紧急碰头会议。由民兵营长杨泰琼传达区民兵营长紧急会议精神，会上，杨说：“贯彻执行‘七·三’布告，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要学习新宾、学习(黎塘)三和大队的经验，把四类分子统统干掉。”支书侯有诗说：“根据武装部长韦善强的指示，对四类分子要实行专政，我们大队是否把四类分子统统干掉，大家讨论。”大队革委会主任吕钦声说：“干脆做(杀)去，这帮人一个也留不得。”会计张洪珍说：“我们大队有人参加‘反共救国军’被公社点名批评，干脆把他们统统做(杀)去！”民兵副营长张建祥说：“这帮人气焰比较嚣张，干脆把他们做(杀)去。大家发表完意见，就决定由民兵营长杨泰琼、副营长张建祥两人负责指挥，全大队统一行动，把受害者押到北沟旧矿窑打死后投进窑去。根据会议决定当晚即召开全大队民兵排以上干部和纠察队紧急会议，要求分工包干，以村为单位落实“专政”对象，会上杨泰琼亲自点新岭村十三人，并负责组织打死；吕钦声点名新埠村四人，负责组织打死；张建祥负责补基村七人，侯有昌负责三择村十三人，张洪珍点名并负责吊塘村二人。全大队共定出三十九人的名单。最后，由侯有昌宣布会议保密纪律，强调透露消息者后果自负。第二天(八月三日)杨泰琼、张建祥统一指挥民兵纠察队把以上规划的人员押到指定地点。民兵纠察队站在背后二、三米处。杨泰琼打手势，黄怀瑞吹口哨，发出杀人信号，杨世祥就开火，其余纠察队员一拥而上，逼近射击，瞬间就把三十七人全部打倒(这些受害者有的当场毙命，有的处于昏迷状态)，杨泰琼、张建祥带头把尸体丢入窑内水中，其他成员也跟着动手，把三十七具尸体全部投入矿窑水中。事毕，杨泰琼、张建祥立即把大队民兵队伍拉到高岭村，又打死杨春高、杨春展二人。这样，当天一受害群众共三十九人。与杀人有关的人员共三十六人，其中国家职工两人(均系打死人后参加工作)，社员群众三十四人。

一九六八年七月初，黎塘区青山公社因病辞职在家的原宾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老游击队员黄世济，被捉到黎塘中学关在一间小房子内进行批斗、审讯，被捆绑吊打，罚他跪在尖利的碎瓦碗片上，膝盖骨头都露出来，一连折磨六天，行走不得，危在旦夕，这样才叫家人拉回家治疗，刚能扶床行走。同年八月三日黎塘区武装部长韦善强又指定黎塘中学红卫兵罗文兴等四人带着手枪、刀等凶器去杀害黄世济，当时黄世济病重睡在床上，罗文兴、丁家茂两人从窗口朝他连开数枪，将黄世济打死在床上，这样还不罢休，梁彪又走进柴房去用长茅刀向黄世济的肚子捅了一刀，肠子流出，黄世济从床上被拖丢下来，过了半小时，公社干部又派民兵莫若富、黄金龙等人用木梯将黄世济尸体抬到黎塘线路器材厂公路旁，在尸体上挂上反动救国军师长黄世济的下场的牌子，陈尸示众三天，在批斗黄世济时，罗文兴等人还抄了黄世济的家，抄走黄金、金戒指、现金、粮票、自行车等财物。

(三)

八月二日，王建勋又召开了有各区革委会主任和武装部长参加的所谓“刹车”会议，会上王建勋说：“七·三”布告后，广大革命群众主动向阶级敌人实行专政，这个大方向是对的，虽有一些缺点也是对的。对敌人专政就是对广大革命群众保护。……前段要是放手发动群众，现在群众发动起来了，同志们应讲究策略，不要再杀了，杀多了，杀罪大恶极的得了。……对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实行专政，矛头主要对准他们。要检查检查，目标对准没有，对于叛徒在过去叛变中有没有血债？有血债是否应杀？交群众讨论，

由群众决定专政，但在专政前必须批判斗争，群众弄清 他罪恶再处理。抓住特务不能放，经过斗、批，然后把他事实摆出来，要有证据，这些人群众不专他的政，送到军管会也专他的政。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愿意改正的走资派还是可以不杀，对顽固的也只好处理，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说明他有现行破坏活动，就要杀他的头，交群众专他的政。……小学教师已关的要送来，最后，要清理阶级队伍，清理后要放到生产队劳动，但不打死，批判斗争可以。公社革委主任和武装部长会议结束后，各区、社回去进行所谓“刹车”，又发生了几起严重杀人事件。

八月二日，王建勋打电话问邹墟区革委会主任韦子林：“你们今天有拉到街上打的吗？”韦说：“有，十几个二十个。现在我们正在开会强调，今后不得拉到墟或公路旁来打了，由各村就地处理。”王说：“对！对！对！就这样办。因为我们这条公路通往柳州，影响不好，又影响卫生。”

八月三日，县驻邹墟区同德公社宣传队长覃在英在区听完革委会传达王建勋八月二日所谓“刹车”会议精神后，打电话给公社干部通知原来规划“专政”的十八个对象(即：李官护、李有桐、李有梅、李有道、李锦乾、李庆彪、李生余、覃兰香、覃其德、覃国安覃彩连、覃香松、谢护祥、谢圣贤、黄庆春、谢圣编、李连芳、覃彩云)每人自带一条绳子到公社集中，覃在英散会回来后，当即布置召开骨干会，并在骨干会上明确群众大会由覃春林主持，谢盖贤宣布罪状。骨干会结束，当即召开群众大会，大会按覃在英的布置，覃春林主持，谢盖贤将十八名“专政”对象的所谓“罪状”一一宣布，用带来的绳子将他们绑起来，拉到独石江边，用木棍全部打死后，把尸体丢到江中。其中生产队干部覃彩云，当日还在田里劳动，公社干部通知他立即回公社开会，他急忙转回家中，衣服没换，水没喝一口，拿了语录本和一条绳子赶去，刚进公社大门就宣布他是坏分子，将他捆绑起来，他向公社干部哀求说：“我没有什罪，请留我一条命，做工养小孩。”结果还是被打死。这些人全部被打死后，覃在英还布置整理死者“罪状”，用大字报形式公布于各村。

八月二日，原新桥中学校医兼校革委会副主任韦志明、赵柏林(该校“红联”组织政委)、黄家成(该校“红联”组织司令员)等人，在新桥中学召集“红联”组织的学生李昭尚、李德发、韦春彰、覃华进、韦群英、谭凤金等十多人到李仕杰房间开会。韦志明在会上讲：“‘七·三’布告下达后社会上对那些牛鬼蛇神已经专政了。我们学校要紧跟形势。陈天杞(校长)、杨受传(教导主任)是大地主，李武俊(总务主任)、黄罗本(教师)也是地主，还留这些牛鬼蛇神做什么？覃冠明(教师)在上思县教学时逼死过一个学生，杨永青(会计)是三青团，帐目又不清，马颜秋、何乃团(均是学生)以前组织一帮人抄过我的家，围攻区公所。赵柏林还被他们打过，你们要把这些人抓回来批斗。”赵柏林接着讲：“我们要紧跟形势，把这些牛鬼蛇神铲除掉，大家是否同意？”黄家成也在会上说：“现在社会上都打死四类分子，我们学校那些牛鬼蛇神怎么办？大家看做(打死)否？”与会者一致同意。散会后，赵柏林、黄家成即派人将陈天杞、杨受传、李武俊、黄罗本四人抓到五十三班教室逐个挂牌子，赵柏林、黄家成带领李昭尚、韦春彰、赵军江、李德发、覃华进、白国华等人把陈天杞、李武俊、杨受传、黄罗本拉去新桥尚武街推到新桥税所后面的江坪处用木棍、石头、铁枝打死。当日，赵柏林还亲手起草了 001 号布告，张贴于新桥街上，公布陈天杞等四人的所谓罪状。同年八月三日，黄家成带领李昭尚、覃华进、韦春彰等人，到新宾公社共和大队，把在家养病黄两人在五十三班教室组织十多名学生对覃冠明进行批斗、殴打，后关在一间空房里，

逼覃写交待材料，造成覃冠明于当晚深夜上吊死亡的后果。同年八月四日，黄家成又带领李昭尚、覃华进到高田公社去捉不同观点的马颜秋回校，当晚赵柏林、黄家成在五十三班教室纠集学生斗打马颜秋，第二天，赵、黄两人组织学生将马颜秋拉到学校附近江坪处打死。同年八月六日，赵、黄两人又带领李昭尚、覃华进等七名学生到新桥农中，将该校老师黄时洪捆绑到清平水库鱼塘边江坪处，覃华进即用枪将黄时洪打死。当天黄家成、赵柏林还带领学生到三友大队将何乃团捉回学校，并于当晚把何乃团斗打致重伤后，抬到该校附近江坪处由三友大队民兵开枪打死。同年八月中旬的一天该校总务会计杨永青从乡下回校领工资，赵柏林、黄家成便以帐目不清为由，把杨永青抓到五十三班教室，组织十多名学生对杨永青进行捆绑吊打，杨受不了折磨，跳下鱼塘，黄家成和韦春彰便将杨永青压入水中几次，才拉上来当晚把杨关在一间房里，逼其写交待材料，导致杨永青于深夜上吊死亡。同年八月上旬一天，赵、黄两人和李昭尚、赵军江等人到新桥大队和民兵将关押在大队小学的甘宝强、李国祥、杨进族三名群众拉到新桥墟头往芦墟方向的公路边用、木棍、石头打死。此外，韦志明于同年八月中旬的一天还布置赵柏林、黄家成和学生去邹墟公社，将下乡工作的该校老师廖溯贤、蒙文坚抓回批斗时暗示在半路将廖、蒙打死。由于县保卫组派人赶到制止，对廖、蒙进行保护，廖、蒙两老师才免遭打死。同年九月份，廖溯贤回校后，韦志明，赵柏林、黄家成还组织学生对廖溯贤以残忍的手段进行刑讯、逼供，廖溯贤被折磨后卧床三天动弹不得，治疗二十多天才痊愈。

(四)

一九六八年七、八月间，宾阳县在王建勋、王贵增、蒙伍存等人的策划、指挥下，致使全县各区(镇)、社普遍出现成批地杀人的严重事件，据统计，一九六八年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的十多天时间里，共被打死和被迫害致死的 3681 人，其中国家干部 51 人，工人 27 人，集体职 21275 人，教师 87 人，四类分子 2036 人，群众 1405 人。全家被杀光的有 14 户，一家被杀 2 人以上的有 191 户，丈夫被杀致使妻子改嫁的 176 人。县城在大杀人高潮的那几天，到处摆着尸体，达到了汽车难以通行的程度，因而出现了有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的被铲草除根，全家灭绝；有的被杀人劫财，无家可归；有的人被杀后妻子被强奸和霸占等悲惨情景。

(五)

根据中共中央有关文件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1983)55 号以及其他有关文件精神，在调查核实事实的基础上，对在打死人案件中有牵连的人员分别进行了处理，案件牵连的人员中已调出宾阳的，也分别寄出证明材料及我县的意见，要求所在单位按政策给予处理。对“文革”期间被无辜打死和迫害致死的人员进行了平反昭雪，对其遗属做了善后工作。

五个人头案的始末（富川县文革参考资料）

我在博文《“张雄飞反革命集团案”的翻案历程及其历史作用》中，叙述了原桂林市工商联副主委黄鼎先生的两个弟弟黄璋、黄琇，在文革中被富川县“联指”派杀害后砍下人头示众，还把两个人头丢进关押他母亲的牢房中去的惨状。最近，有热心朋友给了我一份标题为《五个人头案的始末》的富川县整党办写的复印资料，现全文抄录如下供网友参考。——张雄飞 2011.4.23

“在富川，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大概不会忘记，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二日，在红星台前的电线杆上，悬挂着五个人头示众。

死者分别是：

毛明昭，男，24岁，富川县古城区人，生前是富川县拖拉机站驾驶员；周文斌，（又名周六妹）男，23岁，富川镇阳寿街人，生前是农民；钟永芳，女，35岁，蒙山县文圩区人，中共党员。生前是富川县总工会秘书；黄璋，男，25岁，苍梧县夏郢区人，生前是富川县苗圃工人；黄琇，男，23岁，是黄璋的弟弟。生前是富川县拖拉机站工人。

他们五人在“文革”中都是群众组织“富川县‘4·22’造反大军”的骨干，毛明昭是主要负责人之一，一九六八年两派斗争激烈时，他们五人跑到平桂参加武斗。（据黄鼎同志说，他两个弟弟是逃到平桂矿务局去避难，并未参加武斗——笔者注）

一九六八年七月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了解决广西两派问题的“七·三”布告，八日，富川县革委会发出了关于落实“七·三”布告的紧急通知。同日，富川县保卫红色政权总指挥部总指挥黄礼天（县革委常委，富川县“联合总部”头头）和该部常委黄林（县革委常委）、郭念林（县革委常委）、刘木贵（县革委委员、公安局干部）、翟积发（农代会干部）以及县人武部马钧、熊光明等带领福利、朝东、古城、富阳、富阳镇及县直机关的民兵共二百多人往钟山围堵“4·22”。在望高设立“富川前线指挥部”，负责围阻从平桂武斗中打散后逃跑出来的“4·22”人员。

七月九日，毛明昭等五人从平桂跑出来，逃往富川方向，当晚，毛明昭和周文斌二人在望高被钟山县民兵抓住，交给驻在望高的“富川前线指挥部”。后由富阳镇民兵押回富阳镇“福音堂”关押，在关押期间，县“保红”指挥部派何辉德、吴品邦、邹盈尚、林水高、黎先标、黎尚书等人进行了审讯。

七月十二日早上，县“保红”指挥部刘汉荣交待富阳镇“保红”指挥部成员林国民（镇民兵营武装连连长）统一行动“干掉”毛、周二人，当天上午十一时，富阳镇“保红”指挥部在红星台召开了万人大会，会议由林国民主持，毛景常（镇武装民兵连炮排排长）宣读了毛、周二人的“罪状”，程世洪（镇农代会主任）代表贫下中农讲话，最后以“富川县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名义宣布处以死刑，立即执行，由事先安排的女民兵班长何玉荣枪杀毛明昭，女民兵林代琼枪杀周六妹，富阳区武装部长杨永友，武装干事李洪启分别协助林代琼、何玉荣把毛、周推入刑场，并补了枪。“保红”成员刘木贵也去补了枪。毛、周二人被打死后，林国民交待陈春生喊“富川4·22”成员唐玉贱、吴红玉，把人头砍下，陈春生用铁线串起，由唐玉贱拿回红星台前的电杆树上挂起示众。

钟永芳、黄琇、黄璋三人于七月九日从平桂逃出，十日被钟山立头同乐乡民兵抓住。十一日，同乐乡电告富川县“保红”指挥部，当晚，“保红”总指挥黄礼天就带人去接俘虏，车开到莲山时，黄认为情况不明，怕遭暗算，即回县“保红”指挥部，连夜挂长话到同乐（电话是刘汉荣讲）弄清楚确实是抓住了黄璋、黄琇、钟永芳等三人，决定由刘汉荣带人去接回来处理。

七月十二日，“保红”副总指挥何学多带人去八步医院慰问伤员，刘汉荣就带领蒋梅森（县委会工作员）、欧伯良（“保红”指挥部工作员）、刘建忠（法院干部）、王先高（富阳镇民兵）、陈志远（富阳镇民兵）、陈春生（富阳镇民兵）、邓永端（福利中学革委副主任，“保红”指挥部工作员）等六人搭何学多的慰问车到望高清水拱公路下车。下午四时左右，何学多的车从八步回来，刘汉荣等七人将钟永芳等押上了车，到了望高以北古凉亭，何学多、刘汉荣等商议将钟、黄等在这里干掉，刘建忠说：“不要在这里搞”，刘汉荣说：“这里不是我们的地界

（因属钟山县管辖）没有人埋。”后来车子开到白沙的河路口岔路旁，何学多喊停车，车停了一下，刘汉荣说：“开过一点，不要挡路”，司机又开过去一点，何学多、刘汉荣、邓永端等人在山边上商量了一下以后刘汉荣说：“把他们拉到山边去”，原定由何学多开第一枪后其他人才开枪，但何刚举枪，民兵们的枪也同时响了，何学多打钟永芳，蒋梅森打黄琇，黄璋是民兵陈春生打的，接着莫代位等多人补了枪。枪杀后，又叫刘建忠去白沙，派四类分子程宽期（已死）、地主仔程长增，赖冬青等用柴刀把钟永芳三个人头砍下，洗净丢到车厢里拿回富阳，当晚由民兵陈志远将人头挂在红星台前的电线杆上示众。

就这样，在同一根电杆上挂了五个人头，示众两晚一天，其景状之悲惨，令人目不忍睹。

粉碎“四人帮”后，根据上级党委指示精神，梧州地区三人办、组织部、纪检会和富川、钟山两县三人办、组织部、纪检会共同抽调力量，组成了地、县联合调查组，于一九八〇年十二月起至一九八一年四月止，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全面调查，查清了事件的性质及涉及的责任人，“处遗”时，又派出专案组对事件进行了复查。县委作出了给毛明昭等五位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并于一九八三年七月十日在县政府礼堂举行了毛明昭等五人的平反昭雪追悼会。公开为他们平反昭雪，恢复政治名誉，彻底推倒强加给他们的“反革命”帽子和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对他们的遗属，按政策作了妥善的安排，发放了“三费”。

对制造这一悲剧的杀人主犯何学多、刘汉荣、林国民已依法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4年、13年、11年。莫代位、刘木贵、林代琼、何玉荣、毛景常、杨永友、李洪启等已被开除或清除出党，蒋梅森、邓永端受到留党察看处分，黄礼天在“处遗”开始时已自杀，黄林（已死）和几个民兵免于追究责任（均系非党员）。”

贵县文革惨案

贵县在文革中，全县发生打死人的案件近2000件，惨遭迫害致死的干部群众达3171人，其中国家干部140人，教师163人，工人140人，农民2554人，居民126人，学生48人，所谓四类分子1255人。

石龙“大农”、“松英”事件

一九六八年三月廿五日，石龙“大农事件”发生。石龙区柳蓬大农村是“4·22”派占多数的村庄，但大队干部及大多数生产队干部均系联指派。三月廿五日上午，大农六队“4·22”的社员提出分队，要求分储备粮和谷种，联指派不肯，“4·22”就强行挑谷。该队队长黄开恩和“联指”派头头黄开政即向石龙区公安员。覃寿澄汇报，说生产队的谷种被抢。区人武部。部长贾杰等人听到这一情况，立即召集区干部陈仁风、陈书解、韦乃辉、覃惠宁、李金达、覃寿澄等人和各大队民兵营长、“联指”头头于当天下午一时许在区政府会议室开会，研究攻打大农问题。贾杰说：“根据大农反映，‘4·22’相当嚣张，抢生产队的储备粮，还打人挖供销社，要求区政府组织力量去打”。还说：解放军去解决，“4·22”用手榴弹炸不响，如果响，解放军也完了，大家意见怎么办？”大家决定攻打大农“4·22”，贾杰又说，要打就趁早行动。会议要求各大队民兵在三月二十七日中午前到达大农，并确定了各大队民兵的进攻路线，和发起总攻的信号。二十六日晚，黄开政等人根据覃寿澄的意图，在其屋背晒场召集了“联指”骨干商量对策，决定第二日一早就纠集该派社员去与“4·22”派辩论，如果“4·22”敢动手就与他们打，二十七日早上，六队队长黄开恩和大队干部郭上级便按计划带领一帮“联指”群

众到“4·22”派黄炳付门前辩论，不久，即发生摩擦，扭打起来。黄炳付用黎头木打断黄开恩的手，黄开恩即转到黄开花屋巷处向“4·22”丢了一枚手榴弹，当即炸伤黄运炯。(另一说法是炸死一人，炸伤三人)至此，辩论中断，各自撤退，准备武斗器具。二十七日中午，各路民兵按原定部署陆续到达大农村，并立印研究炸炮楼的具体方案，下午四时许，区政府交通员覃仲彬到大农小学对覃进任说：“快些进攻，解放军要来了，解放军一来就打不成了。”于是，下午四点半钟，覃进任便朝天放三发信号弹。各路民兵一见，便立即向据点发起进攻。当日“4.22”派的郭祆克、郭上委、郭上康、郭上鉴，郭上设等人被打死。二十八日天未亮，民兵又继续用枪炮扫射“4.22”的据点，炸倒烧毁了“4.22”的炮楼和不少民房，这天早上，冒死突围的“4.22”派群众一人被打死，其余的被赶到大农小学集中后，还有黄炳丽、黄炳兰两人被当场拉出去分别用铁叉刺死和用枪打死。在这个事件中，一共炸塌、烧毁民房七十多间，杀死“4.22”群众四十七人，打伤十七人。有二十四名“4·22”群众在二十七日晓突围出来后准备到县支左办公室控诉，在途中被覃塘新民民兵抓到十六人。草塘区公安员丘朝基便打电话给石龙区公所的覃惠宁，报告了情况。二十九日中午，贾杰和覃振任(石龙区贫下中农指挥部主任)召集陈仁风、陈书解、覃寿澄、覃惠宁、李金达、韦乃辉以及黄开政、郭上芬、郭上锦等人开会，研究处理被覃塘新民民兵抓到的十六名“4.22”群众，贾杰说：“大农外逃人员被抓到了，叫我们派人去领回，大家看怎样办？”郭上芬说：“全部杀掉，不拿回来了。”有些人说不要全部杀，有的受蒙蔽，贾杰说：“不全部杀，就不全部杀，由大农去的同志去处理。”会上决定派陈炳端等十五名民兵到覃塘领取被抓的十六人，与此同时，贾杰又在三十日早上交带贾进任通知山北民兵营长贾有勤带一个民兵武装班(共十四人)、前往“保护”领回的外逃人员。结暴，这十六名“4.22”群众在押送回石龙途中有十一人被负责“保护”的民兵拉到平龙水库边集体枪杀，其余五人回到石龙后又被群众陆续斗打死了四人。此外，还有八名二十七日晚突围后被抓获的“4.22”群众于十八日中午到达县支左办公室，向个姓李的同志汇报了情况，要求派人营救十六位被抓的群众，李××不予调解，还说：“群众的事由群众处理。”

几乎与“大农事件”发生的同时，在石龙松英大队也发生了一起杀人手段非常残忍的大批杀人的事件：一九六八年，松英大队在覃锡明、黄绍华、贾尚示、龙志仲的直接组织、指挥下，从三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二十二日分十二次用枪杀、木棍、锄头、铁棍、石头等，打死了无辜的群众四十人。其中成年人二十八人，未成年人十二人，有双目失明的老妇女，也有出生未满七个月的婴儿，有十三户的男人全部被杀光。三月二十七日，他们首先拿覃志珠开刀，以“覃志珠(当时划为反革命分子)写大字报要翻案”为理由，由覃锡明主持召开群众批斗大会，由覃志座指挥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把覃志珠打死在大队部门口，以后，他们接二连三地制造各种舆论，说什么“地、富分子‘杀多一个，少管一个’呀”，“地主分子覃尚。业放鸡、猪出来吃生产队农作物、对他罚款不满呀”“地主分子覃学乐有强奸妇女行为呀”，“覃国远伪造公章、覃振成有枪枝、子弹、手榴弹，组织‘暗杀队呀’，等等。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加在受害者的头上，使许多群众被无辜地杀害了。

石龙“大农”和“松英”事件的发生，完全是石龙“联指”(多数派)受到上级同一组织的煽动和全区各地形势的影响而导致的。纯属是派性膨胀，是多数派对少数派(4·22)的一次血腥镇压，两起事件共杀死群众 103 人，重伤 17 人。在这当中有双目失明的老妇女，有出生未满七个月的婴儿，有十三户的男人全部被

杀光。真是闻说伤心，听说酸鼻。虽然法办了直接责任者，无辜死者也得到了平反昭雪。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这一沉痛的教训。

贵城“四·一三”事件

……四月十三日早上九点钟左右正当各方人员汇集体育场参加县革委成立庆祝大会的时候，“4·22”一部份群众和一批不懂事的少年儿童，在原县委门口和大南门一带哄袭站岗民兵，制造混乱，民兵制止不了，即鸣枪警告，于是发生了覃竞成(联指指挥部保卫人员、随同龙山、附城民兵在大南门一带负责警戒)开枪打死小孩刘小园(当场未死，经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的事件。小孩被打死以后，双方都立即进行广播，把责任推给对方，“4·22”不服，便组织一百多名不明真相的群众，打着“贵城革指”和“7·31红命会”两面大旗，抬着死尸直冲庆祝大会会场，在受到大会警卫人员的阻拦之后，还强行把死尸抬到大会主席台上，要求捉拿凶手，以示抗议。这时，又与拦阻他们主席台上的警卫人员扭打起来。在混乱中还将“贵县革命委员会”的牌子砸烂。撕毁大会横额标语，抢去大会喇叭等物。庆祝大会因此不得不中途停止。这就是一九六八年贵县“四·一三”政治事件。

“四·一三”事件的发生，给贵县“联指”派的头头们找到了镇压对立派的借口，其实，利用武力把对立派镇压下去，是“联指”派一些极端分子及当时县人武部和县革委中一些支持“联指”观点的人由来已久的企图。早在县召开“三代会”期间，他们就趁机把一部分民兵秘密调进县城。并已“预计”会有大事发生，因而决定成立一个指挥部来对付“4·22”，“保红部”的袖章也印制好了。

“4·13”事件发生的当晚，“联指”头头谭发祥便找参加庆祝大会的湛江区代表团团长黄子旺说此事，当晚选举林如健、谭发祥、刘细忠、黄少佳、蔡德仁、陆秀邦为指挥部的领导。四月十四日，他们就宣布成立“贵县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简称保红部)，黄子旺任总指挥，谭发祥、刘细忠、陆秀邦、黄耀意为副总指挥，琳如健、谭发祥是总负责，指挥部下设作战部(也叫指挥部或办公室)、宣传组、后勤部、审讯组。作战部是直接指挥杀人、批准杀人的机构，是由“保红部”的核心人物组成的。他们是林如健、谭发祥、黄子旺、刘细忠、陆秀邦、谭达钦，谭振礼、谭友联、叶干强、丘子山、韦玉星、甘细金等。县革委常委韦守杰和陈炳然也参与“保红部”的活动。为了更有理有据镇压对立派，“联指”派头头千方百计把“4·13”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他们通过县革委，多次组织有关人员开会，讨论对“4·13”事件的定性。参加会议的有杨业荣、张金会、韦守杰、姚斌才、陆秀邦、黎海珍、林如健、张贵恒、韦正辉、黄少佳、韦永和、杨培权、郭殿臣、胡玉山、梁先业等，当时由胡玉山，主持。会议上除胡玉山、张贵恒等少数人表态不够明确以外，包括韦正辉、韦守杰、陈炳然在内的大多数人都表态说是反革命事件。之中，“联指”派头头还歪曲军分区首长关于对贵县“4·13”事件的看法和处理。意见，并派出覃泽长等七人到地区找“联指”头头黄日南、林坚等汇报。最后，贵县革命委员会于十二月四日召开革命会和党员代表大会，正式宣布把“4·13”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公开发表了《关于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贵县革命委员会的前前后后》、《告全国人民书》、《关于彻底摧毁“4·13”反革命集团，誓死保卫贵县革命委员会的战斗总结》。这些都为镇压对立派和调动民兵进城杀人披上了外衣。“保红部”成立后他们首先解决兵力问题，由林如健出面给军管会和新生的革委会施加压力，马上调动了各区基干民兵一千多人，火速进城，并美其名为来保卫红色政权的。在各区民兵陆续赶到县城的同时，

“保红部”的核心人物频繁召开作战会议，研究出整套的镇压对立派的实施方案。

第一，围攻、炸毁少数派据点。四月十五日，他们一边部署兵力，一边组织指挥覃塘、龙山两区的基干民兵攻打拿下了少数派的朝阳饭店据点。四月十六日攻打、炸毁了粤东会馆(自治区重点保护的文物单位)及放火烧掉了县医药大楼，十七日攻打了东风街和县邮电大楼，十八日围攻贵县高中。他们在围攻上述据点时，除当场打死和抓捕了一批少数派群众外，还用炸药炸毁了一些建筑物及放火烧掉了大批物资，使国家遭受到严重损失。

第二，清理街道，大肆抓人、杀人。由于围攻据点抓到的人和缴获的武器都不多，没有达到他们目的。决定改“大兵团作战为小分队活动”。于是开始了连续10天(四月十九日开始到四月二十九日止全城戒严)的街道清查搜捕。在此期间，各区民兵按街道地段和清查任务，不分昼夜，包干完成。10天内共搜捕了数百人，除一些被当场打死外，其余分别关押在县革委大院、附城粮所、贵城派出所、农械厂……等私设的监牢里。

第三，突击杀人。“保红部”在全城戒严期间，每天都搜捕了大批少数派群众，几个监仓塞得满满的。当时，林如健、谭发祥等人借口“为了稳定局势，避免反复，要干掉一些”。于是他们组织了庞大的审讯组，加快了审讯“定性”工作，将他们认为是危险分子的一些人，分批集体杀害了。他们开始是采取威胁性的公开杀人，四月十七日在棉新街公开枪杀了林师兴、黄文骏二人，十八日在街头公开枪杀劳杰生、罗章炎等五人，十九日在小铁路边枪杀磷肥厂韦善松。二十日把物资局干部韦可仁拉去垫黄练进城搜捕江南电影院时被炸死的民兵黄世甜的尸底。二十一日在小铁路边又集体枪杀磷肥厂少数派陈石考、姜志伟等四人。四月下旬“保红部”还在各街道分别召开了群众大会，公开杀人，在棉新街公开枪杀了陈湛棠、梁铿二人，在工农兵小学召开的群众大会上，枪杀了谭裕昌并活活打死了林德义和高耀光。在西五街群众大会上公开枪杀了梁玉群、李文澄二人；在永明街菜市场的群众大会上公开枪杀了黄立权、谢祖泽二人，在兴隆街群众大会上公开枪杀了卢伟滔、陆夏侍二人，在人民电影院的群众大会上公开枪杀了倪国英。当公开杀人被军管会制止时，他们改换了杀人手法，在半夜成批拉到郊外或江边杀害。四月二十一日半夜，“保红部”用汽车从附城粮所监仓拉十人到糖厂独山集体枪杀，四月二十四日第二次半夜用汽车拉九人到石牛水库杀害(不用枪，用刺刀捅)，四月二十六日第三次半夜用汽车拉七人到石牛水库附近杀害，四月二十七日第四次半夜用汽车拉八人到兰田大队石灰窑附近杀害，四月二十八日第五次半夜用汽车拉八人到附城龙山路口兰田瓦窑附近杀害。仅上述五次深夜秘密集体杀害了四十四名干部职工。后来有一次半夜用汽车拉谢振清(原农机三厂支书)等人，到大圩路口，准备集体杀害时，被军管会开车及时赶到，制止了这次屠杀。一时贵县城区成批杀人成风，从“四·一三”后，到五月中旬的一个月里，城区被杀害的干部群众共十一批，计七十六人，加上在县革委大院杀的，在江边杀害的和被迫害致死的，共二百三十多人。

在县“保红部”血染贵城的影响下，各区、社也仿照县城的做法，纷纷成立“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贫下中农联合指挥部”、“镇压反革命指挥部”、“贫下中农法庭”等，使全县这股杀人风迅速蔓延，席卷全县。四月十七日大岭区“农联”召开群众大会，公开枪杀李以义、宋世环等五人，四月二十三日东津区“农联”召开群众大会，搞示范杀人，第一次公开枪杀三人，第二次(4月27日)公开枪杀八人。第三次(4月29日)枪杀七人，该区由于示范杀人，四月底全区出现了乱杀人高潮，在群众会上公开杀害了群众三十八人，加上批斗致死的共计一百三

十多人，其他各区、社乱抓乱杀人的现象也相当普遍

木格“六·一七”、“六·一九”事件

“四·一三”事件的发生，使贵县“联指”组织的头头们找到了企图用武力镇压对立派的借口，在客观上为他们蓄谋已久的镇压计划的实施创造了条件。为了使“镇压”“合理合法”，他们千方百计地要把“四·一三”定为反革命事件，并扩大化。正当贵县拉开成批杀人序幕的时候，四月下旬，玉林地区保卫组和专区革委先后召开公安和政工会议。这两个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狠抓阶级斗争，反右倾保守和右倾分裂(简称反三右)，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农村、城市都要搞，刮它十二级台风，大刀阔斧地干，要充分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这两个会议以后，贵县便层层贯彻。木格“6·17”事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这个事件就是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七日木格区武装干事李翠奇在早礼公社被枪杀，以及因此引起的贵县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调集贵县、玉林两县十二个区的民兵围攻岭塘、新联“4·22”据点事件，致使事态不断扩大给木格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

一九六八年五月，根据玉林专区公安会议和政工会议精神，木格区革委会派出陆千荣(区革委会副主任)带领由梁耀琼、叶仕仁、吴浩才(“4·22”，观点、李天保等人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于廿五日到导礼公社宣传玉林专区革委会关于收缴枪枝问题的通知和县革委扩大会议的精神。早礼“4·22”梁守仁等人说他们是木格区派委会的工作组，不是宣传队，以示反对。二十九日，陆千荣和宣传队暂时离开早礼返区。

为了贯彻落实专区革委关于收缴枪枝问题的指示，区革委副主任、人武部长李振轩再次召集在家革委常委开会，研究收缴黑枪黑弹的突破点问题，会议认为早礼杨屋山“4·22”派人少，又有武器，而且周围都是“联指”群众，容易突破，因而决定作为收缴黑枪黑弹的重点，如果不交，就强行收缴，会议还决定，由陆千荣和区武装干事李翠奇带宣传队先去，民兵(都是“联指”观点的)在后作后盾。

六月十七日早上，陆千荣、李翠奇按计划带领宣传队骑自行车前往早礼。十点钟左右，早礼“4·22”组织的梁永汉、梁炳绍在平悦路小卖铺正和当地民兵(联指观点)发生争论。梁发现宣传队，自识人少争不过对方，便边争边走，民兵也边争边追，追至马安塘时，另一“联指”群众高廷义见状助威，并用铁叉标中梁永汉的后腰，梁永汉倒下后民兵便追上去把他推下石灰池整死。梁炳绍立即回家向梁永仁(梁永汉的哥哥)报告永汉被打死的消息。梁永仁听后找了几个人到公社(大队)大喊大嚷要找梁永汉。这时，宣传队正在开会，李翠奇、梁耀琼闻声出来制止，梁永仁便质问李翠奇：“梁永汉哪里去了?!”李不回答，梁永仁更加火冒三丈，便把带在身上的一枚手榴弹从窗口丢入屋内，因手榴弹落在床上，有棉被阻挡，没有伤人，李翠奇指着梁永仁说：“你为什么丢手榴弹?”即被梁永仁的随同抓住了手，紧接着梁永仁用土制短粉枪对准李的头部开枪，把李打死，然后又追打梁耀琼。

打死李翠奇大约十分钟左右，区里配合宣传队下乡的武装民兵赶到，当即包围了杨屋山，并派民兵追捕凶手，搜捕“坏人”。当晚又炸毁群众房屋十三间，大队长陆有权(“4·22”观点)当场被炸死。这一天一共捕杀了十六人，除三人是在包围时打死的外，其余有的抓后被枪杀，有的被用铁钉钉在木板上打死，因民兵把梁永保、梁永助、梁宇裕三人绑在大队榄子木根下进行枪杀时，被教师陈

杰玲看见，民兵怕陈去报讯，便又将陈抓来杀掉。这就是震动全县的木格早礼“6·17”事件。“6·17”事件发生后，陆千荣于六月十八日早上八点半钟用电话向县革委办公室报告了李翠奇被打死的情况，同日，原湛江区公安员莫汝平、武装干事梁翠宁、农代主任阎朝贵三人，到木格了解李翠奇被打死的情况，各带手枪一支，骑单车路过岭塘大队时，被该大队守路的群众(少数派)检查，扣留交给大队看守在塘护小学(报县公检法军管会后，第二天下午即放回湛江)。当时，木格、湛江两区的办公室都将发生上述问题的情况用电话向县“保红部”和正在县里参加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会的区革委主任汇报。木格区革委会主任谢信炎接到李振轩的报告后，立即向县革委会主任张金会作了汇报，要求派民兵去支援。当时，张金会没有同意谢信炎的意见，要求谢安心参加会议。要谢相信在家的同志会处理。谢信炎由于得不到张的支持，便背着县革委的领导，串通“保红部”的黄子旺、林如健、谭发祥等人，秘密进行策划。当天中午，在黄子旺的主持下，上述人员在贵县饭店四楼再次开会，为避开军管会干涉，当晚转到桥圩继续开会。会议决定调各区民兵围攻新联、岭塘，由谢信炎任前线总指挥，黄子旺为副总指挥(注：后来实际上黄子旺是总指挥，谢信炎为副总指挥)；由谭秉汉带木梓民兵汇合木格民兵靠近新联，谭烈高带新塘民兵从班风迫近新联，苏汉英带八塘民兵经锦垌压过新联，黄子旺带湛江民兵从沙岭穿过新联、东津、桥圩民兵直插新联，并调庆丰、大圩、玉林山心民兵作外围增援。会议还决定各区民兵务必于20日先后赶到，形成包围，待命总攻。当晚八至十点多钟，谢信炎两次打电话回木格区里给陆千荣，说各区民兵已经到齐，作好了准备，一动由外线指挥，以打信号弹为行动信号，叫陆千荣转知李振轩。晚上，李振轩亲自指挥，和朱远球、何庚胜等带领本区民兵，在新塘、木梓两区的武装民兵配合下，首先包围了新塘大队的行塘村。

六月二十日，木格、木梓、新塘、桥圩、八塘、湛江、东津、庆丰、大岭、石卡、山心(玉林县)等十一个区的武装民兵一千多人，包围了新联、岭塘两个大队的谭冯、腰岭、社塘、岭护、行塘等五个村。谢信炎和李天保、张金旺等，首先进入腰岭村，即令住在该村的大队会计吴佐德，通知社员群众，集中到十二队禾堂开大会，谢在会上讲话，要群众不要开枪打民兵，缴交黑武装，交出外来人员和“坏头头”。原桥圩区革委主任罗裕忠，见到谢等进入腰岭村时群众没有反抗，便带领本区民兵进入腰岭村后转到社塘村。湛江区的民兵分为两路，一路由黄子旺亲自带领进入新联大队的谭冯村，一路由革委副主任熊义富带领进入岭塘大队的岭护村，东津区的民兵也分两部，一部由革委副主任李硕成带领进入谭冯村，一部由公安员李乃寿带领进入岭护村。原庆丰区革委副主任黄必善带领的民兵进入新联大队的社塘村。原八塘区革委主任苏汉英带领的民兵进入新联大队的谭冯村。原大岭区革委副主任甘旺衡、石卡区革委常委李益慧、大圩区武装部长梁雁春带领的民兵，以及玉林山心区的民兵，分别进入了谭冯、社塘村，李振轩、朱远球、何庚胜等人和新塘区革委副主任、武装部长刘锡棋、革委常委崔锦舜、区干部谭烈高，以及木梓区革委主任谭秉汉、区干部苏国贵等人带领的民兵，在包围进入行塘村之后，又赶往新联大队，把谭冯村作为重点，从西南进行包围。当各区民兵包围这两个大队五个村庄的时候，社员群众不但没有反抗，而且敲锣打鼓迎接。民兵进村后，便按照谢信炎等人提供的所谓“坏头头”的名单，责令原大队干部逐个找出来，进行逼供讯，到处搜查抓人打人。李振轩、朱远球指挥木格区民兵进入行塘村后，即责令原社长郑绍武逐个找人出来，当即抓了区干部谢树照(“文革”初期平反恢复工作，在家)，小学教师郑仕全、信用社会计谢经

寿、固支书谢经贤、县土产仓干部郑社全(当时在家)等五人，送回区里进行审问关押(郑社全交送县公检法军管会，后释放回单位，过一段时间，释放了谢经寿回家。谢树照、郑仕金、谢经贤三人，要大队写条子领回去斗打死去)。原湛江区革委副主任熊义富带领民兵进入岭塘大队岭护村后，抓了党支部书记谭德秋、副主任党耀林、教师李丕进、李显声和社员李丕信、谭立、谭长春等十人，押送到和平大队关押。李丕进、党耀林两人在和平大队被打死。桥圩区民兵在进入社塘村章面岭时，谭达纪(十五岁)、谭达宁(十六岁)、谭达德(十七岁)、谭科水(十五岁)、谭金生(十七岁)五个青少年学生，因与民兵辩论，即被罗裕忠下令叫民兵抓了起来，押。送到和平大队，除谭金生放回家外，其余四人均被打死。新塘区的民兵进入谭冯村后，抓了木格高中教师韦威禧、梁贯忠和学生陆秀英等十四人(少数派)，押送回区里，除陆秀英等十二名学生放回学校外，韦、梁两人被关押后也被打死。新塘区永新小学教师梁予立，到谭冯村住在谭盛家，被新塘区民兵抓到后，第二天即被谭烈高等指挥民兵，拉到村外水利桥边枪杀。

二十日下午，谢信炎指挥民兵进入腰岭村，召开群众大会后，经社塘村进入了谭冯村，和黄子旺、谭烈高、谭秉汉等人汇集，又在该村五中队禾堂开群众会。谢在会上讲话说，我是代表区革委和民兵一起来收缴黑武器、清理外来人员、抓坏人的……，你们革命村庄，变成反革命村庄，好得你们不开枪，如果你们打一枪，我们民兵就打你千枪万枪，你杀我一个英雄民兵，我就杀你千个万个……。会后，诱捕了谭东，由谭秉汉派木梓民兵和木格区民兵把谭送回木格供销社后楼关押(进行拷打审问后，当晚夜深用县“保红部”派去的汽车运送到分水坳盘岭水库杀害)。廿一日上午，前木格区区长谭寿天，在家里被石卡区民兵抓到，交给木格区民兵送回区里，后交县公检法军管会送到县看守所关押(至同年八月底正式宣布逮捕，九月份县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谢信炎和李振轩通过军管会领出来，交给开会代表批斗打重伤，送回看守所于当晚死亡)。当日下午，木格区革委常委何庚胜(区“保红部”指挥长，开除党籍，行政开除留用一年)、梁东旺(区武装民兵连副连长，开除党籍)、农科站干部杨文舁(记大过)等人，分别抓了谭道新(团副支书)、谭东兰(烈属，女，广西农学院学生，当时，回在家里)、朱裕栋(教师，木格大队人)、朱星才(教师、木格大队人)四人，当晚交民兵送回区里，到了木格大队下水口河边杀害。在民兵进村搜查三天时间内，新联大队被抓后杀害的有谭东、谭东兰、谭达记等十人，外来人员被抓后杀害的有梁子立等三人，被炸死的有谭献章一人，被炸伤、打伤的有谭连助、谭福盛等四人。岭塘大队被抓杀害有党耀林、李丕进等二人。两个大队被抓共计有五十六人。

六月廿二日，各区民兵大部撤离两个大队，在谢信炎、李振轩的要求下，留下木梓、新塘、石卡、大岭四个区的部份民兵作后盾，分别由谭烈高、苏国贵、李益慧、甘旺衡带领，和朱远球带领的木格区民兵，继续住在新联大队。廿三日，谢信炎召开了区革委常委和区干部会议，专题研究组织所谓“宣传队”，进驻这两个大队，搞所谓清理和巩固工作。决定抽调区直单位和部份大队干部、学校领导，由谢和革委副主任陆千荣、常委郭士莲(妇女主任)、雷毓云(已退休)带领，先进驻新联大队。谢信炎亲自召开宣传队人员会议，布置工作任务，要继续清查收缴黑武器。发动群众“反戈一击”，抓“坏头头”，清理阶级队伍，谢住在新联大队所在地社塘村。宣传队进村后，召开生产队干会议，每队挑选两人，组织所谓保卫红色政权民兵，以组织学习为名，强制“反戈一击”，对所谓阶级敌人“专政”。对参加少数派的部分人，反复进行拷打审问逼供讯。首先在各村(片)开批斗会，然后集中全大队开批斗大会。批斗会实际是杀人会，宣传队把木棍拿到会场，

在会上强制成批地打死人，手段极其残忍。第一批在谭冯村学校开批斗会，要原大队支书谭积业主持会场，宣传队李益慧在会上讲话，会上打死了邓开礼、邓月波(两父子、谭初基、谭自华、谭育德、谭乃才、谭章等七人。第二批在社塘三队禾堂，腰岭、社塘两片合并开批斗会，原大队支书谭积业主持会场，宣传队陆千荣在会上讲话，会上打死了吴炳煜、吴高安、吴炳助、谭秀英、吴金华、吴其安、黄崇珍、谭科贤、谭科泽、谭良柱、吴进刚等十一人。第三批，在社塘村三队禾堂，召开全大队的批斗大会，朱远球作主持讲话，会前原计划打死谭章金(团支书)、吴匡民、谭洁给三人，谭职槐、谭职卫、谭科志、谭步志、谭连权、谭连可等六人作为陪斗，结果连陪斗的也被打死了。谢信炎、陆千荣和朱远球等不准受害者家属收尸，在斗打死人之后，朱远球强令地、富逐个拖去成堆掩埋。七月中旬，陆千荣、郭士莲、朱远球带领的宣传队和本区的武装民兵，转移到岭塘大队，先召开生产队干部会议，组织所谓保卫红色政权民兵，每队选出一人，推选李炳贵(复退军人，后任大队党支书，现在贵钢工人)为队长，郑家富(复退军人，留党察看一年)为副队长，开始，首先组织批斗党支书谭德秋、社长郑绍武等原大队干部，后分片召开批斗会。第一批岭护片在岭护小学开批斗会，由李炳贵主持讲话，会上打死了党文照、周丽娟、梁彩、李贵、李育林、党柱南、杨月英、谭木祥、梁桂芳、谭观龙、谭桂光(烈属)等十一人。行塘片在行塘小学开批斗会，郑家富主持会场，会上打死李响芳、谭木英二人。第二批在岭护学校开全大队批斗大会，郑家富主持会议，李炳贵在会上讲话宣布被斗人的“罪状”，陆千荣、郭士莲、朱远球等均参加大会，会上斗打死了谢经贤、郑仕全、谭德铨三人。

“宣传队”进驻新联、岭塘大队后，组织斗打共死去四十七人。其中新联大队三十人，岭塘大队十七人。这两个大队被民兵围攻后，被抓、斗打、枪杀、炸、放水、被逼自杀，其他十六个大队共死去四百一十七人人，全区(公社)共计死去四百九十人。

“木格6·17事件”发生后，县革委曾于6月18日派韦守杰和廖振华带调查组到木格调查处理。然而，身为县革委常委的韦守杰，到木格后，撇掉军管代表廖振华和调查组成员，私自个人活动，他的活动不仅不是调查事件的发生和经过，不代表革委去做干部和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劝阻和制止事态发展，反而积极去煽动派性，唯恐天下不乱，把事态继续扩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好让他的同伙借机消灭木格少数派。在6月20日县革委常委会上(专题讨论6·17事件)韦守杰首先汇报了所谓“事件的原委”(实际是编造的假情况，后为军代表廖振华揭穿)。这次会上决定再派韦守杰和军代表赵廷秀带处理组第二次去木格，宣传当时县革委常委的“三点处理意见”(即一是动员撤民兵，不能乱杀人，二是教育早礼群众交出和协助政法机关追捕凶手；三是教育岭塘、新联群众自觉清理黑枪黑弹和外来人员)。但韦守杰却迟迟不到木格，即便后来到了，也不找赵廷秀等人商量工作，更不积极传达革委会的“三点处理意见”，有意让外区民兵在那里继续乱抓乱杀。6月25日回城汇报时，在县革委常委会上韦守杰受到了批评。

柳州市的“武斗”及惨案

【说明】上世纪九十年代，参加柳州市“处遗”工作组的自治区厅级老同志谢方中，给了我若干他“处遗”结束后，个人保留下来的柳州市“处遗”时工作组调查整理的材料，我如获至宝。现摘该市1968年的部分用电脑打出来，供网友参考（以后如有时间再打其他部分）。——张雄飞 2011.5.6日

元月五日，“柳州联指”和部份驻柳部队约五万人，在人民广场集会，欢呼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的发表。

过了两天，有武宣、象州、柳城、忻城等县“造反大军”群众三十多人，以“广西4·22柳专各县革命造反控诉团”名义，到柳州军分区院内静坐，要求部队予以支持。后来，静坐人员陆续增至一百多人。四天后，“柳州造反大军”的“红六九”、“捍无卫东”、“柳州地总”等群众组织派人对静坐人员慰问，送去木炭及食物等。十一日上午，“柳州造反大军”一万多人，在人民广场开会，表示支持“贫下中农这一革命行动”。会后，举行游行。

二月九日，融安县发生较大规模武斗，“柳州联指常委”研究后，决定派常委蒙志恒、刘目忠、张麦生等人带领“工交兵团”为主的武斗人员约三百人，奔赴融安参加武斗。

二月十三日，柳江县县城拉堡发生武斗，“柳州联指常委”决定：由“工交兵团”和“财贸兵团”等群众组织武斗人员出击。在常委书正钧、刘目忠、张麦生等带领下，数百名武斗人员前往“助战”。武斗持续一周之久，最后，刘若章、郑国忠、凌广支、方荣芬、黄保升、许明汉、李巫溪等二十多人被打死；其中带队去武斗的“柳州联指工交兵团二分团”头头之一金成贵也被打死。

二月二十六日，柳州空压机厂“联指”为武斗打死的厂保卫科科长金成贵开追悼会，抓来不同观点的成华、刘林智、石基宏等二十二名群众，跪棺祭灵，出动百余辆汽车送葬。

三月十二日，驻柳部队“支左”办公室、柳州市人武部“抓促指挥部”联合发出紧急通知《关于坚决贯彻执行中央二月十八日的紧急通知的具体措施》，强调：“对已离职、离校外出的职工、学生和机关干部(包括领导干部)应立印回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如在三月二十八日前再不回来的，一律停发工资和助学金。

三月十七日，驻柳部队领导人孙凤章在两派群众会上，对柳州市前段时间的“文化大革命”主要情况作了自我检查。其中谈到：“第一阶段。(1966年6月～12月)是学习破‘四旧’。第二阶段(1966年12月-1967年1月)主要是要不要批判‘四清’中的反动路线，一派要批判，一派不让批判，形成革与保的斗争。第三阶段(1967年元月25日-3月)围绕‘一卅’、‘一·二五’事件，一派支持，一派反对，形成对立。第四阶段(1967年3月～6月)开展大批判大辩论，分为明显的两大派，即‘柳州造反大军’、‘柳州联指’。大辩论，引起静坐绝食，冲击市公安局等较激烈行动，甚至后来的各次武斗。”

四月九日上午，经广西壮族自治区“革筹”批准，“柳州钢铁厂革命委员会”成立。两万多人集中在柳州钢铁厂广场开庆祝会，会上，驻柳部队“支左”办公室副主任刘祥宣读了广西区“革筹”批示，即批准由李世禄为主任，谭锐为第一副主任，蒙志恒、祁仕新、郑先绪、郭永宽为副主任的共二十九名委员的“柳钢革委会”。当即由李世禄讲话，驻柳五十五军副军长霍成忠宣读了广西自治区党委、“区革筹小组”的贺信。其他代表在会上作了发言，祝贺柳州市较大的第一个单位“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四月二十日，发生影响较大的“四·二〇事件”，柳江县洛满区参加县“三代会”代表，乘坐两部汽车赴县开会。而随车有民兵“押送审理”的九人，以及洛满区上缴国库的现金七万四千五百八十元，路经柳州市汽车渡口时，与“柳州造反大军”的“航运工总”等组织发生冲突，最后洛满区财粮助理员、县“三代会”代表、“县联指常委”覃仁欢被打死，有十二人被打伤，抢走全部现金及民兵的六条枪支，一百八十多发子弹。事后，“柳江县联指”抬尸游街示威，激起两派

更为严重的对立情绪。

四月二十八日，“柳州联指”和“柳州造反大军”，为争夺铁桥北端的自来水厂，发生武斗。从二十八日起至五月上旬，发生“拉锯战”，“战火”燃烧到附近的郊区公所和柳州市染织厂等单位，房屋被炸毁，打死张明、吴德生、林立新等二十多人，伤数十人，染织厂的数万米各种布匹被抢走，原来占据自来水厂的“柳州造反大军”，被迫退到河南方面。基本形成以柳江河为界，“造反大军”占领河南；“联指”占领河北的对立局面。

五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柳州造反大军”的“捍卫东”、“柳州总”、柳铁“工机联”等群众组织，抢夺抗美援朝物资，共抢走八个车皮的一千八百八十八箱子弹，计五六式子弹一千七百一十一万八千七百二十发，引信三十五个。为首有柳铁“工机联”两个头头李振岭、王反修。并给押车的解放军写了一张署名为“李向阳”的“收据”。

五月二十五日，驻柳部队前往执行收缴被抢的抗美援朝军用物资任务，“柳州造反大军”群众组织人员又把部队围住，抢夺走驻红庙部队的轻机枪二十二挺、冲锋枪二百七十九支、步枪二百一十支、手枪一百一十三支、信号枪十二支、信号弹三百一十七发、手榴弹四百四十枚、其他子弹十一万四千六百四十发，打死解放军一人、伤四人。这次事件，使国家遭受严重损失，在广西和全国造成极坏影响，致使柳州的武斗日益加剧。

六月四日，一万多人在柳钢广场举行集会，庆祝“柳州市郊区革命委员会”成立。驻柳部队和柳钢等一百五十多个单位的代表，以及广州军区学习“毛著”积极分子，来宾县武装部副部长罗常源专程前来代表已成立“市委会”的柳城、柳江等十个县，表示祝贺。会上，由驻军“支左”办公室负责人宣读了广西区“革筹”批示的由郭俊庭为主任，刘永生为第一副主任，陈亚苟、罗天琦为副主任的共四十九名委员组成的“郊区革命委员会”，还宣读了广西军区和广西“区革筹小组”的贺信。郊区“革委”主任郭俊庭进了话，有关代表发言表示“热烈祝贺‘郊区革命委员会’的胜利诞生”。

五月底至六月上旬，“柳州造反大军”抢到大量援越军用物资后，枪多弹足，因此，对探矿机械厂、电机厂、汽车总站、马鞍山、冶炼厂以及窖埠等地大举进攻，扩大占领地盘，占据柳州市河南大片，并放出风声：“要在六月二十号拿下河北！”。“联指常委”紧急开会，区建五公司领导干部分派才等亦参与研究，准备守住河北一片，作了布防，即：由岑国荣等人带领柳钢武斗人员坚守大桥北端；张林等人带领区建五公司武斗人员坚守东门沙角沿河一带。万一守不住，作出“战略退却”，往柳城县方面撤退，此时造成人心惶惶，空气十分紧张，犹如“山雨欲来风满楼”。有些部队和干部家属已退到柳城一带，称之“六·一〇事件”。

与此同时，柳州地区几个县武装部和“柳州联指”，在象州县石龙镇召开“联防会”。柳州地区除三江、金秀县外，所有各县武装部和“联指”群众组织代表参加会议。“柳州联指”一派群众组织“常委”、保卫部副部长郑帝旺和市郊区“革委”副主任罗天琦也参加了“联防会”，“联防会”主要内容是研究部署迅速组织民兵进入柳州市，“围剿造反大军”。决定象州、武宣县的民兵，从河南方向的鸡喇、柳机推进；柳江、柳城县的民兵，从柳江县拉堡、西鹅公社、南站方向进攻；鹿寨县的民兵，从柳州市东边的三门江等地打进市内，总攻目标是“收复河南，把‘造反大军’消灭光”。

五月底至六月初期间，“柳州联指”的“保卫部”，为了配合“大部队”行动，“保卫部”梁国开、周继才、覃绍昌等骨干，紧急研究决定，提前处理关押在市

委礼堂不同观点的“审查对象”，分五批拉到河边集体杀害，共杀害了有名单的四十二人。有的被铁丝捆绑手脚，排队站在河边，被集体枪杀；有的被紧绑手脚，推下大河活活淹死，如其中有杨兰生、杨岩生弟兄俩，杨兰生被推下河后，漂游到比较远的对岸，躲避幸存至今。而杨岩生被推下河，漂流到不远地方上了岸，被重新抓获；又被拉到河边杀害，再用竹竿推尸下河。“保卫部”在梁国开、覃绍昌等人掌握控制之下，杀人手段比法西斯杀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梁国开、覃绍昌、龙镇、吴述生等人最后难逃法网，均受到了罪有应得的惩罚。

六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针对前不久柳州发生的抢夺抗美援朝军用物资严重事件，立即电话通知，作出停止武斗，迅速恢复铁路运输，交回抢走的武器物资等五条决定，而称之为《六·一三通知》，要求广西“区革筹小组”、广州军区、柳铁局，军管会主管部门，责成柳州两派坚决贯彻执行。

六月十九日，“联指”就六月十七日广西“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发布的《关于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反革命案件》的公告，发表了“总动员令”。其内容有：“1、必须深入彻底揭露，全面围剿。2、配合解放军，发动强大攻势。3、联系‘四·二〇’事件，打人民战争。4、清理阶级队伍，纯洁组织”。

六月x日，柳州市公检法军管会、柳铁公安处、柳警司联合发出公告，追查“反团”，直至一九七〇年，全市十四个单位，开展追查“反团”工作。前后受审查人员达四百三十八人。其中被关押审查的四十五人；被迫害致死十六人。如柳州机械厂，从副总工程师到职工共291人，(其中处级干部5人、县级干部20人)被列为“反团”对象，范围之广，人数之多。造成柳州市较大冤案之一。一九八三年“处遗”时，该案得到了彻底平反昭雪。

六月二十四日上午十一点钟，“柳州造反大军”据点飞鹅路“柳铁长楼”宿舍被炸，炸毁六十四间房间，后来挖出尸体三十一具。接着不久，柳铁党校、柳铁中心医院等处，连续发生激烈武斗，死伤不少人。

七月七日，空军部队用飞机散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并经毛泽东同志签署的“照办”的《七·三布告》。布告内容：“一、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二、无条件的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连，保证运输畅通。三、无条件的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四、无条件的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五、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上山下乡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七月十三日，在人民广场和市一中广场，分别召开两派群众组织、驻柳部队代表，共约四万人大会。贯彻落实《七·三布告》，与会部队首长阎永让、唐副主任、李政委等在会上讲了话。

七月二十三日，驻柳部队和柳州市、柳州地区、柳铁的群众，在人民广场，又开十万余人大会。柳州军分区政委郭鹏作报告，报告主要讲到：“坚决响应中央的号召，认真执行中央的命令，全面贯彻落实《七·三布告》”。

八月十一日，“柳州钢铁厂革委会”，为在六月份武斗中被打死的蒙志恒、谭尚才开追悼会。追悼会由“厂革委”第一副主任谭锐主持，“革委会”委员吴美江、张盛坤分别讲话。“柳州联指”群众约一万人参加了追悼会。会后，为死者送葬，在即将下葬时，放枪鸣炮，把“造反大军”观点的本厂群众黄鸣皋用炸药

捆绑在身上引爆，作为陪葬，并将黄的尸体剖腹挖肝，吃肝，泡肝酒，骇人听闻。

八月十九日，广西两大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在北京参加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把一派的头头共九人，包括柳州市的“造反大军”头头白鉴平、廖伟然两人，扭送北京卫戍区司令部，进行拘留。后来送回当地处理。(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柳州市公安局宣布逮捕白鉴平。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市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白鉴平无期徒刑。一九七八年二月三日，广西区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批复“维持原判”。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五日，高级人民法院复查改为“纵火抢劫罪”，改判为有期徒刑十六年。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区高级人民法院认为白鉴平已构成“纵火抢劫罪”，鉴于“文化大革命”特定历史条件，可以从宽处理，免予刑事处分，宣布释放)。

八月二十三日，经广西“区革筹小组”批准，“柳州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由七十九名委员组成，其中常委二十七名，王国瑞任主任，第一副主任赵云凌，副主任鲍晓农、默双科、刘祥、孙建钧、张友仁、谭志芳。当天，在市民广场召开有柳州市、柳州地区、柳铁和驻柳部队军民十五万人大会，宣布成立“柳州市革命委员会”。柳州军分区政委郭鹏、柳州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赵云凌先后讲了话。工人、农民、红卫兵代表在会上发言。此外，广西“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广西驻军代表詹新泉到会祝贺。会后，通过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并举行盛大的游行。

九月十日，成立“革委”后，由柳州市“革委”，柳铁局“革委和柳警司一起讨论决定，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中央<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公告》。(简称《九一〇公告》)。《公告》主要内容是：“1、各级‘革委’(‘革命领导小组’)和革命群众，把宣传《七·三布告》和开展对敌斗争结合起来。2、认真清理自己的阶级队伍；团结一致，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猛烈进攻。3、加强对敌斗争，坚决镇压一小撮阶级敌人，发动群众，刮起一场十二级台风。4、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和人民解放军装备。5、外来和倒流城市的人员，必须立即到柳州市‘革委会’箭盘山收容所听候处理。6、群众组织或个人，抢夺、盗窃和非法占用国家物资，全部上交专政机关单位’。公告还强调：“为了巩固新生红色政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必须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从此，在九月中旬至十一月上旬期间，是受迫害致死的人比较多的阶段。如太阳村公社，在“刮十二级台风中”，公社党委书记潘海煌、公社副主任覃有洛、信用社干部杨应彪、老师廖光明等等被迫害致死五十七人。据不完全统计，这阶段死了三百多人，仅次于武斗时期死掉的人数。

九月二十九日，经“柳州市革命委员会”第六次全会讨论决定，由赵云凌、蔡玉斌、孙广远、王心良、陈洪远、张麦生等人负责，正式成立“柳州市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由原各个厂矿的十五个连队两千多人，发展到六十五个连队共八千余人。分布市区街道、工厂单位，发挥所谓群众专政作用。

从十月中旬起至十一月十六日，“郊区革委”举办“阶级斗争活人展览”，把贾俊甫(郊区党委书记)、武钧(农办生产科科长)、纪金和(郊区干部)、刘达光和梁译保(效区农中老师)、钟蔓贤、刘吉荣、诸葛友、黄吉(均为生产队干部或农民)、邱怀寿(插队青年)等十一人，在一个月中，展出一百一十九场次。使这些同志人格受到侮辱，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摧残。直到一九八三年、八四年“处遗”时，才全部予以平反昭雪，恢复政治名誉，得到妥善解决。

十一月初，市“革委”决定，对“三旧”即旧市委、旧人委、旧公检法及其他未被结合的领导干部和未分配工作的干部人员共六百七十多人集中办“毛泽东

思想学习班”，分别在马鹿山、羊角山、大桥园艺场等地“办班”审查。特别是公检法的干警，在园艺场受“审查”时“支左”的部队负责人李连仲说：“你们以前专人家的政，今天就要专你们的政”。还规定：“①不准乱说乱动。②不准外出。③不准接见家属亲友。④不准通信。”更严重的是被斗、被打、被关押，剥夺“人身自由”，极个别的被判刑劳改，造成妻离子散的严重后果。经“审查”后，极少数人员安排工作，大部份继续到“五·七干校”进行边劳动边“审查”。

十一月，“柳州市革委”执行广西自治区“革委”的部署，建立“市革委第三办公室”，抽七十多名干部组成几个专案组，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对柳州市地下党进行全面迫害。如十一月一日宣布对原柳州市地下党工委书记梁山和王少白、邓程章等隔离审查，长达四年零三个月之久。把黄维光、卢志坚、刘达尊、韦竞新等地下党 48 人长期审查或迫害，有的家属也受到株连。造成了比较大的冤假错案。直到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六日，柳州市委根据广西自治区党委决定，作了全面平反昭雪。

十二月十二，柳州市柳南地区和柳铁三百多名群众，在鹅山广场召开批斗会。批斗柳铁领导张炎、柳州地委书记王杞桓、柳州市委书记梁山、市长孙芸生、副市长徐锡文等领导干部，以及群众组织头头王反修、李振岭、白鉴平、廖伟然等人。柳铁军管会负责人赵永信和柳铁局“革委”主任孙连捷先后讲话。表示支持批斗会。号召“深入进行斗批改，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夺取更大的胜利！”

柳城县惨案

【说明】柳城是个在文革前只有十几万人的小县，但在文革中，竟也有被打死和被迫害致死的干部群众多达五百八十七人，杀人手段之残忍，也令人发指：有用枪杀死的，用刀戳、砍死的，石头砸死的，棍棒打死的，有的还被捆绑丢下河活生生淹死的……一九八三年广西“处遗”时，经调查和处理，全县与打死人有牵连一千三百九十四人，立案审查五百四十人。其中国家干部一百四十五人，党员四百八十人；被判刑的一十八人，其中国家干部九人；派头头杀人犯徐振海被判刑十五年；赖德明被判刑十五年；盘祥金被判刑十三年；梁洪坤被判刑十年；吕仁志被判刑八年。覃社明被判刑八年；潘永昌被判刑七年；陈映被判刑七年；潘贵庚被判刑五年。被开除党籍或清除出党的国家干部五十七人（据谢老提供的资料）。

东泉三里坳杀八人事件

一九六七年农历十二月十日上午，由谢水林(农民)带领伍庆初、朱芳茂、余水养、李开林、刘福建(均系柳州市九中学生)、罗玉华(沙塘公社二队人)、罗家才(太平公社松柏村人)、周家美(贺县人)等八人，到东泉镇林文忠家吃饭，被人认为是来抢赌场的。当时，进驻供销社的民兵副营长孔庆荣、韩和新等人听到消息后，立即带领民兵包围了林家，在汤学斌(区武装干部)、韦少礼、黄流沛(均是供销社干部)组织指挥下，用步枪、机枪、手榴弹向林家房子袭击，喊他们投降，均无动静。孔庆荣、罗绍德(民兵)进去抓人，结果罗被挨包围的那八人击伤腿部，后经抢救无效死亡。下午四时，在林家里面的人不投降，外面的民兵又打不进去之时，供销社干部杨湘云出了用炸药炸的点于，经两次用炸药包进行炸房，结果只是把房子炸崩了一角，仍不见人出来投降，无计可施，只好把屋主母子两人捆绑起来，林文忠被强令进去传话，八人出来投降，被搜缴手榴弹三枚，手枪一枝

及钱、粮票等，接着逐个被捆绑，蒙住眼睛，关在武装部。当天晚上和次日上午，对八个人进行两次审讯，均无收获。下午，上述指挥者及民兵营长在武装部研究决定把这八个人杀掉，并由孔、韩等十个民兵押送到“三里坳”一个凹处，民兵冯新友一枪打断一根绳子，其中一个跑走，被孔庆荣用步枪射击，当场中弹身亡。余下七个，民兵押到岑上开枪射击，五人当场死亡。还剩两个中弹未死，当晚爬到雷塘大队北岸村，又被民兵抓获，第二天报告区武装部，韩和新(大队治保主任)等三人即赶到北岸村提押这两人，回到雷塘岭，韩和新用日本马刀将受伤的一人活活砍死，另一个被其他民兵用石头砸死。

刘德义被打死及挖坟烧尸事件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是柳城完中红卫兵的“红联”组织成立半周年纪念日，晚上“红联”的人参加纪念晚会回校，到中医院门前，女学生韦金兰被炸(轻伤)，“红联”的人认为是“红总”的人搞的，于是要对“红总”的红卫兵进行惩罚。“红联”的红卫兵陈荣滔，进了学生宿舍，用五四式手枪把“红总”的红卫兵刘德义打死，后葬在校门内新教室旁边。事隔八个多月，六八年九月中旬，“红联”红卫兵组织决定要挖坟翻棺烧尸，并取得柳城“联指”总指挥部的支持，把需要的柴火、柴油、汽油任务分派给大埔食品站、县农机厂、糖厂和拖拉机站，同时布置“大埔镇监狱”按时解送被关押的人员到场。当天，贾继荣(国家干部)，周昭(大队级的镇干部)及数十名民兵把被关押五、六十人的所谓牛鬼蛇神排成队列走去完中，沿途押解人员强令被押解的人要边走边哭：“去挖死者，死狗刘德义”，完中持不同观点的少数派学生、教师也同时被押送去坟前(意思是这些人都是刘德义的孝子贤孙)，此事轰动全城，居民、群众、干部、工人、学生以及参加县三级干部会议的干部他们闻讯后纷纷到现场围观，竟达千余人，挖坟现场指挥者梁建德(“联指”常委、“红联”负责人、中学生)等人，强令被押送来的全部人员，脱掉衣服，光着身子，跪在坟边哭，不哭的被打，约一小时，坟挖开了，棺材拉出来了，在场的民兵把刘树宝(学生、“红总”组织人)、周兆忠(干部、“造反大军”)、李连喜(小学教师、造反大军)推进坑内，进行活埋。此事惊动了正在开常委会的领导王金山(县革委主任、人武部部长)，亲自赶到现场，制止了正在进行的活埋活动，避免了事态发展。后来，又找了梁建德等人进行教育，制止了正进行的烧尸事件。

一九六八年打火船事件

一九六八年元月，柳州地区体委在融水县举办兰球赛运动会。地区体委副主任谭瑞铭，教练康健华等四个干部，带着武宣、来宾、金秀县以及合山煤矿运动员代表队乘坐“桂青号”客轮。乘客中有吕仁山、景长平二人。元月七日下午二时，客船从柳州启航开往融水。客轮开出以后，柳州“工交兵团”认为船上装运有武器，就派独立排二十多人全副武装乘坐专车赶到柳城截拦，并和柳城“联指”配合行动。八日凌晨十五分，客船到达大埔牛头潭，遭到袭击。柳城“联指”常委蒋进芳大喊停船，鸣枪警告，柳州“独立排”的带队人李培训用7.26步枪开了三枪，同队来的长塘民兵也开了枪。当场打死金秀县体委负责人江长杰(三十一岁、共产党员)，打伤运动员罗青标，后客轮被迫在林业局码头靠岸，船刚靠岸，“独立排”的一些人和柳城“红卫兵”的高长选、郑务明、谢宗鹤等人带着口罩、黑眼镜上船搜查；抢走乘客、运动员的粮票、现金、衣服、球鞋等物，抓走乘客景长平(柳城物资局局长)。

周显昌一家父子三人被害

一、二月间的一天，徐振海(凤山供电所副所长)得悉周文龙是凤山区革委辑拿未获的“脱逃犯”，便和国家干部周兆烈(与周文龙是同村人)带领干部、民兵十余人前往仓贝村捉拿，后押回凤山粮管所。当晚八时，徐交待民兵副营长梁振华，梁又交待民兵唐畅余把周文龙杀掉，说：“徐振海讲，只准刺死，不准开枪”。唐等人执行命令，押到柳江河边，将周杀死。周文龙被害后不久，徐振海又带领民兵李树养等十多人去仓贝村将周显昌(周文龙的父亲)、周文虎(周文龙的弟弟)父子俩捕解凤山，回到石角口(地名)时，徐命令周父子二人跪下，徐、李分别用刺刀从背后刺去。尔后，徐对参捕人员说：“你们每人的刺刀都要见红”。这样李昌德等四人也各刺一刀，周父子俩当场惨死，后徐等人把尸体丢下大河给水推走。

融安武斗

融安县“二·九”事件发生后，融安“联指”立即派邓大威等二人，由四顶矿的司机杨宪平引路到柳城，和柳城“联指”常委何健枢(文化科干部)接洽。后出何主持在家的常委会议，决定派刘中仁(“联指”常委、地区财贸干校干部)、徐旅海(凤山供电所副所长)二人带领中回等大队民兵四十余人，分乘三辆汽车于二月十日晚上开赴融安。沿途太平区的“造反大军”窃听柳城“联指”援兵电话，即派颜仕谦带领一小队武装人员到花山尾(地名)埋伏，当“联指”三辆援兵汽车送入火力圈时，开枪射击，双方交火，因力量悬殊，“造反大军”成员黄忠中弹身亡。人死后，不敢再拦，柳城“联指”援兵顺利通过，开赴融安增援，并参加攻打铜鼓桥的战斗。

“三一一”事件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一日下午六时三十分，柳城五号排灌船运送化肥去凤山区，在凤山镇冲口码头卸完三十吨化肥后，起航返回大埔，徐振海(凤山供电所副所长)听说船上有枪，有“柳州工机联”，还有“柳城红总”，立即拿机枪到射击位置上，鸣枪警告，但船没停，徐就瞄准船打了三个点射，接着民兵也开了枪。结果打伤了护航的解放军战士石登鹏和该船机手邓崇新，邓崇新由于伤势过重，不幸身亡。

大帽桥二谢被害

一九六八年六月五日，凤山供电所徐振海与部份去柳州参加武斗人员，乘汽车返回凤山。同车返回的还有东泉区民兵副营长孔庆荣等人，押解东泉区对河大队农民谢燕德、谢金秀回来，二谢均被反绑和蒙住双眼。当车开到大帽桥往凤山叉路五十米处，徐振海和黄邻江二人把三谢押下车，徐对二谢说：“到家了，送你们回家去”。接着徐、黄两人将二谢拉到距离汽车数米处，用刺刀将他们刺死。

县革委扩大会议煽动“刮台风”

一九六八年六月八日至十三日，县革委在古砦召开了革委委员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有县革委委员，各区革委会主任，县直机关革委会主任或领导小组组长。六月七日由王金山(革委主任、人武部部长)主持召开预备会议，安排会议议程和会议开法。

六月八日，莫国祥(革委副主任)作柳州分区会议精神的传达报告。报告共分

四个部份，阐述在大好形势下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新特点和新问题是：阶级敌人利用群众组织和受蒙蔽的群众，矛头指向革委和军队。针对这一严重情况，切不可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迅速克服各级领导等干部存在的不敢向阶级敌人发动进攻和不敢发动群众缩手缩脚的右倾保守思想，通过大搞阶级斗争的论述，大查敌情，大揭阶级斗争盖子，大批大斗，坚持反动立场的四类分子，牛鬼蛇神，向他们刮一次十二级台风。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也是“古砦会议”期间，县直机关和大埔区联合组织了游斗，将所谓“走资派”、“牛鬼蛇神”一百二十余人，强令他们戴高帽排成长队上街示众。副县长覃炳坤打着大黑伞走在前头，边游边斗，许多人被棍打脚踢，侯高浪等人还被打成重伤。

古砦会议后，全县各地迅速刮起了向“阶级敌人专政”的台风。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四日至十八日，大埔区革委会召开三级干部会议，革委会主任赵祖发传达贯彻古砦会议精神，会议决定要抓一批斗一批，区直机关水管所所长罗何谋，县直机关干部吕月江等人在会议中被批斗，罗何谋被打成重伤当晚死亡。接着，全区搞“顺藤摸瓜，点名就抓”，一天就抓了一百零四人，抓后均关在大埔镇“监狱”里。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六塘区召开革委常委扩大会议，革委主任吕仁志传达贯彻“古砦会议”精神，提出“七种人”(一、有现行破坏的五类分子；二、打击干部的；三、投机倒把的；四、不出集体工的；五、不服从管制的；六、反攻倒算的；七、历次运动漏网的。)为“刮台风”的批斗对象，并且要刮掉一批，敲掉一批。会议决定：先开批斗示范会，后分片开群众“刮台风”批斗大会。六月十八日在六塘小学召开批斗示范大会，区革委副主任覃社明讲了话。拉燕、大龙、六塘三个公社四千多人到会。动员报告后，分公社进行批斗，结果全孝榜(拉燕公社羊角村人)、梁加高(六塘公社银村人)、韦桂先等五人被活活打死。二十一日又在六塘、冲脉、马山三个片召开群众“刮十二级台风”大会，当天到会共一万多人，批斗了一百六十人，打死二十二人。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洛崖区革委召开五百多人参加的三级干部会议。区革委主任覃仕双传达“古砦会议”精神。报到的那天晚上，分两个会场作示范性的批斗大会，两个批斗会都出现乱打乱踢，被斗者：苏日光、龙正平、严勤昌、杨宗权四人被打成重伤；韦永盛被打后当晚死亡。

一九六八年六月中旬，沙埔区革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古砦会议”精神，并决定在沙埔召开全区群众“刮十二级台风”游斗大会。六月二十二日区革委主任高杰主持会议，副主任张显忠作传达报告，然后分公社进行批斗，结果当天有五十人被打成重伤，陈坤光、全德宪等九人被打死。

青山脚下五人被杀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六日晚上十一时，东泉区的民兵副营长孔庆荣，从柳州开车回来，命令民兵龙庆加、吕建明两人帮送“在押犯”去柳州。后孔又找陈良(税务所所长)对在押人员进行审问。审毕，将被关押的伍金甫、巫维展、庄十、何茂、杨观妹分别捆绑，蒙上眼睛，押上汽车。车开到青山脚下路口时，孔庆荣命令民兵把这五人拉下来，又令“放他们下来吃草去”。民兵将这五人推到公路旁茶子树跪着，最后，命令民兵开枪射击。之后，孔又分别给五人各补一枪，四人当场死亡。唯独庄十未死，半夜爬到小仙村背的冲沟里躲藏，后又被抓送沙埔的古木公社，党支书方继才下令民兵把庄十拉到古木坳公路边枪杀，并在庄的尸体，

插上“谋杀干部的下场”的木牌。

凤山爬游事件

“古砦会议”结束后，凤山区革委副主任何勋在常委会议上传达“古砦会议”精神。参加常委会的有何长斌、林景光、李佑宗、罗坤二胡东生、兰辉杨等人。会上作了研究，提出每个公社，每个单位要查出三至五个阶级敌人，由群众进行游斗。六月十七日在凤山中学召开全区群众大会，何勋主持会场，区革委主任何长斌作动员报告后，宣布就地分开以公社为单位进行批斗，被批斗的人均被乱打乱踢。接着十八日在礼堂召开区直机关干部、教师、职工大会。何长斌掌握会场，何勋传达“古砦会议”精神，何勋传达后，何长斌进一步作了动员。会上将批斗对象逐个点名上台亮相。计有凤山小学、凤山中学和机关干部莫洪智、刘昌黎、郭芳、朱传真、张林桂等二十人，这些人被五花大绑、跪立示众，后又被押封区会议室外，跪在石渣上数小时，最后再由民兵送到凤山小学关押。十九日中午，由民兵张保民用长绳子把被关押者逐个绑住连成一串，戴上猪笼帽，赶去游街。游到凤山小学后门时，不准直立，要象狗一样，四脚爬地，掌心向上，不准看人，不准帽歪，违者鞭子对不起。这些人只有从命，爬游过街，一个个和群众见面，任由棍打脚踢，区委书记郭芳被拉上肉台，被打成重伤，其他的人有些也挨打。爬游结束后，这帮人仍全部被关押在凤山小学里。

韩老师被害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七日，六塘小学教导主任韩世芳被学生打死。韩世芳在一九五〇年入伍，一直从事教育工作，曾被评为广西省优秀教师。“文革”中，教师张向东、韦捍东、覃先养等三人合谋将韩的地主“成份”改为“份子”，并将“材料”公之于众，尔后又组织师生对韩送行多次的残酷批斗，韩被打得到处是伤，走动不得。但张向东等人仍未放过，又组织全校师生把韩斗死。在批斗会上，一些不明真相的学生，拿起木棍砖头等物，朝韩乱打乱砸，结果脑壳被打开裂，脑浆飞溅，当场死于会场。

廖德彰被迫害致死

廖德彰，男，一九二九年生，家庭出身贫民，个人成份工人，汉族，初中文化，柳州市人。生前系柳城县大米厂会计。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成立县革委时，被结合为县革委会委员。“文革”期间，廖德彰只因参加“造反派”组织，一九六八年六月在大米厂被周志飞(大米厂保管员)等人组织批斗三次。讲他“制造手榴弹，影响生产”，过了一段时间，又组织第四次批斗。廖被捆绑、打。打手是李荣汉，掌握会场批斗的有何近秋(粮管所保管员，“文革”副组长)、周志飞二人。后来成立“批斗联合小组”，组长韦福强(大埔粮所指导员)，副组长何近秋、周志飞。他们三人又组织对廖进行批斗，诬陷廖德彰“勾结造反派攻打粮所，抢粮所的枪”，廖德彰不承认，即被吊上二梁，对廖连续批斗十多次，最后这次被打得很伤，咀巴出血。由于廖不愿再受斗、打的折磨，于八月十日写上遗书，投河身亡。

杀人垫底事件

进驻东泉区供销社的民兵副营长孔庆荣，去柳州参加武斗被打死的消息传到东泉后，许世祥(区革委常委、贫下中农阶级斗争指挥部指挥长)、杨湘云(区革委

常委)等人去武装部找部长覃树记,提出要以武装部名义开追悼会追认孔为革命“烈士”,覃部长拒绝。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七日,柳州“联指”的周兆熊、邓君立、谢年初等人将孔的尸体从柳州护送回东泉。由许世祥、杨湘云、汤学斌(区武装部干事)、陈良(税所所长)、杜汝宏等人组成治丧委员会。并向全县发通知,定于六月二十八日中午十二点在东泉中学开孔庆荣的追悼会,参加者有县和各区代表及本地的干部群众共几千人。在追悼会主席台就座的有许世祥、温辉连(区革委副主任)、杨湘云、汤学斌、周兆熊、邓君立、谢年初等人,许世祥主持追悼会,温辉连致悼词,汤学斌也讲了话。追悼会结束后,结队送灵车游行,从中学到烈士塔,然后下葬。当送葬队伍到时,按事先布置好由民兵韩新和、吴登华把杜秀金(乡文书,土改根子)、龙黄明(复员军人)二人杀死(垫底的意思),后把孔的尸体下葬,葬孔时,民兵连续鸣枪,以示威风。

出“布告”杀人

东泉区凉亭公社“贫下中农阶级斗争指挥部”于一九六八年六月中旬成立,由公社干部沈兰标、何胜华等人负责。“指挥部”成立后,决定将熊惠、杨亚连、罗桂明三人杀掉。六月二十七日,在凉亭小学召开群众大会,把熊、杨、罗三人的“罪恶”写成的“布告”向大会宣读,判处死刑,交大会执行。结果熊被五寸刀刺死,杨、罗被枪杀死。后把农字第一号的“布告”,贴在墙上,公之于众。

总结“刮台”经验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八至三十日,县革委会各区、县直机关革委会(领导小组)主任(组长)会议,“总结“刮台”经验,继续“刮台”部署。县革委会副主任莫国祥作《关于前段开展对敌斗争工作总结》报告,县革委会主任王金山作关于会议总结和会后“刮台”工作部署。

一家五人被害

一九六八年全县“刮十二级台风”期间,古砦区上富公社民兵营长韦天光、民兵梁定全等人,把先杀覃长城(大哥),后杀覃长忍(老二)等的杀人计划,向区革委请示报告。于七日将已经到外地(覃村、云峰等地)入赘的覃长城、覃长忍、覃长秋、覃长首兄弟四人枪杀或打死。其母卖桂凤见安分守法的儿子均被打死,无处申冤,无法再活下去,于是自寻短见,一家五口就这样被“文革”吞没。

龙头事件

一九六八年七月三日,大埔区龙头公社召开传达“刮十二级台风”会议,上午八时,二十二名被游斗对象集中公社院内。刘万昌(民兵副营长)等人按潘永昌(区公安员)的布置,将被斗者分别捆绑、挂牌、戴高帽,一起押到公社门前的榕树下送行批斗,刘建友、袁建升、钟秀利三人被打得不省人事,张权生被打成重伤。但仍未放过,刘万昌下令给民兵将这四人拉到粮所门口进行枪杀。七月九日又组织一次游斗,当天把瓦窖公社的杨德经、杨贵明、苏保证、杨振兴、钟贵文打死。

洛古沉河事件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二日。大埔区洛古公社党支部书记赖德明,在畚坪糖厂召开公社、生产队干部会议,布置“刮十二级台风”,指名王振章等五人是“暗杀

队”，要搞大会批斗，斗后放下本河去。结果王振章、韦少荣、王治平、王立记、莫国犹五人，批斗后分别被捆绑手脚丢下融江河，王治平被丢下河后磨断绳子，才能死里逃生，现仍活在人间。

编写“敌人”破坏材料

一九六八年七月三十日，县革委生产指挥部根据各单位汇报，编写了《面上阶级敌人破坏活动初步情况》的材料发往各区、各单位。

凤山焚尸事件

一九六八年九大中旬，县里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期间，大埔发生了翻烧刘德义尸体事件，虽已制止，当时在县参加三级干部会的凤山区社干部住在完中，在目睹这一切后的讨论中，区革委主任何长斌说：“人家都行动了，我们凤山静悄悄的，大埔烧刘德义的尸体，我们回去怎么办？是不是翻烧李启德？”(李是凤山农中沉重，由于观点不同被另一派组织的人捅死)，当时到会的同志一致同意说：“做就做”。并决定凤山公社负责搞假棺材、挖坟翻尸，柴火由各公社五类分子每人送 30 至 50 斤，通过研究决定后，于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凤山公社民兵副营长梁振华和武装纠察队押解所谓“牛鬼蛇神”约三百人到街上游斗，被游斗都刘昌黎老师胸前被挂一块“孝”字大牌，双手捧“灵位牌”；秦应昌都是胸前挂一副芭蕉树做成的“假棺材”；徐祖敏都是捧一个装有鸡毛炭筛；其余的人扛着柴火。每到人多的地方，就勒令刘昌黎宣读祭文，游斗的人叩首下拜，表示是李启德的“孝子贤孙”，徐祖敏走一段路撒一把鸡毛，高声喊“李启德的死轻于鸿毛！”游街队伍中，谁走不好或跪不直还要挨打。游斗前，街上二队长李权和凤山糖厂吴以基(糖厂负责人)等十二人被强令到凤山岭挖坟(李启德原已埋下的坟墓)，待游斗队伍一到即可焚尸。棺材挖起后，由刘昌黎、曾益两人撬开，然后再由刘昌黎、秦应昌、况炳礼、欧太生四人将尸体从棺内翻出，放在柴火上焚烧，从下午三时一直烧到次日凌晨一时。

假坟

太平区杨梅公社板贡村农民周德勋，因“观点”不同，被抓关押在太平，后被加上参加反革命组织的莫须有的罪名，被打得屎滚尿流，继而又被押解到上油、上火公社批斗，也被打得死去活来。一九六八年八月，在押回杨梅公社途中，准备拉去同凌立荣(造反大军成员)一起杀掉。后来，又被拉回板贡村批斗，被群众拳打脚踢和棍打。多处受伤，鲜血直流，左手骨折，昏倒过去。刚醒过来，又被大小石头往上砸，再次昏倒，公社干部周瑞康认为其已死，又拉其父在其身边跪下进行毒打，其父见周德勋已死，要求收尸，不给；要求守尸也不给。深夜其父偷偷地到地坪看尸，解去绳子，发现尸体还软，心还跳动，就将周德勋背回家，进行药救。为了掩盖人们耳目，天刚亮全家嚎啕大哭，拿着工具到白虎山下去“收尸”，在山洞里制成假坟，掩护了多处受伤，左手骨折的周德勋，为了安全和治好周德勋的重伤，家里设法将他转移隐蔽在山上，经过数月医治，终于幸存下来。

洛满“围剿”

一九六八年八月上旬，柳江县洛满一带发生两派武斗，柳州军分区认为造反大军是“反革命”，于是组织宜山、柳江、柳城三县和八一锰矿民兵进驻“围剿”。柳城县革委会主任、人武部部长王金山、吴而玩三人亲自带领全县武装纠察队、

民兵一千人参加，刚开始时吴而玩黄鹂总指挥，后又换王明生负责。指挥部成员有：计柏珍、王彦廷、白春青、孙殿举、董其田、覃秀章、秦成业。在围剿中，打死当地群众二人。我县武装纠察队由于放哨换岗误传，当场打死“工纠”队员二人，还有一人重伤，送到宜山医院抢救无效也死了。

邓良毅老师被害

一九六八年暑假期间，邓良毅老师参加县革委举办的“斗批改”学习班。后沙埔区大安公社研究，决定批斗大安小学教师邓良毅，学校负责人杨谨明，出具证明，派民兵到县将邓老师押回公社，在办公室进行批斗，被杨芳辉用电工钳钳了邓的十指，进行逼、供、讯。残酷的批斗，邓老师忍受不了，当晚自杀身亡。

鹿寨县惨案

据反复核实，全县因“文革”而死的有一千零四十三人，其中干部一百零二人，工人三十一人，农民和居民八百八十三人，教师二十四人，学生三人。被枪杀和批斗打死的五百三十人，被迫害自尽的四百四十三人，武斗死的十四人，其它原因五十六人。经调查参与杀人和打死人的凶手有二千三百六十三人。死人最多的是寨沙公社一百六十七人。死人最多的大队是黄冕公社黄冕大队四十一人，一次杀人最多的是平山公社，一九六八年九月二日组织大游斗，仅几小时就打死十九人。杀人手段最残忍的是江口公社，全公社被残酷打死的六十六人中有半数被丢进河中毁尸灭迹。另外全县还有一千八百多人被打伤致残。对上述被害致死者绝大多数已实事求是地作出死亡结论，给予平反昭雪，遗属感到满意，他们深深感谢党和政府在政治上对他们的关怀和支持。有的遗属说：没有党为我们的亲人平反，我们永远抬不起头，也就没有我们今天说话的日子。

1968年5月16日中渡公社革委集中各大队四类分子到英山街游斗，由公社武装部长黄永福和朝阳大队党支部书记、公社贫下中农对敌斗争指挥长吴声瑶组织指挥。吴声瑶安排韦英宏向群众宣布韦昆武的“罪行”，并布置民兵潘老恩枪杀韦昆武。在当天游斗中，由潘老恩、韦显顺用枪打死。六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吴声瑶又主持召开朝阳大队革委干部会议，传达公社狠刮台风的会议精神，决定于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召开全体贫下中农社员大会，枪杀黄展国。韦显顺组织会场，并指定刘元超为第一枪手。批斗大会开始后，韦显顺宣读了黄展国的“罪状”。民兵韦乾胜、谭德林将黄展国推出会场，拉到雷公岭坳口(地名)，刘元超用七九步枪打第一枪，韦世德打了第二枪，把黄展国打死。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日，经县革委批准成立江口公社革命委员会。四月二十四日晚，挂在公社大门的革委会牌子被人偷走，公社革委主任黄志刚(处遗时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武装部长黄凤福(处遗前，因其它问题已被判处徒刑)即向县革委作了汇报，县革委主任、武装部长张春峰说：“偷革委会牌子就是反对革委会，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是反革命事件，要迅速抓紧侦破。”五月二十日，公社革委决定由黄凤福负责指挥组织新安、水碾、六合、丹竹等大队的民兵约二百多人，手持各种武器，到江口街搞大搜查。先搜查江口搬运工人李宿光的家，得出被毁坏的牌子，并把李宿光、钟其萱、马海泉、周云开、张仲尧等人抓到公社长期监禁。七月二十七日晚约八点钟，在江口医院背晒坪批斗马海泉、周云开。社直各单位职工、附近生产队社员数百人参加了批斗大会。会议由江口大队保卫组成员覃意春主持，先批斗马海泉。不到二十分钟，就被陶大明等人用棍棒把马海泉活活打死。接着又拉周云开跪在马海泉遗体旁批斗，不多久也被打昏(误死)。

随后覃意春派四类分子把周，马二人抬去丢下柳江河。七月二十八日，周云开没被水淹死，被柳江县白沙大队群众发现，由民兵杨庆祯、吴永禄用小船将周送到江口公社老糠坪码头，并到公社报告了情况。当时在场的有周松保，韦永奎，王仁飞。他们在一起议论说：“怎么办”？周松保说：“不搞已搞到这个程度了，干脆搞死算了。”随后王仁飞打电话给江口大队保卫组长覃世勉，要他设法处理周云开。覃世勉接受任务后，马上到老糠坪码头，用一块约 20 斤重的石头捆绑在周的身上，用小船划到河中把周沉于柳江河中。钟其萱于同年八月一日被批斗打死。

1968 年 5 月 24 日平山公社平山大队，在平山街银行门口对面的圩厂组织批斗本大队表旺生产队反革命分子黄鉴(50 岁)的群众大会。当时吴大萃(原平山大队党支部书记)也参加了批斗大会。吴大萃趁批斗之机，以黄鉴在解放前杀死其叔娘母子为由，对黄鉴进行报复。在批斗中，吴大萃问黄鉴解放前是不是你杀死我叔娘母子的？他们犯了什么罪？你仗势欺人等话。随后，吴大萃拿一根如锄头把大的木棍朝黄的身上到处乱打。黄鉴当场被打死。吴大萃还在一九六八年九月二日，以刘治平(农民，47 岁)、黄明化(居民，47 岁)两人在解放前杀死其叔娘母子的凶手为由，进行挟嫌报复，亲手打死刘、黄二人。

1968 年 5 月 25 日江口公社革委会召开常委会，参加会议的有黄凤福、黄尚义、周松保、杨作宽、韦永奎、黄志刚传达县革委会议精神，贯彻落实掀起刮 12 级台风高潮。会议决定：一、召开一次三级干部会，生产队指导员参加。二、拿江口林场抓到的一个外地人李宽(有拐带妇女行为)到大会典型批斗，各大队把表现不好的“四类分子”带到大会亮相。

五月二十七日在公社礼堂召开三级干部会议，黄志刚传达县革委会议精神。五月二十九日，杨作宽作了关于阶级斗争的辅导报告。五月三十日黄志刚作总结报告。会议将结束时，黄凤福就派民兵将李宽押到会场。随后水碾大队民兵杨飞把在洛清江渡口抓到的一个外地人雷达带到会场批斗。总结报告结束后，黄凤福(会议主持人)宣布批斗会开始，林场工人首先揭发李宽拐带妇女的罪行，杨飞揭发雷达在水碾大队乱搞男女关系。接着，部分群众开始打被批斗者。当批斗最紧张的时候，黄志刚、黄尚义，黄凤福、杨作宽和所有常委都离开会场回到公社，让群众自由批斗把雷达、李宽打死。

1968 年 5 月 28 日寨沙公社寨沙大队原党支部书记梁继祥，原大队长吴海明组织召开全大队群众大会。地点寨沙街圩厂，批判四类分子郑天福、陈长秀。批斗中，先是叫郑天福和陈长秀交待自己的错误，然后由群众揭发，再后梁继祥大声问群众：“这两个怎么办，该不该杀？”群众回答：“该杀”！于是郑天福和陈长秀就被民兵营长韦天开和民兵范金华等人推到现寨沙供销社肥料仓库后的山坡上枪杀。

1968 年 6 月 2 日龙江公社龙汪大队召开部分队干会议。会议主要研究第二天拿谁上街游斗的事。会上林培明为了达到拿本队四类分子林水安来游斗的目的，扩大伪造事实。说林水安大开私荒，不服管制，骗取了大队的同意。六月三日，林培明、林桂荣、林喜连、廖运寿到田间抓了林水安(当时林水安在耙二苗秧田)。在送往龙江街的路上，到龙江大队医疗室门口时，林培明喊林水安跪交待自己的错误，林水安说：“我没有什么错误可讲。”林培明、林桂荣、廖运寿，梁亚先对林水安拳打脚踢，然后，熊志考、梁亚先把林水安拖到了龙江小学旁，用石头砸死。

同日，城关公社俄洲大队原大队党支部书记邬家端亲自主持布置召开群众大

会批斗王学平。会场在大队院内，邬讲：“这个人(王学平)劳改未滿，现在又参加俄洲抢枪，难道这种人不该杀？抢枪时我的头部被打成重伤，他们抢我们的枪，捆绑我们的民兵，血债要用血来还。然后邬叫韦瑞明喊群众签名盖章枪毙王学平。同时邬叫葵凤明把王押出会场，后交给枪手廖宏明、赖继兰把王押到牛角塘用美制三〇步枪打死。

1968年6月上旬雒容中学四清小组长易超之在工作队员何少省住房召开工作队和学校“文革”领导小组成员会议。在会上由四清工作团政治部主任唐盛佑传达上级关于开展“文革”的指示，并研究布置学校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韵工作，向学生宣扬一些老师的“罪恶历史”，号召学生写大字报。他对学生说：“如李世梅你们可以写他想复辟，他的女儿名叫蒋飞来，就是盼望蒋介石飞回来嘛？”还介绍了徐连彭、梁春景、梁萃光、廖均老师的“罪恶历史”，煽动学生写大字报，致使这些老师被大字报多次围攻，特别是对梁春景老师的围攻更为猛烈，甚至连身上也贴满了大字报，规定不准撕下来，也不准搞坏，走到那里都得披挂着。中午，还被学生拿到室外给太阳暴晒，使梁人格受到侮辱，精神上受到打击，最后含恨上吊身亡。

1968年6月16日鹿寨县革命委员会、县人武部主要负责人张春峰、张义信、廖茂乾等人决定成立“鹿寨县贫下中农红色政权指挥部”。由黎景琪任总指挥，廖度乾、张义信、何文高、温有信任副总指挥，组织鹿寨县干部和各公社武装民兵共二千余人，于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六日，占领三门江林场，向柳州“四·二二”派群众发动武装进攻。这是文革中规模最大的武斗，动用了手榴弹、手枪、机关枪、步枪，六〇炮等武器，攻占了柳州砖瓦厂、柳州排灌站、柳州标准件厂、柳州印染厂，攻打了柳州灯泡厂、农械厂、铸造厂、使工厂厂房、机器受到破坏，柳州印染厂丢失八万多米布匹，标准件厂职工损失贵重东西两万多元。鹿寨武斗人员杀死“俘虏”和没有参加武斗的无辜干部群众九人，强奸女青年一人。鹿寨干部、民兵在武斗中被打死十四人。武斗期间动用国家资金及粮食，物资折款十三万多元。“七·三”布告下达不久，鹿寨县参加武斗的千部民兵撤回鹿寨县境内。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民兵开始分批回到各公社。

1968年6月18日于绍卿，男，汉族，一九一五年出生于河北省唐山市，高小文化，矿工出身，一九四一年参加人民解放军青英部队，一九四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十七级干部(副县级)，三等残废军人，历任人民解放军战士、班长、代理排长，抚宁县税务所所长，湖南永州、新田县农军科科长，榴江县工商科科长，鹿寨县黄冕区委书记，县供销社副主任，县民政科科长，县财贸部副部长，县交通局局长等职。

于绍卿在“文革”期间，被诬为假党员，打成走资派，被抄家批斗。六月十七日晚。原交通局主要负责人梁干主持批斗于绍卿会议。在批斗中，平山道班工人陈志忠用脚踢伤于绍卿的胸部，当场口吐鲜血。六月十八日，于绍卿为躲避皮肉之苦，跑到县公安局要求避难。公安局不收，反而电话通知交通局把于要回去。梁干派了陈志忠、潘献华(交通局合同工，现是农民)、钟水德(寨沙古道班合同工，现是农民)三人去到公安局叫于回来。于绍卿在绝望中说：“我死在邀里也不回去，回去了你们还是整我。”陈、潘，钟即要捆于。于进行了反抗。因寡不敌众，被五花大绑倒地拖了一里多远回到了交通局。途中衣服被拖烂，皮肤出血，大声叫痛。然后被绑在交通局门口的苦练树下，被人用杉木条毒打。陈志息用二人凳猛击于绍卿的头部多次，流血不止，当场昏迷过去。在于绍卿不省人事的情况下，梁干没有采取积极的抢救、措施。待请示县武装部张春峰同意后，仍被捆

绑着用板车送往医院松绑包扎。因伤势过重，无法留医，又把于绍卿车回交通局关在王具房里，不准家属见面，无人护理，致使于绍卿同志当晚含恨而死。于绍卿死后，梁干要马维屏用打死于的那条板凳写上“反革命打人凶手于绍卿”作墓碑。

1968年6月中旬县革委常委会议上，革委会付主任张春峰(已故)提出，为了在赴柳州武斗期间，加强社会治安，要在县城、公社成立工人纠察队，常委一致同意了这项建议，县城成立工人纠察队二十人，刘万有任队长，由县人民武装部供给冲锋枪、手枪、步枪等武器装备。由一九六八年六月成立至十月的四个月时间里，非法抓捕、关押、批斗、诬害干部群众七十三人；用吊、打、跪进行人身摧残，搞得奄奄一息接近死亡的二人(肖成兴，工人，周更生，县中教师)；迫害致死的一人(兰春荣，供电所工人)；受刑致残十八人；对干部群众进行非法抄家十一人，收缴人民钱财，抄走人民币一百七十元、光洋一百四十元、东毫七十八个、人参一斤、砒霜数两、手表一块、书籍数本，理发工具、木工工具一套，粮票数拾斤，香烟数条。

1968年6月22日江口公社六合大队在大队部召开小队长会议，会前有人提出找一个老实点的“犯人”来批斗。目的是证实陈有孚被迫供认的“暗杀队”是否属实。于是拉了地主成分陈意超来批斗。在工作队谢秀奎和黎明庆的组织下，对陈批斗约半小时。陈说不出他们需要的情况，有人提出把陈拉出去吓一吓，谢秀奎、黎明庆同意此做法，由民兵梁汉武等人推到大队部前面良六地坪角。梁汉武命令陈意超跪下，就用小口径步枪朝陈意超背后打了第一枪，鲜血流出，陈意超喊“哎哟，阿姐救命啊！”梁汉武接着又打两枪(第二枪卡壳，第三枪没打中)，陈意超喊得更大声，声音更凄惨。这时，民兵关振发从大队部楼上拿来鸟枪，朝陈意超背后打了一枪。打中背后，但还跪着，回头望了一下。最后覃水生拿起装有火药，铁沙铅头的鸟枪朝陈意超的头部打了一枪，陈意超当即死亡。

同年七月，谢秀奎在大队部组织召开各小队长、贫协主席会议，批斗陈黄氏。在批斗中，谢秀奎说：“你说没讲，不讲就揍死你”。并对陈黄氏采取了打、踢、捆和坐老虎凳等残忍手段进行逼供。会上陈黄氏一只小腿被压断而昏迷瘫倒。谢秀奎命令民兵将陈黄氏拖到良六岭顶放。第二天陈黄氏死在良六岭背水沟里。

1968年农历7月12日寨沙公社关庄大队原党支部书记韦桂元在大队堂屋大门口主持批斗郭达明、李木保、黄官生、黄龙香、郭正明大会，说他们是暗杀队，有枪支弹药。在批斗中进行残酷毒打、吊、压扛，李亚祥用木棍打死郭达明、郭正明，李亚祥、陆亚祖、梁自主、韦祖生用锄头把、木棍将李本保、黄官生、黄龙香打死。

1968年7月17日龙江学区斗批改领导小组组长何俊英在自己的房间召开斗批改小组领导成员会议。参加会议有左天佑、韦志义、罗义伦、林惠萍，研究如何批斗冯肇华的四条“罪状”。会后叫老师集中教室开会。批斗会由何俊英、左天佑主持。何俊英说：“你(指冯肇华)不老实交待参加暗杀队组织，只有死路一条”，又说：“冯肇华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何用脚猛踢了冯。接着罗义伦、韦秀生等人把冯肇华当场打死。何俊英又说：“冯肇华是罪该万死，我们不要怕，他死得活该。”同年七月二十六日上午，何俊英主持召开斗批改“积极层”教师会议，在研究批斗杨炳灵时说：“对杨炳灵的斗争不能心慈手软，”会后由韦子勤等人到宿舍把杨炳灵拉去龙江小学后背批斗，将杨炳灵打死。

1968年7月25日江口林场赵云礼、黄绍辉、何杰基来江口公社要钟其萱去跟林场吴志明对证时(当时说钟曾交武器给吴)吴不承认)。周松保当面向赵云礼交

待说：“你们拿去就不要送回了，在那里处理算了”。事后林场群众多数人不同意处理，于二十九日将钟其萱送回江口公社。八月中旬，黄志跚、黄风福从柳州武斗回公社后，周松保将周云开、马海泉、钟其萱的情况向黄志刚作了汇报。黄志刚说：“刮台风以来，各地都要死一些人的”。九月一日，周松保在江口邮电所门口找到林更就，要他主持批斗钟其萱的大会，林更就不干，随后周松保又找韦贤才(贫下中农副指挥长)要他主持批斗钟其萱的大会。当晚钟其萱批斗会在江口一队晒坪召开，约二百余人参加，韦贤才主持会议，覃意刚宣读钟其萱的“罪状”，林更就等人用棍棒把钟其萱活活打死，后派四类分子抬去丢下柳江河。

1968年7月26日晚上，江口公社江口大队保卫组负责人覃意春在江口医院背后的晒坪，主持召开批斗吴长坤、蔡佑年大会，约两百群众参加。覃意春逼问吴长坤组织暗杀队的问题，逼问蔡佑年搞“变天帐”及想暗杀人的问题。覃还说：“你不老实交待，群众就不放过关，就由群众处理。”覃连问群众几次：“他不老实怎么办？”少数群众说“不老实就打死他”。于是，吴长坤就被群众及保卫组民兵陶大明(已死)用一根木棍首先打倒在地，接着欧阳发、周世珠(已死)蒋大芳、何望明用棍棒将吴长坤打死。蔡佑年被梁大芳用一根竹棒打倒在地上，然后周世珠、林官成也围上去将蔡打死。吴、蔡被打死后，由保卫组喊人抬尸丢下柳江河。另一晚上，覃意春与保卫组民兵欧阳发、周世珠、覃永福、覃世友、吴玉友、覃世勉在大队堂屋议论。覃意春讲：“现在白沙(柳江县)那边又打死人了，我们大队关这些人，大家看怎么办？”欧阳发、覃世勉，覃意春分别提出拿周瑞明、黎海成、谢谦“搞去”。当晚十一时许，覃意春就吹哨子喊民兵集中堂屋。由民兵将周瑞明、黎海成、谢谦重新绑好并用纸及烂布将周、谢的嘴巴塞起来，一起押到江口老糠坪码头。谢谦、黎海成、周瑞明三人分别被覃意春、周世珠、韦善言(已死)、欧阳发打死，尸体全部抛入柳江河。同月二十九日晚约十点钟，覃意春又喊民兵集中大队堂屋，说有任务，然后又进“牢房”把蔡光才喊出来，由吴玉友、周世珠将蔡重新捆好，覃意春又亲自带民兵把蔡推至老糠坪码头，蔡喊冤枉，覃意春讲：“冤枉什么？”这时欧阳发首先用鸟枪朝蔡打了一枪，后覃意春、周世珠也各打一枪，蔡光才即死亡，蔡死后，覃意春喊吴玉友、周世珠回大队“牢房”，叫“犯人”莫让文、黎政权下河边把蔡的尸体拖进水中，黎拉蔡尸到深水后就上岸往回走了三至四丈远，覃意春又喊黎政权说：“你还有什么东西在河边？”同时覃意春给吴玉友做了手势(意思是搞掉黎)，当黎政权走到河边时，吴玉友朝黎开了一枪，覃意春、周世珠又各打了一枪，黎倒下后，覃世友拿一把刺刀朝黎的身上戳了几刀，黎当场死亡，尸体丢下河中。

1968年7月31日城关公社俄洲大队原党支部书记邬家瑞在脚板洲原大队办公室召开葵凤明、廖明安、韦瑞明四人会议，邬主张把郑戊忠送去大汾片开群众斗争大会，给群众打死算了。又说：“俄洲大队有历史性阶级斗争复杂，要斩草除根，把郑干掉，我要去公社开会，你们在家不干，会后就不好干。”会议分工由葵凤明、廖明安二人负责把郑押去大汾片，在大汾二队晒谷坪开群众大会批郑，由于郑没有交待出新的问题，当场被打得半死。这时葵凤明就下令民兵和部分群众推郑到大汾滚水滩边被群众用棍棒和石头打死。

1968年8月13日中渡公社革委主任邹玉杰主持召开了社直机关、英山大队的负责人会议，研究给参加柳州武斗中被打死的、英山大队民兵钟庆生追悼会的议程、以及代表发言问题。散会后，邹玉杰、王水福(又名王胜辉，公社武装部长)等人在一起商量决定开追悼会时，拿卓麻子(真名卓德发，中渡五金店社员)开刀，当晚王水福亲自布置要吴声瑶负责抓卓麻子到会。

八月十四日早上，由朝阳大队干部吴声瑶、民兵陆生、罗刚三人将卓麻子捆绑押到追悼会场旁抽水站守候，大约八点多钟，公社各机关单位干部职工、学生、英山大队社员、参加柳州武斗返回的民兵等约一千多人，到银盘岭钟庆生坟地参加开追悼会，会议由革委副主任韦显成主持，革委主任邹玉杰致悼词：接着各代表发言。代表发言后，中渡供销社主任文喜臣、邹玉杰、韦显成各向空中鸣枪为号，吴声瑶、罗刚、陆生即把卓麻子推封钟庆生坟的左侧约 80 米处要卓跪下，吴声瑶、民兵张老水、钟少武用棍棒将卓麻子活活打死。”

1968 年 8 月 14 日晚上，中渡公社革委会主任邹玉杰主持召开各大队党支部和社直各机关负责人会议。会议确定于八月十六日(英山圩日)进行大游斗。十六日上午十点多钟，由王水福、吴声瑶指挥游斗对二百多人被捆绑挂黑牌，排成三路纵队，上街游斗。游到烈士墓前集中批斗，接着吴声瑶宣布黄鸿尧、陶涛、李盛章的“罪行”，当场由群众将三人打死。三人被打死后，吴声瑶命令游斗对象围绕尸体走一圈后宣布散会。当天除在开会集中打死三人以外，英山大队欧政在游斗中被打死。石勿大队回到半路又将童老伍、吴松打死。这天共打死六人。

1968 年 8 月 16 日鹿寨县三道林场革委会主任陈立珍亲自主持召开林场举办第三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碰头会，参加会议人员有场革委成员和部分党员干部，其中有蒋廷权、梁志锋、封水福、张光_玉、张毅明、梁志红、覃廷权、罗德忠、韦亚连、刘振清等人，主要研究学习班的开法，并布置了在学习班中如何斗争韦栋、郭福山、兰茂希的具体计划。陈立珍讲：前两期学习班是讲大联合，这期学习班主要是斗批阶级敌人，韦栋跑到柳州干坏事，要狠追查；郭福山、兰茂希他们也要狠狠批斗。在学习班中刘水福等人将韦栋吊“半边猪”，踢打等二天时间。十九日下午，韦栋被吊打后伤势很重，头部肿胀，全身到处是伤痕，后关在一小房内。第二天天刚亮，发现韦栋死于房内。

韦栋在三道林场批斗吊打中，曾被逼供认杀死廖大贵。陈立珍也认定龙连刚、郭福山、兰茂希等人也是参与杀害廖大贵的凶手，故决定将龙、郭、兰三人送到城关公社俄洲大队进行联合批斗。同年八月的一天，陈立珍和刘水福两人到俄洲大队找大队干部商量关于批斗龙连刚、郭福山、兰茂希、苏建成、莫英武、冯伟亮的问题：刚好俄洲大队干部在开会。陈立珍对大队干部讲：“林场送来这帮人，要依靠你们大队贫下中农协助批斗。”在场的大队干部有党支部书记邬家端、民兵营长葵凤明、会计廖明安、文书韦瑞明。后来，郭福山、兰茂希等人在俄洲大队被关押、批斗、游斗、吊打长达四个月。在刘水福、葵凤明、韦有强的毒打下，郭福山被打断肋骨一根，后脚跟被打残。兰茂希的胸口被踢伤，造成内伤。苏建成的门牙被打掉。冯伟亮腰部被打成内伤。龙连刚在严刑吊打下被迫上吊自杀，救下来尚未断气：当时刘水福从俄洲打电话到大村分场找陈立珍，要陈去看一下和研究怎样处理，陈立珍在电话中说：“他死了没有”，刘讲：“还没死，还扯气。”陈又讲：“我不看了，由贫下中农哪样处理就哪样处理。”后来，龙连刚在尚未断气的情况下，被俄洲大队民兵营长葵凤明喊四类分子抬去活埋了。

1968 年 8 月 19 日中渡公社宣委覃胜略在安安(地名)召开大队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黄腊大队韦希贤(对敌斗争指挥长)、廖华忠 (副指挥长)韦祖团，寨上大队韦彩伦，赖国福(民兵营长)，韦玉扬，钟玉南，山尖大队民兵书隆盛、韦善平共十人的干部会议。计划“刮掉”黄腊大队的韦介凡、韦永词，寨上大队的韦坦庆，韦孔庆、覃世义五人。会议结束后开始游斗，由保卫组民兵押四类分子走在前头，群众跟后。从安安游斗到喇塔，刚上喇塔圩头下坡，钟书云(女)、钟元昌被群众棒死，进喇塔圩游一圈转到北坡上，钟书均、钟寿昌、钟礼端又被棒死。

但原计划刮掉的五个人还没死。覃胜略喊韦希贤在坡上组织群众围拢来开会。覃胜略在外围指挥，韦希贤在会上宣布韦永词、韦介凡、韦坦庆、韦孔庆押进会场，由民兵用棍棒打死。覃世义由民兵押去用鸟枪打死。这次大游斗共打死十人。

1968年8月20日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五日，江口公社六合大队民兵营长何家林，大队长刘光明向公社武装部长黄凤福汇报说：“大头岭(地名)有柳州被打散的全副武装土匪常下山找东西吃”。当时黄凤福一边派何家林、刘光明继续侦察，一边向县人武部汇报。县人武部部长张春峰指示此事由你们处理，并说明，如果火力猛的话，你们就退。经公社领导研究，于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由武装部长黄凤福等人负责，调动六合、丹竹两个大队共二百余民兵，包围搜查大头岭，当场打死杨锡涛，抓获杨锡伟、杨龙辉，杨锡巧、杨中辉等人。押回公社关押，多次批斗，在批斗中枪杀杨锡巧、杨锡伟、杨中辉。在大头岭被打死和被抓获的人，都是丹竹的一般社员，没有武器，他们害怕“文革”受牵连而跑到大头岭避乱的。

1968年8月23日中渡公社山尖大队在山尖小学办公室召开大队干部会议。大队党支部书记韦学辉在会上讲：“公社开会讲刮十二级台风，我们山尖大队连一级也没有。别处都开了斗争大会，我们还没有开。人家都搞了，我们一个也没有搞，喇塔大游斗，寨上、黄腊也刮了，我们山尖没有刮着，我们也要搞他几个，大家研究，拿那个来搞。”当时到会的五位大队干部都沉默不语。韦学辉又说：“你们不提我来提。”韦学辉说：“韦道芝有变天思想，讲毛主席不久了，湖南都是刘少奇的兵，韦学奎是暗杀队，韦仁昌做黑医师，侮辱妇女，仇视贫下中农，韦崇鸾当土匪杀害了三个民兵，公开不出集体工，外出搞私捞，大家有什么意见。”参加开会这五个人还是不做声。韦学辉就决定讲：“那就这样了，研究开大会的分工，阳林和韦代风负责发通知，明天开群众大会，个个带棍棒来，在山尖球场坪开会，还有其他的四类分子一起带来。”

八月二十四日，全大队停止生产，参加开会的群众约七百人，四类分子及要搞掉的韦道芝等四人也都被民兵押到会场。阳林主持会场，韦学辉在会上讲：“要刮十二级台风……。”并宣布韦道芝、韦仁昌，韦崇鸾、韦学奎的各自“罪状”，说：“今天要他们坦白交待，坦白不好的交群众处理，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韦学辉先喊韦崇鸾(农民、56岁)交待“罪行”，韦崇鸾只讲了几句，韦崇新、韦耀云父子(与韦崇鸾有私仇)就把韦崇鸾打死了，接着喊韦仁昌(农民、67岁)、韦道芝(地主、75岁)交待“罪行”，又被群众打死了，最后喊韦学奎交待参加暗杀队，韦学奎不承认。韦学奎在乱棍之下身亡，这次刮台风共打死四人。

1968年8月24日寨沙公社革委会主任唐昌义，副主任兼武装部长曾德友，带领公社民兵二百人，组织拉庙大队干部和党员，集中到参加柳州武斗被打死的民兵李逢春(原拉庙大队党支书)的坟地，为李逢春开追悼会，会上由公社民兵将何九龙(男，54岁，农民)、刘石左(男，21岁，农民)、古家安(男，22岁，农民)、刘振相(男，35岁，农民)、陆志高(男，23岁，农民)五人押到李逢春坟前，用七九步枪进行集体枪杀祭坟。散会后，拉庙大队民兵营长韦天新又拉了陆中怀(男、55岁，农民)到李逢春坟前枪杀。这天在李逢春坟前共摆尸六具。

同日，四排公社和睦大队本寨村，卢秀兰的父亲卢希春经队长同意砍了两棵松树。贫协主席温玉连(女、一九八五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认为没有经过批准，当即向大队汇报，将卢希春传到大队。卢到大队被打后，回家想不通服毒死亡。卢秀兰在父亲死后，即找公社领导汇报，温玉连认为卢秀兰要为他父亲“翻案”。于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六日晚，组织队干和社员，在本队仓库斗争卢秀兰，叫人用木杠来压在卢秀兰的腿肚上，一头插在门坎下，两人踩另一头，一些人同

时用木棍打，用鞋子来打，而卢秀兰始终不说。这次批斗会后，卢秀兰就跑到外面躲了几夭，后被抓回。八月十九日晚上又在仓库批斗卢秀兰，要卢秀兰承认是暗杀队员，交出武器，又被人用木棍打，温玉连则扯头发。卢秀兰被打后，说要小便，趁机跳到屋后的水塘里，寻找自尽，后又被拉上来。八月二十三日上午，温玉连带领七人，将卢秀兰、陈文坤(卢秀兰的丈夫)、韦庆先押到大队集中，然后去四排游斗。卢秀兰被捆后讲脚痛不能走，温玉连讲，走不动也要走，拖也要拖去。并叫人将陈文坤、韦庆先、卢秀兰三人捆的绳子连在一起。卢秀兰只走了一段路就倒下了。陈文坤见妻倒地，不忍心再拖而停下来，陈文坤被毒打，又被强迫拖着妻子走，卢先是仰着身子，继而侧身、扑身被拖走。总而言之，翻来滚去地被拖着。卢秀兰的长裤被拖脱掉、内裤、上衣被拖烂、全身被拖伤，流着血，拖到一里路的盘龙岭牛练坑旁。卢秀兰已被拖得不象样子。温玉连叫停下，解下卢秀兰放于路旁。温玉连并把卢秀兰掉在茶子山边的裤子盖在卢的下身，然后继续把陈文坤、韦庆先押往大队，卢秀兰便留在牛练坑的水沟边过了一夜，无人看守。第二天，温玉连才叫四类分子及子女、卢秀兰的弟妹共五人去埋卢秀兰。发现卢秀兰还未断气，带有身孕，他们犹豫议论了一会。但害怕“犯法”就用土把卢秀兰埋了。

1968年8月25日寨沙公社长田大队民兵营长陆中和参加了拉庙李逢春遣悼会回来后，向党支书廖志芳提出说：“拉庙搞得几轰烈，搞了几个，我们大队的四类分子很难管，也要杀一批。”廖志芳完全同意，并提出明天就开会摸名单。二十五日召开了支部扩大会议，共摸出了要枪杀的名单十七人，廖志芳感到要杀的人太多。当扩大会议散时，紧接有廖志芳，陆三保(已死)、陆中和、韦端儒等参加的支委会，一致同意在二十六日召开群众大会，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并决定枪杀黄金和(干部)、林亚静(农民)、郭崇姣(农民、女)韦桥甫(农民)、刘喜秀(农民)五人以及决定由陆中和具体指定执行枪手。

八月二十六日，会场设在长田村背坟地的草坪上，到会群众约七百拿人，把所有的四类分子和所谓“坏头头”统统押到离场不远的卫生室旁集中，由民兵看守。大会由陆三保主持，先诣大队长林日旺讲话。接着是廖志芳讲参加柳州武斗的情况，提出今天要斗一批杀一批，然后要民兵把四类分子和“坏头头”押到面前，又照支委会决定要杀的名单一个一个的宣布，跪在台前的最前排。这时廖志芳大声的问群众：“跪在前面的坏家伙该不该杀？”群众答：“该杀。”这时陆中和、韦天新、廖志荣、廖志刚、林桂华等多人把黄金和(寨沙供销社干部，41岁)、林亚静、刘喜秀、郭崇姣、韦桥甫(均为寨沙公社社员)五人推出会场枪杀。廖志刚枪杀黄金和，韦天新枪杀韦桥甫，林桂华枪杀刘喜秀，廖志荣枪杀郭崇姣，陆中和枪杀林亚静(处遗中陆中和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廖志芳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1968年8月26日江口公社新安大队召开批斗大会庆祝自治区革委成立。民兵营长卢祯先于八月二十五日晚主持召开大队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公社工作队龙仕正，大队长黎明先、会计韦严峰、党支书陈忠、韦秀荣、陈河清(文革组长)。会上有人提出：“结合召开群众大会，抓一下阶级斗争，”召开批斗会，龙仕正问：“抓阶级斗争；批斗那些人？”卢祯说：“重点批斗韦振胜、覃荣德、这两个人问题多。”当晚，决定第二天(二十六日)召开庆祝大会。二十六日开批斗大会，地点在大队部前的门坪。庆祝自治区革委成立大会由卢祯主持。庆祝会后开始批斗韦振胜、覃荣德、曾俊光、黄元华，(曾、黄二人是研究会上陪斗对象)。卢祯宣读四人“罪状”，群众就围上来，用棍棒打被斗者。当时，卢祯(处遗已开

除党籍)未加制止,不到半个钟头,这四人就死于乱棍之下。接着,卢祯派民兵押“四类分子”把四人尸体抬走扔到河里。

1968年8月27日县革委于八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在县革委第一会议室召开了县革委常委扩大会。会议由张春峰主持,各公社革委主任、武装部长、部办领导及县直各单位负责人,县革委常委:张春峰、廖茂乾,谢文业、钟杨声、廖振儒:赵松龄、马凤乐、冯裕怀等人参加。会上由县革委常委、生产组长谢文业传达“七·三”布告精神,学习广西日报关于《刮十二级台风》的社论,全县范围内掀起斗、批、改高潮。要求各公社、各单位把斗、批、改对象摸好底,定于八月三十日召开“双代”会,贯彻会议决议精神。

八月三十日召开全县“双代”会(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先进代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先进集体代表大会)。参加“双代”会的县直各单位领导在散会时,被留下来在县委第一会议室开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张春峰,张义信、韦仕宁(县人武部副政委)、谢文业、刘瑞亭、以及各部、委、办的领导和各公社领导。

这次会议主要布置在城镇范围内(包括城关公社部分大队),搞大游斗。会上张春峰在讲话中:“当前正在贯彻“七.三”布告,我们要以布告为武器,既要打击明显的阶级敌人,又要深挖暗藏的阶级敌人,对四类份子和坏头头要给予狠狠打击。要压制他们的威风,要让群众看他们的丑恶面目,就是要他们到群众面前亮相,拿他们上街亮相,决不能手软……等。”

八月三十一日这天,县城大部分单位按照会上布置的把“坏头头、牛鬼蛇神”拉到街上游斗。当天被游斗者有一百四十多人,他们挂着写有各种罪名的牌子,排着队,按照“新创举”:后面打前面,一个打一个地在大街上进行亮相。这天上午,“双代”会休息时,部分代表也上街去看大游斗,有的代表和群众一起用棍棒拳打脚踢,残酷地斗打被游斗者。这次拉人上街游斗的单位四十六个,总人数一百二十七人,其中女十一人,男一百一十六人。按职业分:干部三十四人,工人二十五人,医师二人,护士二人,教师二十人,其他四十四人。按政治面貌分:党员二十人,团员三人。按游斗的定性分:小爬虫三人、四类分子十三人,暗杀队十八人,坏头头十三人,右派二人,杀人犯一人,残渣余孽二人,走资派五人,资本家子女二人,阶级异己分子一人,土霸王一人,叛徒二人,两面派一人,其他六十三人。按受害程度分:伤或重伤一百一十人,残十人,当天死亡七人(莫镇泉、印刷厂工人;成伟仁、财政局干部,兰金贵、中共党员,建筑公司工人;李少仁、城关公社农民;周世龙、城关公社农民;古联棠、鹿寨中学工人;莫玉卿、城镇公社农民)。

1968年8月28日晚八时许,鹿寨中学红卫兵付刚(学校保卫组长)、张桂香把周更生(老师)、梁栋南(老师)、学生黄绍光、林德裕押回学校,付刚请示宁祥绪怎么办?宁说:“先批斗他们的一下威风。”接着就广播通知开会,会场设在鹿中第一球场。宁祥绪亲自主持大会,将周更生、梁栋南押上会场,跪在乒乓球桌上,黄绍光、林德裕跪在球桌边。在批斗中,付刚、陆朝强等人,采用拳打脚踢、压铁杠等酷刑。经过一再折磨,周更生当场扑倒于桌下。这时付刚用脚踢周更生,骂周是装死,即用冷水泼头,仍不见苏醒。斗争大会就此结束。后命令教师王大中,薛幼信去做人工呼吸,最后抢救无效死亡。为了掩盖周死的真象,推卸罪责。宁祥绪令杨白堪(现任县教育局局长)执笔,由宁口述写了一张公告,假称周更生是由于害怕斗争,心脏病突然发作经抢救无效死亡。

1968年8月下旬鹿寨县革委和支左部队根据自治区、地区布署组织工人、

贫下中农、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工宣队的组织结构是：解殷军由海后十六人、六九八二部队十五人，县人武部二人组成；工人由鹿寨化肥厂三十人、胡连科负责、鹿寨糖厂八人、县直厂八人组成，陈明生负责，贫下中农由部分公社贫下中农近百人组廊各公社带队人是，中渡公社廖明，城镇公社李再栋，雒容公社李寿南，龙江公社韦向葵，寨沙公社黄佳贵，四排公社陆少忠，城关公社彭俊康。工宣队设队长陈明生，副队长胡连科(鹿寨化肥厂干部)，指导员彭俊康。整个工宣队约有队员一百六十人，后陆续减少，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撤完。

1968年8月30日寨沙公社古木大队民兵营长陆超荣主谋策划在古木大队古木小学的篮球场召开群众大会，要在会上打几个活靶子。公社武装部长曾德友在会前打电话给郭升连(党支书)通知陆超荣：“七·三”布告下来了，不能搞，不准开大会，不准打死人。但陆超荣坚持按预定计划开会。参加大会的有北里、拉庙，寨沙等地群众约七百多人。陆超荣指定刘三妹(支委、妇女主任)在会上讲话，并宣布邓明德等七人罪行后。高声问群众：“这帮家伙该不该杀。”群众应声“该杀！”接着寨沙、北里的民兵就将邓明德(教师)、罗喜英(教师)、胡仁武(寨沙铁木社工人)、邓六三(社员)、郭正才(社员)、郭修君(“反革命分子”)七人枪杀。

1968年9月2日寨沙公社北里大队召开支委会，参加会议的有大队党支书左大贵、大队长韦四七、民兵营长邓庆福、文书韦金生、会计邓石奎、副业主任吴元坤。在板贡村大队长韦四七家老屋研究枪杀韦成生等四人会议。邓庆福讲：“今天开个研究会，准备搞几个，人家外面拉庙几个大队都搞了，具体搞那几个，由支委提名。”支委提了韦成生(富农子弟，二十一岁)是重婚；韦儒富(富农子弟、二十七岁)，是派头头；代松贤(贫农、二十二岁)是反霸家属；韦朝昌(四类分子子弟、十九岁)、提出这四个名单后，支委会一致同意，并决定在九月三日大会枪杀。九月三日，邓石奎、韦金生把头天研究的名单给没有参加研究的纠察队长韦志刚看。韦看后就发火说：“你们研究搞的几个都是我们北里外面的，你们里面的一个也没有，如果三柏村的邓七九你们不搞，要保他，我和林亚明(纠察队员)也要拉他去杀。”后韦金生、邓石奎、韦志刚在枪杀名单里加上邓七九(又叫邓庆平、农民、十九岁)，王春兴(农民、十七岁)两人。在枪杀大会前已经向邓庆福作了汇报，邓庆福无反对意见，并派民兵罗社生执行枪杀王春兴，陆儒信执行枪杀邓七九。

枪杀大会在北里八社山木满坪召开，约五百人参加。全大队部分四类分子和造反派头头统统被押到会场。被列为枪杀名单的六人也被押到会场主席台前跪下。吴元坤主持大会。邓庆福代表民兵营发言中说到柳州武斗情况及北里的阶级斗争形势和如何抓阶级斗争问题。大会发言后，邓石奎宣布被枪杀人的“罪状”。吴元坤问群众：“这帮人怎么办？”邓庆福在旁边喊道：“这帮家伙该不该杀，”在场群众答：“该杀”。于是，韦成生、韦儒富、代松贤、韦朝昌、邓七九、王春兴一一被杀害。

同日，经平山公社革委主任林润德同意，由熊立宽、易吉胜等组织向阶级敌人刮台风，通知各大队民兵营长及治保：主任，组织民兵、群众共二百多人，持枪拿棍棒，押送各大队四类分子、“坏头头”以及群众意见大的人共一百五十多人，上街挂牌游斗。在游斗中，陶启超、蔡国良、谭永林、谭昆荣、谭明荣、罗振规、李振昌、罗谋干、罗文仲、何氏仁、刘治平、黄明化、吴声周、谢吉亮、雷桂英、翠昌政、陶锋、李垂芳、田尚武十九人被打死。

1968年9月初四排皮防站革命领导小组长覃德礼，主持批斗住院病人覃公略大会，在会上覃德礼说：“不能让覃公略蒙掘过关，今夫不老实就狠狠斗，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并领着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老实交待只有死路一条”的口号。批斗近两小时。由于覃公略没有交待出什么问题，覃德礼叫梁景仁、韦光值等人把覃拉到茶山背用柴块打昏(误以为死了)，一帮打手便回去了。覃德礼交待欧昌明要四类分子去埋。韦振福、李玉祥、韦汉琴、闭龙庆等到现场后，发现覃公略不见了，便顺着沟底找到了覃公略，又把覃公略拖到了事先已挖好的土坑边准备埋。李玉祥说：“覃公略还未断气，先不埋。”梁景仁说：“你们不敢打，等我来打，就用锄头在覃公略的胸部连敲了十几锄头，血从嘴里流出来后死亡，然后埋葬。

1968年9月8日江口公社江口大队石龙一队原指导员覃太保、民兵排长韦崇贵、莫永盛(队长)三人在本队地坪一起研究继续批斗吴贵友。韦崇贵编造讲：“大队保卫组的覃世勉讲，吴贵友很嚣张，要拿他回队批斗，干掉他去，”覃太保、莫永盛当时都表示同意。还研究决定批斗后，用船送回大队时，在途中将吴贵友搞死。

次日下午，韦崇贵带领民兵何世明、覃正清去原江口大队部将吴贵友押回本队。当晚，由覃太保、莫永盛两人主持召开群众大会，对吴贵友进行批斗。散会后，莫永盛安排韦崇贵带领民兵覃正清，何世明，吴春生、陈福春五人，在石龙村机厂码头用本队的船将吴贵友押送回大队。当船下行至回水湾葵洲尾时，韦崇贵将双手被反绑着的吴贵友推下洛清江。吴入水后曾浮起来，韦崇贵用撑船的竹篙向吴的头部连打三棒将吴打沉淹死。事后，还交待同船的民兵回去讲吴贵友是跳水自尽。

1968年9月9日工宣队进驻鹿寨中学，当天早上，县里在小广场(县小学球场)开了欢送大会(县直机关欢送，学校师生欢迎)。会上县领导授予“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旗一面，并讲了话。工宣队长陈明生接旗并代表工宣队讲话，红卫兵代表也讲了话。大会是李英主持。

进校后，成立校革委，陈明生被选为校革委副主任，主任暂缺，陈明生以校革委副主任的头衔，在鹿寨中学打击、迫害、压制大批老干部、知识分子、教师、学生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制造不少的冤假错案，使广大师生深受其害。据不完全统计，仅是陈明生亲自主持的大小批斗会达一百余次，教职员遭受迫害的就占在校职员总人数的45.6%，遭受摧残迫害较深的有四十五人。其中致死一人(黄建奇、学生)，受冤被送政法机关关押五人(教师梁栋南、吴桂宝、学生马红专、梁志武、吴汉生)，被逼成神经失常的一人(邹德民、知青、女)。工宣队于一九七九年三月撤离鹿寨中学，时间长达十一年之久。

1968年9月11日江口公社丹竹大队二队社员杨珠江六八年被诬为“暗杀集团”后，于九月十一日晚被批斗。批斗大会由大队保卫组长兼民兵营长黄盛和，二队队长杨锡鸿在二队仓库地坪主持召开。约二百人到会，批斗杨珠江关于“暗杀集团的组织情况”和“暗杀的对象”。会上，樊五、余旗都动手打了杨珠江。斗至十一时，队长杨锡鸿考虑影响次日生产，宣布散会。余旗、陈家声讲：“不行、要继续斗下去。”这时余旗逼问杨珠江“暗杀队”的问题及为何评工分时带刀进会场，企图是什么？(余、樊等人六七年冬和杨珠江因评工分问题吵闹过，差点打起来)，这样间约十来分钟，余旗向群众问：“杨珠江不老实怎么办？”群众哄起来讲：推出去放下河去算了。这时樊五、杨宗正，余旗、张浩、陈八一、杨宗元、杨宗福把杨珠江推至河边。杨珠江讲：“我身上还有几块钱，你们帮我拿给我家里。”樊五讲：“谁帮你拿去，”珠江又讲：“不帮拿，你们拿去用也可以，不然可惜了，”樊五讲：“谁要你的钱，我们要你的命，”接着樊五用铁锚(红

樱枪式)猛打杨珠江的头。杨倒下后，余旗、张浩、陈八一、杨宗元、杨松、杨宗福用石头砸。樊五对他们讲：“你们莫动等我来。”接着樊五又用铁锚对准杨珠江的耳朵根戳过去。杨珠江当场死了。余旗、杨三喜把尸体拉入河中给水推走。

九月二十七日晚，黄盛和召开小队管委会议说：“今晚要把杨锡保(被诬为暗杀集团)搞臭、搞垮。”当晚，杨锡保被打得喊死连天，付福开(大队保卫组民兵)问群众讲杨锡保老实不？群众答不老实，余旗喊：“不老实就解出去。”接着，樊五、付贵成、杨三喜(又名杨建志)，杨宗福、余旗把杨锡保推至河边码头。樊五首先用铁锚打杨锡保头部。杨倒下后，樊五又用铁锚对准杨锡保的耳朵根连戳两下，杨锡保当场死亡。尸体拉入河中让水推走。

十月二十二晚，又是黄盛和主谋策划批斗杨小四(又名杨畴飞)。由于杨小四“不老实”，被杨宗福、樊五、余旗、黄亚寿(又名黄建志)、付贵成、杨宗正、付刚(又名付春发)把杨小四推到河边灯头(地名)的荒田。樊五首先用铁锚戳杨小四的腹部，杨小四喊杨宗福救命。这时樊五又用铁锚刺耳朵根。付贵成、余旗、黄亚寿、杨宗正、付刚都动手打起来。杨小四当场死亡，尸体让河水推走。樊五亲自用铁锚戳其被害人的耳朵根、腹部致死，尸体让河水冲走，手段极其凶恶残忍。

酷吏韦国清文革二三事

广西文革期间杀了多少人

1983年1月我平反回桂林时，游行举的标语牌有两句口号：广西在文革中死难的六十万男女老少尸骨未寒！韦国清一身是血！（见博客“相册”）我说的“六十万”，是民间传闻的数字，不准确。

这几个数字是权威的：

有人根据区民政厅“死者家属补贴”和公安厅“非正常死亡”的统计评估为20万人；1983年“处遗”后官方统计的有名有姓的被害者是8万9千多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严佑民，1983年率整党巡视组来广西视察后说：“有人说广西杀了20万人，‘处遗’得出的数字是8万多，我走了21个县，认为取两方面的中间数15万比较真实。”

这些人，均死在支持韦国清的“广西联指”党政军民学成员刀下，他自然要负主要责任。

韦国清至少是历史上少有的“酷吏”，原桂林市市委副书记王同连说：“韦国清应该列入中国的《酷吏列传》里去，他的历史地位就在那里！”这已是历史的结论。

韦国清搞大屠杀手段十分狡猾，他从不个人直接指挥，而是用操纵、纵容、默许的方法，来达到他的目的。

如他当了区“革筹”小组长后，1968年3月5日，就用“区革筹”主要成员魏佑铸（广西军区政委）的嘴，说广西有“反共救国团”，6月17日，又操纵“区革筹”和广西军区，发布《关于破获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反革命案件的公告》，“广西联指”总部立即发布《关于彻底摧毁蒋匪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总攻击令》，造成广西各地数以万计的“广西422”成员和无辜群众因此冤案被屠杀。

又如当他用谎报军情和栽赃的手段，弄得中央也说南宁反抗武装镇压的“422”是“土匪”，是“国民党”，要“围剿”，要“实行歼灭”时，他就以执行中央指示的名义，操纵广西军区直接指挥部队，攻打南宁展览馆和解放路，把“422”彻底消灭了。

再如1968年7、8月，是广西各地大屠杀的高潮，韦国清所控制的“区革筹”不下令禁止，至到9月，待“联指”把要杀的、能够杀得到的人，几乎都杀光了，才下令制止。这叫纵容。

至于默许，下面就讲两个具体案例。

笑眯眯地默许杀人

1980年的一天，广西区纪委副书记徐江萍，把在南宁地委宣传部工作的处级干部温藩生找去，对他说：“有人向我揭发，1968年8月份，武鸣县梁同生产大队干部去见韦国清，请示能不能杀生产队的牛鬼蛇神？韦国清同意杀。我不太相信这个讲法，韦国清不会这样笨的讲‘我同意杀’。你帮我去调查有没有这回事？”

徐江萍1926年参加革命，曾和陈云在上海江浙一带搞过地下工作，延安时期，又当过陈云的秘书，和胡耀邦也是老战友，胡当中央组织部的科长，他当中央社会部的科长，经常来往。胡当总书记后每次来南宁，都要看看他。

温藩生则是解放前参加地下党的老同志，文革中，因是“422”观点，被批被斗交给生产队管制，在广西的乱杀人高峰期他险些丧命，先是“联指”要把他装进猪笼丢下邕江，后又计划放他出去叫帮派分子乱棍打死，幸好一个“联指”小头头怕事，讲“他是地区革委会放在我们这里的，要是打死了他，革委会追究我们怎么办”，他才得以不死。1983年广西“处遗”前，他写过很多材料寄中央反映广西乱杀人的情况，他为人谦和，熟人都叫他“老温”。

老温觉得徐江萍要他办的事情关系重大，必须深入到武鸣县梁同大队去调查方可。他在南宁地区有个熟人叫吕月茹，其夫李政文是南宁地委办公室政研组组长，因参加群众组织“422”，批斗时被打死了，“联指”用汽车把他的尸体拉到邕江丢下江去，然后连夜开会写了个通缉令，第二天张贴出来，讲“李政文是国民党特务、日本汉奸，于昨天晚上畏罪潜逃，特公告通缉”等等。而李政文根本不是特务，也不是什么汉奸。他死了以后，就把他的爱人吕月茹，下放到武鸣县去了。老温决定找她帮助调查。

老温在武鸣县找到了吕月茹，她满口答应温藩生的要求说：“我熟悉原来武鸣县的县长邓维卓，他也是因为参加‘422’挨打死了，他的爱人叫李彩花，最清楚梁同大队这件事啦，而且李彩花还是梁同大队的人，她跟梁同大队干部的关系也好，让她去了解这个事，县长的老婆回娘家，谁也不会怀疑呀？我喊她去办。”

老温说“好得很！”就跟着吕月茹去找李彩花。在李彩花家，老温把来访目的告诉她，吕月茹也向她介绍：“老温也是受迫害的，他反迫害很坚强，是好同志。”李彩花听了马上说“我去！我回娘家探亲，谁也不会说什么。”老温又对她讲：“你回去，要调查清楚：是哪天杀的？哪天去请示韦国清的？韦国清是怎样讲的？他们回来又是怎样传达的？回来后是怎样研究杀人的？杀了多少人？头一天杀了哪些人？第二天又杀了哪些人？这些都是些什么人？弄清楚后列个名单，再写个材料，我们好向中央汇报。”李彩花说：“好，今天下午我就回去，明天就搞清楚了！”

老温调查到了韦国清默许乱杀人的完整过程：

1968年8月的一天，梁同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大队长、会计等大队干部都去南宁，找到一个当年曾跟韦国清在梁同大队蹲点的公安厅干部，对他讲有重要的事情，想见见韦国清，当面向韦国清请示汇报，不知韦国清能不能接待？请他帮联系。公安厅那个人就去向韦国清报告，韦国清讲可以接待，并讲“明天晚上九点钟，在自治区青年团楼上办公室接待。”这个联系的人刚刚走出门口，韦国清又喊他：“来来来，你去通知贺亦然也去（贺是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笔者注），一同去。”

第二天晚上，梁同大队的人，开了一部小型拖拉机，拖了一车西瓜，晚上九点钟到达，韦国清贺亦然也同时到了。梁同大队的干部从9点钟开始向韦国清汇报，接待到当晚零时以后才结束。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梁同大队的干部向韦国清报告：“韦书记，我们已经把那些反对你的‘422’和牛鬼蛇神都杀了。”韦国清听到“都杀了”，很高兴，笑眯——眯的，然后讲：“我告诉你们啵——，杀人要经过最高人民法院批准才能杀啵——。”他在说这句话时，把‘啵’字拖得很长。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他都没有批评和明确制止梁同大队乱杀人。

汇报结束了，梁同大队的人，又坐拖拉机回去了。在路上他们讲：我们向韦书记汇报杀人，他虽然讲杀人要经过最高人民法院批准，但是他笑咪咪的，又不批评我们，说明他是同意我们杀的。

半夜他们回到大队，就连夜研究杀“422”和牛鬼蛇神，马上杀了三十多个，都是拿木棒和棍子打死的；第二天晚上又研究杀了三十多个。这个大队一共杀了七十多人。杀的是下台的大队干部和小队干部，以及与他们观点不同的贫下中农，其中还有一个女的转业军人，那个转业军人在部队还当过记者。所以说，这个大队乱杀人，是经过韦国清默许的。

当温藩生把事件的经过情形，以及被害者的名单等书面材料交给徐江萍时，徐老很高兴，立即寄给陈云。

巧妙同意放水淹南宁

据有关资料记载：1968年7月30日至8月1日，南宁“422”的据点和区域展览馆、解放路被广西军区指挥的部队攻陷后，南宁市发生了“联指”武装及民兵滥杀无辜的屠城：“南宁七、八月这场大屠杀（不是武斗）死者不下一万人，肖寒（当时是南宁市委书记，后任自治区党委书记——笔者注）则承认死了八千。南宁市公安局的人说，大屠杀过后，南宁市吊销粮簿的有五千人。无数工人、干部、学生、外地逃来的群众（其中只有少数四类分子）、市民被捉后枪杀，有的全家杀光。”“在踏平解放路的前前后后，杀了许多‘战俘’和群众。事后，当时担任广西大学联指广播员的×××对同学说：‘八月六日那天，我亲眼看见手无寸铁的422群众和居民群众，潮水般从解放路逃出来，联指的人用冲锋枪、机枪扫射，闭上眼睛都可以扫倒一大片，真够惨啊！这些事，我们联指的群众也看不下去。’”

解放路一带的“422”据点被攻占后，在下水道里，还藏着许多武装人员和居民群众。为了肃清这些不肯出来的“土匪”，同时为了清洗“422”区域到处都是的血迹，和用大水冲走那些虽有汽车搬运，但火葬场烧不完的尸体，“广西帮派丧心病狂地炸开南宁上游百色县之澄碧河水库的闸门，还炸了几个小水库，放大水淹南宁，据说是为了淹死躲在地道里的‘匪徒’，其实，还可洗净血迹斑斑的杀人场。这场大水灾使大半个南宁被淹，从火车站到百货大楼，要坐船，历史上没有过这么大的水，而且，8月中下旬，并没有下大雨，根本不可能发大水。”

另一个知情人温藩生这样说：“为了炸开澄碧河水库，公安厅派三个人去请示韦国清，韦不直接答复，而是大声说：‘这种鸡巴事还来问我，我哪管得了这样多事！’去的三个人领会韦国清的意思是同意炸，南宁‘联指’指挥部就打电话给百色‘联指’指挥部，说请示了韦国清，‘韦国清说“这种事还来问我”，我们可以自己干了。’百色‘联指’指挥部就派人去炸了。与此同时，南宁这边通知下游的西津水电站关闸，这样江水就流不下去迅猛暴涨，很快淹了南宁。为了让水进南宁市中心，“联指”又派人去炸市内风景区南湖的坝，水流进了七星路一带。放水的目的，是为了淹死仍躲在地下水道里的人和洗清街上的血迹。”

还有“桂林老多”赴京代表杨福廷、唐玉星、李田等回忆：1968年8月26日，广西“区革筹”组织他们去南宁解放路，参观“422”“放火烧房子”等“罪行”时，他们看见解放路的街道，留有一人多高被水淹过的痕迹，还看到街道上东一具，西一具，约有30多具没被大水冲走的尸体，有的尸体，面部已变成骷髅，但长长的头发还粘连在骷髅上……

诬陷韦祖珍上了“林彪贼船”

韦国清等在文革中，人都杀了那么多，给活着的人制造冤假错案，就更多如牛毛了。原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韦祖珍，就是一个受害者。

1971年发生了“林彪事件”，在批林中，区党委宣布广西“上了林彪贼船”的，是韦祖珍。

文革后从知情人回忆的事实以及后来平反的情况看，韦祖珍显然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韦国清，为了掩盖与林彪死党黄永胜的共犯，就给韦祖珍，扣上“林彪分子”的帽子，以表明自己是个和林彪集团毫无干系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众所周知，在文革期间，韦国清就是广州军区政委，与黄永胜的关系十分密切，并深深得到林彪的赏识。1968年6月份，在桂林“支左”的6955部队团政委孙云魁，在长沙会见“老多”负责人杨福廷时说：“3月份广州军区已经开会，定广西‘422’是反革命组织了，你们不要抵抗了，抵抗是没有用的！”这不就是韦国清与林彪集团相勾结，镇压屠杀群众的罪证吗？

记得广西当年批判韦祖珍时，《广西日报》列举的罪状，不外乎有这么几条：一条讲他诬蔑广西的大好形势，说广西的生产，就像乌龟爬沙，越爬越下来；第二讲他否定广西建设的辉煌成就，回百色时，说上林县没搞什么建设，街道还是那条“五寸街”，东兰县没有什么大变化，“变化只有一个，把我家门口的大榕树砍去了”；第三讲他攻击贫下中农，说生产队的干部不行，他家的生产队长就会去捉“蚂拐”（青蛙——笔者注），是“蚂拐队长”；第四就是讲他上了林彪贼船，至于如何上的？让人只看见政治帽子，看不见令人信服的事实。所以，报纸上越批，人们越觉得韦祖珍是个幽默可亲、敢讲真话实话的人，他的罪状，显然是他的顶头上司——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主持罗织的。

关于韦祖珍，温藩生同志这样回忆：

“1980年初，曾当过韦祖珍的保卫科长的南宁专区水电局副局长莫文骝，带我去见韦祖珍，想通过徐江萍与陈云的特殊关系，争取为韦祖珍平反。韦祖珍见了我很高兴，拉着我的手就讲：‘讲我是黄永胜安插在广西的钉子，哪有那回事啰，在军委大礼堂开大会，黄永胜喊“韦祖珍到了没有？”我讲“到了”，他讲“组织上决定调你回广西工作”，我讲“服从组织分配”，马上去组织部办手续就来了，黄永胜连谈话都没有跟我谈，怎么讲我是他安插在广西的钉子呢？还讲我上了贼船，没有那回事，在庐山开会，毛主席讲给林彪当主席，我只是表示同意，怎么讲我上了贼船呢？老温，我把在庐山会议的笔记本给你看，你就知道我讲的是真话了。’”

温藩生把他的笔记拿回去看后，又去对他说：“我反复看了你的笔记，你没有反对中央。”韦祖珍又一肚子委屈地向他说：“我在红七军时，就和韦国清在一起，我们是老战友，他竟这样对待我！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要我去西园宾馆开常委会，一进会议室，他就出来叫：‘韦祖珍！’我答‘到！’他说‘现在决定送你到北京，让你在北京交代问题，飞机已经准备好了。’讲完马上把我铐起来送走了。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把我放回来。”

徐江萍很同情他，要他写材料向中央告状。恰巧此时，中纪委五室主任张珉率领的中央工作组，来到南宁调查广西的文革问题，温藩生等便向张珉汇报韦祖珍的冤案，并告诉张珉，韦祖珍已经得了晚期癌症，本人希望在去见马克思之前得到平反。

第二天，张珉便把韦祖珍用小车接到明园饭店，亲自听韦祖珍申诉，然后向中央报告，建议为韦祖珍平反。

第三天，中央同意张珉工作组的意见，指示广西区党委写为韦祖珍平反的报告上报中央，这样韦祖珍才获得平反。但是，当温藩生在韦祖珍家里看到广西区党委的平反书时，发现写得很糟，就对韦祖珍说：“那天我临走前，不是建议你，

平反书要达到六条要求，才能签字，这个平反书，还留有‘尾巴’，你怎么就签啊！”韦祖珍说：“唉，老温呀，我看见有‘平反’两个字就签字了，因为我等了这么多年，高兴啊！”

当韦国清被撤掉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军委副秘书长、政治局委员时，韦祖珍已经住进了解放军 303 医院，他的夫人带老温去看望他。

老温在病床边把韦国清被撤的消息告诉他，问他：“这个好消息你高兴吗？”韦祖珍用几乎听不到的微弱声音说：“高兴……”，就再没有气力说话了，只把手竖在床上和老温握手。

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握手，第二天，韦祖珍就与世长辞了。

广州军区（韦祖珍原是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广西军区、广西区党委要为韦祖珍开追悼会，可是，在区党委写的悼词中，连韦祖珍在长征中当过红军师长都不写，韦祖珍夫人就不同意开追悼会。为此，广州军区政委亲自来南宁说服韦夫人：有意见可以提，追悼会还是要开，希望要以大局为重。

要为韦祖珍开追悼会了，老温问韦夫人请不请韦国清参加？韦夫人愤恨地说：“不请！老韦临走的时候还嘱咐，开追悼会不要叫韦国清去！”所以，在韦祖珍的追悼会上，有邓小平、中央军委、国防部长等等送的花圈，唯独没有韦国清的花圈。

为了推卸责任保护自己，把下级当作“人肉盾牌”，是韦国清的一贯伎俩。例如 1957 年“反右”前，徐江萍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的副院长，那年自治区人大会议的检察工作报告，本来应当由检察长林方作的，林方不作，让他来作，这个报告是别人写的，写好后又经过韦国清看过批准同意的，他只是在大会上宣读，可是后来却因唸这个报告，被这个报告的批准者韦国清打成“右派分子”。

不让路就判你十年

《乔老爷上轿》是文革前有名的戏曲，文革时候，南宁的一个“422”画家借题发挥，画了一副漫画叫做《韦老爷上轿》，于是“国清同志”就有了一个出名的绰号“韦老爷”。从下面我的一个好友、广西文联原办公室主任×××讲的一件小事，足可以看到“韦老爷”的威风，可能不止八面。

文革期间，韦国清和贺亦然坐小车去百色，途中有辆大卡车在前面开，那时百色因地处山区，经济又不发达，公路狭窄，路面都是土石，汽车开起来，烟尘遮天蔽日，韦国清坐在大卡车后面的小车里，自然很不舒服。可是，前面那个卡车司机，不知是路面小呢？还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吃不得土？还是年轻气盛，对大官看不顺眼？无论后面小车的司机怎样按喇叭，他就是不让小车超过去。

这可把韦国清气坏了，到了百色，就打电话回南宁下令追究。那个司机也真傻，车屁股上挂着牌子，还跟大官作什么对啰？结果被判了十年徒刑，文革以后也没有放出来。不过，那小伙还真是一条梁山好汉！

2010 年 2 月 2 日

《酷吏韦国清文革二三事》是“胡说八道”吗

张雄飞

最近我发表了博文《酷吏韦国清文革二三事》，有位网友在我的新浪博客上发表评论，说是“胡说八道”。

这篇博文是“胡说八道”吗？这位网友如果不是心怀恶意，而是因不知情，被文中所说的几个广西文革期间乱杀人数字所吓倒，对文中所述韦国清干的坏事，觉得匪夷所思，从而把我的博文当作天方夜谭的话，那么，就请按照我所提供的知情人，去做一番认真调查：

一、关于“杀人数字”：

我在文中列举的三个“权威数字”，最好调查的是“官方统计”。因为中共中央在平反文革冤假错案时，很少向地方派出庞大的工作组，但广西却获此殊荣，党中央于 1983 年，派出了以中央委员周一峰同志为组长的“广西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工作组，在其领导下，各地调查平反昭雪了大量冤假错案，并对数以万计的杀人犯及涉案者，进行了党纪、政纪、刑事处分。其后，中共广西区党委“处遗”办公室，根据各地的上报，得出了最终的统计数字。

我们姑且以官方的统计为准，一个省份在一次运动中，竟被冤杀 8 万多人，还不骇人听闻吗？把这骇人听闻的数字告诉您，怎么能骂人家是“胡说八道”呢？即便有两个数字是“胡说八道”，总不能说官方的数字也是“胡说八道”吧？先生，您能提供不是“胡说八道”的数字吗？

别地方不敢说，若说南宁，知道广西文革乱杀人总数目的离退休干部人多得很，那位网友不妨去访访这三个人：

1、原广西人民出版社社长吕梁，他曾于 1983 年，主持编纂出版了《广西文革大事年表》，他会告诉你广西在文革期间到底乱杀了多少人？

2、广西医科大学黄卓正教授，他参加了南宁市的“处遗”工作，也对广西乱杀人的情况了如指掌。

3、广西区直机关的离休干部温藩生同志，也参加了南宁市的“处遗”，他可以把这五位数，一位不差地告诉你！

二、关于南宁大屠杀的惨况，在广西已路人皆知！请去问问南宁的广大群众吧，也去问问前面介绍的几位知情人吧，我在博文中所写的及所引用的，仅仅是冰山一角！

三、关于韦国清干的那几件坏事，拙文本来就为怀疑者提供了调查线索，如果真想弄清事实真相，应该去向知情人调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建议您还是去作一番调查为好，以免韦国清上将在文革期间所建立的“丰功伟绩”，被人抹煞了岂不可恨！

另一位网友则评我的博文说“张雄飞先生：现在都已经是 21 世纪了，你还死守着个人的那点文革经历沾沾自喜？与时俱进，干点正经事吧！”，我读罢不禁太息，觉得有必要说几句话。

首先老夫觉得“那点文革经历沾沾自喜”的断论，恐怕有失公允吧？如果换了这位先生，他能对因为反抗韦国清等对桂林无辜群众的军事镇压，揭露广西文革的罪恶，被“三开除”，被判了无期徒刑，在监狱和狱中之狱——单身牢房之中，度过了十二年宝贵的青春时光“喜”得起来吗？这是血与泪的经历，只是老张我不哭罢了。对于这样能“沾沾自喜”的经历，先生您是不是也要去体验一下，

以便获得写文章评人的灵感和喜悦？

至于教训我要“与时俱进，干点正经事”，我则难以领教而百思不得其解：

1、如果这位网友是年轻人，为什么在这自由的“博客时代”，不让别人也有“博”一“博”的自由呢？您要别人“博”什么，才合您的口味和价值观呢？干什么事才是正经的？写博文就是不正经的吗？朋友，您认为我的博文不屑一顾，可以不看；您觉得我的博文不真实或颠倒黑白，欢迎赐教揭露批判。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您并没有认真读我已有的全部博文，不然就不会说我“死守着那点文革经历沾沾自喜”了，因为我的博文，主要内容不是写个人经历（起码目前还不是），而是揭露广西文革的罪恶，批评广西有些媒体（如《桂林晚报》），不能站在公正的立场上，以历史事实为根据，如实地再现当时的历史真实，而不是回避、歪曲和捏造。年轻人：简单的否定，是不能服人的。

2、假如那位网友是广西的中年人，就或多或少有文革经历或听闻了，除非不敢面前历史事实或为历史罪人开脱，否则就不会对广西十年文革的残酷那样视而不见，更不会对别人的揭露愤愤不平了。先生，您在政治上和良知上已麻木到这种程度，就没有必要对别人说三道四了。7[z a, }8 U- D- h; L

3、要是那位网友是老年人，那么我只想说：已经是 21 世纪了，您怎么竟说出那样的话！老兄：我们老就老吧，总不能只知道去寻找找棺材或爬火葬场烟囱乐处“正经事”，做点能给年轻人带来点什么的事，不是也很有意思吗？

我估计这两位网友，十有八九是知情的广西人！理直就应该气壮嘛，何必匿名呢？”

2010 年 2 月 13 日大年三十就

一部掩盖韦国清等文革罪恶的官史（待续未完）

转自 张雄飞博客

《桂林市志》大事记文化大革命部分（1966 年——1978 年及 1983 年）

1966 年

1 月 19 日 龙隐桥建成通车。

2 月 12 日 中共桂林市委发出通知，在全市开展向焦裕禄学习的活动。

2 月 25 日～27 日 中共桂林市委组成千人工作队，分别深入到工交、财贸、基建、郊区各基层单位，宣传贯彻《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深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定》及市委党员干部会议精神。

3 月 13 日 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及其秘书程思远回桂林参观游览

4 月 27 日 中共桂林市社会主义教育总团委员会成立。下辖 5 个分团，分别成立分团工作委员会。28 日，各分团中的桂林队员进点。

5 月初 全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染织厂、机械厂和食杂公司为先行，先后在工业、交通、基建、财贸等系统的 85 个单位铺开。

6 月 4 日 广西师范学院（1983 年 5 月 28 日改名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贴出批评院领导的大字报。中共广西师院委员会组织一批大字报加以反击。

6 月 14 日 广西师范学院少部分学生贴出《炮轰桂林市委》的大字报。

6 月 16 日 7100 人参加横渡漓江活动。

6 月 20 日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派出以中共桂林市委副书记徐为楷和自治区党委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申本田为首的“文化大革命”工作队进驻广西师范学院。

6 月 21 日 南郊暴雨，3 个小时雨量达 106 毫米。相思江水猛涨，雁山公社 7300 多亩田地和 30 多间房屋被毁。

6 月 23 日 中共桂林市委及“四清”工作总团发出《关于各工作团成立文化大革命小组的通知》。

7 月 2 日 桂林市“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成立。

7 月 22～23 日 中共桂林市委召开扩大会议，认为“四清”中主要是要解决对“当权派”和“四类干部”的斗争问题，中心是“使无产阶级政权掌握在革命派手中”。

7 月 28 日 中共桂林市委召开领导干部和“四清”工作队长会议，介绍广西师院“阶级斗争”情况，并组织部分人员参观师院的大字报。

8 月 5 日 “文革”工作队撤出广西师院，一些学生贴出“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的对联。

8 月 17 日 “首都红卫兵南下串联队”到桂林市。

8 月下旬 红卫兵及一些群众横扫“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9 月初 群众中出现“改组市委”和“保卫市委”的两大派组织。

9 月 7 日 11 时起，部分红卫兵在中共桂林市委院内静坐绝食，抗议市委“破坏文化大革命”。

9 月 10 日 中共桂林市委召开群众大会，号召广大群众向市委及市委领导

干部提意见。

10月1日 桂林铁路南站货运站建成。

10月12日 第二发电厂（沙河电厂）工程指挥部成立。

10月下旬~12月中旬 各群众组织分别召开大会，批判中共桂林市委及市委主要领导人、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各级负责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0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外语学校在桂林组建。

11月 桂林市体育运动员王维俭在第一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上获女子个人全能、自由体操、平衡木、高低杠5块金牌，并与队友一起夺得女子体操团体第一。

12月15日 桂林味精厂投产。

1967年

1月12日 “桂林市革命造反大军联合指挥部”（简称“造反大军”）“接管”桂林广播站。

1月24日 “革命造反派夺权行动委员会”进驻中共桂林市委、市人委、市“文革”小组和市公安局等单位，“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2月8日 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

3月8日 由“市造反大军临时服务委员会”、部队干部和“革命干部”三方面的代表组成桂林市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下设工交、财贸、基建、3个办公室，负责指挥全市的生产和经济建设工作。

3月 驻桂林部队派出干部、战士，开展“三支两军”（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工作。

4月25日 桂林市警备司令部、政治部成立，桂林军分区司令员景伯成兼任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市军管会、市警备司令部发出布告，严禁打、砸、抢、抓，制止武斗，并对粮食、物资仓库和监狱等62个单位实行军管，对一些守护单位、重要目标派出警卫部队。

7月20日 市民政局新建的火葬场启用。

8月10日 桂林地、市“造反大军”成员夺取驻军武器弹药。

8月13日 桂林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成员，包围二塘火车站及炸药库，抢夺武器。

9月15日 桂林市一派群众组织和另一派群众组织在阳朔县白沙镇发生武斗，开枪打死2人，是为“白沙事件”。

9月28日 市召开职工干部代表大会，促进革命领导干部、革命群众代表和军队代表的“三结合”及尽早实现大联合。

10月24日 桂林市无产阶级革命大联合委员会成立。

1968年

1月10日 市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发出公告，支持两派；群众组织实行联合，规定群众组织不准抓人、打人、杀人，不准高打、砸、抢、抄。

2月18日 “造反大军”及“联指”代表在支左解放军主持下，经过办学习班，组成“桂林市革命大联合委员会”（简称“大联委”）。

3月8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林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

4月14日 桂林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全市8万军民集会庆祝。

4~11月 郊区、城区人民公社及各单位先后成立革命委员会。

5月初 两派群众组织分别占领据点，逐步形成以阳桥为界的南北对峙局面。

5月17日~8月3日 两派大武斗，全市陷入混乱状态。

6月4日 桂林市周围12个县的8000多农民进城介入桂林武斗。

7月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为解决广西问题发出《布告》（简称《七·三布告》），立即停止武斗，恢复交通，交回枪支及物资，外来人员要返回，严惩坏人等。

7月13日 设在桂林的广州军区桂林步兵学校撤销。

7月14日~8月8日 桂林地、市革委会及桂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为忙落实《七·三布告》，先后多次发出通告，要求两派立即停止武斗，撤出据点，拆除工事，通过谈判进行大联合。

8月20日 桂林地、市革委会和桂林警备司令部、政治部联合签署《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七·三布告〉的公告》。

8月21日 凌晨，市革委会指挥“工人纠察队”及“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强行进驻“造反大军”控制的据点。

8月30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接收1966年、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几个问题的通知》。

9月3日 市“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高、中等院校及医院。

9月6日 市革委会发《关于封闭集市贸易的布告》。

9月13日 市和郊区安置办公室联合举办“知识青年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10月20日 郊区召开首届贫下中农代表大会，成立桂林市贫下中农代表大会（简称“农代会”）。

11月下旬 桂林电表厂自制1300吨油压机成功。

11月 市革委会把原直属机关干部（少数调市革委会工作外），分别集中在七星幼儿园、民族师范学校和冶金地质专科学校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对干部进行批斗和审查。

12月7日 桂林市红卫兵首届代表大会召开，成立“桂林市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

12月12日 桂林市工人阶级首届代表大会召开，成立“桂林市工人阶级代表大会”（简称“工代会”）。

12月 市革委会成立第三办公室，专司“清理阶级队伍”工作。

1969年

1月17、19日 数万群众于广西师院及体育场集会，批斗所谓的特务、叛徒、死不悔改走资派。

2月初 “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桂林日报社。

2月3日 欢送首批知识青年（部分中学毕业生）到农村安家落户，原市直部分干部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3月7日 市革委会召开整党建党会议，号召要认真搞好“斗批改”，以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优异成绩迎接中共九大”召开。

4月15日 首批上山下乡的街道居民，分别往全州、恭城等地农村安家落户。

4月 集中原市政协、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的非党干部及社会上党外上层人士共81人于市妇幼保健院，举办“党外人士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行“斗、批、

改”。”

8月8日 桂林市“五·七干校”成立，原中共桂林市委、市人委干部500余人，在原市园艺场举行开学典礼。

9月22日 桂林齿轮厂试制成功冷挤机。

9月24日 青狮潭水电厂第二机组与桂林电厂并网发电。

10月18日 以阮友寿为团长的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代表团到桂林参观访问。

12月5日 市革委会发出通知，要求所有单位要以“备战、备荒、为人民”和“要准备打仗”的观点，统帅年终总评。

12月上旬 郊区革委会召开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会，号召掀起以大办水利、造田造地为重点的冬季生产高潮。

12月20日 原市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的214人集中雁山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1970年

2月13日 为贯彻中共中央1月31日《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的决定》和2月5日《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市革委会决定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即“二·五运动”）。

2月下旬 桂林地、市下放近300名医务人员到农村安家落户。

3月21日 市防洪指挥部成立。

3月 桂林市成立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单位也相应成立领导小组及办公室，配备专案200人员多人。

4月10日 19时30分，桂林林业汽车队汽油库因雷电引发火灾。

4月17日 市革委会组织3万多名骨干，统一行动，于凌晨2时对800多“对象”抄家，以“搜查反革命破坏活动”。

4月26日 各界群众俯庆祝中国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4月底 市革委会政工组组织教育革命参观团到外地参观。归来后在全市进行教改实验，一些中学到生产队办教学、生产、无私奉献教研基地；一些中学办分校或校办工厂、农场。

5月4日 七星岩、芦笛岩等风景点开始凭票浏览。

5月14日 市革委会召开计划会议，学习周恩来总理在全国计划会议上的讲话和毛泽东主席的《论十大关系》。

6月16日 贯彻毛泽东主席“六·二六”指示，桂林市区下放300名医务人员到农村；组织69个农村巡回医疗队，参加793人次；郊区77个大队中有73个大队建立合作医疗制度培训“赤脚医生”80多名。

7月 市革委会成立中共党的核心小组。

7月 桂林市民兵独立营（1000多人）开赴融安，参加枝（城）柳（州）铁路筑路大会战。

8月17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进一步广泛地开展计划生育和提倡晚婚的意见》，要求各级领导要亲自抓，各卫生单位的领导要亲自抓，各卫生单位要做到小手术不出公社、工厂。

12月19日 10月以来城区连续发生火灾10数起，经济损失近20万元。市革委会发出通报，要求各级革委会健全制度，加强安全生产教育检查。

1971 年

1 月初 市革委会将郊区自 1965 年实行的粮食征购任务 3 年的政策，改为一定 5 年，并对少数征购任务畸轻的社队适当调整。

1 月 全市开展“批陈（伯达）整风”运动。

2 月 17 日 市革委会召开物资调剂会议，部署清仓查库，修旧利废，调剂余缺，以解决物资不足的矛盾。

4 月 17 日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召开在南宁学习的各地、市负责同志会议，强调桂林是“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的重点地区。

4 月 23～27 日 中共桂林市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恢复中共桂林市委委员会。

5 月 29 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加强城市规划管理暂行条例》。

7 月 6 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认真对外开放的准备工作通知》，并成立开放筹备领导小组。

7 月 31 日 开始实行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制度。

10 月中旬 中共桂林市委根据上级统一布置，开始分批分期举办学习班，开展“批林（彪）整风”学习，批判《571 工程纪要》，清查有关的人和事。

10 月 19 日 桂林市城市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改为桂林市城区革命委员会。

11 月 19 日 市革委会成立改革临时工制度领导小组。

12 月 15 日 中共桂林市委、市革委会决定加强党对农业学大寨工作的领导，争取奋战二三年，实现“社、队、站变大寨，郊区变昔阳”的奋斗目标。

1972 年

2 月 根据中共自治区委员会三届三次全会扩大会议精神，全市各战线分期分批，先党内后党外，原原本本地传达中共中央文件，逐条逐句地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团及其反革命政变纲领《571 工程纪要》。

3 月 根据中共自治区党委《关于在城市、县城、街道铺开社会清队工作的意见》精神，全市结合“清队”进行城镇居民下放农村工作。

4 月 12 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建立健全社、队农业机械化管理机构的通知，规定人民公社建立农机服务站，生产队建立农业机械小组。

5 月 20 日 市革委会进行机构调整，成立 16 个局、撤销工交、财贸、农林水 3 个小组；保留办事组、政工组、生产指挥组、人民保卫组和“五七”干校。

是日 市中级人民法院恢复。

5 月中旬 城区街道开展打击现行反革命和刑事犯罪分子的群众运动。

10 月 13 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安置处理老弱病残干部的意见》，以“可退可不退就不退”为原则。

11 月 8～28 日 中共桂林市委在自治区党委主持下，在南宁市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对桂林市“一打三反”运动的“4·17”大清查扩大化提出批评。

11 月上旬 中共桂林市委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强调要狠抓阶级斗争，狠批资本主义倾向，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

11 月 19 日 尼泊尔王国首相基尔提·尼迪·比斯塔和夫人到桂林参观访问。

12 月 9～17 日 中共桂林市委举行第十次全会扩大会议，传达贯彻 11 月 8 日在南宁召开的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

1973 年

2月 城区街道结合社会“清队”，开展整顿社会治安工作。

4月26日 共青团桂林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第九届委员会。

5月 经国务院批准，桂林市正式对外开放旅游。

6月15日 市工会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市总工会第十届委员会

6月27日 市第六次妇女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市妇联第六届委员会。

7月8日 中共自治区委员会发出通知，已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撤销“三支两军”机构和撤出人员。自此，市“三支两军”人员开始分期分批撤出。

7月9日 撤销桂林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10月上旬 中共桂林市委成立社会主义教育领导小组，抽调400多人，组成24个宣传队，到21个先行单位试点。

10月15日 加拿大总理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及夫人到桂林参观访问。

10月18日 47个国家驻华使节和夫人及外交官员到桂林参观访问。

12月8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干部学校在桂林组建。

12月10日 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阿尔巴尼亚人民军总参谋长彼得里特·杜米为团长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军事友好代表团到桂林参观访问。

12月14日 李宗仁的元配夫人李秀文从美国回到桂林定居。

1974年

2月9日 中共桂林市委召开干部、工人、知识分子代表会，传达中央文件，动员“批林批孔”。运动期间，有些人被定为“反革命分子”而遭拘捕判刑。1983年1月平反。

4月15日 中共桂林市委部署落实政策工作，要求各系统成立落实政策办公室。

5月10日 阮氏定副司令率越南南方妇女解放联合会代表团抵桂林参观访问。

5月14日 开放绢纺厂、橡胶机械厂、广西师范学院等14个单位供一般外宾参观访问；增开无线电一厂等8个单位供常驻桂林的越南病员和越校师生参观访问。

5月 恢复中共桂林市委学校，成立市直机关临时党委。

6月9日 罗马尼亚国地防空司令瓦西列·阿列克赛上将到桂林参观访问。

6月10日、21日 美国驻华联络处副主任詹金斯和布鲁斯先后到桂林参观访问。

7月6~12日 中共桂林市委分别召开常委会、科以上领导干部会、基层领导干部会和群众大会，传达、宣传中共中央1974年21号文件，动员和部署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7月中旬 橡胶厂、绢纺厂等单位开始宣讲“儒法斗争史”。

7月16日 漓江大洪水，最高水位146.80米。市区30条街道被淹，5000多户居民受灾；郊区75个大队受到不同程度灾害。洪水持续3天3夜方退。

8月3~5日 中共桂林市委召开各部、委、办负责人会议，部署机关的“批林批孔”运动。

8月6日 越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黎清毅率越南政府经济代表团访问桂林。

9月21日 4万多军民集会，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10月23日 丹麦王国首相保罗·哈特林到桂林参观访问。

11月 桂林市贫下中农协会成立。

12月19日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一行到桂林参观访问。

1975年

1月4日 桂林市环境保护领导小组成立。

2月8日 波兰共产党总书记齐米日·米雅尔抵桂林参观访问。

3月5日 刚果人民共和国总理亨利·洛佩斯及由他率领的政府代表团到桂林参观访问。

3月8日 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副司令员江燮元、欧致富到桂林视察。

3月26日 由944名干部和452名广西师院师生组成的第一批“抓三分之一”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染织厂、二塘公社等52个单位。

4月6日 南宁——长沙航空线开通。

4月17日 桂林电网并入广西电网。

4月24日 比利时王国政府首相莱奥·廷德曼斯和夫人到桂林参观访问。

5月 中共桂林市委结合整党整风组织党员轮训。

是月 全市开展“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所谓“批资批修总体战”。制订“堵资本主义的路，迈社会主义的步”的12条规定。

9月27日 以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为团长，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副总理黎清毅为副团长的越南党政代表团到桂林访问。

10月 中共桂林市委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号召大学习、大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苦战3年，改变郊区面貌。

1976年

1月8日 周恩来总理逝世，一些单位群众自发地以不同形式举行悼念活动，寄托哀思。

2月27日 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夫人，到桂林参观访问。

3月31日 郊区甲山新立小学学生因敲取旧迫击炮弹头上的铜引起炮弹爆炸，死28人，伤5人。

4月 全市各单位组织理论骨干队伍，召开务虚会，宣讲“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民主派等于走资派”，开展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活动。

5月20日 新加坡共和国总理李光耀率领友好代表团到桂林参观访问。

6月17日 中共桂林市委召开市、郊两级常委会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7月6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逝世，全市人民连日哀悼。

7月8~12日 桂林大水灾，最高水位146.94米。受灾工厂19个，损失75.7万元；受灾水田31652亩，菜地2282亩。

9月5日 西萨摩亚国家元首马利托亚·塔努马非利到桂林参观访问。

9月18日 中共桂林地、市委，桂林地、市革委会在市体育场及附近街道举行追悼会，沉痛悼毛泽东主席逝世。

10月24日 中共桂林地、市委及地、市革委会召开群众大会，热烈欢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

12月 中共桂林市委领导全市人民揭批“四人帮”罪行，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

1977 年

- 1 月 8 日 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纪念馆揭幕开放。
- 1 月中旬 中共桂林市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传达第十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揭批“四人帮”，号召掀起学大寨的新高潮。
- 4 月 26 日 圭亚那合作共和国总统阿瑟·钟抵桂林参观访问。
- 5 月 10 日 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兼国务委员会主席吴奈温到桂林参观访问。
- 5 月 28 日 桂林冶金地质研究所研究成功人造金刚石。
- 6 月初 全市召开广播大会，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庆会议精神。
- 7 月 23 日 桂林地市 5 万多人集会，庆祝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追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恢复邓小平职务；永远开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党籍，撤销他们的一切职务等决议。
- 8 月 9 日 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一行到桂林参观访问。
- 8 月 16 日 中共桂林市委举办秘书长学习班。接着，全市开展全面清查“四人帮”、政治排队运动。
- 10 月 1 日 改建新桂林火车站投入使用。
- 10 月 7 日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总统阿赫马杜·阿希乔到桂林参观访问。
- 10 月上旬 中共桂林市委分别召开科研单位领导干部、科技人员座谈会，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动员加快向科学技术进军的步伐。
- 10 月 28 日 市革委会召开环境保护工作会议，要求各级领导治理污染，保护环境。
- 11 月上旬 桂林电表厂与中国计算科学研究院合作研制成功的 ZQS—5 交流阻抗比较装置达到国内行进水平。桂林二机械厂试验成功热处理碳、氮、硼“三元共渗”新工艺，使摇臂钻主轴头部硬度达国内先进水平。
- 11 月 15 日 中共桂林市委召开干部大会，揭批“四人帮”炮制的“老干部都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
- 11 月 22 日 教育战线职工集会，批判“四人帮”破坏教育革命的罪行。

1978 年

- 1 月 29 日 中共桂林市委、市人民政府授予王全禄、韦统豪等 20 人以劳动模范、模范工作者称号，号召全市要民向他们学习，掀起学大庆、学大寨新高潮。
- 1 月 市一建公司木材加工厂自制纤维板制浆机组建成投产。桂林地质研究所研制成功机械细磨抛光矿石片新工艺。橡胶机械厂研制成功国内最大的自动化双膜定型硫化机。
- 2 月 桂林电器科学研究所研制成功双轴定向聚丙烯薄膜。桂林冶金地质研究所试制成功单道弯晶 X 射线荧光谱仪。桂林无线电四厂研制成功功率因数补偿自动控制器。
- 3 月 桂林齿轮厂试制成功电解内齿轮机床。市汽运公司试制成功 60 吨大型平板车。
- 4 月 12 日 中共桂林市委召开大会，传达贯彻全国科学大会精神，给冶金地质研究所勘探技术室等 28 个单位转发全国科学大会授予的奖状。
- 5 月 16~17 日 连降大雨成灾，农作物受淹 30543 亩，受灾严重的 6339 亩。

5月中旬 全市开展揭批“四人帮”、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和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一批双打”运动。

6月 中共桂林市委召开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会议，部署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工作。

7月11日 中共桂林市委召开会议，传达贯彻自治区科学大会精神；转发自治区科学大会授予桂林市的先进集体、先进科技工作者的奖状；授予182名工程技术人员以技术职称。

8月5日市革委会召开质量报捷大会。桂林量具刃具厂等36个厂的75种产品分别达到国内、国际先进水平和本厂历史最好水平，向大会报捷。

9月7日 中共桂林市委、市革委会召开会议，传达自治区四级干部会议精神，动员深入揭批“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和影响；改变领导作风，落实党的政策，调动广大干部群众和积极性；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整顿和加速发展社队企业，以优异的成绩迎接自治区成立20周年。

10月31日 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环境保护工作汇报要点》。《要点》把桂林市列为全国重点治理环境污染的20个城市之一，要求到1985年基本解决大气、水质污染等问题。”

10月全市工交战线举行庆功会，表彰了在“质量月”活动中立一等功的量具刃具厂等8个单位，立二等功的机械厂等8个单位，立三等功的桂林钢厂等21个单位；获质量信得过称号的11个产品，立功的105个产品；获质量信得过称号的36个班组和157人，分别授予奖品、奖旗和证书。

11月 中共桂林市委重新复查、公开宣布纠正一批原定性偏高、处理偏重或与事实有出入的案件，撤销其原处理决定。

12月24日 中共桂林市委发出关于深入学习和宣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通知。

1983年

1月12日 全市开展物价大检查。

1月20日 下雪，城区雪量3.6毫米，积雪深度4厘米。

1月 市公安武警中队和消防大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广西总队桂林市支队”。

4月下旬 中共桂林市委开始贯彻中共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指示，在全市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简称“处遗”），平反冤假错案，清理“三种人”（跟随林彪、“四人帮”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调整各级领导班子。

5月 净瓶山大桥建成通车。

6月1日 121个国营企业开始实行利改税制。

6月 松坡中学高中部改为“桂林市第一职业中学”。

7月20日 中共桂林市委召开经济会议，要求集中财力、物力，保证重点建设，刹住乱涨价、乱摊派、乱发奖金和滥发补贴的歪风，推动技术进步，提高经济效益。

8月21日 泰国武装总队最高司令沙友德·格莲上将一行到桂林访问。

9月6日 约旦国王侯赛因·伊本·塔拉勒和王后到桂林参观访问。

9月14日 由桂林飞往北京的中国民航264号三叉戟客机在机场起飞时，与一架军用飞机相撞，乘客死10人，伤19人，机组人员伤2人。

9月23日 “处遗”工作队 1800 多人，分为 254 个小组，分赴各基层单位，督促和帮助抓好“处遗”工作。

9月24~28日 市人民政府桂林市城市总体规划技术鉴定会，规划突出一个中心（风景游览城市）、两个特点(山水甲天下和历史文化名城)。

10月1日 新建的市少年宫举行落成典礼。

10月8日 临桂县划归桂林市管辖。

10月21日 桂林靖江王墓群遭到大范围的严惩破坏，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文件，要求保护好。

12月7日 按国家二级公路标准设计改造的桂林至阳朔公路竣工通车。

12月18日 市职工业余大学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毕业。

12月30日 桂林人民广播电台恢复播音。

作者简介：37年生人，49年参加革命，55年入党，现为离休干部。曾任市歌舞团歌舞队队长、音乐指挥。因桂林文革事，68年至73年被关押，并被开除党籍干籍公职，下放到桂林钢厂当烧火工，74年带头发起揭露广西文革在韦国清的支持下，发生于桂林及全广西无数乱杀死人的罪恶事件，被原广西区党委定为“反革命集团”，后又公开称为“张雄飞反革命集团”、“桂林几个反革命分子”。76年7月被判处无期徒刑。被在桂林战报、广西日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公开批判，83年1月在中央的直接指示下才获出狱并彻底平反。”

别有用心的《桂林市志》

1997年12月，由数届“桂林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历时14年编，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字数5,332,000，共印刷5000部，定价每部（上、中、下三册）550.00元的《桂林市志》（简称《市志》，请看博客图片），其“大事记”的文化大革命部分（见附件），有着极为严重的政治错误。

其错误的要害，是刻意掩盖韦国清及其帮派体系，于文化大革命之中，在广西和桂林市犯下的史无前例的罪恶。

尤其恶劣的是，《市志》是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已经作出否定的决议，以及1983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根据“六中全会”的结论，派出庞大的工作组，对原广西区党委进行了事实上的改组，在“处理广西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简称“处遗”）中，又进一步全面具体的否定了广西和桂林市的文化大革命，并由改组后的自治区党委，对文革中发生于广西和桂林市的一些重大事件，亦作出结论之后才编纂而成的。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市志》的出炉及其大事记中的文化大革命部分，实质是用隐晦的方式，对中共六中全会的决议、对区党委在“处遗”所作结论的翻案，从而也就是为韦国清等在文革中的罪行翻案。这就是《市志》问题的要害所在。

好文明的广西和桂林的文革

请网友们先读读《市志》文革大事记全文，那么就会发现：桂林市的文革，多么温良恭谦让呀！因为整个桂林市的文革，只由于对立的两派，在那个叫做“白沙”的地方打了一仗，才不幸打死了两个人！除此之外，别无死伤。如果你要问：“不是有很多爆料，说桂林市在文革中打伤人数以万计，乱杀人数以千计么？桂林市不是在文革中，制造了一万多起冤假错案吗？”那么，《市志》的编纂者们，

将会以绅士的风度彬彬有礼地告诉你：“女士先生们，那是以讹传讹的望风扑影的不负责任的所谓的‘爆料’，我们的态度一贯是严肃的认真的重证据不轻信传言按照科学发展观编写历史的！你们不是说桂林文革杀了许多人吗？我们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见呀！如果你们想证明那是真正的在桂林的历史上发生过的，那么请把他们的尸体抬来给我们看看好不好？我们没有实证是不敢编纂历史的。至于你们说的所谓一万多冤假错案的问题嘛，首先你们在弄清楚我们编纂委员们的职责不是搞数字统计的，搞数字统计那是审计局的事，我们开个介绍信，你们去找他们查一查好不好？再见再见拜拜拜拜！”

网友们，你们如果看了《市志》文革部分的“大事记”，脑海中必然会出现那些官僚的、伪善的、高傲的、摆出一副神圣不可侵犯架式的面孔！

《市志》这部官史不记广西和桂林的文革罪行，恐怕只能说明：那确实确实存在的罪恶，是当年的官方，即韦国清所把持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干的，是史官们不敢得罪的大人物——韦国清上将干的！

桂林市的文化大革命，真的像《市志》所记的那么文明么，不！那是血淋淋的、到处都是寡妇恨、孤儿泪的极其残暴野蛮的“文化大革命”。请看在 1983 年“处遗”后官方的一些并不完全准确、也不十分公正的资料记载吧：

一、广西文革的罪恶：

“由于广西“文革”中有一条所谓正确路线，大搞派性镇压，结果造成全区冤假错案二十万件，被打死和迫害致死八万五千多人……

一九八三年三月……在全区范围开展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工作。全区共组织了十万人的“处遗”队伍，历时四年多时间……处理了‘文革’中乱杀人的问题……全区共处分了五万三千多人(其中被开除党籍的二万五千多人)，在被处分人员中国家干部一万八千多人(其中被开除党籍五千多人)……”

二、桂林市文革的罪恶：

“十年‘文革’动乱，桂林非正常死亡达一千一百二十八人，其中：干部、工人五百五十六人，群众五百七十二人。全市冤假错案一万一千五百二十二起，平反一万一千三百三十三起，完成百分之九十八点三五。‘文革’中被抄家要求清退的二千五百七十三户，已清退二千四百户，财产损失据不完全统计约三千万元（以上数据均不含两县）”

需要强调的是，以上的官方所记，少说要比历史的真实情况文明十倍，如果按照老百姓的记忆，历史的真实，则比官方记载的残忍十倍！

什么是《市志》认可的“大事”

条件很简单：《市志》的编纂者们选题的标准，不在于历史事实的影响所及意义所在，而在于他们的政治需要。言而总之，只要编纂者们认为历史上发生的事情，记下来能服务于他们的政治目的，那么就是谁家的猪生了几个崽鸡下了几个蛋都不会遗漏；只要他们认为对他们掩盖韦国清及其帮派势力的文革罪行不利的事，哪怕是桂林的独秀峰在顷刻之间倒塌漓江在一夜之间干涸，他们也会“没听见，没看见”而不记。例如，桂林市某年某月某日下大雨、某年某月某下大雪、某年某月日某个风景点开张等等，他们可以当作大事来记；但文革十年及其后的“批‘四人帮’在广西的别动队——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平反冤假错案”、“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这七年发生的许多大事，他们就可以完全不记，或别有用心地略记。这，就是这些“大人物”、“中人物”、“小人物”的德性。

运用“三十六计”的高手

《市志》的编纂者及其支持和操纵他们的幕前幕后的大人物们，都不是等闲之辈，因此，他们为了对广西的文革进行“否定之否定”，把中国古代三十六计中的高招，运用得炉火纯青。

一曰瞒天过海

这三十六中的第一计，可以看作《市志》掩盖韦国清及其帮派势力文革罪恶的总计谋。在这个极大的欺骗与谎言之下，《市志》施展许多小骗术以实现他们总的战略目的；其他小计谋，都是为这个大欺骗服务的。这样一来，韦国清及其帮派势力在广西和桂林文革中的许多罪行，就被冲淡了，洗刷了，掩盖了。他们瞒不了全国舆论这个天，过不了广西十万文革冤魂的血海！

二曰无中生有

《市志》为了替韦国清及其帮派势力掩盖文革中的罪恶，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一丝不挂地捏造历史，企图把臭名昭著的重大历史事件，消泯于杜撰的文字之中。

例如：1986年8月20日发生于桂林市的重大事件“八·二〇革命行动”，是桂林市乃至全广西妇孺皆知的韦国清一伙武力镇压消灭“桂林老多”的血腥事件，据广西1987年官方根据“处理文化大革命遗问题”的资料所记：

“六八年八月初，广州军区在湖南衡山开了会，会议由黄永胜主持，广西军区吴华、桂林市人武部（政委）陈秉德、警司的景伯承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是落实‘七·三’布告，研究要出动军队，武装解放据点问题。

八月十七日，桂林军分区司令员景伯承在桂林步校主持召开了各县武斗民兵团负责人及县武装部第一把手会议。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吴华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他说：‘桂林问题肯定要解决。一小撮阶级敌人一定要搞干净。贯彻“七·三”布告抓两个关键：1、收缴武器。2、清理外地人员，对抗拒不交武器的要采取军事行动强行收缴’。桂林军分区政委慕石起也讲了话，他说：‘你们（指各县武斗人员）来桂取得了很大成绩，有很大贡献，坏人、坏头头、走资派、叛徒一个也跑不了’。八月十九日在‘一〇四’驻地景伯承、慕石起主持召开了十二县武装民兵团负责人会议，具体布置了‘八·二〇’行动，一〇四部队康凝副政委、地区革委常委张牧田等参加了会议。

八月二十日，以桂林地、市革委会和桂林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联合署名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中央七·三布告的公告》（简称‘八·二〇公告’），借口以解除武斗据点、收缴武器、清查外来人员，组织大规模行动。行动前，收缴了‘造反大军’的武器，绝大多数武斗据点已经解除，为对付‘造反大军’，由市革委会将‘联指’武斗人员为主体组编了二千多人的‘工人纠察队’……配备半自动等武器，纠察队主要负责人有市人武部科长王永清，工交部武装科干部郑国安等。‘工纠’武装人员、各县武斗人员，其它‘联指’成员以及反戈一击的‘造反大军’部分成员等共一万多人组编为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于八月二十日凌晨，进驻‘造反大军’控制的地区，实行大规模的搜捕。从八月二十日开始，接连好几天，除从据点抓人外，各单位‘联指’也分别自行抓人。因‘八·二〇’这个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行动，导致以后一段时间被抓、被打、被杀、被抄家、被错批错斗者约万余人。”

然而，《市志》却这样“编纂”：

“8月20日 桂林地、市革委会和桂林警备司令部、政治部联合签署《关

于进一步落实〈七·三布告〉的公告》。

8月21日 凌晨，市革委会指挥‘工人纠察队’及‘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强行进驻‘造反大军’控制的据点。”

“八·二〇行动”，就这样被《市志》抹杀掉而变成“八·二一行动”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黄永胜亲自策划指挥、由韦国清一伙执行的武装镇压一派群众的罪行，就这样被《市志》掩盖过去了。这是最明目张胆的无中生有伪造历史！)

三曰假痴不颠

《市志》的编纂者这些假装的政治痴呆者们，他们对在桂林发生的许多文革大事，装聋作哑，不提不记，企图让时光来淡化和淹没那些曾叫韦国清者们做噩梦的文革罪恶历史。君若不信，请看下面的事实：

1966年的假痴不颠

(以下均引自桂林官方有关资料。这些资料虽不完全，也存在诸多有意的错误，不过用它们来对照《市志》有意的错误，更能说明问题)

(一)“七月四日，区党委作出决定，对张云莹(师院院长、代党委书记)、陆文中(院党委副书记)、吴元庆三人以镇压‘文革’为名，令其停职反省。”

(二)“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下午，区党委第二书记乔晓光在师院礼堂召开的全体师生员工动员大会上宣布：黄云、徐为楷犯了所谓方向路线错误，区党委决定并经中央批准，撤销黄云市委书记和徐为楷副书记兼‘文革’组长的职务。”

这些算不算在桂林发生的文革大事？《市志》为什么不记呢？因为韦国清文革初期在桂林犯的错误更加严重，如果记他们的事那么韦国清干的事要不要记呢？而且，对上述领导干部的处分，都是区党委决定的。这样人们就会问：这些干部所执行的，其实都是韦国清当时的指示，结果韦国清没事！他们不是成了替罪羊吗？答案，还是让韦国清自己来作吧——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我回到桂林……对于敢想、敢闯、敢于向区党委、市委的错误开火的革命小将……极错误地认为他们是受坏人背后操纵，在‘闹事’。于是，我提出要要对要害部门加强警卫，在机关、工厂成立赤卫队。防止红卫兵冲击。把革命小将视同洪水猛兽。我还请桂林步校派出宣传车……是把矛头指向头一天上午游行的桂林‘老多’，起到了挑动群众斗学生的作用。特别严重的是，当我听到一些片面的、尚未证实的汇报后，更加害怕群众，害怕坏人钻空子，煽动‘暴乱’。八月十九日、二十日两天，先后调动几个连队，集结在郊区桂林步校，加以防范……是极端错误的。”(摘自韦国清的书面检讨)(未完待续)

2010年6月1日

1967年的假痴不颠

(一)“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造反大军’连续三天在桂林市体育场召开几万人大会批斗韦国清、黄云等一批区、市领导干部。批斗大会由黄沃南(师院学生)主持，在批斗中给韦国清和地市领导干部挂了黑牌，戴了高帽，有些被斗者还要下跪。当时被批斗的还有：区党委书记贺希明，桂林市委副书记刘竹溪、徐为楷，桂林地委书记王祝光、副书记李云亭，区党委派来桂林市的‘文革’顾问林中等一批领导干部。……批斗后，数十辆载人汽车进行大游斗，韦国清同志还披着用‘工人赤卫队’和‘红旗红卫兵’的袖章缝制的衣服坐在第一辆汽车上。”

这不明显是“桂林老多”的错误吗？而且还记下了“国清同志”被批斗游街的情形，《市志》为什么不采用呢？网友，这里有个大玄机：因为韦国清在1968年以后，对反对他的大批区、市领导干部，批斗的规模还要大，斗得还要惨，不仅是挂黑牌、游街、罚跪，而且是毒打、多年关押迫害等等。所以不提不记为妙。

如何评价桂林文革中对立两派的行为？笔者认为从整个组织来说：因支持韦国清而最后全胜掌权的“桂林联指”是犯罪；因反对韦国清而最终被武装消灭的“桂林老多”是犯错误。首先要弄清“犯罪”与“犯错”的实质区别，就好回顾桂林文革这段历史了。

（二）“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桂林市‘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红卫兵》编辑部就南宁‘文化大革命’局势发表严正声明，最先提出‘打倒韦国清，解放全广西’的口号。

四月十九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伍晋南、贺希明等认为韦国清在‘文革’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站出来支持‘红卫兵’的‘革命’，反面躲起来，让下级干部受冲击。于是他们发表了关于打倒韦国清的《四·一九声明》。

同月二十四日，桂林市委副书记王同连，监委副书记许正义，监委委员邵永清等三十多名部、委、办局以上领导干部先后发表了支持《四·一九声明》的《四·二四声明》。宣布打倒韦国清。

五月十八日，桂林市‘五四铁笔’、‘拼刺刀’等组织串联成立“桂林市红色革命造反司令部”。晚上在市灯光球场召开批判‘刘、邓、陶’大会，提出‘支持韦国清’的口号，得到一〇四、七〇一、三〇一等驻桂部队和军分区、市人武部的支持。”

上述这些桂林市的文革活动，也不能说不是大事吧？《市志》为何不记呢？恐怕至少有两点原因：

1、《四·一九声明》揭露韦国清在文革初期，为了逃避第一把手应负的责任，让下面的干部去挡红卫兵的冲击（如在南宁的区党委第一书记伍晋南、桂林市长冯邦瑞副书记王同连等，日夜受到红卫兵的冲击而苦不堪言），他找却地方躲藏起来，出了问题，就把责任推给下面。如韦国清主持的区党委，把奉命在第一线与学生周旋的桂林市委书记黄云、副书记徐为楷撤职就是例子。《市志》如记了这些，岂不是揭了韦国清的短吗？

2、广西的干部和群众，在“打韦”和“支韦”这个问题上，分裂成水火不相容的两派。作为广西第一把手的韦国清，本应该是广西的“全民领袖”，对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应该“一碗水端平”，特别对那些因为对自己有意见而反对自己的群众，应该包容和爱护，不应有亲疏之分，更不该视若仇敌。可是韦国清却反其道而行之，秋后算帐，对仅因为观点不同的“打韦”派进行大屠杀！趋炎附势的《市志》编纂者，当然不会像史上公正的史官面对皇帝的屠刀秉笔照记！

（三）“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上午，桂林地、市‘造反大军’，师院‘老多’及六九五五部队共七万多人，其中部队全体人员及部分‘造反大军’人员荷枪实弹，全副武装，在市人民体育场集会，隆重庆祝毛主席在首都天安门城楼首次接见百万‘红卫兵’一周年大会，会后举行了武装游行。”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驻军六九五五部队与地、市‘造反大军’举行所谓‘拥军爱民’的武装游行，部队中共有六十门大炮（还有若干辆坦克——笔者注），一百四十辆汽车满载全副武装人员，军民互相呼叫：向六九五五部队学习！致敬！向桂林地、市‘造反大军’学习！向桂林‘老多’学习！坚决支持保卫桂林‘老多’等口号，这次游行加深了两派对立和支左部队之间的分歧。”

上述行动，是“桂林老多”及支持“老多”的 6955 部队的错误，因为当时已经在桂林市掌权的“桂林老多”，不应该显示武力和准备以武力压制“桂林联指”。

《市志》为什么不记呢？因为如果记了支持“老多”的 6955 部队武装游行，那么，驻桂林的空七军部队、104 部队、桂林市人武部，在 1968 年“八·二〇行动”之时，不是武装游行，而是出动全副武装的连队，镇压“老多”和支持“桂林联指”乱抓人，乱打人，乱杀人记不记呢？

（四）“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桂林‘造反大军’共三万人，在市体育场召开了‘强烈抗议桂林“联指”破坏《十条协议》的大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途经市委大院‘联指’据点南面围墙边时，游行队伍中有数人被‘联指’从墙内扔出的砖块打伤，顿时队伍起哄。一些人涌进九九分队驻地，想通过九九分队翻墙冲进市委院内。被九九分队武装人员阻拦。

游行队伍进入警戒线后，九九分队有的战士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机床厂王占金、二运公司赵巧苟、毛巾厂刘锡光三人，打伤数人，游行队伍迅速撤离现场。”

“人命关天”，这个可以说是“天”上加“天”的大事，总该记下来吧？不能，因为《市志》的大手笔们知道：记了打死三个人的事，那么后来打死十个、百个、千个人的事，记不记呢？所以他们拿定了主意：关于打死人的事，统统不记！

1968 年的假痴不颠

（一）“一九六八年二月上旬，灵川县‘联指’总部酝酿要武力拔除另一派群众组织占领的大面墟据点，并派人到桂林市‘联指’总部联系求援。市‘联指’主要负责人曹铁军、李年生、曾明轩答应派人支援。

二月二十六日下午，曹铁军等人带领市‘联指’武装人员乘两辆汽车到达灵川，并参加该县‘联指’总部召开的战前会议，会上决定由市‘联指’主攻，县‘联指’配合。

二十七日凌晨，各路战斗人员分别进入阵地，武斗至天亮前结束，‘联指’攻占了大面墟据点。

这次武斗‘造反大军’被打死七人，重伤二人，灵川县‘联指’被打死一人。”这个事件为什么不记？因为是“联指”进攻打死人的。

（其实“大面事件”远比上面的官方记载要惨得多，如在这次武斗中，“桂林老多”的组织“工总”“警卫师长”周荣生和“工总”中层头头冯善春被俘后，周被用开水活活烫死，冯被用两尺长的竹钎从肛门钉入而死，所以他们的尸体被运回“工总”的据点市工人文化宫后，那惨状激起死者家属和“工总”普通群众的愤怒，酿成了活活打死三个“联指”无辜成员的悲剧……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留待以后慢慢说吧。）

（二）“六月十二日，‘联指桂保总’在南站对面东方红饭店语录牌楼建立了一个专门关押人的‘看守所’（监狱），把抓到另一派群众组织的人员及一些所谓五类分子关押在‘看守所’内，先后关押二百五十八人，其中被迫害至死三十五人，致伤七十五人。

平乐武装人员先后攻打桂师、榕湖饭店时，被打死十二人。

七月十四日上午，将被打死的尸体运至桂林玻璃厂停放，平乐武斗人员前往悼念。九点钟左右，卢红光、林海、李绍邦等二十多人，冲进‘看守所’对被关押的人乱打一通，文化局副局长郭文刚等人被打得头破血流。于同日中午，平乐

武斗人员廖德权、伍学强、林海、廖昌辉、侯永成、唐桥生等二十四人冲上楼，将被关押人员唐跃武（桂林针织厂职工）、侯霉（插青）、李江（汽配厂职工）、白先德（棉纺厂职工）、马震鹏（桂林二中）、秦恩深（兽医站）等十二人拉到桂林十一中对面的树林里，三人一群、五人一堆，先向他们拳打脚踢，用枪托猛击，用刺刀乱刺，然后集体枪杀。”

（三）“七月九日至十五日，在齿轮厂的‘联指’成员刘若忠（武斗副连长）、莫敬祥（‘联指’总部常委）等策划组织下，先后由魏日勋等人枪杀了该厂党委书记王伟、副厂长段明池、施工员朱信元、车间主任苏华祥和霍冠南（国民党起义将领，特赦人员）。

（四）“六八年六月份，自治区政协委员刘介和马车社社员蔡振华（‘联指’成员），同住桂林中山南路一百四十九号一栋楼。

六月二十日左右，蔡振华的一条小狗从二楼掉到楼下，蔡认为是黄剑珍（刘介的儿媳妇、刘忠汉之妻）有意将其狗丢下楼的，两人争吵起来，在旁的邻居李雄坤说“一条小狗有什么了不起”，蔡说：“打狗就是欺主”，并咬定狗是剑珍丢下的，对黄、李怀恨在心。

七月二十三日，蔡振华以抓所谓国民党残渣余孽为名，指使申松华等人，将刘介、刘忠汉、黄剑珍、刘颂平（刘介之孙）、李雄坤抓走。

二十四日上午十一时，蔡振华强行将刘介等五人拉到桂林造纸厂后面，用冲锋枪将他们杀害。该犯长期逍遥法外，直至一九七九年才被逮。八〇年十二月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报高院批为有期徒刑十二年，最后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才判处死刑。”

（五）“一九六八年六月十日、十九日、二十六日、七月三日、二十四日，‘联指’先后用高射机枪、追击炮、无后座力炮轰击解放桥，打死三十余人，打伤数十人，仅七月二十四日下午就打死泥湾街下河洗澡、洗衣服的群众二十二人，打伤数十人。

这些血淋淋的大事，《市志》自然不会记，因为上述所记，都是支持韦国清的帮派势力草菅人命的罪恶！

（六）“八月二十九日，市人武部政委、市革委会副主任陈秉德在工人电影院召开的一次市直机关干部大会上公开号召全市人民行动起来，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刮十二级台风。”

1968年8月20日这一天，“桂林老多”这个群众组织，虽然被武装消灭了，但对其成员及支持者的批斗、游街、关押、杀戮才刚刚开始，因为“八·二〇革命行动”不是一天的行动，而是持续一个多月的行动。

（七）“八月三十日举行了全市性的大游斗。”

（八）“九月一日至二十日，市革委会、师院驻军对地市‘造反大军’中的邓铁桥、许瑞林、鲁鹤松、于文杰、张树枝、余有壬、邓井发（专署农委干部）、诸葛军（专署外贸局干部）等十二人以混进群众组织里的‘阶级敌人’罪名，在师院进行‘活人展览’。”

网友：“活人展览”这件事，不是发生在欧洲的中世纪，也不是发生在中国古代！在人类已经进入文明的时代，竟有拿活人（不是野兽）展览的怪事，算得上骇人听闻吧？拿活人展览，不是个人的行为，是当时的权力机关——市革委会和当地驻军组织的，他们如果没经过“广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韦国清的批准，敢这样干吗？

（九）“九月二日，‘联指’市直机关‘七·一’总部，对市直机关不同观

点的另一派头头、群众和一些领导干部进行全市游斗。被游斗的有许正义(市监委副书记)、邵永清(监委委员)、王仁武(经委副主任)、蓝守贞(财政局长)、李新(市税务局长)、崔耀华(市财办副主任)、郭文刚(文化局副局长)等一百多人。以各种罪名,戴高帽、挂黑牌、反手捆绑,先是跪在盐业站院内,不少人被打,然后押上汽车,由“工纠”武装看押,沿街游斗,游斗途中许多同志被观看的所谓“革命群众”打得头破血流,鼻青脸肿,有的被打伤致残。”

(十)“九月二十七日,地、市革委会在市体育场批斗了王同连、许正义、杨德华、吴腾芳、王祝光、陈基义、陆文中、崔耀华等一大批领导和另一派群众组织头头,给他们挂上‘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坏头头’、‘反革命’、‘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反共老手’、‘三反份子’、‘国民党残渣余孽’、‘牛鬼蛇神’、‘翻天右派’、‘地主分子’、‘地主仔’、‘资本家’、‘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小爬虫’、‘政治爬手’、‘黑手’、‘黑后台’、‘黑高参’、‘黑干将’、‘牛鬼蛇神总后台’、‘反革命两面派’、‘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杀害贫下中农的刽子手’等各种罪名黑牌。”

下面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游斗中,任意打死人枪毙人的几个例子:

(十一)“‘八·二〇’以后,不仅搞了几次全市性的大游斗和批斗会,各系统、各单位也纷纷组织游斗和批斗会,有的人在游斗、批斗中被打伤致残或打死。如染织厂副厂长陈华、市体委教练汪成竹就是八月三十日的全市性游斗时被活活打死。”

(十二)“九月四日,专区食品公司游斗车开到北门食杂仓库门口时遇上兴安县‘卫革指挥部’组织来桂收尸(武斗时被打死的)的一伙人,他们不问情由,手持棍棒、石头、鞋子等物,爬上汽车,乱打乱砸被游斗的同志,并边打边喊:‘打死这些国民党残渣余孽’,‘为亲人报仇’,‘推下车打’,此时,兴安中学学生蒋孝生手持‘五四’式手枪,朝着被推下车的游斗对象连续开枪射击,直至打完弹夹内七发子弹为止,将被游斗的‘造反大军’成员林伟(公司业务员)、张少钧(统计员)、苏秋枫、王修澡(业务员)、马洪光(物价员)、黎光录(统计员)六人杀害。

凶手蒋孝生,当时二十岁,广西灵川县甘棠公社灵保大队元村人,一九七〇年应征入伍,一九七一年一月,因文革杀人问题暴露提前退役。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入党,后被提为灵保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大队长。”

(十三)“九月十三日下午,市二建二〇一工区在乐群小学操场召开批斗大会,会议由‘联指’头头李良佑(工区工人)主持,阳春辉(工区工人)宣布了肖菊生、锁成林、段辉余、李元禄、胡际生、粟定芬(均系该工区工人)等人的所谓‘罪行’材料,然后由该公司武斗人员李友和(人保干部)、黄广依、韦锦沅、王日光、许汉生(均系工人),将肖菊生等六人押到染织厂门口桥边,由韦锦沅、李和、李元禄等枪杀了。王日光完成了维持杀人现场秩序后,还对六具尸体补了枪。”

(十四)“九月十五日,为纪念‘白沙事件’一周年,雁山‘联指’头头秦宗德(雁山机械厂工人,雁山地区‘联指’总指挥)、文华钧(植物研究所研究实习生、‘联指’宣传部长)、莫志文(雁山公社秘书、‘联指’副总指挥)、李国荣(公社兽医站长、雁山‘联指’总部常委)等人策划,经请示万春桥(雁山公社武装部长)同意,召开批斗会,会后在雁山农科所路口南侧集体枪杀了‘造反大军’成员吴全仲(植物研究所食堂管理员)、腾秀山(植物研究所技术员)、马崇义(植物研究所研究实习生)、秦继诚(植物研究所工人)、孔庆柳(师院学生)、白胜山(桂林地区劳动大学学生)六人。”

(十五)“九月中旬的一天上午,雁山公社兴隆、罗安、枫林三个大队联合在良丰农场二队大草坪召开批斗大会,以熊德喜、熊绍海、秦税次、黎六弟、秦贵保、熊税喜、秦天忠(均为农民)、熊詹月(地主)九人参加“反共救国团”为由,决定对他们枪杀,另外还决定枪杀罗安大队的葛新荣(家庭出身地主)。会上秦贱贵(兴隆大队支部书记),葛连才(罗安大队支部书记)先后讲了话,尔后,由良丰农场机务科副科长齐秀贵和刘双发、刘春成、葛石保、葛秋生等(均为罗安大队民兵),在良丰农场二队猪场旁边,对以上十人执行枪杀。”

(十六)“据市革委会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向自治区的汇报中说:从‘八·二〇’到‘九·二〇’的一个月内,被当时的所谓群众专政,打死九十多人。据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调查统计,‘八·二〇’以后至六八年底,被乱抓乱杀死一百六十人,批斗游斗死九十四人,自杀九十一人,总计为三百四十五人。至于各单位私设‘公堂’,随意关押、拷打、批斗这种现象就延续得更长。”

1974年至1978年的假痴不颠

《市志》在1974年的文革大事记中,记载2月9日,市委召开大会动员“批林批孔”后写道:“运动期间,有些人被定为‘反革命分子’而遭拘捕判刑。1983年1月平反。”

这是指代不明,让人费解,不知所云的记载。不是编纂者们文化水平不高,是他们继续使用假痴不颠的计谋,企图用两句话,来掩盖发生在桂林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案”,即“张雄飞反革命集团案”、“七四专案”(下简称“张案”)。

为何说这个冤案是个大事件?理由如下:

一、这是个广西最高等级的“反革命集团案”

(一)1974年4月8日,当桂林市张贴出第一张揭露广西和桂林文革罪恶的大字报,韦国清主持的广西区党委,即视其为最危险的阶级斗争,桂林市委即“报请区党委批准,定为‘反革命案件’,并由区党委主管,报公安部备案,区公安厅派人参加,市委书记钟枫挂帅,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副书记分管政法工作的潘树彬同志具体负责,市公安局副局长吴务群协助。下设材料组、专案组、接待组(三个专案组,竟有一百多人——笔者),区公安厅三处处长李良参加材料组工作。市公安局的刘祉高、苏忠民、罗旺生、刘根生等同志组成专案组。每个专案对象配备三至五名专案人员。”(引自市整党办文字)

(三)韦国清亲自抓“张案”的查办。1、桂林市委每天都要向广西区党委汇报桂林大字报活动的情况;2、韦国清亲自主持办理这个案件,例如1975年4月,韦国清听了桂林汇报写大字报活动情况,便明确指示:“张雄飞一定要抓起来!”(摘自桂林市委“七四专案”办公室向区党委的汇报记录)于是,“张案”的23个主要成员便陆续被逮捕。

(三)1975年7月15日,“张案”成员全部被捕后,7月16日,市委、市革委在市中心体育场,召开有各基层负责人参加的万人大会,宣布“破获了一个建国以来桂林地区最大的反革命集团案”。

二、将“张案”与批邓小平及“四人帮”挂钩

(一)1976年7月,在广西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中,称“张案”成员是“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和依靠力量”,并编成“罪行”材料发全广西批判。同年7月下旬,在桂林组织了三场万人以上的批斗大会后,又在市中心体育场,召开了四、五万人的宣判大会。分别对“张案”的四人(龚

志明、张雄飞、许瑞林、黄锦祥）判处“死缓”等重刑。“张案”还有四名成员被另外宣判有期徒刑。其余成员，继续关押。此外，还有成员陈壬午被刑讯逼供死在柳州铁路局看守所。

（三）1977年元月，“张案”又被和“四人帮”联系起来，说“张案”成员是“‘四人帮’的别动队——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又把“罪行材料”印发全自治区批判。广西在批“四人帮”联系实际“三清查”时，清查的第二个内容就是“清查与张雄飞有关系的人和事”。

（四）从1974年4月起，至1978年12月止，在桂林和全广西对“张案”的迫害和批判斗争，长达四年半之久。

三、对“张案”进行全市性的批判斗争

（一）自1974年4月8日桂林出现第一张大字报起，桂林市委市革委，就把“张案”当作全市头号阶级敌人，利用党权及政权，召开各种会议，举办各种学习班，强迫各行各业人人“与‘张案’划清阶级界限，都要对‘八·二〇革命行动’表态”。

（二）从1975年7月至1978年12月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里，多次召开万人大会及其他大会，对“张案”进行批判斗争和清查。

1、因为1975至1977年9月以前，桂林没有市报，所以无法查证在这段时间里，召开了多少次批判“张案”的万人大会。但仅在1975年7月里就有三次以上，另从《广西日报》的报道中，也可见此前桂林召开批判“张案”的万人大会不止一次。例如1977年5月15日，《广西日报》第一版头条在通栏大字标题《桂林军民举行大会，深提狠批“四人帮”插手广西的反革命罪行》报道：“【桂林讯】……最近，桂林军民五万六千多人举行大会，愤怒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别动队——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的反革命罪行。”

2、1977年9月29日，在《桂林战报》的创刊号上，以头版头条大字标题《市委召开大干一百广播大会》，报道了市委书记郭鹏的报告摘要：“……深入地系统地批判‘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张雄飞一伙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切实解决好对‘八·二〇’革命措施的认识和态度，彻底清查与‘四人帮’、张雄飞等几个反革命分子和冯邦瑞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

3、1977年10月22日《桂林战报》头版头条通栏大字标题《市委召开了全市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深入揭批‘四人帮’经验交流大会》，报道十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中共桂林市委召开“经验交流”大会，市委副书记潘树彬作报告，市委书记郭鹏讲话。报道强调：“大会指出，揭批‘四人帮’，一定要联系我市的实际，揭批‘四人帮’在桂林的别动队张雄飞等几个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批判冯邦瑞（原桂林市市长）同张雄飞几个反革命分子、同冯邦瑞彻底划清界限。”

4、1977年12月10日，《桂林战报》头版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打好第三战役，推动全盘工作》，号召：“批判张雄飞一伙反革命分子妄图打倒区市领导干部的罪行……”

5、1977年11月15日，《桂林战报》头版头条在通栏大字标题《联系实际揭批“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夺取揭批“四人帮”伟大斗争的彻底胜利》下，整版报道桂林市委于11月12日，召开批斗冯邦瑞一万五千多人的大会，市委副书记潘树彬在讲话中还“指示”：要“充分揭露张雄飞、许瑞林等几个反革命分子在批林批孔期间挑起的事端”。

6、1977年11月19日，《桂林战报》头版头条通栏大字标题《部署打好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报道桂林市委于11月15日召开大会，号召“还要联

系揭批张雄飞一伙反革命分子妄图打倒区、市党委革命领导干部的反动言行”。

7、1977年12月21日,《桂林战报》在头版通栏大字标题《镇压阶级敌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下,报道桂林市12月18日召开三万多人的公判大会,判处了文革中的“桂林老多”派“工总”的第一负责人刘天偿死刑立即执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徒刑。在罗列刘天偿的“罪状”时诬蔑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一系列的严重反革命罪行,在关押期间仍坚持反动立场,继续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在一九七四年,与张雄飞等几个反革命分子勾结,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恶毒攻击市革委会贯彻落实‘七·三’布告所采取的革命措施,恶毒攻击中央和区、市党委领导同志,充当‘四人帮’的反革命别动队,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效劳”。

8、1978年1月30日,《桂林战报》在头版头条通栏套红大字标题《我市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先代会”隆重开幕》下,报道市委书记郭鹏作报告总结称:“与‘四人帮’、张雄飞等几个反革命分子和冯邦瑞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基本查清。以张雄飞、冯邦瑞为代表的‘四人帮’在广西桂林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 and 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严重破坏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受到应有制裁……对‘八·二〇’革命行动的认识基本统一。”

9、1978年5月29日,《桂林战报》一版通栏大字标题《大张旗鼓地宣传学习新时期任务和新宪法》,报道中共桂林市委发出通知:“联系桂林市的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以及张雄飞等几个反革命分子和冯邦瑞的谬论和罪行。”

10、1978年12月8日,《桂林战报》头版头条通栏标题《市委召开基层领导干部会议传达区党委扩大会议精神,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分清路线是非,加强革命团结》又号召:“彻底揭批刘振林、刘天偿、张雄飞等几个反革命分子和冯邦瑞、王同连秉承林彪、‘四人帮’旨意,打倒革命领导干部,妄图篡夺区党委、市委领导权,破坏社会法制,大搞打砸抢罪行……”(王同连:文革期间任桂林市委副书记——笔者注)

11、《桂林战报》除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许多批“张雄飞和那几个反革命分子”的报道外,还在第二、三版,发表了大量各党政重要部门,如法院、公安局,宣传部,以及全市诸多大小企事业单位对“张雄飞和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的“革命大批判”文章。

12、还有各单位负责人在大会上对“张案”的“口诛笔伐”,小会上职工干部个人的口头发言批判(大多数人迫于无奈),这大概可以用百万次为单位来计算了!”

四、对“张案”进行全广西范围的批判

1、1977年1月,广西区党委下达三号文件,把“张案”定为“‘四人帮’别动队——桂林几个反革命分子”,并下令在全自治区进行“三清查”,即“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系的人和事、清查与张雄飞有关系的人和事、清查与冯邦瑞有关系的人和事。”与此相配合,区党委又把桂林市公安局铅印的机密材料《桂林几个反革命分子的罪证材料》,下发全自治区,进一步把对“张案”的批判斗争,扩大至全广西。

2、1977年1月16日,《广西日报》头版头条在通栏大字标题《认真学习毛主席〈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的重要讲话,深揭狠批“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夺取新的更大胜利》下,报道“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召开第十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区党委、区革委安平生、乔晓光、刘重桂、覃应机等负责人全数参加,大会罗织“张案”罪状:

“在批林批孔运动期间发生的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挑起的事端，就是‘四人帮’插手广西的严重事件，是他们在全国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几个反革命分子在‘四人帮’在外省的黑手指使下，打着‘反潮流’的旗号，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地疯狂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他们多次召开反革命黑会，四出搞黑串连，大量制造反革命谣言，书写反动文章、诗词和标语，发表反动演说，用最恶毒的语言、最卑劣的手段，咒骂和攻击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攻击敬爱的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无耻吹捧和美化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他们削尖脑袋，拼命向‘四人帮’递送黑材料、写黑信、告黑状；秉承‘四人帮’‘放火烧荒’、‘乱中夺权’的黑旨意，伙同‘四人帮’伸向外省的黑手，按照他们既定的‘四处冒烟，南北夹击’的反革命计划，建立反革命联络点，到处张贴、传抄‘四人帮’的讲话和伪造的中央文件，大造反革命舆论，大肆进行反革命煽动，妄图以攻击落实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在桂林采取的‘八·二〇’革命措施为突破口，把广西的大好形势搞乱，打倒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领导干部，以便取而代之，乱中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3、1977年2月15日，《广西日报》头版头条大字标题《深揭狠批“四人帮”插手广西的反革命罪行》报道：“桂林市五万六千多军民举行大会，桂林市、桂林地区、铁路桂林机务段、桂林驻军负责同志出席了大会。大会由桂林市委副书记陈秉德主持。工人、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的代表在会上进行揭发批判发言。中共桂林市委书记钟枫在大会上讲了话。”接着，长篇幅地报道揭发批判“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各种“反革命罪行”的内容。

4、《广西日报》还在同日第一版发表了“本报评论员”长篇文章《日暮途穷的挣扎》，对“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揭露和批判后还诅咒道：

“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为了搞乱广西，可谓千方百计，费尽心机。但是，违反人民意志，阻挡历史车轮，其结果必然是身败名裂。要乱广西是枉然。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三千多万广西各族人民，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团结战斗，粉碎了他们的阴谋。尽管他们嚣张多时，但却没有人跟着他们‘杀出来’，他们只落得‘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十分虚弱，十分孤立，无法挽救他们最后的灭亡……”

最后号召：“我区揭批‘四人帮’以及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已经普遍展开，但不能低估他们对广西的影响，还必须努力作战……旗帜鲜明地站在斗争的最前列，紧密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深揭狠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

5、在批判“四人帮”期间，《广西日报》多次在第二版、第三版整版刊登区直机关、各地、市、县及柳州铁路局“革命大批判小组”的大量批判文章，联系广西实际，对“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进行批判。

六、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批判“张案”

1、1977年“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写作组”，在《红旗》杂志第二期上，发表了题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文章，其中介绍了对“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坚决镇压的经验：“在批林批孔运动期间，‘四人帮’通过他们在外省的黑手，勾结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挑起事端，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党中央和敬爱的周总理，否定广西文化大革命的成就。

对于这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分子，我们坚决镇压，毫不手软。”

2、1977年5月21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发表了南宁市委书记郭耀卿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的发言，攻击“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四人帮’极端仇视广西的大好形势……批林批孔运动刚开始，他们就通过在湖南的黑手，指使桂林的几个反革命分子，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地进行反革命活动。”

七、一组官方资料

“一九七六年，把张雄飞等人说成是‘（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和依靠力量’。一九七七年又说是‘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组成部分，是‘四人帮’的别动队。”

“一九七七年区党委发出的三号文件中说：‘在批林批孔运动期间发生的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挑起事端，是“四人帮”插手广西的严重“反革命”事件，是“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在《广西日报》上登载了批判文章。”

“一九八四年元月五日，中共桂林市委作出关于为所谓《桂林几个反革命分子平反的决定》。同年三月二十三日，区党委转发了桂林市委《关于为所谓桂林几个反革命分子平反的决定》的通知，予以彻底平反。”

四曰釜底抽薪

《市志》在文革大事记中，对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也记了，但不记这个事件的主要过程及结果，大事化小，简而又简，以至于“名存实亡”。经过这样一番的乔装打扮，便把桂林和广西的文革历史，变也无害的历史了。这是“釜底抽薪”的高招。

1966年的釜底抽薪

一、《市志》记：“6月4日 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贴出批评院领导的大字报。中共广西师院委员会组织一批大字报加以反击。”

“处遗”后的官方有关资料（下简称“官方资料”）则记：“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师院中文系部分学生受北大聂元梓等人第一张大字报的影响，贴出了《李德韩副院长在‘文革’中充当什么角色？》为题的第一张大字报，轰动了全院。此后在院党委组织下，出现了一批反击大字报，开始产生了不同意见的对立。六月二十日，自治区党委派徐为楷（桂林市委副书记、市‘文革’小组组长）、申本田（区监委副书记、师院‘文革’工作队队长）为首组成‘文革’工作队进驻师院。此后对全市各中学和专科学校亦派出工作队。”

上述事件，是桂林市和广西“打韦”“支韦”两大派斗争的首战，它拉开了广西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具有标志性的影响及意义。《市志》对这个事件仅作略记，意义也非同小可，因为这样一来，对以后的文革大事件，都可以照此办理了。

二、《市志》记：“7月28日 中共桂林市委召开领导干部和‘四清’工作队队长会议，介绍广西师院‘阶级斗争’情况，并组织部分人员参观师院的大字报。”

官方资料则记：“七月二十八日，市委召开了全市各级领导干部和‘四清’工作队队长会议。介绍所谓‘师院反右不彻底’等阶级斗争情况，并组织工农群众、‘四清’工作队员、积极分子进师院参观大字报，通过参观，分析‘阶级斗争’形势，从此引起了工农群众和师生之间的对立，把“文革”引向社会。”

三、《市志》记：“8月5日 ‘文革’工作队撤出广西师院一些学生贴出‘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的对联。”

官方资料则记：“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党中央决定撤销大中学校的‘文革’工作队，师院内部多数派中的部分学生贴出‘送瘟神’的对联：‘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另一派学生强烈不满，社会上前往参观这副对联的人也越来越多。引起两派学生之间斗殴。至八月七日，共打伤十多人，当时称之为‘八·七’事件。”

四、《市志》记：“8月17日‘首都红卫兵南下串联队’到桂林市。”

官方资料则记：“八月十七日，第一批‘首都红卫兵南下串联队’到达桂林市(下称南下串联队)。从而桂林‘文革’的斗争更加激烈了。”“九月十日，由于出现‘南下串联队打人’、‘书国清同志被打’、‘黄赛阳被捕’等事件。大批‘工人赤卫队’、‘四清工作队’、机关干部参与围攻‘老多’师生和‘南下串联队’。南北火车站被‘工人赤卫队’封锁。当天抓了‘南下串联队’的张铁锚和张顺喜。九月十六日，又一批‘南下串联队’来桂时，出现了‘热烈欢迎南下串联队’‘南下串联队滚滚滚’等对立标语。九月二十日，区、市‘文化大革命’工作队正式撤出师院。”

五、《市志》记：“9月7日 11时起，部分红卫兵在中共桂林市委院内静坐绝食，抗议市委‘破坏文化大革命’。”

官方资料则记：“一九六六年九月六日，桂林市二十六所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和‘南下串联队’三十人向市委和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贺希明提出召开全市群众大会的三点要求（(1)大会由‘红卫兵’维持秩序；(2)市委在会上公开引火烧身；(3)黄云、徐为楷作检查）未获同意。于是从七日上午十一时宣布在市委院内静坐绝食，抗议市委破坏‘文革’。到九日静坐绝食的队伍扩大到七十六个单位，约三千多人，这次静坐共计六十二小时。”

1967年的釜底抽薪”

一、《市志》记：“8月13日 桂林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成员，包围二塘火车站及炸药库，抢夺武器。”

官方资料则记：“为了搞到武器弹药，对付‘造反大军’。逃离到外地的‘联指’成员与鹿寨、临桂、柳州等地‘联指’成员一千多人，于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突然包围封锁了二塘火车站和炸药库，并向炸药库发起攻击，打伤‘造反大军’十三人，撬翻铁路五十多米。”

“桂林‘联指’头头张燕生等十一人在二塘抢炸药未得手，于八月十五日拦截运粮汽车往龙胜方向行驶，至五通附近翻车，张受重伤，被“造反大军”的人抓获，十八日送‘一八一’医院治疗，于九月一日出院。”

二、《市志》记：“9月15日 桂林市一派群众组织和另一派群众组织在阳朔县白沙镇发生武斗，开枪打死2人，是为‘白沙事件’。”

关于“白沙事件”，官方1987年的资料所记与之大不相同：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桂林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贾洪起打电话给荔浦县人武部，要求流落到荔浦的桂林“联指”成员迅速回桂林‘抓革命、促生产’；并通知荔浦县从九月十四日起停止给桂林“联指”成员供应粮食等生活物资。桂林‘联指’成员为了得到粮食等物，以解决生计问题，九月十四下午七时许，桂林、阳朔、荔浦、雁山的‘联指’约四百人，全副武装，分乘十二辆大卡车，由荔浦、阳朔向雁山方向奔驰。

十五日凌晨与‘造反大军’驻守在雁山的下属组织发生了武装冲突，当场打死‘造反大军’下属组织及雁山镇小孩各一人，打伤数人，并占领了植物研究所、

劳动大学、粮店、食品公司、商店、战备物资仓库及邮电局等单位。清晨七时零五分，支持‘造反大军’的六九五五部队闻讯赶去，‘联指’撤退到白沙粮管所，部队继续追去，武装冲突开始后，雁山、荔浦、阳朔等地‘联指’武斗人员陆续赶来支援，这时六九五五部队相继拉来了四门大炮，二辆坦克，增援了三个连的武装兵力。前后共出动汽车四十八辆(小吉普五辆、解放牌四十三辆)和摩托车十多辆。

下午六点，这些‘联指’成员在当地‘联指’人员的掩护下全部撤出了白沙。六九五五部队及‘造反大军’也相继撤走，结束了这场武装冲突。

此次武装冲突事件，‘联指’死七人，伤三十人，解放军死一人，‘造反大军’死一人，雁山镇死一小孩。”(“解放军死一人”为 6955 部队一个班长——笔者)这是一条还运用偷梁换柱之术混淆是非，为支韦派“联指”掩盖文革罪行的记载。至少有三个问题：

1、发生武斗的地方不是“白沙镇”，是“雁山镇”。这制造的“笔误”，用心耐人寻味！

2、不说明武斗的两派组织名称是桂林“联指”和“造反大军”，意在掩盖此次武斗的始作俑者责任。

3、不指出“开枪打死 2 人”者是谁，所以这又叫作借刀杀人！

1968 年的釜底抽薪

一、“武斗”的成因、性质、责任

1968 年发生在桂林市的大规模“武斗”，是桂林文革最大事件。广西经过 1983 年的“处遗”，区党委和党中央，已经对这场“大武斗”发生的成因、性质、责任等本质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结论。因此，为了证明《市志》的严重错误，有必要在就事论事之前，先重温当时的区党委报告及中共中央的批示。

(一) 区党委 1983 年 5 月 13 日，给中央书记处《关于对“七·三”布告重新认识及对外表态口径的请示》的报告全文：

“几年来，我们对‘七·三’布告问题，认识不一致，曾经由乔晓光同志请示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当时认为采取回避态度为好。现在，随着学习和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深入，许多重大问题联系到‘七·三’布告，干部群众要求答复这个问题。我们对‘七·三’布告进行了反复研究，认为当时中央发布布告是为了防止大规模武斗，但是布告本身确实存在错误，主要是把当时群众组织的一些严重错误行动，定为反革命事件，作为敌我矛盾；同时在执行上是根据这种错误的定性，号召‘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过后又调动了军队和武装民兵，镇压一部分群众，并导致大量乱杀人的后果。至于‘七·三’布告的形成，主要是根据当时广西革筹小组的报告，从现有材料看，当时支左工作有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报告本身带有片面性。所以‘七·三’布告发表后，即为派性利用，成为在几个城市、铁路沿线和一些农村乱打乱杀人的合法依据。在某些县和地方产生了有计划有组织大量杀人的事件。在组织路线上，在成立各级革委会时，把一些指挥和直接杀人的人，结合进了革委会，带来了一系列的不良后果。我区‘文革’遗留问题的严重性，与‘七·三’布告关系甚大。根据这些情况，我们认为应当把‘七·三’布告的问题按上述认识在适当范围内讲清楚是必要的。这样做，将有利于拨乱反正，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发扬党性，克服派性，正确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如需要继续回避提‘七·三’布告，那么对当时群众组织的错误行动定为反革命事件，调动军队、民兵镇压群众，也要讲清是错误的。以上意见

是否妥当，请速示复，以便在本月二十日召开的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会议上讲清楚。”

（二）中共中央对广西区党委《关于对“七·三”布告重新认识及对外表态口径的请示》的批复全文：

“五月十三日区党委《关于对‘七·三’布告重新认识及对外表态口径的请示》电悉。中央书记处原则同意你们来电中提出的意见。执行中有什么问题，望及时、慎重处理，并报告中央。”

我们可以根据区党委和中央的文件，弄清楚几个重大问题了。

（一）“武斗”的成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文革的整个过程中，广西对立的两大派的主要矛盾，是“支韦”和“打韦”。当这个矛盾激化到从量变到质变的时候，韦国清及支持他的政治派别，就把“打倒韦国清”的人，当作了“阶级敌人”；又因“军事是政治的继续”，当政治方式不能解决矛盾的时候，运用武力镇压不同政见者，就成为必选的手段。所以“武斗”，就在全广西境内发生了。因此对于“广西4·22”和“桂林老多”来说，不是想不想打仗的问题，而是韦国清通过他所掌握的群众组织“联指”以及各级人武部所指挥的民兵，已经对他们展开了全自治区规模的军事镇压了，也就是说“想要活命，必须抵抗”。这就是1968年广西“武斗”的起因。

（二）但韦国清要使广西的军事镇压合法化，就必须得到中央的支持，于是他在实施镇压的同时，通过所把持的区革筹，向中央谎报军情，所以才有1983年区党委报告中央的“‘七·三’布告”的形成，主要是根据当时广西革筹小组的报告，从现有材料看，当时支左工作有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报告本身带有片面性”一说。韦国清终于拿到“尚方宝剑”，《七·三布告》下达了。据此人们又有理由说：《七·三布告》，是韦国清策划制造出来的！

（三）《七·三布告》的错误，是“主要是把当时群众组织的一些严重错误行动，定为反革命事件，作为敌我矛盾；同时在执行上是根据这种错误的定性，号召‘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过后又调动了军队和武装民兵，镇压一部分群众，并导致大量乱杀人的后果。”

（四）现在可以给1968年的广西全境包括桂林的“武斗”重新定义了：既然是“调动了军队和武装民兵，镇压一部分群众”，那么被镇压的那部分群众——“广西4·22”和“桂林老多”的武装抵抗，也就不是“武斗”，而是“正当防卫”了。这就是广西“武斗”的性质。广西在1968年，根本就不存在“武斗”，存在的是军事镇压及由此而带来的血腥大屠杀！

（五）1968年发生在广西的人间悲剧，罪魁祸首就是韦国清。这是他无法解脱的历史责任！

二、《市志》的错误

（一）《市志》记：“5月初 两派群众组织分别占领据点，逐步形成以阳桥为界的南北对峙局面。”

在1968年的5月初，桂林对立的两派确实“分别占领据点”，但谁是主动先占的？谁是被动后占的？这里面却大有文章。

对此，官方资料有记载：“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上午，地区革委会成立。在市体育场召开庆祝大会，地市‘造反大军’未参加。当天，‘桂铁工总’负责人龚志明、地区‘造反大军延安总部’阎振声、翁泰元等人，与警司、军分区执勤人员发生冲突，被警司扣押。下午四时左右，‘造反大军’的‘地专延安总部’及‘桂铁工总’等组织上街游行，到警司门前静坐示威，并提出抗议，地、市‘造

反大军’也参加了这一行动。桂林两派围绕着一个‘权’字，在反对和保卫革委会的问题上，矛盾越来越大。五月三日“联指”发出《公开信》勒令“造反大军”静坐人员于五月四日中午撤出警司，否则，将采取最坚决的行动。五月四日‘造反大军’未撤出警司，‘联指’武斗人员便于当天带着背包集中于市委院内‘联指’据点，并抢占东、南、北门的制高点，‘造反大军’也相继占了市中心的制高点。”

“看官”，一派静坐示威，另一派则以此为借口抢占据点，其中的奥秘，不言自明了吧？

(二)、《市志》记：“5月17日~8月3日 两派大武斗，全市陷入混乱状态。”短短一句话，里面却藏有三十六计的“瞒天过海、釜底抽薪、笑里藏刀”等大学问！

1、这又是掩盖韦国清文革罪恶的典型例子。因为实际是军事镇压的桂林“大武斗”，是韦国清及其帮派势力一手制造的。这叫瞒天过海。

2、1968年桂林两派“大武斗”，打了近三个月，期间发生了许多大事件，《市志》却想用13个字轻轻带过。这叫釜底抽薪。

3、表面上看，《市志》两派都谴责，实际上“桂林老多”及数以万计的桂林人民群众，是这场军事镇压的受害者，却成了使“全市陷入混乱”的责任方了。这叫笑里藏刀。

官方资料是这样记的：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二日，地区‘联指’常委伊景春、唐廷国及桂林市‘联指’孙忠禄、张燕生等人在荔浦县召开十二县联合会议，会议由伊景春主持，唐廷国、张燕生在会上介绍桂林情况，呼吁各县行动起来，保卫地、市革委会，会议决定，每个县先派十名代表到桂林向驻军和地、市革委‘反映情况’，并发表‘联合声明’，造农民武斗人员进城有理的舆论。”

五月十三日晚，‘造反大军’负责人刘振林、周兆祥、孔宪才(齿轮厂干部)、戴明德等人在师院历史系刘振林的房间召开会议，会上分析了形势，确定了‘针锋相对，文攻武卫，立足于打’的方针，并提出了分为：防御、相持、反攻三阶段的‘红色山城保卫战’的作战方案。

五月、十四日至十五日，周兆祥等在师院召开‘工总’常委会，刘天偿说：‘现在联指占了那么多据点，我们只有打才有出路，只有打才能把主动权夺回来’。刘振林说：‘我们要先下手为强，在他们(指‘联指’)没有准备好之前，就把他们干掉。’

当天下午，‘造反大军’立即召开各武斗组织的领队会议，刘振林、刘天偿在会上作了武斗动员，并成立了以总指挥刘天偿、副总指挥周兆祥、地区干部邓井发、关伯岩为首的桂林地、市‘造反大军’文攻武卫总指挥部，刘振林是司令部成员。

五月十七日，地区‘联指’组织十二县的八十六名代表到达桂林。地、市‘联指’的负责人李年生、曹铁军、伊景春(地区干部)等人在东方红饭店接见了进城代表，并研究成立‘桂林战场前线指挥部’。

五月十九日晚，地、市革委会和驻军部分领导景伯承、吴新中、陈秉德、冯邦瑞等十七人在榕湖饭店小礼堂接见了十二县代表，接见中，市革委会副主任陈秉德对各县农民所谓关心桂林‘文革’表示感谢。市革委会副主任冯邦瑞发表不同意农民进城意见而受到指责。

五月二十四日，地、市‘联指’的主要负责人伊景春、唐廷国、轩凤欢、廖

祖迪、李年生、曾明轩、曹铁军和地区干部徐孝治在桂林饭店召开会议，研究组织各县民兵进城和筹集枪支问题。从六月四日起，在地区革委和桂林军分区的部分领导支持下，地区十二县人武部先后组织了约八千多名武斗人员(含各县人武部干部一百二十多人)进入桂林。为便于对各县进城武斗人员的统一领导和指挥，六月五日晚，地、市“联指”头头在东方红饭店开会，成立了‘桂林地区保卫革命委员会总指挥部’(以下简称‘桂保总’)，总指挥：曹铁军，副总指挥：曾明轩(兼桂北民兵师师长)、王荣(临桂)、董茂轩(荔浦)、邵连刚(阳朔)、李年生等，总政委：徐孝治，参谋长：丁绚(桂林百货站党委书记)。

同日发表了关于要‘坚决消灭桂林地、市“造反大军”一切“反革命武装”，桂林“造反大军”必须无条件地向“桂保总”全部缴械投降’的通令。

六月六日，‘造反大军’刘振林、孔宪才(齿轮厂干部)等人在师院办公大楼召开‘文攻武卫指挥部’成员会议，分析作战形势，会议决定趁各县‘联指’武斗人员刚刚进城立足未稳，打他个措手不及。

‘工总’为了适应武斗的需要，于七月十八日将原‘工总’小分队扩编为‘工总四野’，其领导班子：司令员刘天偿，副司令伍奕仟(交通局保修工人)，政委唐玉星(工具厂工人)，副政委刘重喜(市公共汽车公司职工)等。

桂林两派经过策划，在人员组织和武器上作好了准备，拉开了大武斗的序幕，武斗中大致有以下几个较大的行动。

1、抢占据点

‘联指’在五月四日下午四时首先抢占了阳桥头原榕城饭店(‘大联委’所在地)、食杂第六门市部、中医院、南面的东方红饭店、桂林饭店、北门的百货站办公大楼、地区农械厂、北门粮库、东面的桂林印刷厂。接着，‘造反大军’也相继抢占了市人委(即市革委会所在地)、专署大楼、红星印刷厂等据点之后，并多次主动进攻“联指”据点。

五月十六日晚，由戴明德率领七十余人，乘夜暗潜入预定位置，先用炸药包将百货站办公大楼炸开了两个大洞，尔后向大楼发起冲击，‘联指’成员何嘉荣、杜修柱、军管战士谭绍宏被打死，打伤多人。

五月二十四日早上六时许，‘造反大军工总’武斗人员分别使用定向炸药包、轻重机枪、冲锋枪等武器向地区农械厂“联指”据点发起进攻，武斗中，双方各死二人，并打伤一名驻厂的解放军战士，炸毁厂内一些建筑物。

五月二十七日，刘天偿召集本派负责人在师院办公楼研究攻打房地局‘联指’据点问题，并成立了前线指挥部，指挥部设在艺术馆，五月二十九日拂晓五点，在刘天偿等人指挥下，‘工总’向房地局‘联指’据点发起进攻，发射炸药包二十个(炸响十个)，炸毁民房一间，压死房内市民二人，炸伤三人，打死‘联指’武斗人员一人，并占领了房地局据点。

六月五日，‘造反大军红卫师’在刘振林、刘天偿的组织指挥下，向‘联指山鹰’据点榕城食杂门市部和‘五四铁笔’据点榕城饭店进攻。用炸药包炸塌了榕城饭店的一角，武斗中‘联指’伤亡十多人，‘造反大军红卫师’伤亡三人，师长戴德明被打死。

为切断‘联指’的南北交通，‘造反大军’刘天偿、谢荣杰、周兆祥、刘振林等人经过策划，在刘天偿、谢荣杰、孔宪才等的指挥下，于六月九日、十日、十二日三次派唐品端(玻璃厂工人)等八人炸毁了德智桥和新桥。

2、甲山伏击

六月上旬，桂林市区武斗日趋激烈，市内交通断绝，市西郊甲山公路成为南

北运输的主要交通。‘造反大军’负责人刘天偿获悉“联指”汽车频繁往返甲山公路运送人员、物资。为了配合‘造反大军’北面武斗，决定派人前往伏击，伏击中，打翻汽车一辆，打死对方十一人，重伤四人。

3、攻打榕湖

六月十二日下午三时，桂林‘联指’武斗人员、‘五四铁笔’和荔浦‘联指’武斗人员，在曹铁军、丁绚、孙忠禄等人的指挥下，向榕湖饭店发起攻击，于当天下午六时结束，武斗中打坏了一些建筑物，‘联指’被打死三人。

七月十三日，临桂、平乐、全州‘联指’武斗人员再次攻打桂师和榕湖饭店，平乐县武斗人员被打死十二人。

七月二十三日早上，永福、平乐、龙胜‘联指’武斗人员及‘五四铁笔’部分武斗人员，在徐孝治的指挥下，又一次攻打桂师、榕湖饭店，武斗中，永福死七人，龙胜死二人。

4、争夺北门

六月九日上午，‘造反大军’刘振林派出部分武斗人员到北门贮木场附近的铁路叉口打伏击，打翻‘联指’汽车一辆，打死四人、伤多人。随后又由刘振林带队打虞山，刘天偿、伍奕仟、邓井发负责打观音山，周兆祥指挥打北门。

六月十三日，全州、灵川、兴安等地“联指”武斗人员，在曾明轩、蔡辉龙(全州)等人组织指挥下，向‘造反大军桂铁工总’的北站据点发动进攻，在炸药包、迫击炮的轰击下，炸死在防空洞内躲武斗的群众五人，抓走从防空洞逃出的六名职工家属，到地区林业局后将其活活打死五人。

六月十四日，‘造反大军’刘天偿、伍奕仟、汤其新(市政工程处职工)带领武斗人员从甲山村出发，偷袭了机械厂、铸造厂和冷冻厂，占领后，刘天偿指挥用炸药包向三机床厂宿舍和百货仓库“联指”据点轰击，致使百货仓库爆炸起火，大火连烧三天，烧毁库房五栋，损失五百四十余万元。双方激战后，七月十三日凌晨，‘桂北民兵师’的武斗人员向地区贮木场、气象站、外贸仓库、桂北铁路高站台、化工原料仓库等目标发起进攻，化工原料仓库内的氯化汞、松节油、松香、油漆等易燃物资被击中起火，大火燃烧了两天两夜，损失数十万元。

5、南北夹击

六月二十日，‘桂保总’在五一饭店召开南北武斗指挥人员会议，会议由曹铁军、徐孝治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曾明轩、唐廷国、伊景春、廖祖迪(地区干部)、丁绚、李年生等及各县武斗人员负责人，会议主要研究对‘造反大军’进行南北夹击，缩小包围圈的作战部署。

六月二十二日，南片‘联指’首先打响，曹铁军、徐孝治、丁绚亲自指挥市‘联指’武斗人员，临桂、平乐县‘联指’武斗人员攻打桂师和榕湖饭店，双方先后争夺了三、四次。另在西山一带，双方争夺山头，反复激战。

北片，由曾明轩、李年生、唐廷国指挥桂北各县武斗人员，于二十三日凌晨五点向北站、虞山庙和二级站等处发起进攻，双方进行了反复的争夺，‘联指’一度占领了观音山和虞山庙等据点。

六月二十四日，‘造反大军’召开了紧急会议，提出一定要夺回北门一带，解决粮食问题。当晚，由刘天偿、伍奕仟等人带领‘造反大军工总’小分队向观音山‘联指’据点发起进攻，经过一天两夜的激战，最后在炮火的掩护下，攻下了观音山。唐兆瑄等人带领‘造反大军红卫师’向虞山庙发起进攻，于二十六日天亮时占领了虞山庙和面粉厂。

六月二十七日，刘振林等人带领‘红卫师’相继攻占了第一粮库和盐仓，共

夺得粮食二千多万斤。

北片‘联指’由于打了败仗，丢了四个据点，伤亡较大(死亡一百零一人)，二十八日，全线退到水电设备修造厂至灵川县一带。

6、兴安夺枪

‘联指’南北夹击失利后，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桂北武斗民兵师司令部成员曾明轩、李年生与地区‘联指’头头唐廷国、廖祖迪、唐贵才(兴安)等人和桂北五县武斗组织的负责人，在灵川县委小会议室开会，分析失利的原因是：士气不高，武器不好，而武器不好是主要的，因此，决定到兴安‘四五三’国防仓库去夺枪，并成立了‘夺枪指挥部’，总指挥是曾明轩，成员有伊景春、唐廷国、廖祖迪、李年生、唐贵才等。

夺枪开始以后，市‘联指’曹铁军等人五一饭店，布置动员郊区和桂南各县的武斗人员前往兴安夺枪。在夺枪指挥部的组织指挥下，从六月三十日上午九时五十分起至七月四日，先后有地区十二个县武斗人员、桂林市‘联指’、柳州部分‘联指’成员，连续五天对‘四五三’仓库发起十一次冲击，最多时达一万多人，少时也有五、六百人，他们从‘四五三’仓库夺走各种枪支五千六百三十六支，各种弹药三百二十五万零七发，各种手榴弹十二万四千四百二十八枚，爆破筒一百一十四根，各种军需物资和私人物资七百八十三件。

7、西线激战

兴安夺枪后，‘联指’枪多弹足，‘桂保总’在芦笛岩附近的苗圃召开南北联合会议，会议由曹铁军、曾明轩、徐孝治等人主持，李年生、丁绚、‘五四铁笔’负责人张燕生以及各县武斗人员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丁绚提出的‘南北佯攻、西线突击’的作战方案，决定在西山一带组织一次大打，向‘造反大军’发起总攻。

七月十三日凌晨，各路‘联指’武斗人员分别从西、南、北三面向‘造反大军’发起总攻。在重点突击的西山一带，在炮兵的支援下，‘联指’一度占领了桥头山、雷劈山，后因遭到对方的猛烈反攻，被迫撤离雷劈山。

七月十七日晚十时，‘联指’向西山发起进攻，打死‘造反大军’红卫师三人，俘虏八人。

七月十九日，‘造反大军’下属组织出动了一个武装连，进攻并夺取了恭城县武斗人员驻守的白岩山阵地。在阳朔武斗人员支援下，恭城又夺回丢失了的阵地，并将对方武斗人员围困在半山腰进行围歼，对方除少数几人侥幸逃脱外，其余四十多人均被打死。

同日，‘造反大军’为了夺回白岩山，因一〇四部队礼堂驻有‘联指’武斗人员，无法通过，于是炮击一〇四部队礼堂。同时，为了摧毁‘联指’设在东方红玩具厂的炮兵阵地，炮击中，由于方位，距离没测准，致使越校中弹。

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桂保总’徐孝治、丁绚在乳胶厂宿舍区指挥荔浦和市‘联指’武斗人员，再次强攻雷劈山，激战中，荔浦‘联指’死四人，市‘联指’死八人，伤十多人，对方‘红卫师’死五人，伤四人。

七月二十七日至八月三日，‘联指’又以数连的兵力向‘造反大军’据守的飞凤山、雷劈山、打靶场等地多次发起进攻，双方反复激战。

此时，‘造反大军’已无法向南推进，在军事上采取以攻为守，隔榕杉湖炮击，固守阳桥、榕杉湖一带。这次大武斗，参战人员之多(两派逾万人)时间之久(两个月)牵涉面之广(十二县一市)，均属罕见。

武斗期间，交通中断，工厂停工，商店关门，学校停课，机关无法办公，近

郊农民无法生产，人们不能正常生活，整个山城陷于一片混乱，恐怖之中，据不完全统计，桂林市死于这次武斗之中的武斗人员和无辜群众共四百零六人桂林地、市及十二个县的武斗人员一百九十八人，两项合计为六百零四人(不包括桂铁及外地在桂林被打死的人数)。

说明：我之所以引用上述官方资料，并不是因为这些资料十分公正和真实。可以说，即便是广西 1983 年“处遗”后编写的官方资料，因为在当时中央“宜粗不宜细”的方针指导下，在文革中是韦国清的坚定支持者及合作者的广西区党委第一把手乔晓光的直接领导下，广西的“处遗”及资料编纂，就不可能是十分公正的，因而也就不可能是十分真实的。这是广西文革历史遗憾的一页。但与《市志》相比，前者还是比较可信一些。

（未完待续）